George Konrad

[匈牙利] 哲尔吉 · 康拉德——著　徐芳园——译

A Guest in My Own Country

A Hungarian Life

客居己乡

一段匈牙利生活

欧洲知识分子的匈牙利回忆 | 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获奖作品

人民日报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

作者:[匈]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ad）

译者:徐芳园

ISBN:9787511556967

本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授权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离去与归来

Departure and Return

1945年2月，我们坐在一节纹丝不动的运畜车厢的长凳上。车门敞开，疾风经过积雪的平原呼啸涌入车厢，把我定在原地动弹不得。我不想长期客居布达佩斯，我想回家——旅程为时一周——回拜赖焦新村[注]。我们的父母在那儿被掳走，而我们在驱逐行动前一天设法离开了那里。假若我们晚走一天，就会葬身奥斯维辛。我当时十四岁的姐姐有可能幸存，但我只有十一岁，门格勒医生[注]把我所有同学，一个不落地，送进了毒气室。

关于双亲的下落，我们一无所知。我已不寄希望于此：从楼梯走到玄关再到浅蓝色的客厅，发现一切如故。我觉得我在那里将什么都找不到。但是如果我闭上双眼，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重现往事：走下楼梯，跨过漆成黄色的铁门，然后看见瓷砖烤炉旁的父亲，摩擦着双手，微笑着，闲聊着，蓝眼睛扫视每个人，带着一种信任又顽皮的凝视，仿佛在问："我们彼此理解，不是吗？"饭后他会去阳台，在躺椅上伸展四肢，点一支长长的、插在金滤嘴里的孟菲斯牌香烟，翻阅报纸，然后打盹睡去。

从我记事以来，我就有种隐秘的怀疑，即身边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像孩子。我发觉我的父母也是如此，毫不担心我们偷听，他们会在全家合睡的大床上开玩笑取乐：就像姐姐和我会做的那样。

从五岁起我就知道，要是希特勒赢了，我就会被杀死。有一天早上，我坐在母亲的腿上问，希特勒是谁，为什么说了犹太人这么多坏话。她回答说她不知道。可能他是个疯子，可能只是残忍。有个人说

犹太人应该消失。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消失呢，就算我们消失了，我们又该去哪里？就因为这个希特勒，我的保姆满怀热情追随的希特勒，想出了这些疯狂念头，好比说把我们打包送到其他地方去。

希尔达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她怎么可能因为我消失而高兴，同时又每天早晨如此温柔地给我洗澡，跟我玩耍，让我依偎在她身边，甚至有时候和我一起溜进浴缸？对我这么好的希尔达怎么会希望我发生不幸呢？希尔达很漂亮，确实漂亮，但也蠢得很明显。我很早就断定任何威胁我的东西都愚蠢透顶，因为我人畜无害。我不同意任何一样对我有害的东西能算得上聪明主意。

从我记事以来，我就觉得自己像是那个五岁孩子，骑着自行车一路冒险至巴尔克乌桥，然后凝视桥下的河流。它在夏天仅宽八或十米，黄浊的河水在长满青草的河道里流动，假装温顺却暗藏旋涡。到今天我依然是那个男孩，丝毫没有改变。春天，我从桥上看着涨水的河流卷走整幢房屋、连根拔起大树，看着它冲刷堤岸，看着牲畜残骸漂过。你可以在房子之间划船，河岸附近的街道都沉入了水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完全依靠，危险四处潜伏。碎塔内部空气幽凉，略有霉味，且蝙蝠遍布。我被老鼠吓到了。土耳其人曾经围困它并最终攻下了它。这是一片荒凉之地，一片占领区，无数军队曾在此经过，无数亡命之徒、强盗、乡村土匪和赏金猎人曾在这片平原上疾驰。居民躲到沼泽地里避难。

在我的童年回忆里，人们有一种缓慢的谈话方式：绵延不绝，并且热忱亲切。他们交流起来不紧不慢，不期望即时得到回复。牧民在每天下午赶牛回家时将鞭子抽得猎猎作响。还有比豪尔的持刀者：打断星期六晚上的舞会可能导致一场刺杀。

长发卷曲在头两侧，背带吊着裤子，我就以这副模样走进了客厅。椅套是蓝色的，桌布也是。客厅通往阳台，那里洒满阳光，还有奶酪点心和热可可等着我大驾光临。我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也注意到了当天为我工作的很多人，这才得以进入客厅。浴室的取暖炉和客厅里的瓷砖烤炉都点上了火，卫生也已打扫完毕。从厨房传来烹制食物的声音。

我支起耳朵静听：这可能是矮小的托特先生，来送水牛奶和水牛黄油。夏天，在去瓦劳德[注]的路上，透过火车窗户，我能看到他的牛群懒洋洋地浸在一个大水塘里，几乎不把头抬离水面。托特先生的个头比我大不了多少。他展开用来装钱的镶边手帕时非常优雅，里面也包含我们每月付的乳品费：牛奶、奶渣和酸奶油，样样纯白，好比水牛通体漆黑。

我当时希望长得高大强壮，然后抱着希望捏了一下我家车夫的肱二头肌。它有着漂亮的凸起形状，我想要我自己的也能同样黝黑厚实。安德拉斯和他的马久尔卡会用水箱推车从自流井那里运水过来。女人们则每人带着两个水罐排队等候。我记得安德拉斯和久拉，以及薇尔玛、伊尔玛、尤利什卡，厨房的雷吉娜，还有安妮、希尔达跟育儿室的利维娅。

炉火还在瓷砖烤炉里噼里啪啦地烧着。在灰烬开始崩塌前不需要关烤炉门。我摸着它的边缘，在餐桌旁坐下，椅子上放着一个靠垫。九点了。我的父亲八点下去店里；他的助手和差役在门口等着他。我会在姐姐埃娃和保姆的陪伴下吃早饭，他不会在场。母亲要是能腾出空来，过一会儿也会加入我们。她会把她的钥匙放到蓝桌布上。开关各种门和抽屉要花很长时间。

这可能是我的第三个生日，是个星期六。明亮的阳光在我家后面犹太教堂的黄墙上跳跃不定，令人目眩。花园里的栗子树和酸樱桃树

已经萌发新芽。客厅很安静，但是我听得到餐厅里传来的窸窸窣窣声。我不期待门打开，因为门一开我就必须公开表达我的快乐。你一旦得到礼物，就必须和他们玩耍。你能在摇摆木马上坐多久？

大新闻是鹳在犹太教堂约柜旁的塔上安了家：严冬没有摧毁它们的巢。一座塔住着全家，另一座专属一家之长：傍晚时分，给一家老小分配完打猎果实后，它会退到那里冥思，单腿独立，长喙收起。

装柴火的箱子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它和燃烧的橡木的香味混合在一起。从这里，我们可以行进到我父母的卧室里，那里被母亲衣柜的味道占据，无处不在的薰衣草味，驱蛾剂的味道。另一重激动人心的气味交响乐呼唤我前往厨房，但是我们这会儿还在吃饭（好吧，可能只是一块奶酪甜点，来配我加了牛奶的咖啡）：洋葱和带血肉块的味道太冲了，我也没准备好看到一只家禽躺在石头上，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射到白色的搪瓷盘子里。（用人们会让它凝固，然后配上炒洋葱，做成上午的餐前点心。）

早餐棒极了。现在让我们认真计划接下来做什么。我们会下楼来到父亲的五金店，店面宽十米长二十米，有个当仓库用的地下室。只要是铁做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找到——任何琼卡-比豪尔县居民用得上的东西。之所以叫琼卡-比豪尔（“残破的比豪尔”），是因为相邻的特兰西瓦尼亚[注]，包括其首府纳吉瓦劳德[注]（连同我大部分家族成员，说匈牙利语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匈牙利分离出去，然后拜赖焦新村就成了比豪尔县残部的中心。所有人都会在每个星期四过来赶集，进行采购，甚至有人从边远村庄赶来。

在那天，一大早就开始热闹：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冬天马车还要垫上滑轨。就算是儿童房紧闭的窗户也不能完全隔绝马蹄的声、马儿的嘶鸣声、马车的辘辘行驶声和牛的哞哞叫声。父亲的五金店里挤满了讨价还价的顾客，时不时穿插着一阵阵由衷的欢乐。他的

助手们认识大部分顾客，依葫芦画瓢地还价，而年迈的玛丽阿姨和亚诺什叔叔也毫不让步。父亲的雇员都是跟着他从学徒做起的；他们从十三岁起就接受他的训练。开门之前他们会打扫油腻的地板，然后呈“8”字形把地弄湿。助手们穿着蓝色工作服，记账员穿着黑色丝绸夹克，而父亲穿着深灰色西服。铁和木屑的气味从我身边飘过，接着是马车轮轴润滑油的气味，再之后是用来包裹狩猎武器的油纸味。我可以闭着眼睛分辨钉子和铁丝，光凭闻味。屋子充满了人、靴子和上午点心的气味：面包、生培根以及插在刀尖上送进唇髭下方的洋葱块。

拉约什·乌维格什可以一次照顾三个顾客，用各种方式抛出寒暄和鼓励，还能抽时间问我“过得怎么样？”。他精确地知道你的马车需要什么，在拜赖焦新村，没有一个工匠的手艺是拉约什·乌维格什不懂的。“只要观察活是怎么干的就行了”是他给别人的人生建议。我看见过他一只手卷着烟，同时架起锯子，修理自行车。所以，活就是这么干的。他热爱干活：熔铁、修电路、从蜂巢取蜜——对拉约什来说，都纯属娱乐。他和老农民开玩笑，但不失尊重。他的胡子散发出一种好闻的润发油味，就像我祖父的，老头子给了他一些自己的润发油。如果有理想胡子蜡香味这种东西存在，那就是它了。

1950年，当我父亲的生意收归国有时，拉约什·乌维格什被任命为经理。当时已经有二十二名雇员，店铺扩展到了公寓的第二层，还把隔壁的犹太教堂当作了仓库。在所有助手中，他是这个职位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不如父亲。

伴随着一记喜庆的鼓声，镇里的宣告员高声宣读出公告。一支军乐队列队走过。乐队指挥，通常身体肥胖，用充满仪式感的姿态挥舞着他长长的、带条纹的指挥棒。队伍最后，一个矮小的吉卜赛男孩用力击着鼓。歌词变得越来越令人不悦，其中一首是这么开头的：“犹太人，犹太人，肮脏的犹太人！”父亲做的只是关上门。

马粪和牛粪的气味充斥街头。不管大街扫得多彻底，马车和牛车甩下的秽物还是紧紧粘在鹅卵石上。畜群也成排经过，从早到晚，机智地分散开来，占据小巷。牛和鹅像人一样巧妙地找到回家的路。

到今天我还能闻到水池的气味，那里装着来自自流泉的缓慢水流。每星期天晚上它都会被抽干。直到清理干净后才会开始重新填充，这一过程会持续到星期三晚上。井水带着铁和硫黄的气息，从地下几百米处涌上来，赋予了水池壁锈褐色的外表。它是我们的饮用水，用搪瓷罐运到房子里，然后装在玻璃细颈罐里呈上餐桌。洗漱用水则用马拉的水罐车从井边运过来，倒进地下室，然后用水泵抽送到阁楼。从那里，它就能通过水龙头流到浴缸。维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运转需要很多人的工作。我至今仍能听到女佣们唱歌。我们曾有一个年迈的女厨子，雷吉娜，一个温柔的人。当她生气时，她咒骂的是："但愿他被小雨淋着！"

我能听到教堂会众唱"独一的主"。犹太教堂散发着祈祷披肩的酸味，而祈祷声有时候融进嗡嗡轰鸣的背景声中难以分辨。我可能在教堂庭院里和一头山羊打过一架，抓着它的角试图把它推开。它会略微后退，然后用角一顶，把我撞仰在地。

我的家族居住在农村地区，大部分来自比豪尔县；一些来自纳吉瓦劳德，另一些来自拜赖焦新村、德布勒森[注]、米什科尔茨[注]、布拉索夫[注]和科洛斯堡[注]。他们是说匈牙利语的犹太人。大多数人现在都去世了。我的五个表亲死于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注]。父亲的三个姐妹和母亲的两个姐妹都遭遇了同样的下场。我的一个舅舅在街上被箭十字党——匈牙利法西斯党——当头开枪打死。

父亲那代人受的是文理中学[注]教育，而我这代人——有纺织工程师、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作家——毕业于大学。前一辈人曾是商人、工厂主、医生、银行家、药剂师和配眼镜技

师，在被驱逐出境前都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成员；我这一代则成了知识分子和批判者：领导反对自己父亲的罢工运动的左翼工程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的被开除医学生和具有反叛精神的人道主义者。

我母亲的家族更为富裕，这是我外祖母，而非外祖父，注重实际和具有生意头脑的结果。与其说我的外祖父是个商人，不如说他是个读书人，但是他有一个极具商业天分的女婿，通过他，家族生意扩张到家具厂、沥青石灰厂和伐木林。外祖父算不上严格的正统派，但是个虔诚的信徒，广泛阅读犹太经文。他同时在纳吉瓦劳德的改革派和正统派的会众委员会活动。他爱好繁复的仪式，但也热爱美好生活：对他来说，从九点工作到十二点就够了。接下来是家庭午餐，午后咖啡，以及用完晚餐的阅读时间——在他自己的独立房间里，因为到那时他已经受够了孩子和家庭生活的喧闹。

他会从纳吉瓦劳德赶来拜赖焦新村参与逾越节宴席。我作为在场的人中最小的，朗读《哈加达》[注]问题，而他则朗读答案。我们的《哈加达》——包含节日和流亡纪念的《圣经》章节的书——用杉木装订并以马赛克图案装饰。上面还有几幅画，具体来说有四幅：明智的儿子，邪恶的儿子，当商人的儿子，以及头脑太简单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发问的儿子。我尤其喜欢那个不知道如何发问的，但外祖父说这角色不适合我，因为我老是用问题烦他。

在晚间仪式中，一杯葡萄酒会被放在两扇窗户之间，供奉给先知以利亚。到第二天早上酒杯就空了。我对先知以利亚的来访十分着迷。有一次，在育儿室，我听到相连的餐厅传来声。我从床上蹦起来，透过门缝张望。我看见穿着白色长睡衣的外祖父拿起酒杯，将酒一饮而尽。外祖母去世十年后他再婚了。他当时八十岁。

我们也有一棵堆着礼物的圣诞树，姐姐会弹起《平安夜》这首钢琴曲，我们把它称为“寂静的夜，神圣的夜”[注]。我的父母不会提到耶

稣，但是我的保姆说他会带来礼物，甚至装饰圣诞树。我把他想象成一个飞行的、鸟儿般的造物，和以利亚相反——他乘着火战车从天空雷鸣而过。但是到最后，我猜他们俩一个都没来。

我的曾祖父沙拉蒙·戈特弗里德是第一个定居拜赖焦新村的犹太人。他在18世纪末到达，并开了一家酒吧，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沙穆埃尔。沙穆埃尔最终拥有了七十英亩土地，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令人尊重并维持秩序，既不容忍粗话也不容忍喧闹，而他的产业服务的顾客包含当地的恶徒。从他的照片上看，他有着专注的、很可能是蓝色的眼睛，戴着宽檐黑帽，穿着一件纽扣扣到脖子的白衬衫——是个意志坚定的硬汉，肤色黝黑，坚韧不拔，并留着分成两部分的胡子。他也作为鳏夫再婚了，当时七十七岁。拜赖焦新村的犹太墓园里，他们及腰高的大理石墓碑上唯一的文字是希伯来文。

人人都说我的祖母卡罗琳娜·戈特弗里德是一个和善且好脾气的丰满老妇人。她有三个女孩，接着是一个男孩，即我的父亲约瑟夫。她溺爱她的独子，当她过河去圣马丁的酒吧拜访她的父亲时，她会将小约西(注)打扮起来，穿上海军装和黑漆皮鞋，然后带他乘出租马车，招来不少讥讽。卡罗琳娜带着约西坐租来的马车去看望他的祖父时也是一样的情形。她在那座房子里穿裤子，至少上桌时如此，因为帮手、用人与主人一同在桌上吃饭。

主人，即我的祖父伊格纳茨·康，是个锡匠，他和他的雇工们生产水桶、罐头、浴盆和本地工匠用得着的其他镀锌铁制品。当工厂制品席卷市场时，他闷闷不乐，不得已转行做零售。到世纪之交，他于1878年创立的五金生意已是本地区最大了。

我的祖母在四十三岁时发现自己再次怀孕，略为尴尬。（显然，在那个年代，卡罗琳娜和伊格纳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做爱这件事，还

是瞒着人更为合宜。）这次怀孕的产物是我父亲最小也最喜欢的妹妹，漂亮的玛丽什卡，兄弟姐妹中最受宠的孩子。

在拜赖焦新村废弃且荒草丛生的犹太墓园里，他们俩与人等高的黑色花岗岩墓碑仍静静伫立。那里已有几十年无人葬入，也就是说，自从人数约为一千的整个犹太群体从村庄里消失后。拜赖焦新村也自此变成一座小城市。伊格纳茨活得比卡罗琳娜长，他叫人在她的墓碑表面刻上这句话："你是我的幸福和骄傲。"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墓园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是子弹并没有在花岗岩柱上留下太多刮痕，它们将长久伫立于此——我是说，如果没人打算拆毁它们的话。

当我在布达佩斯什普街上对负责分配墓地的官员朗读父亲的资料时，那位掌管巨大登记簿的老先生拍了一下额头说："我记得他。名声不错。可靠，不欠账。"显然他曾经作为旅行推销员拜访过我们。父亲倾向于购买工厂制品，对这些包里装着样品的游荡者保留意见，但是同时他对人有同情心，还富有幽默感，和他相处起来很愉快。他是一个厚道的人，从来没想过他的债务人有可能逃之夭夭，而他们通常也不那么做。对于较穷的顾客，如果付不起钱，他会让他们赊账，他确信迟早他们会设法还上。他从来不买卖不可靠的五金。任何跟他相关的东西都牢靠异常，水壶也好，自行车也好，承诺也好。

父亲阅读好几种报纸，在战争初期开始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匈牙利语广播。我对BBC的四记敲击声有种亲切的熟悉感，因为当父亲试图在电流干扰音中听清新闻时，我会依偎在他身后。到了战争中期，他也听莫斯科方面的新闻。我们不得不关上门窗：集中注意力将旋钮如此这般地转过四十九、四十一、三十一和二十五短波频道，我们这样是在进行颠覆活动。

家庭相册（在战争末尾遗失）里的一幅老照片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祖父、我的姑姑们和我的父亲都趴在一个漆成白色的圆盆上，头歪向一边，要不是有根电线从圆盆里伸出来，这幅景象算是相

当怪异了：其实他们是围在听筒旁听20年代最早的电台广播。姿势不舒服，但是值得为此大费周章。

当时我还不够格参与这情景，但是到了战争期间，在每天的两点差一刻，我会坐在沙发上，待在父亲身后，在静电干扰中聆听新闻，真正的新闻。声音断断续续，你真得竖起耳朵听。我九岁的耳朵负责补充父亲漏听的部分。我对“这里是伦敦”产生了强烈的喜爱之情，以至于在1944年5月，盖世太保以利用阁楼上的秘密无线电发报机给BBC发送情报的罪名逮捕父亲时，我因父亲的罪名如此高尚而感到自豪。对他的指控完全是捏造。

我的巴伐利亚保姆，美丽的金发希尔达，因为希特勒抛弃了我们：她的父亲禁止她为犹太人工作，不管她和我们待在一起多自在。之后热心的匈牙利姑娘利维娅来到我家，她不仅德语和法语说得好，还会弹钢琴。她将及腰的金发编成辫子，我看她梳头发怎么也看不厌。天主教徒利维娅爱上了父亲的会计，埃尔诺·沃什海吉，一个安静、瘦高且博学的人，还是当地足球队的骨干。埃尔诺·沃什海吉很英俊，但他是犹太人，这让利维娅有些犹豫。我们经常跟着保姆一起去足球场，坐在窄小的木制楼梯板上；其他人要么站在山坡上要么坐在栅栏上。每当埃尔诺·沃什海吉踢进一球，利维娅和我就会捏紧手掌。偶尔这个诚实的人会坐上餐桌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但没多久他就应召参与强制劳动，再也没回来。

每个星期一，本地的商人都会聚集在父亲的店里评价前一天我们球队——县里的英雄——的表现。漫长谈话的其他主题包括雨（珍贵的）、旱灾（令人担忧的）、小麦的价格，以及那个疯子到底想要干吗。政治话题主要和其他犹太人讨论；否则还是管住舌头为妙：法西斯主义已经渗入了一些聪明人的头脑里，对他们来说，只有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特里亚农会议上失去的说匈牙利语的领土。

我的祖先作为犹太中产阶级匈牙利人度过了一生。我的父亲是整个镇大约一万两千人中最大的纳税人。因此，他被授予绅士俱乐部“赌场”的会员身份，尽管他从来没去过那里。钉在通往其产业的街道入口右侧的是一张门柱圣卷，一张装在珍珠母盒子里的羊皮纸卷，上面有手写的“什玛”经文，安息日祷告语的核心部分：“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他以外并无别神：禁止崇拜动物形或人形异教神祇。

门柱圣卷下方是一块小小的金属匾额，刻着匈牙利在1914年的历史轮廓，在里面用纯黑色画着1920年的领土，仅剩原来百分之三十的大小，上面还写着标语“不，不，绝不！”——意为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损失。我家族的成员们认为自己是好匈牙利人和好犹太人。这两者在“二战”之前并未被视为分离的概念。

匈牙利政府参战投入德国阵营，抱着收复失地的目的，愿意送五十万犹太人去德国集中营作为交换。这生意做得糟透了，因为最后他们不但失去了犹太人，还失去了领土，落得满是耻辱。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认为：还有些人觉得，尽管有很多匈牙利犹太人死在了奥斯维辛，但数目远远不够。

村庄中间的匈牙利国旗在半旗状态飘扬，每当一块国土回归匈牙利，它就会升高一点。在3月15日，1848年独立战争纪念日，犹太小学的孩子们会穿着白色衬衫和深蓝色短裤在小学前面做节日游行。

父亲参与了收复罗塞尼亚[注]及其主要城市——乌日霍罗德[注]和穆卡切沃[注]——的运动。他有一件炮兵军服，上面缀着一颗白星，说明他的军衔为一等兵，又有红饰绳表示他是文理学校毕业生。周末他会穿上军装和靴子，在乌日霍罗德的宾馆和母亲见面。

我在军衔上比父亲升了一级，当了下士。（我的儿子米克洛什没有继承这个传统，在法国陆军军衔没升到二等兵以上；事实上，他因

为跟长官顶嘴，被扔进了牢房。）我从七岁开始就对军事事件感兴趣，祈祷蒙哥马利将军能在非洲打败隆美尔将军，以及同盟国能攻下突尼斯和比塞大[注]。我是个爱国主义者，能为匈牙利感动落泪，但同时为也能为盟军胜利而落泪。根据我从新闻片中得知的信息，我试图想象斯大林格勒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注]。黑暗中躺在铜床的床罩下，我会用大拇指轻轻地按压双眼，接着新闻片就会在脑海中播放，画面中出现我自己版本的匈牙利和德国制品，所有的坦克和重型火炮，以及在星夜中逐渐消逝的空战。

蒂萨河[注]以外天空更加开阔，道路也比多瑙河以西更泥泞。这是匈牙利东端，在这里你一度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光脚走路的人群，以及众多穿着深蓝色粗麻布围裙站在家门口的老人。这曾是一幅恒定的画面，就像在湖泊中凝视前方的水牛那样恒久不变。

坐火车来到拜赖焦新村，我跨越铁轨间的红色炉渣，然后经过绿色铁栏杆，到达铺着黄砖的站台。戴红帽子的信号员用他的信号盘向我致意，电报机在他身后叮当作响。那是70年代某段时间，我躺在比豪尔宾馆的房间里，离我的儿时故居仅几步之遥。没有热水，厕所门关不紧：你得抓着把手。尽管苍蝇落在我全身上下，我并没有拍它们。在炎热中，我喝了很多帕林卡[注]。站台边，公交车发动机发出连续不断的隆隆声。马路对面的电影院里，吉卜赛孩子们和战前一样，在亲吻时发出响亮的声音，只是现在不允许往地上吐南瓜子和瓜子壳了。

我仔细端详我们的房子，在布满裂缝的小路上漫步，挨着幸免于难的可怜棚屋。在我旧时常去的院子里冒出一对夫妻。玩洋娃娃的小女孩现在垂垂老矣；她们长得像她们的母亲，男孩们则像他们的父亲。很多脸从栅栏往外张望。凝视中带着冷漠。

我也去了市场。几乎所有东西都变了：卡车和拖拉机扬起灰尘，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四处疾驰。没变的是女人的喧闹声，鹅和鸭的嘎嘎叫声，公牛拖着长音的嘶吼，新鲜的马粪味，和成堆的杏子和嫩马铃薯。旋转木马还在那里，棉花糖小贩和摆满折刀的桌子也在。你还能买到翅膀咔嗒作响的木头小公鸡。然而，房子门前那个会有一两个老人坐在上面抽烟杆消磨时间的长凳，和刺穿所有物品、显露出它们缓慢衰败过程的强烈光线，现在都已消失。

我想我曾打算就某事下定决心。一个炎热的下午，在窄似棺材的宾馆房间里汗湿的床上辗转反侧了一阵后，我沿着主街漫步而下，穿过足球场。没人跟我说话。有时候我有种被监视的感觉。在一个小巷的酒吧里，一个臭气熏天又声音粗哑的醉汉突然开始唱歌，接着又不唱了，然后盯着窗外看。

一个老人，在他铜色带刺青的躯体上只穿了一件夹克，跟我谈起了过去：我当时喜欢跟他在一起坐在马车的车夫座位上，他则会把鞭子递给我。他是安德拉斯，我家之前的车夫，那个有着硕大、引人遐想的肱二头肌的安德拉斯。安德拉斯是那个用上了蜡的刷子滑行来给我房间的油毡抛光的人，是那个搬柴火上楼的人，是那个在浴室的铸铁炉子里生火让我起床后有热水洗澡的人。在公园里那个位于邮局前面国旗后面、缓慢流淌的自流井旁边，安德拉斯的马久尔卡拉水罐，他则一桶接一桶地给水罐装水。很有可能，安德拉斯从来没有体验过躺在浴缸里的感觉。用人们每星期在洗衣室的镀锌锡桶里洗一次澡。我会小心翼翼地走进浴缸，在我的保姆去准备我的熨平的白衣服时，女佣会看着火不让它熄灭。洗衣皂的气味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女佣有用人的气味，男仆有男仆的气味。

女佣不会简单地从我母亲的手中取走报酬；她会抓着她的手并亲吻它。我的父亲在递给雇员装薪水的信封时会和他们握手。我不记得车夫或者我们的女厨子曾在任何房间里坐下——在厨房里会：安德拉

斯会坐在厨房的板凳上，用一把搪瓷勺子搅动厨子直接从壶里舀到他碗里的浓汤。餐桌上从来不会出现壶，上桌的只有一个瓷汤盘和一个分汤用的银汤匙。用人会花整个下午擦亮银器。

我虔诚吗？因为我祈祷，所以我是虔诚的。但是儿童是享乐主义者，享受宗教的某些方面而拒绝那些剥夺娱乐的方面。我享受酒，但是我只能在逾越节的晚上尝到，在那时我可以把小拇指放到酒杯里蘸，然后舔它。桌上的辣根代表苦涩，蘸了蜂蜜的面包则代表好运。主持完仪式后，外祖父会聆听我的疑惑，然后说上帝有很多形象，但他比任何形象都强大，因为上帝总是超越画像的。

我们是科哈奈特族，科恩族[注]，也就是说，亚伦[注]和守护约柜的祭司们的后人。我的外祖父也是科恩族，不过这个族称是父子相传的。只有科哈奈特族才有权力将《圣经》五书从圣幕中取出，拿着它绕会堂祝福会众。特殊的洁净规定禁止他们迎娶离异妇女或者踏入墓地：任何触摸圣卷的人都不能与死者接触。至于我，我娶了两个离过婚的女子，并且喜欢在墓地里散步。

父亲坦然面对他担任的职责，不想在镇里或者会众里充当领袖。他就是他。我的父母并没有比其他犹太人更为同化；他们只是更加靠近整个世界罢了，所有的宗教和民族都在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带着复杂的感情，但是缓慢而坚定地，在超越民族界限适应现实生活，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都是被同化者。但是我的表弟伊什特万和我是犹太小学里仅有的不参加《塔木德》[注]课的学生；有一天，在上课的那座粉刷一新的平房里，半块砖头从满是灰尘的院子的栅栏间翻滚而过，落到我的头上。其他人放学后一点钟到家，但是三点还要到犹太学堂，也就是宗教学校，投入犹太法律及其释义的学习中去。因为要在教室待到六点，他们看起来病恹恹的。我则强壮得多。当时流行恶斗。孩子们会站成一圈把敌人围在中间，然后扑上去厮打。我们在一

块定时上油的地板上打架。抓着肩膀把对方按倒在地上不能动弹的那一方获胜。如果失败者的口鼻流了点血，胜利就更为甜蜜。

即使在童年时期，笔也是我最喜爱的工具，虽然我也组装飞机模型，甚至用钢丝焊了一个。对我来说，修理自行车轮轴或者修补内胎并不比挠鼻尖难多少。螺丝刀和锯子很趁手。没什么比观察工匠大师更让我享受的了：我热爱看锁匠、铁匠和收音机修理工干活——他们都是父亲的顾客。纳吉，医院的主工程师，我认为他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而他从来不能把油污从手上彻底洗掉这一点，也得到了我尊敬的赞许。

事实上我在筹备一个与他类似的企业，一个飞机工厂，打算建在我们滑冰的湖后面（夏天鹅在里面游泳）。所需的只是一小块牧场的土地。显然我应该先去沙罗什保陶克[注]的英国文理中学念书，然后去牛津或剑桥。带着毕业证书归来，我会继承——或只是经营——父亲的五金生意，并自此开始生产。那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生产飞机呢?一开始做小型的，但很快就转移到客机生产，因此有一天拜赖焦新村的所有人都能坐着牛车到机场，坐一次免费飞机来消遣，从空中感受一下代赖奇凯、米凯佩尔奇、扎卡、富尔塔、绰克莫甚至鲍孔塞格[注]。计划就是这样。

我的表弟伊什特万·扎多尔比我小一个月：他是金牛座，我是白羊座。我们在同一间产房出世。他是个漂亮的粉色小东西，很安静，而我（脚先出，脖子上还缠着脐带）出生时浑身通红，光秃秃的，还非常痛苦。我的母亲羞于展示我的尖脑袋，在我父亲来探望前用编织帽盖着它。到今天，想到我缠着父亲问关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问题时他脸上的表情，我还是会大笑。“你可是个丑陋的小不点，”他会说，接着安慰般地加了一句，“但是你最后长开了。”

伊什特万和我都出生在德布勒森的大学诊所里，尽管我们住在拜赖焦新村。我们的家族是匈牙利大平原地区最富有的两个犹太家族。约瑟夫·康拉德，我的父亲，一般被认为是两者中较富裕的，因为他在主街上有一个多层的房子，但是实际上他的表哥贝拉·扎多尔更有钱，还多一个大学学历。

我父亲只有商业高中教育程度，是在塔特拉山脉[注]里的一个古镇凯日马罗克[注]完成的，那里是一个重要的撒克逊——即德国——社区的故乡。尽管我们家族的母语是匈牙利语，但是当时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将男孩们寄宿到一户说德语的家庭的做法也说得通。我父亲最终住到了一个数学教师家。他会带着家里的年轻女士在城堡的墙上散步，或在多布希纳[注]的冰窟里滑冰，那里的雪在夏天仍不会完全融化。这个洞窟强有力地支配了我的想象。好几次我问父亲有关洞窟的事，晚饭后他躺在阳台的躺椅上，语言滔滔不绝漫无边际。我所知道的只是那个年轻女士有一身红色的滑冰套装，以及父亲还搂着女孩做了几个花样滑冰动作。

伊什特万和我在学步车的帮助下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而我们的母亲在一旁聊天。她们是姑嫂和朋友。伊什特万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妹妹，他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表哥。玛丽什卡，这个小美人，很早就被她的表哥贝拉·扎多尔看中了。

在我刚开始上学的那几天，我的家庭教师利维娅和我一起坐在课桌前。每当她站起来，我就开始啜泣，以为她要把我丢下。第四天，她成功把自己从我身边拉开。我大声哭喊，其他人取笑我，我生气了，把每个人都揍了一顿。回到家，我宣布我不想上学，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反复重申。最终我的父母接受了这个状况，而我成了一个在家上课的学生。伊什特万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老师下午才来，我们整个上午都自由地在卡尔洛溪岸边酸樱桃树间的宽敞花园里玩耍。我们会迅速上完课，回去踢足球，割香蒲或捉青蛙。

在玛丽什卡姑姑允许的时候，小伊什特万会看着他母亲躺在浴缸里。他会抚摸她的衣服，闻她的古龙水。被叫作内内的家庭教师会大声呵斥他，叫他立刻出来，别烦他母亲，但伊什特万还是站在那里，透过起雾的玻璃看着他母亲转动她美丽的双腿。

我们在学校里坐在一起，不愿意分开。伊什特万会陪我走回家，然后跟着上楼。“你懂的，久里[注]，对吗？”他会不时提问，站在大门口。“我懂，我懂。”我会停顿思考片刻后回答。伊什特万是最好的谈话对象，我从没有和其他人说过这么多话。胳膊搭在彼此的肩膀上，我们会绕着学校的庭院一圈一圈地走。他们试图让我们闭嘴，但是失败了，接着他们打算把我们分开，最终结果是把我们丢在了同一排。伊什特万可以忍受恶作剧，但是很烦幼稚的吵闹。我知道不少人承认伊什特万比自己聪明；我就是其中一个。

伊什特万·扎多尔的弟弟帕尔比他小三岁，一直追随着伊什特万。他成了一个数学家，到现在已经在华盛顿住了大概四十年。在打乒乓球上，帕里[注]能把我们两个都打败：他铆足了劲追上这晚生的三年。他一点也不能忍受冒犯。如果一个售货员不小心说了点过头的话，帕里会用一个复合名词回答：“杂种牛蠢猪！”趁他父亲从房子里出来教训他的那工夫，我们已经坐到了溪岸边的酸樱桃树和覆盆子灌木中间。

他们住在一幢宽敞的房子里，就在我家对面。房子里还包含一家挺大的衣鞋店。售货员将英国布料剪裁出的合身西装摆出美妙身姿，还喜欢夸张地拿着布料在空中挥舞。他们有种愉快的相处方式，当女人在镜子前转动时称赞她们。

踏入我父亲的五金店，你能吸入一种可靠的铁味：钉子、铁丝、马车轮轴、犁、耙、铁炉、锅、自行车和狩猎武器。你可以用指尖检查镰刀的锋利程度，如果你想要验证它是否由精钢做成，你会用到一

块二十公斤重的、从人类记忆开端就存在的铁秤砣：你会拿镰刀头（没装把手）用力地敲好几下秤砣，然后把它拿到耳边听它的响声。

每次拜赖焦新村火车站有货物到达，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那是父亲布达佩斯之旅的成果之一。安德拉斯和久尔卡会把箱子拉回家，而我会坐在车夫座位上，得到允许给久尔卡发号施令：走（奈！）和停（喔！）。帮忙卸大箱子令人兴奋极了，里头装着火红色的瓷罐，安放在散发清香的厚实木屑层上。

伊什特万不了解这些快乐，他几乎不在意他父亲的生意，也很少踏足店里。他也不喜欢扮演乖儿子，听人说他长高了多少，忍受别人捏他的脸。打完招呼后他就会退到里屋。玛丽什卡姑姑也是如此，远远地观察店铺的活动，把事务都留给埃特尔卡姑婆，她不知疲倦的婆婆，来打理。埃特尔卡姑婆身材瘦小，长着深深的皱纹，坐在收银台的高凳上照看一切，好像她天生就该坐在那里似的。

贝拉姑父会在店里来回踱步，亲自接待几个相熟的顾客，但是他脾气暴躁，缺乏耐心，很快就会退到通往花园的房间，在笨重的皮扶手椅里坐定，陷入书房的半黑暗中；书房隔壁是玛丽什卡的房间。在那里，他会阅读日益恶化的新闻，稍晚到我家的客厅与我父亲讨论，言语间带着担忧，但不失希望。

镇里大多数上层女士都喜欢贝拉姑父店里的商品。然而，玛丽什卡姑姑却不喜欢——这意味着我母亲，她的朋友，没必要非得从他那里购置衣物。两人偶尔会去布达佩斯旅游。

这样的旅行没有旅行箱和帽箱是不可想象的，她们会被安德拉斯、出租马车夫和戴红帽子的列车服务员尽职尽责地送进头等车厢。在布达佩斯西站，这个流程会反过来重复一遍，不同的是，一辆出租车带我母亲和玛丽什卡姑姑去多瑙河边的匈牙利酒店。她们上午待在最好的裁缝那里，夜晚则在剧院度过。等她们回来，我会询问母亲哪

里是买布料、白色衣物和鞋的最佳地方，正如我询问父亲布达佩斯钢铁厂和批发商的优劣势：万事万物在生命中都有其位置。

我们都知道班里最漂亮的女孩是谁，也就是那个最泼辣的女孩。我要借这个机会透露一件事：抓住坐在我前面的芭芭·布劳的粗辫子然后拉一下真是其乐无穷。芭芭会用低沉的嗓音笑，然后告发我。我不得不拿着我的笔盒盖离开房间，因为老师会拿着它打好几下我的手。我一回去，芭芭就会轻抚我的手，然后盯着天花板，在她大而黑的嘴边挂着一丝讥笑。接着她就会把辫子放回我够得着的原位。

玛丽什卡姑姑一生都在为某件未发生的事做准备。她热爱服装，变着花样地打扮自己，并不吝花费。她买了非常多的书：给自己看的现代小说，给男孩们看的印第安故事。但是有一天她走进花园，到粉刷一新且覆满玫瑰的凉亭里，盖着骆驼毛毯休息，后来浑身蜡黄，再也没有缓过来。只有她的墓碑是纯白的大理石。

伊什特万五岁就被丢下了：母亲去世后，父亲变得忧郁。当埃特尔卡姑婆也去世后，内内接管了家务事。内内坚定地认为，适当的饮食应当由这些组成：她固定做全麦面包、菠菜糊和水煮鸡胸肉。任何人对这食物甚至只是清嗓子都会被立刻送上床睡觉。她是一个谨慎的女人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既不漂亮也不快乐。伊什特万家几乎不存在欢乐的迹象。

我们会穿着夹克、帽子和手套在主街上来回走动。我们必须请求许可才能脱掉手套或者解开夹克顶部的扣子。穿着劣质靴子的农家男孩看着我们。

当我们转动电话机的摇臂时，一位年轻女士会回答："接线员。""给我接十一号。"我会说。"给我接六十号。"伊什特万会说。我们一天会这样做很多次。"你为什么不干脆过马路呢？"那女孩会问。"请帮我接通。"我们酷酷地说，即使当时才七岁。

我们的父亲会在人行道边缘搂着我们的肩膀，直到他们觉得我们够大了，能自己过马路了，才停止那么做。汽车在当时算是稀罕又惊人的物件，但马车是川流不息的。

我们穿着夹克接待彼此，握手，带我们的客人到座位上去，紧接着进入谈论大事环节。如果我们不想让其他人听到我们，我们就离开房子，到秋天的花园里去。感受落叶在脚底下嘎吱作响真是令人愉悦。

伊什特万从来不轻声说话，每次听到琐碎无聊的话，他的脸都会流露出愤怒；我对各种各样的事感兴趣，而这些事似乎总让冷漠的伊什特万不耐烦，我试图扮小丑逗笑他。只要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就连一句“是”或“否”都饱含激动。他喜欢从观察中归纳最极端的结论；我有所保留地跟随他的逻辑：也许明天我就不这么看了，到那时，他现在所向披靡的思路可能会失去一些力量。

1944年3月19日德国人占领匈牙利的时候，我十一岁。那些我们曾经围在桌边担忧过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里不再是例外之地；新情况即将到来。一切曾经多么简单！当时发生的事情在现在看来多么滑稽！我回想起那些夜晚，我听大人们在餐桌上运筹帷幄，谋划着英国人如何从意大利和希腊攻入，发起西线总攻，因而给我们的领袖霍尔蒂海军上将[注]更多空间策划逃亡，让他能成功逃离，让匈牙利开始往中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转变。在那之前，我们的父亲们还可以平静地经商、行医和开律师事务所。犹太儿童还可以在那栋有着布满灰尘的院子和美丽祈祷室的阴郁小平房里上学，不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被老师侮辱。星期五晚上我们可以听到房子边的人行道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大人会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牵着我睁大眼睛的同学们去教堂。

在占领日，我和父亲一起坐在他卧室里紧挨着收音机。没有抵抗的消息：匈牙利部队没有做出抗争。摄政、政府和整个国家臣服在强大的德国人面前。我不怎么信任霍尔蒂。我小时候有一个按他模样做的玩具铅兵。我用军官和一整支铅步兵包围了他。它们都穿绿军装，而霍尔蒂身着矢车菊蓝海军上将军服，上面带着金色流苏。我还有一架大炮。它能将迷你炮弹射出一米左右。战场是宽大的棕色油毡表面，我把军队和材料摆在上面，分成两方。早期获胜的军队总是摄政阁下率领的那方。在我们进入战争后，炮弹开始击倒殿下，从那时起，霍尔蒂的军队就是战败方了。我会用炮弹射击他，他会仰倒在地。

那天晚上，我所有的姑父和表兄弟姐妹都坐在收音机旁。根据一则流言，一名本地驻军指挥官对德军入侵表示了不满，而我立刻认为击退德国人的会是艾杰德陆军上校率领的新村军团。不管怎样，我们在镇边缘有一个很大的军营，一支强大的驻军，还有高大的军马拉着大炮。如果摄政呼吁人民奋起为自己抗争，他可以把比豪尔县作为一个根据地。

“为什么偏偏是他？在这里？”伊什特万的微笑尤为尖刻。是的，陆军上校是个好人，并对德国人绝无好感。数年来，我一直在熄灯之后在床上构想政治祈祷语。在学校，我只和伊什特万谈论战争，课间站在走廊里谈论。我们四处张望以确保别人听不见我们。我们很快就发现别人都躲着我们。在占领日前夕，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霍尔蒂或者本地驻军指挥官都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第二天，德国坦克伫立在市政大厅和加尔文教堂前，穿着派克灰军装的士兵把守着整个地方。市民避免跟他们接触，甚至避免朝他们的方向看去。伴随着一阵节奏高昂的进行曲，排成几乎贴着彼此的队列，德国人演示了阅兵仪式该有的样子。他们把士气低沉且歪歪扭扭的匈牙利队列完全比了下去。

不久就有巡逻队在镇里四处行动，征用居民区。姑父的房子被整个占领了，表弟们搬进了我家。亲朋好友拜访我的父母来交换消息和表达困惑。父亲坐在阳台上，在阳光下闭着双眼。他不得不关门停业，店不再是他的了：门上挂了锁，贴了封条。所有贵重物品都必须上交，包括收音机。我们三个男孩睡在客厅里，更准确地说，是假装睡觉，接着打开一盏低瓦数的灯，彻夜谈论政治，利用餐柜里的核桃白兰地让自己保持清醒。

每天都有新法令出台，所以我们知道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糟。我们打乒乓球直到黄昏，幸运的是晚上不需要分开。因为缺乏玩桌面游戏的耐心，我们谈论混乱的时局。伊什特万认为俄国人会最先到，我们会有共产主义。对此我们知之甚少。从乌克兰回来的人说那里很穷：在乡下，山羊睡在房子里；在城里，很多家庭共享一套公寓。坐在高背皮椅上，我们认为，只要有公正，贫穷是可以忍受的。

对拜赖焦新村的犹太人来说，乌克兰承载着黑暗的记忆。1942年，年轻人被带到那里参与强制劳动。他们被迫裸体从一所撒满靴钉的乌克兰学校大厅里跑过。站在墙边的匈牙利警察会用来福枪的枪托打他们。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激动起来了：他们一定在喝朗姆酒。一旦他们的包裹检查完毕，这些人就可以走出去到雪中穿衣服。手表、戒指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被没收了。他们如果隐藏了什么东西，就会被送回大厅里跳舞。

随着军队撤退，他们被转移到西部。病人被送到医务营；不能走路的人由同伴扛在背上。一天晚上，雪地那边突然间火焰冲天：士兵在医务营上浇了汽油，放火点燃，把强迫劳动队伍里的生病犹太人烧死。班迪·斯韦德穿过雪地冲回去，在幻觉中看到他在军营中的哥哥朝他走来。他的同伴追着他，在守卫开枪前把他拉了回去。幸存者于1943年获释，回到了新村，继续过之前的生活。一切都和旧时相同，只是他们不怎么说话了。

我们的同学对我们既不特别敌视，也不因为我们的处境而幸灾乐祸。他们不了解事实，而且十分冷漠。他们会看着坦克，但什么都不说。“现在你们麻烦大了。”一个邋遢的小男孩轻蔑地说道，他是我们当中最穷也最差的学生。他的父亲作为修路工加入了箭十字党。学校里只有两个犹太人：伊什特万和我。学校不接受较穷的犹太孩子。

伊什特万喜欢自创一套说法，那种让你摸不着头脑的苦涩真相。“我们是班里最有钱的，也是最好的学生：他们当然不喜欢我们了。有多少人不嫉妒呢？有人喜欢一两个犹太人，但不喜欢其余的犹太人。世上的好人很少，真正的坏人也不多；剩下的既不好也不坏。如果他们让犹太人活着，那么一切都好；如果他们杀了犹太人，也没问题。任何事都没人反对。”

我们还在给客厅供暖，气氛温馨：母亲在给每个人的外套和夹克上缝黄色星星。自制星星是可以接受的，尽管私人企业响应新需求的速度很快。每个人都知道规定：鲜黄色，机器锁边，六乘六厘米。你必须把它缝得很紧，紧到铅笔不能从线底下掉落的程度：那些聪明的犹太人会把它放上去装装样子，然后随时取下。犹太报纸鼓励读者一字不差地遵守当局的指令。

一天，伊什特万和我决定，黄色星星没什么可耻的，并在镇里走了一圈。当时是春天，因为学年在4月结束，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我们穿着笨重的靴子踏过泥土覆盖的、没有铺砖的小路。女人们从带有瓦屋顶和白柱廊的门廊上盯着我们看。

我开始学农家孩子，从水桶盖上喝水。我走到邮局前的自流井边，我的好衣服好鞋子引起了在井边总是围成半圆的人群的幸灾乐祸。但即使戴着黄色星星，我还是结识了新朋友：偶尔有女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我在井边排队时会跟人简短交谈。村里的傻子，有一次打赌吃下了一整桶煮熟的豆子，他跟我要黄色星星。旁观者哈哈大笑：还是和往常一样疯狂。

然后有一天早上他们来了，花园门口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从阳台往下看，看到五个德国军官，同样数目的匈牙利宪兵，以及可笑的警察琼托什，他之前警告说要告发所有人，但如果给他几帕戈[注]他就绝口不提。还有一些黑帽子，但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盖世太保。我父亲穿戴好他的粗花呢夹克、规定的黄色星星和其他衣物，走下楼开了门。

盖世太保军官用德语告诉他，军方收到报告指控他是英国间谍并在阁楼藏了一个无线电发报机。房子被上上下下搜了个遍。我知道他没有发报机，但是想到他被指控拥有一个，我觉得很高兴。我很想仰慕他。如果他们为了一件武器而搜查他，我会更加尊敬他。

我父亲相当害怕，并且对疼痛敏感，所以我母亲，两人中较坚强者，带领德国人和宪兵搜查房子，在他们当中毫无惧色地移动，提供简洁的信息。他们拿走了一些东西——钱、珠宝、一台相机——但是没有做出重大发现。他们表现出不满，命令我父亲和姑父跟他们去宪兵营，叫他们供出藏无线电发报机的地方，以及笼统来说，哪里藏着什么。“夫人，你真的能让我们相信你们什么都没藏吗？”

从5月15日起，父亲就不再是我的而是盖世太保的了。他跟着几个宪兵和德国军官从花园大门离开。我从楼上的阳台看着他微驼的背。我从没见过他被刺刀护送。他和姑父被带走后，我们走到客厅，在那里我们的视线能透过临街的窗户跟随他们。走在前面的是盖世太保军官，后面是两个帽子上饰有公鸡尾羽的宪兵，接着是我父亲和姑父，然后是更多的佩着刺刀的宪兵，可笑的警察琼托什殿后。其他东西都和往常一样：牛粪三三两两地在热鹅卵石上被烤干，时间是5月中旬，黄色的光线落在加尔文教堂粗粗的塔尖上，成排的洋槐树无动于衷地列队于主街两旁。

父亲既不朝左也不往右看：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当一个人被武装者押送时，观察迎面而来的熟人的表情是很有启发性的。尽管父亲认识每个他擦身而过的人，他走起路来却像个踏上舞台的演员。场面并不出离愤怒，只是不寻常。一开始，那些脸上显示出困惑；接着，慢慢地，事情豁然开朗：好吧，当然了，这是下一步，他们在抓犹太人。只有母亲和我们两个孩子待在家里。

母亲觉得该做点什么。匈牙利宪兵怎么能在几个穿黑军服的德国人的命令下抓走她的丈夫呢？本地行政部门的匈牙利领导层对此怎么想？那些我们认识的先生是否促成了这一状况？

母亲穿上一件好衣裳，到警察局局长那里报告了此事件，并提出了控告。当她离开局长办公室时，一辆黑车在她身边停下，一个说德语的声音大喊："上车吧，康拉德夫人，或者你想要我把你和你丈夫关在一起吗？"他是盖世太保军官的头目。母亲点了点头。他们发了好心，把她和我父亲关在同一所监狱，但不在同一区域。宪兵逮捕了一批有钱且有名望的犹太人作为人质。他们的妻子待在家里。只有我母亲随她丈夫一起进了监狱。

这救了我们的命。我后来发现，告发我们的是一名箭十字党糕点师。我能活到今天得感谢他。他可能因为我们不去光顾他的生意而怀恨在心，尽管他的店面入口相当壮观：几头北极熊——用木板锯成，还涂了油彩——在舔覆盆子和香草冰淇淋。但是食物不如彼得里克糕点店，在那家店的黄油色瓷砖墙背景下，两个矮小且绾着灰色发髻的乌脸老太太给人端上奶油甜点和冰激凌。她们使用鸡蛋、糖、香草——真正的原料——并避免售卖一些试验性的糕点。她们不是箭十字党，每个星期天早上都去教堂，手挽着手，身穿白色丝衬衫，头上戴有面纱的深灰色帽子。她们在弥撒过后才开店门，仍旧带着教堂的肃穆感，贩卖拂晓时分就烤好但还散发余温的奶油甜点。

但是她们没有决定历史。上天把我的命运交给了她们的竞争对手，那个用画出来的冰块和海豹弥补低质量的糕点师。他通过告密信的形式为自己异想天开的猜疑找到了合适的发泄方法，并由此把我的父母扔进盖世太保集中营，因而赠予了我们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最终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躲开了新村犹太人的共同命运：奥斯维辛。

四个孩子被丢下：我，我姐姐和我的两个表弟。他们的犹太家庭教师伊比还在，因为恐惧和前景不明朗的时局，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不悦的气味。她是一个笨拙而软弱的女孩，做饭和打扫卫生总是问题多多：一切最后都会变得乱七八糟，而且脏兮兮的。

看着一种生活方式瓦解让人心烦意乱，而我观察着它一天天崩溃。父母不在场和担忧已经够糟了，但是随无力感而来的恶心更可怕。伊什特万和我认为，我们的父母犯了一个大错：我们早就该抛弃一切然后离开了，因为现在我们依然不得不抛弃房子和花园。

天气炎热，是个美丽初夏，鹤们站立在约柜旁它们通常占据的位置上。我们像疯子一样打乒乓球。星期一的小集市，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的大集市，夹克上缝着黄色星星，胳膊下夹着祈祷披肩，犹太男人们走常规路线，经过我家去犹太教堂。每天晚上我们都遵守灯火管制的条例，把贴着黑纸的板条框放在窗户上。

尽管不再被允许进入泳池，我们还是会透过栅栏偷看，观察男孩们模仿德国轰炸机“斯图卡”，从蹦床上尖叫着跳进二十五米长、用慵懒安静的自流井水填灌的水池。通常情况下，它会在星期天被抽干，然后在星期三下午重新灌满。前一年，伊什特万、帕里和我曾在这里游了四十个来回，家人还给了我们钱到泳池餐厅买辣椒填鸡和面条。

戴着黄色星星散步渐渐变得不那么愉快了。路人脸上传达的信息一般不是好感。最不懂掩饰的人会表示：“好吧，现在你们逃不了

了！”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啊哈。就是这样。他们正在把你们抓走。让他们抓吧！”就算是温暖的表情、同情的表情，都伴随着加快的脚步：匆忙的支持。我们宁愿待在花园里。我会荡好几个小时的秋千，直到脑袋晕眩。

一天中午，一队英美轰炸机在镇子上方闪烁着银光飞过。它们没往我们头上扔任何东西，只是途经此地去轰炸德布勒森火车站，并在明亮的天光中闪耀了几下。教堂钟声敲响，警报声鸣起。宪兵检查确保每个人都藏在地下室。但是我们没有躲藏；我们把头后仰，搜索天空：很好。至少在上面他们控制着一切。

我们收到一张父母从德布勒森寄来的贺卡，上面写着他们很好，仅此而已。尽管收音机被没收了，但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要藏：一包未经许可获得的面粉，几条培根。它们藏在地下室里一个非常巧妙的位置，那是房子的建筑师（伯格先生，他和我父母一样，以相同的交通方式被送到相同的集中营）在1933年展示给我父亲看的，他说这么个隐蔽之处有一天可能派得上用场。那是个很小的角落，在混凝土水罐远侧和地下室楼梯下方的黑暗中，一个只有最细致入微的搜查者才能找到的地方。我们的搜查者可没那么细致入微。

父亲的书桌抽屉后面还藏了一些钱：三包百元大钞，三万帕戈，够买一栋大房子的了。更重要的是埋在管棚下面的两个铁盒子，里面装着黄金首饰，是父亲定期用他的部分存货换来的。一个盒子埋在角落里，后来被发现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找到另一个，因为它在这个区域不对称的中心：正上方从横梁悬下来一个灰釉水壶，装着用来喂安哥拉兔的燕麦。

那些日子里，我们在院子的兔窝里养了一堆兔子。最上面两个笼子旁边的是小小的木头育婴箱，它们的门通往兔妈妈的大房间。刚出生的小兔子粉红色，光溜溜的，颤抖着一起依偎在兔妈妈的肚皮下。我想要至少用指尖抚摸一下它们，但是别人告诉我，兔妈妈闻到孩子

身上人手的气味，就会把那只沾了人味的小兔子推走或吃掉。只有在它们开始长毛后，我们才能摸它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带几只小兔子到床上玩了。

用纺轮把柔软的白色兔毛纺成纱真是件乐事。我要是不细心，线很容易断，细心的话，那个用自行车轮草率改成的脚踏式纺轮，能连续转几分钟保持线不断，轻柔地将线卷到纺锤上。线从我左手拿着的毛团中展开，我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控制它的粗细。在冬天的下午，当火炉即使关着门也散发出太多热量时，我们会把纱线卷到轴上。当母亲给我们织温暖的帽子和挪威样式的滑雪衫时，我们会听收音机传来的战时新闻和古典音乐。

不管怎样，管棚里的水壶一直挂在那里，防止老鼠糟蹋喂兔子的燕麦。尽管它用铁丝连着钩子挂在天花板上，老鼠还是沿着天花板横梁爬了上去，扑通一声掉进了迦南福地，结果那里成了它们的苦海，因为它们的小爪子爬不出水壶的釉质内壁，只能在无尽的宝藏上不停转圈，直到一只可怕的手揪着尾巴把它们拽出来，然后摔到地基上。

夜复一夜，母亲用令人钦佩的远见向我们展示她和父亲埋藏的物品。“如果我们分开了，或者再也不能见面，你们孩子需要知道我们拥有什么。”姐姐和我精确地记下了一切。我们跟谁都没提这事。就算是孩子也能保守秘密。母亲还在我们的外套上缝了几个薄薄的金链子，以防我们流落某处需要用钱。我们不得不做好被分离的准备。对话的语调相当客观。

1944年5月，有传言说首都以外的犹太人会被重新安置到一个位于曾经的波兰领土的劳动营里。在湖泊和森林之间，有城市正在为他们而建造。他们会被移出总人口，但命运不会太糟。从这一刻起，犹太人和基督徒不能住在一起了，甚至不能相互接触。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必须被隔离。

当局指望我们理解此事：我们当然不能住在一起了；我们怎么能想这样的事呢？匈牙利犹太报纸还在提倡每个人遵守法律并严格遵从法规：现在，在这个艰难时刻，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必须严于律己，显示自己是好匈牙利人，直到那时才能希望获得解脱。

种族隔离背后的全国统一战线固然很好，但是组织和执行的步骤是多么复杂，当局需要做的细致工作是多么多，又有多少内政部大小官员不得不缩短他们辛苦挣来的睡眠并祈求妻子的原谅。此次驱逐行动耗费了大量工作。每个部门都得发挥作用，从宪兵队到遗弃财产管理员。值得特别称赞的是铁路工人在敌军轰炸下表现出来的模范合作精神：短短几周内，他们就把犹太人通通装进了运货火车，让他们滚出了这个国家。集合六十万犹太人，把他们关起来，然后用武装巡逻队把他们拉到货运车厢里——这值得喝上一杯来庆贺。省会城市的日报都松了口气，宣布空气变清新了，整个地区都judenfrei[注]，没有犹太人了。

我们收到一封住在布达佩斯的亲戚的信，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住。我们需要快速决定是否过去。犹太人不再被允许坐火车旅行，而且会不断检查文件：告发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责任。前往布达佩斯的亲戚家需要宪兵队的特别许可，一个例外，一次对法规的暂停。再说了，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不和其他人一起待在这里呢？镇里有我们的姑姑们、姑父们和表姐弟们，我们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也许他们不会来抓我们。也许会有某个更高级的权力来干涉。荡在秋千上，我感到驻家燕子的快乐非常纯粹。我骨子里是个新村男孩。我会生活在这里，并死在这里。

要是他们真的来了呢？在布达佩斯躲藏起来更为容易，在大海里更难捞针。我向花园门口施了咒语，仍然愚蠢地希望我的父母能回家。我会听见一记敲门声，打开门，看见他们微笑着站在门前。从秋

千上跳下来，我跑到门口，拉开了门闩。没人站在那里。只有德国士兵在街上跟当地女孩闲逛。

我用力摇醒了自己：我们终究是要离开这幢房子的。我走到房间里确认那三万帕戈的藏匿处是否安全。它很安全。我穿过街道，来到一个基督徒律师家，他是我父亲的一个好顾客，虽然是个右派，但是并不特别排犹。我让他给我办旅行许可。“这要花很多钱，”他说，“你们有钱吗？”我说我们有。“有多少？”我告诉了他。他说那足够了，我应该提前付他一半。我回家给他拿了一万五。他说他第二天会告诉我们他办了什么事。整件事只有我们知道。关于钱的事一句话都没提。

我们几个都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是最想离开的那个。其他人对此犹豫的事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不喜欢当寄居者。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足够的食物，还可以蜷曲在自己的扶手椅上。跟我们关系最近的亲戚过来让我们别走：他们可能只驱逐纳吉瓦劳德的居民，不驱逐我们。匈牙利犹太人很早以前就在自我安慰：发生在波兰犹太人身上的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到现在，每个犹太人都登记在册了。在县户籍登记员的命令下，犹太会众自发列出了清单，用街道和号码排序。因此，宪兵队能毫不费力地在凌晨把所有人逮捕。镇里绝对没人敢冒险藏匿我们。因为逮捕布达佩斯犹太人更难——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他们最后才走。至少我们能争取时间。

第二天律师来拿剩下的一万五，然后告诉我可以去领文件了。但是首先，他说，我应该去见绍莫迪，公民男校的校长，一个对我的能力评价甚高的好人。我应当感谢他接受我们的请求。我去找了校长，感谢他的好心，然后敲了敲我的鞋跟[注]。他对着我微笑，抚摸了我的头，说道，你应该继续努力学习，当一个好匈牙利人。现在我可以去宪兵队拿旅行文件了。

一名宪兵上士按规格制作了许可，并用他的大手在打字机上把它打出来。他花了点时间从出生证明和警察登记文件上提取信息并整合成文字。墙角枪架上的来福枪，帽架上饰有公鸡尾羽的帽子，靴子的气味，一张旧书桌，一盏绿色台灯，一个印台，我们四个人各自的许可，八记盖章声。另一张桌子上，一名正在吃培根的下士抬眼看向我。

“这么说你们要离开了？”

“是的，我们要走了。”

上士递给我四张纸。他努力工作，对自己很满意。他对我也很满意，因为我恭敬地对他微笑。他祝我旅行愉快，我谢了他。文件放进了亚麻西装外套的内袋里。我的口袋里有其他犹太人没有的东西。镇领导准许我们离去了。

拉洛·卡达尔主动提出要送我们去布达佩斯的亲戚家。我们很高兴：基督徒再也不会踏入我们的花园了，种族隔离基本上实现了。他是我姑父纺织厂里的助手，是个高大优雅的年轻人，镇足球队中卫。他的妹妹卡塔琳是我姐姐的同学和朋友，经常来我们家玩桌面游戏。她有一条黑色的马尾辫，洁白的牙齿，以及大大的棕眼睛。当她来访时我总是盯着她看，在打招呼或道别时，我绝不会忽略亲吻她的脸颊。她比我大三岁，因此也比我高。她会走到我面前道别。在她让我吻她前，我们站着一言不发。

和我同岁的表姐薇拉也来看我们。她想知道我是否会给她写信和会在哪里写。很难确定我们中的哪个会为另一个难过。我也吻了她的脸颊，那是1944年6月5日的黄昏。接着我们开始打包行李。问题是带多少东西以及为什么？我们该把什么留下？仔细想想，我们既不需要这个，也不需要那个。除了铁路条例规定的重量限制，我们还得记住，一旦到达，只能保留自己拿得动的东西。

次日凌晨三点半我们就起床了。站在浴缸里，任冷水喷洒在头上，我睁开眼睛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拉洛·卡达尔五点钟穿着轻便灰西装来找我们。他前一天买好了车票。熹微晨光中，鹳鸟夫妇静静地站在约柜上。

父母的房子在我们身后关闭。随便什么人进来都能拿走留下的东西。我们乘出租马车去火车站。街上没什么车。看到我们的人都带着冷漠的眼神。没人说话。我们是影子，在这条属于我们的路上的不规则的影子，这次没有刺刀押送。我们在火车站等待从纳吉瓦劳德开来的布达佩斯特快列车。我们靠在站台的绿色栏杆上。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人们盯着我们胸前的黄色星星。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看见火车开来，我很高兴。当我开始从火车窗户往回看时，我只能分辨出蒸汽磨坊和加尔文教堂塔楼了。很快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某种东西结束了。今天我认为那是童年。我看到伊什特万也紧咬牙关：我们都感觉到了它的终结。我们无声地站在窗前：平板车厢上装着炮弹和坦克的德国军事火车、吹口琴的人、灰色军装、橡胶雨衣。

有人在田野里劳动。小麦很高，并一小块一小块地变黄：是个好收成。前一天索尔诺克火车站受到了轰炸。控制塔倒塌了，天桥被炸坏。烧毁了、烧黑了的废墟。我们在那里停了一段时间，给德国军事火车让道。还有另一趟火车经过。运畜车厢的铁丝网窗户后露出女人的眼睛，很有可能是犹太女人的眼睛。

站台上的人看起来严肃且害怕。火车停的时间很久。一切缓慢但正常。通知经常提起轨道维修。检票员在旅程中过来检查了两次文件。第一次，主检票员，一个胖胖的红脸且留着卷曲八字胡的人，头戴小而圆的羽毛帽，对拉洛·卡达尔吼道：“如果你是个真正的匈牙利人，你怎么会搅和到犹太人的事里呢？你怎么会护送犹太小鬼呢？”拉洛脸色发白，没有回答。

文件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检票员有权用各种借口把我们踢出列车。他看着我们，但是并不确定他想不想看；我们回望他，不带微笑，表情严肃。我们是特权阶层的孩子，而他不是这个阶层的成员，但是我无法判断这会让天平偏向我们还是反过来。他走开了。

我们的星星和这个小事件让我们成为不寻常的旅客。其他旅客既不对我们说话也不对拉洛说话。在这种时刻，最好什么也不说。第二次检查几乎是懒洋洋的，进行得很顺利。文件整齐，检票员冷淡地点点头。

我害怕布达佩斯，尽管前一年我跟着母亲来这里旅游过一星期，来享受它的繁华。在西站的玻璃走廊里，我们把自己交给戴粉帽子的搬运工照顾，接着打出租车去匈牙利酒店，在那里有男侍者给我们打开前厅的门，然后拉开带细薄布花边的落地窗帘，让我能走到阳台上，欣赏多瑙河、桥梁、远处河岸上成排的绿色栗子树，以及气派恢宏的皇家城堡。我太快乐了，几乎无法呼吸；我变得虚弱，就像一个人看着歌剧场上幕布拉开，黑暗中显露出一个金碧辉煌的舞池时那样。那时母亲会站到我身后，现在她可能在那个运畜车厢里。那时我们有一个搬运工，现在我们自己拎包。但不管是现在还是那时，玻璃围成的走廊依旧美丽，未被炮弹损伤。“入侵开始了！”卖报纸的人大声吆喝道。“英国和美国的军队登陆诺曼底海滩了！”人们拿着报纸抱紧皮包，但不做评论。伊什特万和我放下我们的包，甩了甩手。接着我们环顾四周，看着人群。他们正如新村的人：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跟拉洛·卡达尔道了别。他现在可以回家了。我多想跟他回去。

后来我们发现，第二天拜赖焦新村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逮捕了。在宪兵队的陪同下，他们拖着自己的包走过街道。剩下的人在旁边看着他们，有人向他们问好，有人辱骂他们，但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因此

仅仅在我们离开一天后，新村的犹太人都被带到运畜车厢里，运往纳吉瓦劳德的犹太区，再从那里转到奥斯维辛。

两星期之后我在多瑙河畔散步，而薇拉被浇上汽油烧死了。当时我不知道，镇里的两百个犹太孩子里幸存的只有我们四个离开的：一对长着雀斑的安静双胞胎（他们成了睾丸试验的试验品），以及我当时十四岁的表姐若菲（她响应门格勒博士的号召，加入了工作小组）。她经受了考验，回到了家。其他人都化成了灰烬。

1944年的夏天，我基本上是在吉赛拉姨妈位于布达佩斯埃尔诺·荷兰大街36号四楼的公寓阳台上度过。在那里我可以看着街角，等待我的父母从圣斯蒂芬环路走来，出现在视线中。他们从来没出现。

吉苏(注)姨妈的丈夫，安多尔姨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中尉给祖国服役。一个装瓷制和银制小玩意儿的玻璃盒子也放着一块小小的紫红色垫子用来展示他的战争装饰品：一枚战功勋章、铁十字勋章和各种其他荣誉奖牌。虽然没能用他的战绩换取特殊地位，但他会在允许犹太人行动的时段在布达佩斯犹太委员会逗留，带回令人宽慰的消息。

安多尔姨父远非家族骄傲，但他确实救了我们的命：当盖世太保带走我们的父母时，是安多尔姨父寄来了邀请信。后来他抛弃我们是形势所迫，但救我们这件事他做到了。作为一个不英俊的人，他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时髦，将下巴高高扬起，肩膀往后拉开。总是保持“绅士”，他用刀叉吃玉米棒和桃子。他的行事风度里有种令人厌烦的屈尊感：他会拍我的背以示鼓励。但他也放任自己出人意料和毫无优雅可言的情绪爆发。

在20年代，安多尔送了二十一朵红玫瑰给吉塞拉，我母亲的姐姐，来赢取她的嫁妆，并摆平自己的债务。在他们宣誓之后，他要求——刚开始很骄傲，但最后跪了下来——我的外祖父把他的钱放在他

安多尔的银行里，因为，要是连他自己的岳父都不信任他的机构，别人会怎么看待他呢。第二天安多尔的银行宣布破产，我的外祖父也因为他女婿的好办公室而破了产。在家族的支持下，安多尔在布达佩斯租了一座公寓，在附近开了一家手套店，维持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

安多尔姨父是他的五层楼里的空袭队长，他会拿着一盏吱嘎作响的灯在防空洞和一楼之间上下走动。他戴着一个发亮的头盔，几乎完全盖上了他高傲且突出的下巴和粉色的颈部垂肉。到9月，犹太人被要求挤进更小的空间里，我们不得不搬家，因为他、吉西姨妈和我们的两个表亲阿吉和扬奇得到的房间如此之小，只勉强装得下他们的四张小床。我记得这些友善但不熟悉的女人和孩子散发出来的浓重气味。没有我们的位置。

若菲婶婶住在隔壁楼里。她不是我们的血亲，而是我父亲的表弟久拉·扎多尔医生的妻子。当时，我的两个表弟，伊什特万和帕尔·扎多尔，跟若菲婶婶的儿子彼特·波罗尼一起住在那里，他跟我们差不多大。一个留着灰白短发的男人的脸从记忆的迷雾中显现出来。我喜欢他的姓：曼杜拉，“杏仁”。我还回忆起了一个比我稍大的孩子。因为被禁止走到街上，我们在走廊里玩。若菲婶婶愿意让我们住在那里，只要安多尔姨父一家负责养我们就行。在开始的几天里，我们还会回到亲戚家吃午饭。

接着到了10月15日，那天摄政霍尔蒂在广播里宣布他要求停火。那是个明亮的秋季星期天早上。人们涌到街上。我们也因为这消息激动万分。楼里的所有人——女人和小孩，老人和年轻人——都是犹太人。老人们爬上楼梯，摘下门口木板上的黄色纸星星。有些人在街上就地撕下外套上的黄色星星。我们还可能继续活着、回家、找到父母；一切都可能重又回到原来和平时期的样子，但也许从来没有真正

的和平时期。我们等待确认的新闻；收音机只广播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公告：摄政的发言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我们绕着我们的街区走动。并不是区域里的所有人都敢移除犹太建筑门口的标记，但是有一个孩子放火烧了纸板做的黄色星星，我们站在一旁看着它燃烧。一对不佩戴黄色星星的夫妇手挽着手漫步而过。“看看他们变得多么张狂。”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对一个戴帽子的女人说。新武警指挥不见踪影，但是德国军用车辆和卡车沿着环路飞驰，车上满是穿着绿色衬衫别着箭十字党臂章的人，脸上都带着不安的坚定神情。

一个犹太人问一名警察有没有出新规定，现在我们能否在宵禁之后出门。根据官方规定，我们只在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五点之间有权出现在公众场所。处处都存在不确定性。事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官方论调是关于和平，而不是英勇战斗，旧规则似乎不再适用，犹太人也不再从雅利安“民族有机体”中隔离，现在我们该去做什么呢？一旦法律不再允许迫害，我们犹太人该做些什么呢？在那天，我们想不出来自己做主能干什么。

到晚上，我们知道：停火只是一名笨拙的摄政做出的一个笨拙举动，他把自己的意图先告知了德国大使，却没有告诉他的军队！萨拉希，箭十字党的领导，宣布摄政被免职，宣称我们现在要更加坚定地和我们伟大的德国盟友并肩战斗，来赢取战争的胜利，并净化我们的祖国——我的祖国。下一步是灭绝。臭虫、蟑螂、犹太人——你们完了！钢铁意志在此，剩下的只不过是执行的问题。保持谨慎很重要，因为在布达佩斯还有十万犹太人，对这么多人的公开谋杀可能在基督徒人群中产生一种失败主义情绪，但是屠杀在所难免，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注]。离开家，有条件的话躲起来，或者混入人群，隐藏到背景里，别太显眼，否则你会一命呜呼。

透过开放屋顶，我们看着电影院大屏幕：嘲笑犹太人的宣传电影《我来自捷尔诺波尔》还在播放。我们在走廊里来回跑动，甚至大着胆子走到外面，兴奋地讨论事态发展。我们是野生猎物，害怕猎人们，就算他们是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政治也提供了武器和许可来杀犹太人，只要黄色星星还合法，甚至连儿童和老人也杀。

我的观点是，因为我是无辜的，所以命令灭绝我的法律本身才是不合法的。我见过不起眼的鼻涕虫出去杀人，轻易得就像射杀野兔或者拍死苍蝇那样，全都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的名义进行。我们面对的是终极敌人，他要的是你的命，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他做好了开枪把你打进多瑙河、任河水把你冲走的准备。

我们溜走了，像人们过去常说的那样。安多尔姨父带着冷静的自信向我们说明了他的计划：我们要躲到他们称之为手套工厂店的地下作坊里，在三个街区外。我们不能带太多东西，因为箭十字党在这个地区巡逻，我们不能张扬。我们可以睡在切割台上，在厕所的洗脸池洗漱。我们不能开灯，但是当阳光闪耀时，到中午会有足够的光线进入房间，能够阅读。听不见外面有任何枪击声，我们希望最坏的事不会发生。到第二天，我们发现黑暗的作坊里缺乏舒适感，尤其是安多尔姨父，他在早上发现他把他的剃须刷忘在家里了。令人痛苦的损失。尽管你可以在打湿皮肤擦完肥皂后，用指尖摩擦出一点不成形的泡沫，但不管是操作还是其结果在美学上都不令人满意。安多尔姨父认为回家不明智（虽然圣巴托罗缪之夜并未成真），但是他确实想要那把剃须刷。在安多尔姨父眼中，最简单的方法（排除了不用刷子剃须和压根不剃须的严苛选项后）是让我去取刷子。

我出发了。有戴着臂章的士兵站在走过去第三幢楼房的门口。天下着小雨。也许他们不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他们把我叫了过去。

“嘿小子，过来。你是犹太人吗？”

“你为什么这么问？”

“你可能是。”他们说。

“我确实可能是。”我说。

“那你是吗？”

“你为什么这么问？”我说，回到我最初的问题。

“嘿，这是犹太人说话的方式。”

“你是犹太人吗？”我问。

“你为什么这么问？”他说。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话。”

“把你的裤子脱了。”

我没有动。我们盯着彼此。

“怎么着？”

“在下雨。”

“好吧。走吧。”

他和我都知道真相。他只是不想杀我。

余下的路程没有事故发生。当我到公寓时，年纪大的女士们兴奋地问我一家人在哪儿过的夜。我记不得我编了什么了——大概是说去哪里做客了——但是她们瞥见了我把剃须刷从浴室镜子下方的架子上拿下来装进口袋。“你回来拿这个？”其中一位女士问。

“再见。”我说。

在街角，我看见箭十字党的人向荷兰街跑来。我迅速左转，希望绕路波佐尼大道回到家人身边，但是我没意识到他们会并排奔跑，且人数众多，不仅仅能从波佐尼大道这一头排到那一头，还会从后面通过圣斯蒂芬环路包抄过来，把视线中的人通通包围。在那些日子里，很难看到犹太人大白天待在新利奥波德城[注]区。他们拘留的那些人被派去古布达[注]的一座砖厂，再从那送去西边，徒步而行。还有几个地方能把犹太人装进铁路车厢送走。几星期后，当局采取了简化程序，把一个地区包围起来，开枪把人打进多瑙河。

我看见一个戴着眼镜和白色臂章的瘦子试图解释他的特殊情况；他曾冒生命危险反抗贝拉·库恩[注]的公社。箭十字党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把烟头啐到他脸上，领他去了旁边。人们排队等待检查文件。拥有一份盖了官方印章的文件还不够，你得回答问题。

我挑了一条队伍，那里有个穿皮外套、歪戴帽舌的人把双手放在大腿上盘问别人。当我前面只剩两个人的时候，我偷偷趴下来四脚着地从他的棕色猎靴旁爬过：有这么多人围着他，他绝不可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我小心翼翼地慢慢走到作坊里，绕着街区，确保没人看见我进去。

“你回来啦。”安多尔姨父说，慈祥地拍拍我的头。他立即刮了一次胡子，用了很多古龙水，然后抚摸着下巴来回踱步。午饭时刻就要到了。安多尔姨父说作坊不是个躲藏的好地方，我们应该一个接一个地回到原来待的地方。至于我姐姐和我，我们可以四点以后去他家吃午饭，在那之前，我们要在“那个女人”家等着，说的是若菲婶婶。他喜欢以轻蔑的口气说她。但是当我们四点按响荷兰街9号的门铃时，开门的却是早上那个发现了我拿剃须刷的小动作的老太太。当我问起一

家人去哪儿了时，她说我的姨夫、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带着行李离开了。他们去了哪里，她不知道。

我们站在那里，埃娃和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们花了点时间才搞懂，我们的亲戚去了一个藏身之地，安多尔姨父弄到了伪造文件，他们能用这些文件改名换姓登记成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基督教难民家庭，住到同意为钱而收留他们的熟人家里。我们第二天和第三天都回去看了，还是没有他们的消息。

半年后，1945年4月，我在纳吉瓦劳德的某个街角瞥到了吉苏姨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但她已经往街的另一边走去了。一星期后我们面对面地相遇了。她邀请我跟她一起散步，我拒绝了。她告诉我他们的新地址。那个地址原来是纳吉瓦劳德亲戚的家，他们消失后，吉苏姨妈和她的家人接管了他们的公寓。我迅速离开了，随口许诺以后会登门拜访。

那天晚上，10月15日，若菲婶婶也带着男孩子们躲起来了，彼特、伊什特万和帕里。他们带着很少的包去了玛格丽特环路，那里有个熟人让他们住他的公寓。他们进去时没有戴黄色星星。他们刚刚放下包就有一个居民打电话告诉他们快跑，因为门房打报告说他们可能是犹太人。冲下楼梯，他们看见电梯装着武装的箭十字党人上升。他们听见楼上的门被敲响，匆忙跑回了他们习惯的恐惧之地。

若菲婶婶不仅给了我们栖身之地，她还给了我们食物和关爱。在收留了姐姐和我之后，她在一个大号临时公寓的两个房间里照顾五个孩子。她变卖家当养活我们。与此同时，我们几个孩子想尽办法逃脱——从浴室窗户垂一条绳子爬到车库屋顶——如果箭十字党来抓我们的话。

每天早上，当我们可以出去时，若菲婶婶出门想办法搞到文件。一两个中立大使馆会把居民楼置于自己的羽翼下，在门口挂上标记，

表示这座房子处于瑞士、瑞典、西班牙或者梵蒂冈使团的保护下。据说教皇的保护是最好的。如果你不能把它变成一间安全屋，你应该去犹太聚居区，在那里人们开始拆除高墙和大门。由于若菲婶婶早上的秘密之旅，我们获得瑞士保护信的机会很大。

我并不为失去安多尔姨父的监护而悲伤，因为我跟若菲婶婶和来自拜赖焦新村的表弟们在一起更自在。我们重又是一个自然的“我们”，我父亲家族的一支。久拉·扎多尔医生，若菲娅(注)的丈夫及伊什特万和帕里的叔叔，被关押在一个劳动营中。作为一名神经科专家和精神病专家，他曾在海德堡学习，在苏黎世行医，并于1938年回国。他曾是我童年神话中讽刺的象征。出于某种内在原因，他温暖而真心的微笑会渗透出一丝冷漠。这让我犹豫：他似乎在拿我取笑。

有个例子。我五岁时做了疝气手术，之后我扯破嗓子尖叫着让他们解开捆我的绳子：我刚从麻醉中恢复知觉，无法忍受被绑住。我的决定不被信任令我出离愤怒，好像五岁的我缺乏大脑，不能让自己在手术后躺着一动不动地休息，非得羞辱地将我用皮带捆在床上不可。此外，他们用的白纱布、白床、全身都穿白色的工作人员、白色房间——这伤害了我的色觉。

我的家庭教师利维娅的骆驼毛家常服是温暖的米色。每次她触摸我——喂我一勺药或者按下我的左臂来量体温——都带着体贴。但是护士——那个拙劣的陌生中年女性——并不因为她碰巧用白色外壳伪装了自己而有权利碰我。我想要她离开，她和她充满能量且富有侵略性的仁慈！我把身体僵直成了一根柱子，厉声尖叫——不！我不妥协！解开我！——那时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的床尾。浓厚的灰白头发，高高的额头和那无礼的微笑，对我的愤怒表示怀疑，确信我是在假装。那个穿白大褂的人从哪儿看穿我的灵魂了？即使隐藏在白色面具之后的是久拉叔叔。

我们的家庭医生斯波纳特医生会穿着便装来见我们，一套灰色西装。埃娃和我会躲在餐厅的窗帘后，这样他就不能“戳我们”，或者我们就不用喝恶心的鱼肝油，或者只是为了躲着，晚些时候再跳出来，忍住同谋的窃笑。菠菜叔叔（我们这么叫他）就算是在用听诊器听我们的胸腔时，也会和父亲谈政治。这让我们不愉快地发痒，因为斯波纳特医生秃顶，而且他冰凉的头顶散发出一种令我们恶心的医院气味。当他的头压在我们裸露的皮肤上时，我们会打个哆嗦。尽管久拉叔叔穿着白大褂，但他还是说如果我停止扭动的话，他建议他们解开捆我的绳子。我们执行并遵守了这个协议。

大约三十年后，我问另一名喜好讽刺的人，即心理学家费伦茨·梅瑞，是否认识久拉叔叔。他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大家都认为他半疯了。1941年，久拉·扎多尔医生在镇中间，赛普街5号，租了一幢大公寓，按他妻子的包豪斯品味装修，用他在海德堡和苏黎世获取的学位证书以及作为犹太医院主治神经医师的名气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只是沿着符合自身地位发展的道路前行。他美丽的妻子是他从一个受人尊敬且成功的记者身边追求而来的，她结交了一大批诗人、画家和各种各样的革命者。

久拉叔叔出身于一个更为普通的家庭。他在拜赖焦新村的家族早早让他继承了他那份财产，让他开始事业。他们的房子又当店面又当作坊。他们自食其力，享受生活温馨僻静的一面——每当他们愿意这么想的时候。店面和作坊通往街道和世界，后面和楼上则属于保守区域，热情的领地，快乐和绝望、热情和憎恨快速交替。他们的生活上一刻还是美妙的，下一刻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所以这个拜赖焦新村的世界公民，出生于同一个镇却胆敢蔑视我们，在首都定居下来，仿佛一切都正常不过，仿佛头等大事是建立他的病人群体以及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他的研究。当他坐在他位于新村花园的凉亭下时，我会盯着他的白色灯芯绒裤子、黄色鞋子和蓝

粉色丝衬衫看。他会让我们这些乡下人尽自己全力做出优美措辞，但是他就算在听时，也在用他的大城市观点默默评论我们。我们幼稚；讽刺是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意识不到存在是模棱两可的，即使爱也是狭隘的。久拉叔叔的乡下乐观主义被城市居民的洞察力损害了。城里人会把自己的鼻子凑到任何东西前，总是一副清楚你的底细的样子。说得好像人们没有在第一次握手时就表现出真实自我似的！当久拉叔叔第一次对我展现出那副表情时，他还不到四十岁。现在我的年纪能当他父亲了，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被杀害，他真实的天真本质会最终胜出。（事实上，它真的胜出了，尽管是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出于他作为乡下公民对法律的尊敬，他自愿回到劳动营，丢下了他的妻子。）

若菲婶婶是个纤弱瘦小的女子。关于她的一切都是银色的：她的声音、她的眼睛、她乌黑浓密头发里的少许银丝。我经常觉得我们这些充满野性的小家伙让她发笑。她有个儿子，彼特·波罗尼，并且充当着我两个表弟，伊什特万和帕尔·扎多尔的监护人。由于命运和安多尔姨父的好意安排，我姐姐埃娃和我两个也加入了她的照顾名单中。四个男孩非常吵闹，有时候若菲婶婶会头疼，叫我们消失——至少消失一会儿。

到1944年秋天，若菲婶婶一定有三十岁了。有时她的眼中会闪过一丝讥讽的目光，但她的声音带着来自遥远海岸的体贴感。她的品味命令我们做的，没有人会犹豫，她将我们视如己出，一个带着五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甚至保证我们灵魂完好无损地度过了那些可怕时期。

她丈夫本可以从强制劳动营溜走：1944年圣诞节，他获准休息一天回家探亲。不顾若菲的恳求，医生还是回到了营里：他不想让家人惹上麻烦，他有生病了的同志要照顾，此外，他还承诺了仁慈的长官

他会回去。但是在他离开的时间里，仁慈的长官被调走了，最终诚实的扎多尔医生和他的病人——都是诗人和学者——葬身于万人坑。

直到那个夏天，犹太人还在从布达佩斯的外围城区尤佩斯特和基什派什特被移送到奥斯维辛。他们本可以走路或者坐电车进城，但是他们听从命令，去了火车站。他们中的共产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抵抗者、胆大者——弄到假文件躲了起来。更顺从可能也更害怕的中产阶级试图躲在安全屋里挺过危险时期。安全屋里住着富裕的世俗犹太人，他们设法联系到了中立大使馆之一。贫穷的正统犹太人，男人蓄着黑胡子戴着黑帽子，妻子裹着披肩，儿子留着鬓发，女儿长着大大的眼睛，他们都去了犹太聚居区。那是他们的地方：它有着最密集的犹太教堂。他们和中立外交官肯定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当时是犹太聚居区的开放季节：喝醉了的箭十字党人会走进来随意射击。

瑞士的保护信，保护护照[注]，在瑞士领事卡尔·鲁茨[注]的运作下发放出去。他的名字不如他的瑞典同事拉乌尔·瓦伦贝格[注]的名字出现得频繁，尽管鲁茨救了同样多的人。在瑞士联邦的保护下，我们搬到了波佐尼大道49号，在那里，我将最崇高的敬意致予三四个躲在地下室的年轻人，人们窃窃私语说到他们是抵抗者，而且从军队叛逃出来。在四楼这个三居室公寓里可能住了八十个人。到晚上我们会把所有不能睡人的家具叠起来。不是所有人都有一张床或床垫，但是每个人至少有一张毯子。我们四个男孩睡在地上的床垫上，靠着窗户和一堆家具。那像是一场不间断的室内派对。总找得到人说话。每天上午有两小时我们可以离开房子，五个孩子挨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若菲婶婶保护了我们，而我们可能也反过来保护了她。任何要求看她文件的人都会大吃一惊。“他们都是你的孩子？”拥挤的人群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一些人搬到了藏身处，另外一些人则在心血来潮的突袭中被绑架然后被开枪打进了多瑙河。

在1944—1945年的冬天，我见到了许多尸体。我可以想象自己身处其中的样子，但是日复一日的生存任务模糊了我的大部分想象。危险让你变得实际。只有在孤绝的时刻你才会面对死亡的可能性——比如说，当某人拿手枪指着你的头时。那时你会感到：是的，它会发生。在你感觉到死亡的那一刻起，你成了大人，也就是说我在十一岁时就是个大人了。对有些人来说，它发生得早一些，另一部分人则晚一点，还有人的这一刻从未来临。

死亡绝非愉悦之事，致命危险亦如是。你可以站在上空有战斗机扫射的屋顶露台上，感觉整个场面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让我们穿着钉靴在我们用几桶水造就的溜冰场上滑动吧。“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态度后来将我从伤感情绪中拯救出来，不至于忧郁而死。

我能活下来归功于一连串好心的巧合。事实证明这是受益终身的天赋：在十一岁时，能够认清我随时可能被杀死的简单事实，以及学会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在1944—1945年的冬天，我想到死亡就像想到，比方说，柴火：它没什么稀奇的。它在我的控制能力之外，就像抽出错牌一样。

穿着滑雪靴和挪威毛衣的美丽年轻女人在抽烟，她们浓密的头发梳成光滑的髻，穿着滑雪裤的长腿交叉在一起。她们嘲笑所有我不懂的事物。她们和我认识的小镇美女们不同：更恶毒、更神秘、激进而文雅。她们谈论起法国超现实派、德国表现派和俄国抽象派就像谈论老朋友一样。她们是艺术家、舞蹈家、左翼——而且她们伸起腰来如此美丽。她们会为我们这些孩子唱歌，用匈牙利语唱《国际歌》和《木夯歌》(注)。

但是没人比若菲婶婶更让我惊奇。我想要为她做出英雄之举，并且不敢在她视线范围内哪怕是挠痒痒。要是她略带慵懒的声音问：“我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你会陪伴我吗？”我会陪她去地狱之门。为了若

菲婶婶，我愿意在手臂下夹厚厚的小说防止吃饭时手肘外翻。更胆小的人搬到了地下室，但是若菲婶婶无法将洁净从人性尊严中分离。她觉得，为了躲避炸弹和燃烧弹、炮弹和火炮地雷，而让我们躲到防空洞里，待在腐臭的黑暗中，和许多肮脏且嘈杂拥挤的躯体为伴，是令人厌恶的。就算它确实提高了一级危险系数又怎样呢。

“尊严比安全更重要，”她会说，“我们不会让跳蚤爬到身上的。”即使在警报开始鸣响时，我们也没有躲到地下室。最明智的选择是屋顶露台，在那里冬天的太阳每天都明亮地照耀着，即使是在1月份也如此，但是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度。我们会泼几桶水，给自己造一片绝妙的滑冰场。用助跑起步，你可以从一头滑到另一头。苏联战斗机“老鼠”(注)的扫射子弹落在冰面上，发出砰的一声。我们总是抬头看从飞机腹部倾泻而下的炮弹会落到何处。一阵尘云或烟会证明那枚炮弹到底是炸弹还是燃烧弹。

下面的街道传来往前线运送军火的有轨电车的隆隆声，现在只有几个街区之遥了，紧接着是德国人互相喊叫的声音。俄国人逼近了，但是箭十字党还在街区里弄死犹太人和基督徒逃兵。“弄死”这个词出现在每张公众海报上；它的意思是当场杀死，把尸体弃置不顾。街头武器爆炸，纸面文件毫无意义：只有醉酒和恐惧有意义——以及当时的同情或憎恶。戴臂章的人有大量的人群可射杀，尽管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处死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甚至有可能对日复一日地进入杀人情绪感到费劲。用老妪和少女填满冰块壅塞的多瑙河是种魅力阴晴不定的艺术。连毫无反抗能力的人他们也杀——而且他们想杀多少人就可以杀多少——就算是他们的眼中也流露出些微反抗之意，由路人的凝视而落实，路人看着安静的冬季外套被领到河岸，带着某种程度的同情。当然你还得挤时间干别的，比方说喝酒和取暖。戴臂章的人一定想到了，如果俄国人到了城郊——从喧闹声判断，还带着很多大炮——他们不会停留而会朝着中心挺进。如果他们占领了整个城

市，箭十字党军队绝对得不到勋章，这可不是个愉快的想法。谋杀情绪时而爆发，时而偃旗息鼓。

枪击俄国人是危险的；犹太人则是瓮中之鳖。生存是幸运，死亡则是厄运。你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做不了太多，而且有时候自尊会阻止你这么做。前一天晚上几个人从公寓被带走。从隔壁房间，不是我们房间。

我看着德国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能击退仅仅五个街区外的俄国人？聪明如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及什么不允许做。箭十字党，在另一方面，是底层渣滓，退学者。他们唯一的特长是虐猫。孩子需要长大来理解成人是多么的不成熟。一个拿着枪的十四岁孩子押着没有武装的人们来到多瑙河岸。没有将枪从他手中夺走，他们反而听他指挥去行动。大多数受害者称之为命运，但是命运应当引发恐惧，激起他们自卫，不管这威胁是花园里落下的雨夹雪或是敌人手中的死亡。然而人们很像宠物，习惯了身边的同伴减少。你无法每半小时产生一次愤怒和同情。站在屋顶露台上，我们听见偶尔一阵的噼啪射击声。有人（带着武装）检查另一个人（不带武装）的文件。前者不喜欢后者的脸或者文件，让他站在墙边，用枪打死了他。被带到多瑙河的人必须站成一排，面对着河水。枪击从背后而来。

就算是如此众多的暴力死亡也不能掩盖那些光彩夺目的冬日早晨的美。处于死亡的阴影下，面包变得更像面包，果酱更像果酱。我愉快地将各种各样的家具劈成柴火。我们甚至冒险去了一趟河岸，在那里我们剁碎了一个小码头。那是很好的干松木，带着它的白油漆烧得极旺。

我们知道大批俄国人带着坦克和重炮来了。他们的飞机相对来说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少，英美轰炸机大部分迟至1944年夏天才来；在这个冬天，响彻天空的还是“老鼠”。

克拉拉经常站在屋顶露台上，调整她的黑马尾辫，扎了又扎。我会时不时拉一下它。她的鼻底有个小胎记，鼻尖有颗痣。作为我帮她忙的交换，我得到允许，可以在露台上快速地亲吻那颗痣。禁止在鼻子上逗留。克拉拉喜欢不带人称地谈论自己的身体部位，好像它们是独立的个体：“鼻子受够了。”她告诉我。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摔跤。把克拉拉按住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两个轮番占据优势。偶尔我能设法把她的肩膀摁到地板上的马毛垫子上并躺在她的肚子上，但是我的手腕会被狠狠咬一口，留下两排消不掉的牙印。“你有胆量把手放在蜡烛上吗？”克拉拉问。我有，然后在掌心留下了灼痕。克拉拉吻了它。我小心地把拳头放进口袋里，仿佛捏着一只麻雀。

克拉拉无法忍受被关起来，做不到一整天待在安全屋里。犹太人的宵禁对她不起作用。我试图阻止她。我很担心，但并没有跟踪她。她会在街区里四处走动，然后吹嘘她的所见所闻。当一名军官要她的文件时，她失去了回答他怀疑的问题的勇气，仅仅保持沉默。他们把克拉拉带到多瑙河，跟一长串犹太人排在一起。在那里，她认出来她的一个姨妈，挤进去站到她旁边。他们都被要求掏空口袋，举起双手站着，面对着玛格丽特岛上光秃秃的树和被炸毁的玛格丽特桥的独立桥墩。她姨妈向前跌进河里，但是克拉拉没有被枪击。“你真走运，我的弹夹空了。”机枪手友善地笑着说。“现在走吧——回家好好待着！”因此初级（但并不怎么年轻的）军官让她回去了。

透过钉着木板的门，我辨认出克拉拉的脚步声，然后给她开了街门。“让我们在这里站一会儿，”她说，“握着我的手。明天别让我出去了。整天都和我待在一起。别告诉母亲他们开枪打死了沙理姨妈，而我就站在旁边。”

第二天早上，我蹲在院子里的炉子前——三块砖头和一个铁烤架，它上面极其缓慢地煮着豆子汤，慢得令人痛苦。我的职责是让它搅拌均匀，时不时尝一下看看煮软了没有，并往火灰里添加锯下来的

椅子腿碎片。克拉拉站在我身边，谈起了她在学校的头两年，那时候她没办法说一个字。她会做她的功课，但是不发出一个音节。她想要至少和其他孩子打声招呼，但是张不开嘴。我对汤煮好了没有更感兴趣。我提起盖子，然后插进一把木勺子。

一架俄国战斗机呼啸而过。克拉拉紧贴着墙。当她喊“过来”时，声音里带着狂怒，让我吃惊地转过了身。战斗机用机枪扫射街区内部铺着石板的院落，没有射中一个人。克拉拉如此生气的原因是我总是逞英雄，显然是故作夸张。突然间我听到炉火发出嘶嘶声，低头看见汤从锅的洞里流了出来：一颗子弹从这个红色搪瓷大容器的底部穿过。要不是我转了身，它有可能从我的头穿过，因为当时我正低头看着汤。再找一个锅可不是件简单的任务。

“你为什么冲着我大喊？”当天晚上我问克拉拉。

“不知道。”她回答道，那会儿对自己没什么信心。

我们站在屋顶，听一位著名女演员唱歌。从俄国军用喇叭传来，她的嗓音带着深沉且具有威胁性的嗡嗡声。目的是在跟着德国人无意义地抵抗的匈牙利士兵犹豫不决的心中种植下恐惧：“你无处可逃，你无处躲藏。命运无法抗拒。”俄国人进入了城市，并一路挺进到安乔尔福德[注]区。喇叭就在几个街区之外。一支斯大林蜡烛高高升起，点亮了屋顶。手牵着手，我们看着，眯着眼睛。“真美。”克拉拉低声说道。我们两人都因为她的低语而笑起来。

我们的安全屋来了个不速之客：内内。她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挂在项链上的铝制玛丽勋章。内内叫我们把它戴在脖子上。她想让我们皈依天主教。如果我们皈依了——或者仅仅宣称我们愿意这么做——她就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修道院，他们在那里保护和隐藏改宗犹太儿童。我们感谢内内的帮助，但是告诉她我们不愿意。

我们几个孩子商定了一个计划：万一我们被撵进人群——那样的话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我们被开枪打进多瑙河——我们就把背包扔在公园的角落里，然后朝不同方向跑去。就算他们朝我们开枪——如果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从他们的房子里被赶出来，现场会有很多守卫——还是有人能逃走。

第二天早上，四五个箭十字党和宪兵闯进房间，吼我们穿上衣服，并交出所有武器，包括菜刀和小刀，以及任何值钱的东西，然后顺从且安静地在楼房前的人行道上排成一列。他们带着一个拉比，他和气地建议我们服从命令，特别推荐我们交出所有的项链、纪念品和订婚戒指。我从容地穿上袜子。

在楼房跟前，雷本雅克的红帽子尤为显眼。雷本雅克是房子里的坏男孩。他想要加入我们的团伙，但是我们从未接纳他。他推测拉比会拿走他的那份东西，因为觉得他们不会杀死拉比。我们好奇地看着彼此，疑惑这是不是实施计划的时候，以及我们该不该让雷本雅克加入它，就在那时，两个大嗓门男人走来，一个穿着宪兵制服，另一个穿着德国军官制服。他们朝着——不是我们而是跟我们一起的箭十字党和两个宪兵——大喊，命令我们回到楼房里。他们可能是共产党员伪装的，或者是两个犹太演员，好演员演得不太起效；差演员则更令人信服。很快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房间，仍旧穿着自己的外套，满心茫然。

大厅是我们的俱乐部。孩子们会轮流望风，剩下的人则会沿着底层楼梯滑下大理石斜坡。雷本雅克戴着他的红帽子出现了。他大约十四岁，总是拿他的邮票来烦我，因为他知道我从新村带来了集邮册。我总是用比较值钱的小邮票来交换漂亮的大邮票。我不太听得懂他说话：他的话语里充斥着城市俚语。他不说“尿尿”，而是说“解手”，或“小便”，或“嘘嘘”。他语焉不详地提起某个阴道，最后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孩的性器官。他不时在句子中插入这样的

话："你懂了吗，伙计？没有？那就舔我的鸡巴吧！"克拉拉说他只是在仗势欺人，她鞋带里包含的智慧都比雷本雅克的红帽子下面多。他喜欢吹牛说自己甚至不能再看到婆娘、骚货、丰乳肥臀了——简而言之，女人——据说在地下室里她们紧紧黏着他。克拉拉审阅我的交易，用一本目录检查邮票的价值。"那个撒谎的浑蛋一直在占你便宜。你不介意吗？"我不怎么介意。最终我把整本集邮册给了雷本雅克，换来了一大块培根，配着洋葱烤熟，放在一盘豌豆上，成了整座公寓楼的眼馋之物。雷本雅克从地下室里母亲的床下偷出这块培根，然后带着它像黄鼠狼一样偷偷溜走。他跟他的母亲睡在同一张床上，一个体味很重的肥硕女人，下巴上长着胡子。

几十年之后我偶遇雷本雅克。他瘸了腿，重又住在地下室里：他将三间公寓让给了三任妻子，他的妻子会把比他健壮的情人带回家，然后宣布在此期间雷本雅克睡在隔壁房间。在他的地下公寓里，雷本雅克从孤儿院买来女孩卖给有钱游客，教前者偷后者的护照。雷本雅克喜爱各种可能性：瑞典、巴西、澳大利亚……

在安全屋里，雷本雅克会冒险上楼，置母亲的警告于不顾，即战火更容易燃烧到那里：他被我们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他充满渴望地研究我们摆在黑色长桌上用来吃豆子的罗森塔尔汤杯，把它们举到灯光下端详：半透明的。他偷走了一个。

"别当马屁精，"我说，"说不定明天他们就会枪杀你。"

雷本雅克很迷信，我的话惹恼了他。"知道他们明天要枪杀谁吗？你，你这个呆鸡新村爱哭鬼！"

克拉拉拧了他的手臂。"你给我收回那句话！"她本人很迷信。

"看你的呆逼能不能尝到我的精液！"但是在痛苦中呜咽了一会儿后，他收回了他的话。

更多的子弹穿透了公寓。玻璃碴让罗森塔尔杯子里的豆子难以下咽。铁炉的排气管对着窗子，弯曲得像一个人肚子上挨了一脚。机枪子弹从外墙反弹。克拉拉突然变得孩子气，坐在桌子下面，给陶羊和木鼠举办起了豪华婚礼。雷本雅克蜷缩在她旁边的桌子下面。我让他紧张起来。

“你真的爱上了那个笨蛋？我说，他连寓言和止痛剂都分不清。”

“什么是……寓言？”我满腹狐疑地问。

雷本雅克把话题转移到有洞的锅上：“你救了那个乡巴佬的命。还不够吗？现在爱我吧。”

克拉拉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邪恶的微笑。

“好吧。把你的集邮册给我，再把我的帽子装满糖块。”

雷本雅克脸红了，但是没有伸手去拿那顶蓝色流苏从早到晚在我眼前晃的帽子。

那天晚上，住在隔壁的年轻人马里奥从多瑙河回来了。子弹射中了他的手臂，而他设法游了出来。唯一困难的部分是和绑在自己身上的父亲分开。他父亲被击中胸口，一开始紧紧抓着他，但最后还是松开了手。拽着一块浮冰，马里奥顺着多瑙河漂流到了桥下。他害怕被冰块夹碎。最终他爬上了岸，爬到伊丽莎白桥下的台阶上，浑身血水地回到了家。途中他被人拦下，但是那时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你想的话就开枪再把我打进多瑙河吧。”

“犹太人就像猫，”一个老箭十字党说，“他们总是死而复生。”他总看见这样的事发生。这就是他们如此危险的原因。他现在刚刚从河

里出来，变得厚脸皮了。当一切结束时，他们竟好意思把事情通通赖到我们头上。“嘿，你不是去我们那儿做过客吗？”

是的，他去过——他和他的父亲。他们拷问马里奥关于他弟弟的事，他弟弟参与了一次武器抢劫行动。他父亲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说，如果不招供，他们就会收拾他另一个儿子，马里奥。父亲给了一个虚假地址。箭十字党的人暴怒着回来，接着枪杀了另一个人，代替了他们所追杀的马里奥的弟弟。在他们关押马里奥期间，他们不停地用靴子后跟踢他的睾丸。最后一个宪兵军官来到箭十字党的楼房，拽开了他们。一件好事。

埃尔杜什医生和一群犹太老人被人从波佐尼大道拉到街角建鹅卵石路障：年轻的犹太人早就被带走了。六块石头高，四块石头深，这堵墙难以突破。从斯大林格勒一路挺进至此的T-34坦克绝对会被拦在这里无法前进。

我们孩子从门口看着，老人们弯着腰抵御寒冷，用拨火棒和锤子敲击石头，分开用沥青粘在一起的石块，然后把它们抬到腿间，拖到路障上。穿着猎靴、黑裤子和绿衬衫的年轻人监工，催促老人们加快速度。其中一个人挥着车夫曾经用来抽打马匹的鞭子，甩到了犹太老人的脖子上。他们其实还能更卖力地工作。

很可能是拿着鞭子的人引起了隔壁楼房的一位老先生的义愤，那栋楼里住的都是基督徒。有时候老人们待在一起，就算这意味着跨越宗教边界。不管怎样，老先生拿出他的猎枪打伤了年轻的挥鞭者。箭十字党的人以为是一名犹太人开的枪，于是开始盲目地开枪反击。二十名路障工人奔跑着寻求掩护，然后倒下。埃尔杜什医生朝着房子的大门跑去，但是没有太慌张，免得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我是唯一还站在门口的人：其他孩子和门房，一个更老的犹太人，一听见枪声就冲上了楼。

我打开了钉着木条的入口大门。埃尔杜什医生飞奔进来。我想要在追他的高个子年轻人能推进来前关门并上锁，然后我们两个，孩子和老爷爷，从里往外推，但是我们的围攻者，才二十五上下，奔跑着猛冲过来，把我们撞得连连后退，连他的靴子尖都发出了啪啦声。他占据上风。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枪。

他比埃尔杜什医生高，他的嘴唇因为受伤的自尊而颤抖：犹太人就这样在我面前摔上门？一抹浅浅的微笑，失败者的微笑，浮现在埃尔杜什医生的脸上。年轻人举起手枪，朝医生的太阳穴开了火。卡尔曼·埃尔杜什医生倒了下去，血液流到泥泞的粉色仿大理石上。接着年轻人瞄准了我的额头。我看着他，更多的是出于吃惊，而非恐惧。他放下手枪，朝门口走了出去。

当有轨电车无比迫切地给前线，也就是附近地区运送军火补给时，勇敢的女人们还会离开楼房，仍旧设法搜寻面包。在1945年1月17—18日的晚上，我们搬进内室睡觉，因为外面的房间被炸毁，失去了窗玻璃。然而，我们没有上床，却蜷缩在窗户边，在那里看战斗。凭借斯大林蜡烛嗖嗖散发到天上的光线，我们看见一个壮观的新闻现场，不受画面的束缚：一台坦克隆隆驶过路障，将玄武岩砖块推到两旁，后面跟着更多的坦克和步兵；德国士兵，之前拿着机枪趴在石头堆后面的地上，朝公园冲去，因为前线在朝圣斯蒂芬环路移动。

当1月18日的黎明到来时，我亲眼见证了战争的历史性转折点（对我来说是解放，对其他人来说是战败）。一些兴奋的年轻女人——教师、时装设计师、舞蹈家——哼起了《国际歌》。玛格达，一个高大的粉金发舞蹈家，教我们跟她们一起唱。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说我们也应该是，因为他们是唯一的地下党，其他党都与政府合作。那天凌晨四点，我们沉浸在解放的情绪中。

一段时间后，玛格达丧失了热情。1949年她试图偷偷越过边境，穿着冬天围困时期穿过的同一双滑雪靴。边境守卫开枪打死了她。

1945年1月18日上午10点，我跨出了波佐尼大道49号的前门。两个俄国士兵站在人行道上，穿着磨损了的外套，稍显邋遢，与其说他们友好，不如说是冷漠。人们跟他们说话。他们不懂，但是会点头。很明显他们对我们不感兴趣。他们问希特勒是不是在楼里。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说希特勒和处于瑞士保护下的布达佩斯犹太人一起住在波佐尼大道49号。接着他们问起了萨拉希，箭十字党的首领：不，他也不住这里。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明白过来，“希特勒”指德国人，而“萨拉希”指箭十字党。他们是相当单纯的男孩。他们拿着手电筒走进避难所，用机枪的枪筒戳人，把灯光照进每个角度。他们发现一些穿平民服装的逃兵，但随他们去了。他们并不特别关心楼里住着犹太人：如果你试着解释你是个犹太人，并期望得到一些善意，你不会成功。但是他们对我们这些男孩足够友好，我们也习惯了他们在地下室里翻箱倒柜地找希特勒。地下室里有个人会说斯洛伐克语，也稍微听得懂他们说话。他立刻提出给他们当翻译，当他们穿过一条用丁字镐凿开的过道去隔壁的避难所时，这个说斯洛伐克语的犹太人开始大声发号施令，像个穿着便服、刚刚从包着毯子的人群中提拔上来的司令。最后，克服了仅存的犹豫，他跟家人告了别，跟着俄国人跑了。

士兵们闯进一家药房，喝了一瓶黑猫（Chat Noir）古龙水。他们自信地伸手拿它，仿佛很熟悉这个牌子。它是这里最接近烈酒的东西了。我们——不管是穿着便服的士兵、当地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一样——随后蜂拥而至。机智的人带了背包。我拿了一把口琴，后来跟雷本雅克换了一袋糖块。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出入大楼了，这座楼房的中立立场保护了我们，但是并不足以拯救另一半居民的命。一些西里尔字母的标记开始出现。黄色星星从前门摘下来，躺在雪堆里。当我第一次作为自由人踏出大门时，或许也踏出了我的童年，被各式各样的禁令包围的年代。枪击和轰炸结束了，走出地下室安全了。偶尔还有一些流弹，但现在是德国人从布达那边开枪了。

有时候整整一轮机枪开火扫射街道，我也知道了我能贴墙贴得多紧。

考虑到整座公寓遭受了炮火袭击，而且要和三十个人分享它，我们想最好去若菲婶婶和久拉叔叔在赛普街上的公寓，那里可能是空的，至少不这么挤。我们突然有种冲动，要离开地下室的人群，摆脱我们被迫挤进其中的七层包豪斯犹太区。

被踩硬的雪在沥青地上结成了冰。我们都背了包，紧紧抓着被子，把剩下的微薄财产放在雪橇上拉在身后。风吹起了雪尘。温度肯定在零下，因为我们没有手套，手指冻成了紫红色。我们在渐暗的夜里经过了燃烧的楼房。通过黑色的窗户，我们看见逐渐熄灭的火焰把天花板涂成了铁锈红。它们就像炸弹炸毁楼房正面后展现出裸露内部的横截面：一个浴缸晃动着，但是洗手池还在原位；墙上有一个沉重的桃花心木橱柜，但是餐桌在三段楼梯下面。这就是毁坏包含的无耻且扭曲的幽默。

精疲力尽但是精神振奋，人们推着财产各处走动，回家、寻找亲人、为了走动而走动：不管怎样，总有某人在某地烤面包。人们背负着家当跋涉过街道，而士兵们则围坐在坦克上，或成队行动。火舌从窗户里喷射而出，人和马分散地躺在地上。幸存者并不从人身上割肉，但他们从马身上割了：老人们蜷缩在死马里面，用小刀从骨头上刮下结冰的肉片。

铺盖卷在散架，我们只得绝望地抓紧被子。我想要赢得若菲婶婶的赞许。有一次她把我叫作她的“小顶梁柱”，但是另一次我试图取悦她，却被称为“我的小伪君子”，让我的喜悦交织着失望。那个稍带冷淡却仍旧风情万种的讽刺现在也出现在若菲婶婶的脸上了，她好奇我会怎么对付处于分崩离析边缘的铺盖卷。

街角的楼房被夷为平地，但是赛普街5/a号还奇迹般地挺立着。楼身上有几个零星的弹坑，但都可以修补。院子里的大理石喷泉完好无损，从石雕宁芙(注)的水罐上挂下几根冰柱。

久拉·扎多尔医生公寓前门的黄铜名牌不见了，若菲婶婶的钥匙也已打不开门锁。门铃不响了。她只得使劲敲门。长门廊的黑暗中亮起了一小圈灯光，当门上带隔栏的小窗打开后，我们看见一个白发女人用不友好的目光打量我们。

若菲身穿浅色毛外套，黑发绑在浅灰色丝帕里。我们五个孩子站在她身后。我们很好奇，并且下定决心要收回公寓。

“你好，女士。我是若菲娅·瓦戈，久拉·扎多尔医生的妻子，是这个公寓和其中的财产的主人。”

白发女士从隔栏后回答了如下的话：“我是卡兹梅尔·德拉维达夫人，这个公寓的合法占用者。您的公寓，女士——因为它确实曾是您的——被官方赠予我们特兰西瓦尼亚难民了。”

对此若菲说道：“女士，您的程序合法性遭到几条反对。”

对此德拉维达夫人答道：“我相信，女士，您既不愿非难我们的诚实，也不愿指责我们的爱国义务，即遵循千年国家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任何时期的执政当局。”

若菲娅：“不管怎样，您得让我们进去，女士。”

德拉维达夫人：“女士，我的良心对近期事态的观察让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们主动从外套上移除了区别标记，认为歧视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并不歧视你们，女士，出于爱国同情，我赠予你们公寓里五间房间中两间的使用权。”

若菲娅："女士，我无意欺骗您，让您认为，如果我发现我的公寓没被占用的话，我不会更高兴，但是当然了，您自己也得在寒冬里找到避难所。我还能怎么说呢？请在礼节允许的程度内自在地使用我的房间和家具吧。"

我们一动不动地观察两位老人，卡兹梅尔·德拉维达医生和他的妻子，敏捷地将他们的重要储备——几袋土豆、豆子、面粉、培根，成串的香肠，装在大纸袋里的糖，红色搪瓷锅里的猪油，以及一个大泡菜罐里的脆猪皮——搬到了卧室，生怕入侵人群消灭它们。

直到那时他们才喘着气问我们有没有带什么食物。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带。好心肠让德拉维达夫妇给了我们足够的土豆、面粉和培根支撑我们当天的晚饭和第二天的三餐。第三天我们什么都没得到，但是他们没有隐瞒消息——这是最有用的东西——即垂直于赛普街的雷亚尔塔诺达街学校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德国仓库，尽管当地人已经在1月18日那天抢走了大部分存货，但可能还有一些东西留下来。

我们男孩带着空背包出发，看看能找到什么。我们听见多瑙河方向传来机枪的突突声。要是德国人回来了我们会有麻烦：德拉维达夫妇会把我们从若菲婶婶的公寓赶走，我们的双脚再也不能跨进那个很久没擦的铜门槛了。

一条踩出来的小径从学校的前门开始，经过白雪覆盖的院子延伸到后面的楼梯并通往地窖。我们看见德国人的尸体显眼地倒在雪地里，然后用手电筒照了照他们的脸。我总觉得死人在扮鬼脸，但是每张脸都很平静，包括地窖里那个躺在木板箱上的人，旁边是一只掏空了的豆子口袋，他的头以一种相当不舒服的姿势悬着。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的头下面曾有另外一只木板箱。要是他们没留下它，那它一定值得拿走。

我们用豆子、豌豆、小麦和干洋葱装满了我们的背包，这些是当时仅剩的东西了，但我们还是对那个年轻德国人身下的木板箱感兴趣。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长着有力的眉毛，窄脸上有浅色的胡碴儿。他深陷的大眼睛睁着，感兴趣地观察我们。

“原谅我们。”我们在试图将他从木板箱上推下来时对他说。

“我不会原谅你们的，”士兵冷静地回答，“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得死在这个木板箱上面，我先是在地下室的台阶上挨了颗枪子，然后把自己拖到这里。事实上，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会发现这个木板箱里装着高质量的香肠，虽然它外面已经因为发霉而变白，但是刮一刮后你会发现它完全可食用。我已经开始变僵硬了，然后你们会把木板箱从我身下拿走，偷走货品，但是我会待在这里的黑暗中，在这个死亡地窖里，直到收尸的把我带到一个更黑的地方。不，我不会原谅你们。”

但我们并未动摇。“哦，陌生的德国士兵，我们理解你的委屈，因为，坦白地说，我们不会让你的残躯平静地待着（不管有多不舒服），尽管可以说凭借我们的帮助移走你身下的香肠木板箱，我们实际上还帮了你一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快速了解了你跨越了漫长距离从永久居住地过来，肯定是出于命令，而非邀请。此外，当子弹击中你的时候，你很可能在做我们不赞同的事。我们可以指出，我们射中你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但是你会否开枪射击我们，只是一个纯粹取决于收到命令时的随机情况的变量。你把无辜者开枪打死，而我们正是无辜的——尽管可理解地有些愤世嫉俗——年轻男孩。”

我们一抬起木板箱就满是失望：它轻得令人悲哀。剩下的十根细瘦香肠，在我们刮掉白霉，切碎和豆子一起放进小炉子后，支撑不了我们多久。两个星期后，我们只剩小麦了，不得不把它磨成粉，煮上好几个小时来软化它。煮小麦时，我们站在旁边取暖，同时用干洋葱蘸芥末勉强充饥。

德拉维达先生，头戴毛帽，坐在摇椅里，毯子裹到腰部，双手各捏着一个网球。“这能活动筋骨，非常放松，还有助于思考。”他穿着带流苏的冬天外套和有护腿的登山靴。他的嘴唇单薄但线条分明，围着一圈同样细的胡子，尖酸地扭曲着，带着不屑和骄傲。从久拉叔叔的高背阅读椅上，他偶尔朝我们这些吵闹的幽灵投来一瞥。“就算你们赢了，也无权过来四处偷窥。”他旁边坐着他的狗，来回拍着尾巴。德拉维达先生时不时用网球触碰狗头。“我把贝拉的食物拿进来了，因为你们吃了它的烤土豆。你们人这么多，又吵闹，又吃我喂狗的土豆。别站在门口！要么进来要么出去！这是什么？蒜味香肠？真走运。你们犹太人总能得到好处。”

我们饥肠辘辘。我们吃了狗食，还从德拉维达先生的厨房柜子里偷了大蒜。慢慢啃咬蒜瓣几乎像是吃饭了。外面，机枪的砰砰声响起。我们交换了目光，然后看着德拉维达先生，他看起来受到了鼓舞：“游戏还没结束。如果局面扭转，我们的军队回来了，你们就需要我的保护了。我有可能保护你们，但是这得看你们的表现。如果你们表现好，并保持安静，不吃光贝拉的食物，我会替你们说一两句好话。虽然说实话，你们是个累赘。我总发现厕所门关着。你们有那么多吃的来让你们老是蹲厕所吗，小蝗虫？”

我们四个男孩并排躺在双人沙发上，谈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灯光一熄灭，我就想象自己和父母一起在家里，仿佛什么都没变。跟别人谈起这事我会觉得羞愧，虽然我也好奇其他人在想象什么。大公寓里寒冷黑暗，我们在床上也穿着袜子。炉火很早就熄灭了。

有一次来了几个俄国人。他们检查了若菲婶婶的文件，像猫打量酸奶油似的打量她和我姐姐。我姐姐把衣服拉到被子下面，穿戴起来。若菲婶婶进了厕所。其中一个士兵跟了进去，但是一分钟之后踮着脚尖走了出来，仿佛在表示世上没有哪个年轻人能像他一样得体。在把手电筒照到我们四张注意力集中的年轻脸庞上后，他们夸起了若

菲。“好妈妈，棒妈妈，很多孩子。很好！”他们吼叫着命令我们不要大声喧哗，尽管我们已经很安静了。他们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罐肉和三个鸡蛋，把它们放到了桌子上。

“真冷。”脸形各异的苏维埃士兵说。他们把火拨旺，其中一个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瓶白兰地。他们大口咬下培根片、红洋葱和黑面包来下酒，他们大快朵颐时甚至还给了我们一两片。在出去时，他们主动跟每个人握了手。我抓住一个士兵的机枪弹夹。“你想干吗？”他把他的毛帽子用力按在我头上，接着放回了自己头顶。他们什么也没拿，留下了一丝混杂着温暖、洋葱和靴子的气息。他们还留下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德拉维达在前面的房间里用斯洛伐克语跟他们嘀咕了几句。

第二天我在面包房外面排队，即便只是为了飘出来的香味。动作快的人早上就占了位置，虽然面包十点钟才开始卖。我经常到得不够早，只能空手回去。但至少我不用在机枪扫射街道时趴下或者紧贴着墙。此时真正的战斗已经结束，就算是在布达也是如此。报童大声喊出报纸的名字：萨巴查克[注]！自由！公园里坟墓堆积成山，大街上人们四处寻找亲人。

若菲婶婶一直在等她的丈夫。有一天她穿着浅色皮衣去了西站，因为她梦见他躺在田野里，仍旧睁开的眼睛盯着她看。她梦见了一座村庄，现在要去寻找它。她向一名俄国军官求助，解释她想向西旅行。一开始军官没听懂她在说什么，但当若菲娅用法语继续讲述时，他让她在自己的火车上坐下，告诉她没人会打扰她，并说她应该告诉他什么时候想下车，因为他就坐在隔壁车厢。事实上她没有找到她梦见的村庄。她询问小镇范围内是否有集体坟墓。有。他们把它打开。她找到了她丈夫。

若菲婶婶和久拉叔叔最后一次说话是在波佐尼大道49号六楼的阳台上，它面对着用来拍打地毯的院子。那是他们最后一次接吻的地方。1953年若菲娅从阳台跳下，跌到了鹅卵石上。

解放的第二天，我跟着若菲婶婶去了维瑟林尼街的犹太医院，在医院三楼我们找到了她还活着的母亲。她的头被击穿，子弹从右脸进入，从左耳下方的头骨射出。她是个瘦小的女人，五十多岁，就算处于这种状态，看见女儿也尽力挤出一丝微笑。几个糖块就是我们能带给她的全部了，但是我们连放一块到她嘴唇上都不可以。犹太医院曾经是个学校，现在又恢复成学校了。在1945年1月的那天，我往学校院子望去，看到小山般的尸体堆到二楼高。若菲坐在母亲旁边。她们握着手。谁都没问彼此在上一次见面后经历了什么。第二天我陪若菲过来的时候，她母亲正被送进院子的尸堆里。若菲婶婶让我回家，然后设法安排鉴定了母亲的身份，让尸体免于葬入集体墓地。

我不怎么喜欢在布达佩斯漫步，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不友好，我渴望家的亲切，渴望我们在新村的房子。空手从面包房返回，然后站着搅拌锅里的小麦，而火几乎要熄灭了，这种感觉悲惨极了。当你从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看出去且毫无指望时，就算是灿烂冬日也令你感觉悲惨。也没什么东西剩下可偷了。三个星期前，几个穿雨靴的优雅绅士坐在一匹雪地中的死马的肋骨上，他们现在成了一个滑稽的记忆：无马可骑了。

现在我们只是累赘，多余要喂的嘴，也没有迫近的危险在威胁我们。最明智的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那里肯定有吃的。所以我姐姐埃娃和我决定回新村去，等我们的父母。伊什特万和帕里前往科洛斯堡：他们的姑婆挺过了最难熬的一年，邀请他们过去住。我们会回到村庄里的家，想办法回去。我心中对拜赖焦新村和我们家的思念之情非常强烈。如果父母没有回来，我们作为继承人，会将店铺重新开张。我会把所有的店铺老伙计请回来，像父亲一样，举止间丝毫不带

布达佩斯的傲慢和轻蔑。但是如果父母回来了，我会给父亲钥匙和账本，接受他的握手和对我保持生意运转的感谢。

我不喜欢扮演客人的角色，我当主人时更自在。一长大，我就会带一个女人到我父亲的房子里，用某天在去赫尔帕利的路上时吉卜赛人巴可告诉我的办法生很多孩子。有一次我去拜访他，看看像我这么大的吉卜赛儿童是怎么生活的。一个男孩朝我走来，只比我小一点，除帽子外一丝不挂。房子里需要一个女人，一个好闻的衣柜和一只好闻的手笼。你还需要孩子去使用秋千和乒乓球桌。

如果在非正常时期你还按照正常时期的观念做事，你就该上魔鬼那走一遭了。这需要一张火车票。面包房外的队伍里传来消息，德拉维达夫妇也听说了，即火车票只在拉科什仁德索站出售，从市中心徒步走路要花好几个小时。路途遥远，途中到处是俄国和罗马尼亚士兵。有时候我有点害怕。我姐姐不能陪我，因为这城市对年轻女孩来说太危险了。我没有手套，尽力用一只——天知道为什么——发网给双手御寒。想到我现在真的又饿又冷，这让我有点自豪，但是我也睁大双眼，可看的东西太多了。

我看到的是第二战线部队，前线已经从布达佩斯推进到维也纳了。这些年轻人搜集了各种各样的服装，为了取暖一点也不顾忌，把短裙穿在裤子外面并把女士头巾包在头上。他们是一群粗野的小伙子，在卡车上发出嘲弄之语。我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他们总在笑。当他们在卡车上撒尿时，他们喜欢看到女人扭过头去，当然了这又让他们用更大的热情去晃动鸡巴。我看见其中一个从车子上跳下来，给了一个女人一条对半切开的方形黑面包。女人后退了几步，但是士兵默默贴近她，把面包塞进了她的口袋，然后离开，留下女人在原地颤抖。

我打量起这些圆头男孩来，惊叹他们的奇装游行，他们的滑稽举止，他们突如其来的冲动。自然，我觉得这很奇怪。但他们确实有种

幽默感。看着戴白手套的红唇罗马尼亚军官像真正的绅士那样挥舞相机，他们就像乡下女孩看到优雅城市淑女，弓着身子窃笑。

接着有拿着机枪的士兵押送男人做点小活，只是去隔壁镇，或国家，或大洲，或乌拉尔山的另一边——“达瓦伊，达瓦伊！”（快走，快走！）他们承诺人们可获得一份布马什卡——某种身份证件，因此人们服从地跟随他们离开城镇，来到蒂萨河，从那里坐火车继续来到营地和遥远的苦寒之地，都是为了那些文件提供的虚幻安全感。海市蜃楼。

每千人中的逃跑者数目并不多，不管是匈牙利犹太人还是匈牙利基督徒都一样。真正逃跑的人数远远低于本可以逃跑的人数，很多人本可以活下来。而对刚刚到达的押解士兵来说，不管是冷酷，冷漠还是仁慈的，他们总是深不可测，难以理解。他们行动起来不如德国人那样整齐、有纪律或生硬；他们不那么有军人气魄，而且更为放松。他们也不可预测：一个人会给当地人礼物，另一个则会抢劫他们。同一个人经常两者都做。基本上不用害怕德国人强奸女人，但是这些男孩等不及要解开他们的裤裆。然而他们并不根据原则而杀人，即使他们在用汤勺舀饭盒的时候看起来闷闷不乐，他们仍能开心地对某人笑，冷不防地，毫无缘由。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很清楚：一个温暖的房间，一个女人和一顿饭。他们会为了能给予他们这些东西的女人把月亮从天上摘下来。达瓦伊，月亮，达瓦伊！

城郊的火车站是一个垃圾堆。在临时售票窗口前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从一个完好无损的天桥下蜿蜒而过。好吧，好吧，看来我们不是唯一知道这个地方能搞到火车票的人！传言说窗口最终会打开。漫长的几小时过去了，夜幕降临，此时一名铁路员工宣布没有票——也不需要票。任何挤进火车的人都能走，挤不进的人就走不成。第二天下午三点有一趟火车从西站出发往东开。谁想上都能上。

我们中午到了那里，僵硬地站着，我姐姐和我，夹在一群用肘部推挤着上下火车的人中间。我们任自己被人流推动。我们看起来绝无可能上车。人们坐在车顶，站在门口，吃力地攀登上车钩。有的人甚至蜷缩到座椅上面的行李网内。我们没法把脚踩到台阶上，我们只是不擅长推挤。我们的处境似乎毫无希望。

突然我们看见了佐尔提·瓦尔加，新村的摄影师，穿着衬毛皮大衣，戴着护耳皮帽。瓦尔加从我出世起就给我们拍照。我三个月大时不得不趴在平台上，实打实的一丝不挂，连头发都没长，只有一副生气的表情，作为营养良好的婴儿，我的脚踝长着一圈肥肉。接着有一张大概是三年后的照片，我穿着海军衫坐在父亲的膝盖上，留着长头发；我姐姐坐在母亲的大腿上，卖弄风情地歪着头。

一旦佐尔提·瓦尔加把他的头塞进那个黑色多褶且用蜡帆布包围的锥体里—几乎是黑暗的大口——我们就会等待（谁知道师傅的脑袋还在不在那里呢？）说好的小鸟弹出来。我们想象它是某种金丝雀，但是接着出现的不过是一下咔嚓声，根本没有小鸟，只是佐尔提·瓦尔加把头从玻璃眼盒子里伸出来，像个魔术师，脸仍红着，汗流不止，理所应当地期待人们为他的戏法而鼓掌。

现在佐尔提·瓦尔加站在我们面前。他拥抱了我们，说他看见我们安然无恙有多么高兴：真是太好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跟他在一起，他邀请我们加入他们。我为佐尔提的善意而高兴，虽然我似乎回忆起前一年他还在期待德军胜利。在逃离新村，前往布达佩斯，并坐在围城外之后——他们并未继续向西前进，因为他们希望避免战争——他和他的家人想念老家的房子，不管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姐姐和我知道我们不会看到父母在家，但是我们同样期待看见我们的房子，用某种方法重新开始旧生活。

我们的自愿旅伴想办法把我姐姐从窗户塞进了一节乘客车厢的行李网里。他把我挤进运畜车厢，在那里我们被挤得特别紧，一名老人

告诉我他的心得：“单腿站，孩子。你是个小孩，你做得到的。没地方放两条腿。左右腿轮流站。”

这是我第一次长途出行：花了一个星期。但这不是离去，这是归来。我们不是在逃跑；我们在回家，回到一个存疑的失乐园场景。房屋总是不忠实的：它要么在你之前倒塌，要么在你死后仍然存在，给任何人或物提供庇护。现在谁住在那里？谁有钥匙？我不敢想象我们能发现事物能像曾经那样。也许家具被移动过了，也许衣物都不见了，也许房子会是空荡荡的。然而，有一个可能性我没想到：肮脏。在我的脑海里，家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从没考虑过我见到它的第一眼，它会是令人厌恶的。

我单腿站在运畜车厢里，和八十个人一起，凭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非守卫的来福枪托挤进来，夹在这些身体中间，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思念的画面：我要怎么找到姐姐呢？埃娃在行李网里对付得怎么样？我们的豆子或者我们用天价从一个蹲在空店破窗上的年轻人那买来的两个面包卷能支撑多久？要是旅程一直拖下去怎么办？佐尔提·瓦尔加能给我们点吃的吗？他能吗——以及他会吗？

据称俄国人征用了我们的车头，但是会提供另一个。火车还停在布达佩斯西站，但是我现在舒服点了，因为一些人等累了，放弃了出行计划。从狭窄的窗户里，我能看到月亮透过车站大厅现已失去玻璃的肋拱而闪烁。自封的大人物从车厢里上上下下，推搡着在人群中开出路来，传播消息说我们会在凌晨一点出发，五点，十点——是的，十点肯定出发。

我溜下去，在轮子间撒了尿。尿液立刻就结成了冰。人们仍然坐在车顶，背对着背，但数量比之前少了一些。更坚定的运畜车厢乘客现在相互忍受着，而我设法在一个肥胖的老女人背后蹲了下来。虽然我们没有朝目的地移动一英寸，但是我们已经在火车上度过了一个漫长夜晚，这感觉不错。

最终我们在下午两点出发。路上一直停停走走。车头来了又走（如果我们有更好的车头，我们会失去它），铁轨需要维修，军事火车有优先通行权。过了一段时间，埃娃和我坐在了运畜车厢的长椅上，从佐尔提·瓦尔加那儿得到了面包和培根充饥。有那么一刻，我们听见了一轮机枪开火：散兵在吓唬平民。惯常的传令官说他们在挨个车厢找女人。女人从某处搞到煤块，把自己的脸涂脏，让自己看起来又皱又丑。就算是上了年纪的女士也在眼睛下面抹了煤灰，我姐姐和我注意到了，对着彼此微笑。我把埃娃放在角落里，站在她前面。其他女人把头巾拉到眼睛上，弯腰驼背地坐着。五六个士兵过来巡视了。其中一名士兵肯定被一个女人吸引了，即便她涂黑了自己，但是当他弄湿了手指摩擦她的脸却发现黑色被擦掉时，他生气了，往女人脸上吐了口水。士兵们在一片不满的喧闹中离开了火车。

我们来到一座草草建成的跨蒂萨河桥前，盟军轰炸了旧桥，残余部分又被德国人炸毁了。桥塔间的临时支柱支撑不住火车的重量，所以我们徒步走到另一趟火车等待着的地方，但是它没有车头。最终我们再次开动，最终我们再次停下，坐在2月暴风雪夜中一节积雪的敞门运煤车厢里。大平原吹来的风，疯狂冲刺无所阻拦，无情地重击我们。我们的手早已麻木无知觉，睫毛上挂着冰晶。像用胶水粘紧的眼睛把我们带到一个幸福之地，而寒冷近乎疯狂。我们走出去，站在黑暗包围的露天铁轨上。

我们决定闯一闯，走到土路上，到我们发现的第一幢房屋寻求庇护。我们走路时风几乎要把我们吹倒，我们拖着笨拙的背包，直到最后一丝微弱的灯光闪烁在蓝白色平原的边缘。当我的双腿把我带到那里时，我冻得浑身发紫，失去了知觉，在冰块间跌跌撞撞地穿行。我顺从地在铺着稻草的土地上伸展身体，当一个年轻女佣躺到我身旁叫我依偎着她，并把我的手拉到她的肚皮上以驱散冷战时，我恢复了意识。我从后面紧挨着她，把脸埋在她的背上，让她的臀部贴着我的大腿。我们完全是一个人了。我意识到，你可以爱上一个你从没见过正

脸的人，并且能够对一个陌生人发生反应，好像她是你最亲近的爱人。我抱着她，仿佛我早就把她当作我的唯一。到早上，我感谢了房屋住户的好意，并对我的床伴表达了特别感激。

考虑到火车第二天还是不开，我出去侦察了一番，在结冰山丘上的车胎印中间发现了一块扁平的黑色方块状固体，离马粪不远。仔细察看后，发现它是一块苏维埃军用面包，尽管硬得像块石头。但是只要它真的是面包，它就能在铜管道流出的温吞自流井水散发的稳定蒸汽中软化，软到能吃的程度。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因此我满意地咀嚼着我的发现。

一个女人路过，迅速地把面包篮里的羊粪块扔到雪地里，仿佛在播种，从左到右，保证把整条街的宽度都覆盖。看见我摸着湿面包，她伸出她的篮子，捧腹大笑着说："吃点肉就面包吧。剩下的几个我不播种了。你的肚子会咩咩叫的。"

"我在哪里？"我问她。

"在特勒克圣米克洛什[注]。"

"我该拿这块面包怎么办呢？"

"扔在这里喂鸟。"

在1945年2月28日，旅程的第七天，我们到达了新村车站。它在这一年中几乎没变，因为这附近没发生什么大战役。我们拿着包摸索着下了第一节车厢，从皮什珀克洛达尼[注]起它就跻身高级乘客车厢的行列了。如果父亲来接我们，事情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当我们和母亲一同到达，打过招呼之后，他会在黄砖站台上拥抱我们，然后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新闻：想象一下吧，我们在佩斯城的公园里的湖上滑冰，在那个恶臭的猴舍喂狒狒吃苹果，再之后去小歌剧院看一场《拉提·玛

提》的表演（由于所有的孩子都在笑，拉提几乎插不上一句话），接着触摸摄政本人走过皇家城堡的房间时会触摸的绳子，我们还在城堡地区时响起了空袭警报，于是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走进一个深深的石穴，城堡下面的洞穴，在那里一名老师站在我们旁边，解释山的肚子里有一个湖，想象一下，他说，你可以在上面划船。但是当我们踏上站台向前张望时，很明显父亲没有在等我们。也没有其他人在等我们。

在那个曾有出租马车给布达佩斯来的旅人提供服务的地方，现在只有几辆牛车。我们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在犹太学校教过我的老师山多尔·克莱斯勒。和整个学校的学生一样，我们班的每个人都被杀了，因此很自然地，老师看到我们深受感动。他站在那里，一个留着胡子的矮小而有胆量的人。看见他几乎就像看见父亲那样难以置信。

山多尔·克莱斯勒是个好老师：内向，但是善良公正。除了小学科学，他还给了我几下用铅笔盒盖打的掌掴，基本上都是因为芭芭·布劳。克莱斯勒先生早在我一年级时就是我的老师，那时候我还有私人教学：他会来我家，在客厅里从下午三点到四点给伊什特万和我教课，这一小时就是我们所需的书本学习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自己。有时他会和我们一起走到花园里，偶尔他会踢一脚球，但是从来不参加游戏，因为他是一个在意尊严的年轻男人。

他的父亲是个好锡匠，爱好政治。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每天穿着工作服来我们家的店铺，然后他们会站在烤箱边说笑话。但是我想不起来他父亲来过我们的房间，而父亲不被接受的地方，儿子也不会感觉自在。他叫我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去：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对我有好处。我取得了拔尖的成绩，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也得到了不少责骂。因为我在蹲下跳圆圈舞时随着“野兔叫它的儿子跳到绿草地”的歌声有节奏地抓在我前面跳舞的女生的屁股。或者因为通常的原因：打架。我打别人，也挨揍。一间教室里总共有三个班级。当老师忙着教

一年级时，二年级和三年级在安静地做作业。我仍然觉得避免持续关注同一组活动是个好主意：我们有可能在阅读、绘画或写作中迷失自己。

克莱斯勒先生是从强制劳动中归来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被带去了奥斯维辛，他的所有学生也死在那里。他看到我们跟我们看到他一样吃惊。他拥抱并亲吻了我们，他从来没这么做过。他听了佐尔提·瓦尔加的故事，感谢他将他的两个学生带回家，并承诺在需要的时候为佐尔提的英勇做证。八个月前，带我们去布达佩斯的行为是一桩政治丑闻；现在带我们回来的行为成了政治荣誉，这同样不怎么令人愉快。

我们紧接着碰到了一个穿着皮夹克而且皮带上别着手枪皮套的年轻人。“山尼[注]，”他说，“把这些孩子变成好共产党员。”

“好的。”山多尔·克莱斯勒说，然后我们三个人继续走。

战后他有了一项重要事业：起初作为德布勒森的小学教师，之后退休成为学校专员。在我们到达的那天，他主要担心的是实际问题：当天晚上我们睡在哪里以及谁会养我们。我们固执地要去我们的房子。老师建议我们等到第二天。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睡在自己家里，搬回去等待父母呢？

在一家主街上的小店里，我们见到了三张友好的脸：伊姆雷·塞凯伊、马尔顿·格吕克和安德拉斯·斯韦德。前两个是我父亲的表弟。他们从强制劳动营回来，各自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三个联合开了一家小店，在里面你能找到你需要的所有东西，从红糖到黑色羊毛方巾。商品——他们用其交易面粉、烟熏香肠和葡萄酒——是用牛车从纳吉瓦劳德和德布勒森拉来的。我们进去时，店里一片欢腾。接着这三个肌肉强壮的大男人都退到不同的角落里，流下了眼泪。回来时他们尽全力挤出笑容。然后他们带我们去了我们的房子。

到处充满了污秽，从阁楼到地窖：遭受践踏的书本和照片散落一地；浴缸被驻扎的士兵当作茅坑，里面充满了干粪便。仅剩的家具是那个洛可可风格的白色大衣柜，它有三扇门，装饰着天使，镜子依然完整无缺。大概是它太重了，他们搬不走。我脚下躺着我之前在学校写的故事，讲的是一棵小冷杉成为出海帆船的桅杆，热衷于和来自山顶的老朋友风对话。有一本相册凌乱地散页铺在地上，消失了的脸，也混杂着我们的脸，肮脏泥泞。我回头看站在我身后的三个男人。我们开始懂得，好景不长，盛筵难再。

“还是去我家吧。”伊姆雷叔叔说。他的管家从一条巨大的圆形面包上切下厚厚的几片，涂上黄油和盐，然后把它们放到茶杯旁边。我揉了揉眼睛。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然，男人们早已知道了，虽然他们自己那时被召去强制劳动，在靠近前线处挖壕沟，不在奥斯维辛或驱逐移送营。他们的司令官，一个当地地主，在俄国人经过村庄时带他们回了家。大多数离开城镇的犹太人是年轻人。战前，新村的一万两千名居民里约有一千名是犹太人。其中大约两百人幸存。他们在司令官上走了运，因为他在和平时期就认识他们，曾经光顾过他们的生意，从他们的工作坊里定做过东西。他想要的不过是回归和平，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跟他的乡亲们在一起，并且无愧于良心。10月20日，苏维埃部队在村庄边缘打了一场坦克大战后经过这里，到11月，连被送去强制劳动的人也都回家了。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家人的下落，并在纳吉瓦劳德的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毒气室的消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妻子被送进了毒气室还是劳动营：她们是强壮的女人，所以丈夫们还能希望失去的只是孩子。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管事的德国人想要事情进展得越顺利越好。有母亲在身边时，孩子更容易保持安静并裸体进入淋浴间。为了不让孩子们哭闹，他们宁愿把年轻女人一起毒死。

接受这些男人的喜爱并不容易，这一百余名失去孩子的鳏夫。他们对我们很好，看到我们活着很高兴，但是我忍不住想，我的幸存会

提醒他们自己的孩子已死亡的事实。他们中的一个跟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不但在为自己，还在为其他人活着？"

照顾我们的伊姆雷叔叔其实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弟，他是个热心肠、坦诚、安静的人，有着宽肩膀和幽默感。他无望地等待他的妻子，伦克婶婶，他的女儿帕妮和他的儿子久里从奥斯维辛回来，而我还有希望，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去了奥地利，那里的战争还没结束。伊姆雷叔叔只住了之前房子的两个房间，睡在旧卧室里。我睡在他旁边的床上，那是他妻子的床。

我姐姐和管家占了另一个房间。伊姆雷睡得不多，但抽烟很多。他那个用弹夹壳做的打火机不时地亮起。我会从眼角看他被香烟的微光照亮的脸。有一次他哭了，用男人的方式，啜泣声从胸腔涌起，通过喉咙冒出来，然后他转身趴下，把脸压进枕头里，肩膀颤抖着，咬着枕头不让我听到哭声。我假装睡着了。

我回到了伊什特万和我曾就读的公立学校，前一年秋天我们从那里转学去了犹太学校。老师和学生和从前一样，只是伊什特万不坐在我旁边，他留在了布达佩斯。前一年把我们排除在外的军事教育没有开设，所以我已经是班级团体的正式一员了。老师和学生都不知道怎么和我相处。班主任问我想坐在哪里。没人坐在小巴尔奇旁边，于是我要求坐在那里。他就是那个不到一年前语气肯定地跟我说现在我们犹太人完了的人。我们的匈牙利地理兼体育老师有一次在扇他耳光时扯起他的头发，好让耳光打起来更疼。我们一起捣蛋，分享涂了猪油的面包。

"你父亲在哪儿？"我的同学们问，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父母被驱逐出境了。班里有个男孩的父亲在前线阵亡，还有一个男孩的父亲是战俘，仍然下落不明。有谣言说，在国外，平民和战俘都在挨饿，病弱者被冻死。我不是唯一处在孤儿状态的人。我们重新接受了彼此，避免说起家人。

我们用靴子后跟在结冰的小路上滑行，洗劫被子弹打坏的坦克。我们收集弹夹壳。偶尔我们会找到一个头盔、一条皮带或一袋装着达姆弹的弹夹，就是那种会在身体里爆炸、黄铜弹片炸得到处都是的子弹。我们会在木板上钻洞，把黄铜弹壳硬塞进去，然后把尖头子弹装进锥形弹壳里。之后我们会拿一枚钉子对准子弹尾部，用铁锤砸，让它爆炸。一块塞了十几颗子弹的木板看起来就像一台多管迫击炮。我们那时经常说我们要发射喀秋莎火箭炮。可射击的东西很多，尤其是乌鸦，因为1944年的收成很好，雪地下面有大量供它们啄食的遗穗。我们从来没伤着自己，真是个奇迹。

一年前，有个老师告诫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他现在不这么做了，但是他也不说德国人坏话。私下里他跟他的一个好学生说，要是给他们神奇的武器，他们还可能东山再起。然而，俄国人一占领维也纳，这个老师就申请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上个夏天，孩子们还在想象那些德国的神奇武器，如德国俯冲轰炸机般嚎叫。一个大孩子被叫作虎，用了德国坦克的名字。但是到1945年的春天，德国人已经过气了，孩子们的想象被哥萨克和他们镶毛边、顶部有金十字架的红色布帽吸引了过去。

哥萨克一刻也坐不安稳：他们就像坏男孩。他们会拿着鸡蛋、洋葱和一大块培根冲进来，叫我们煎熟。他们会狼吞虎咽着吃完，用整杯伏特加把食物送下去，然后嚼一整块红洋葱。他们会喝醉大哭。我们不得不通过侧门把我姐姐偷偷送出去。

有一天，杜琪·莫扎尔，一个刚满十五岁的丰满漂亮女孩，站在家门前，一辆带跨斗的摩托车轰鸣而过。跨斗里的哥萨克伸手将她掠走，把她放在他前面坐下，随后绝尘而去。下次他们被人看见是在一年之后，摩托车轰鸣着回到镇里，跨斗里的士兵把杜琪·莫扎尔跟一个婴儿和一个手提箱一道放下，接着再次绝尘而去，仿佛他从来没到过这里。

一整个班的神枪手强奸了一个农妇，另外两个狙击兵在门厅拿机枪顶着她的丈夫，让他保持安静。有时候反抗太剧烈，他们会射杀女人和她的丈夫。他们开着卡车来，带来东西又拿走东西。如果你能搞清楚他们到底想要什么的话，可以和他们交易。他们中的一个只想要我们看看他在结冰的泥地里找到的相册。捡到以后他就一直随身携带，凝视相册里陌生人的祖父母。

我从布达佩斯带回了受伤的爱国心。有些事情你无法说起。那一年成了我和我的基督徒朋友间的沉默钟罩，因为在那一年里，他们都是正常的孩子。

“我为什么爱我的祖国”。这是1945年3月布置给我们的作文题目。我该写什么呢？事情太复杂了。我认为我的祖国想要杀死我。父母想要杀死孩子的事件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果不是我的祖国想要杀死我，如果只是其中几个居民，那么我的祖国和那些下令杀人并付诸执行的人的祖国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也说起他们的祖国——无时无刻不在说。如果我是我的祖国的一部分，那么这就是自从去年考试之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些我都不能写进作文里。

我尤其喜爱我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和生我之地的一个形象：美好的地方，给你安全感并且不会将你赶走的地方。但是一旦你被驱离家园，看到乡亲们接受这事实（更准确地说是为此高兴），那么你就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有家的感觉了。某种东西被摧毁了，你跟这个地方的关系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亲密得天真无邪了。在长达一周的归途后我姐姐和我想要在镇子里重新找到家的感觉，但房子是空的，我们的父母不在，而我站在那里，在3月15日国庆节那天，站在那个我曾经和同学组成方阵朝国旗行进的广场上。

广场上有个石讲台，演讲者就站在那里，其后是一根旗杆，上面的红、白、绿三色旗在战前一直处于半旗状态，提醒大家，我之前说过的，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得不完整，失去了四分之三的领土

的痛苦事实。在收复失地前国旗绝对不会完全升起。我们穿着深蓝色的裤子和白色的衬衫。我还能记起某些明亮的春天早晨，穿短裤和短袖衬衫就够暖和了。天主教、新教和犹太学校并排而立。

在少年时期，我和其他人一样，对半旗状态很不满。我认为这无法接受，就像不能接受每次我们去纳吉瓦劳德看望祖父和当地的亲戚组成的复杂网络时，火车经过比豪尔凯赖斯泰什[注]后要在边境停那么久，一个穿制服的人替换另一个穿制服的人，我们还必须经过护照检查和海关边检。一跨过边境，我们就看到水泥工事，仿佛战争迫在眉睫。从拜赖焦新村到纳吉瓦劳德只有三十公里；从拜赖焦新村到布达佩斯有七百公里。所以跟罗马尼亚国王相比，纳吉瓦劳德更像是我的领地，而不是他的。

家族的口头传统包含很多城市。除了拜赖焦新村，还有布拉索夫、科洛斯堡、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布达佩斯、普雷斯堡[注]、维也纳、卡罗维发利[注]、阜姆[注]、海德堡、特里尔[注]、曼彻斯特和纽约。拉比的亲戚可能住在那些遥远的城市里，但是纳吉瓦劳德是事物的真正中心，纳吉瓦劳德的咖啡馆和剧院，还有它的河岸，从我某个姑婆的阳台上，我可以透过小望远镜观察克勒什河面上发生的事。

如果纳吉瓦劳德是太阳，那么毫无疑问，拜赖焦新村就是月亮，琼卡-比豪尔县的中心。我们有自己的县大厅、自己的县监狱和自己的总督；我们在军事青年中心有舞会和文学之夜，由绅士俱乐部或犹太女性组织赞助。在小学，我们学习拜赖焦新村的地理，接着是比豪尔县的地理，惊奇地背诵能在这里找到的一切：平原和雪山、河流、森林、矿藏以及——在所有事情的中心——纳吉瓦劳德这个现代城市和它背后的八百年历史。我像热爱祖国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会嫉妒地保卫拜赖焦新村，反对代赖奇凯，地区里的邻居。

1945年国庆节演讲里突然出现了显著变化。回想起1848年3月15日，一个演讲者称其不只是一场独立战争；他称之为“革命”。我在学校的地位是有礼貌的局外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下去。这个唱着“对祖国保持绝对忠诚，哦马扎尔人(注)，因为它是你的摇篮，有一天也会成为你的坟墓，养育着你保护着你”的人群，这个热爱悲剧苦难的人群，不能指望我已变成鬼魂的犹太同学加入他们，因为这个祖国对他们的坟墓毫无兴趣：他们在波兰的一个小镇里化为了灰烬，两百个孩子的命，用那个悲伤的父亲的话说，我为那两百条命而活。

小镇居民大体上没有对犹太人被运走发表意见。有些人甚至嘲笑费劲摆弄行李的老人，而他们确实可笑，竟然觉得他们会需要他们的东西、他们熟悉的枕头和毯子，而等待着他们的是火葬场。他们被装进火车里的事实，和前线传来的消息、起草的通知、晴朗早晨飞越镇子上空的轰炸机外表一样，遭遇了相同的冷漠：它们是人们无力掌控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几个。这种冷漠来自对命运的接受，并混合了恐惧，可能还有解脱。“城镇摆脱犹太人了。”当地报纸宣布。匈牙利语找到了德语形容词judenfrei的对等词。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在丈夫们和儿子们身处前线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糟心事了：阵亡消息不断传来，庄稼该收割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商店关门了。接着有人认为轮到自己拥有这些商店了，他们的小女儿应该弹钢琴，他们的小儿子应该睡在黄铜床上，他们应该好好享受亚麻橱柜和里面的东西。每头牛都有了家和新主人。

1945年早春，我在拜赖焦新村总是觉得冷。天早早黑了，我在没有点炉火的客厅里就着烛光读书，同时肥胖的管家，邮递员的妻子，坐在厨房火炉旁点着油灯削土豆、剥豌豆。当她三岁的儿子告诉母亲他饿了时，她解开扣子，露出一个巨大而下垂的乳房，孩子吃起奶来。或者是他爬到凳子上，或者是她弯腰下去。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我们在拜赖焦新村，却不在家。

每天我都从我父亲百叶窗紧闭的五金店前经过。谁都能从侧门走进公寓里，在废墟里游荡，但是不值得为此大费周章。有时候我会走进院子里，爬上二楼，通过空房间，低头看着马车沿着主街行驶。一对夫妇端坐在马车驾驶位上，两人都戴着羊皮帽。

我穿着一件厚重的外套走过我的房间。浴缸里的粪便散发出寒冷干燥的气味。地板上还散落着曾为我赢得老师赞许的作业以及相册里掉落的散页：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喀尔巴阡山脉度过的夏天、马拉马洛什峰、现在已被毒死的姑婆们和表亲们。我没有从地板上捡起任何东西，或者是我捡起来又放了回去。我前一年的外套没有变紧也没有变短：一年里我一英寸都没长；我可能还缩水了。站在那堆羞耻感中，面对思乡之情的讽刺，我凝视着幸存的镜子里自己震惊的脸，朝那个最终回到了家的小人点了点头。

一个女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个裸女的身体，一个橱窗模特。她显然是个女人：她有乳房和墨水涂成的阴毛。她的眼睛被人用匕首挖了出来，她的身体被子弹打成了蜂窝。为什么看见她是个女人他们还朝她开枪？我听见背后响起一阵沙沙声：吉卜赛儿童过来看我在找什么，或者找到了什么，说不定他们也能找到点东西。

在冬末的早晨沿着主街散步。会有人邀请我进入这个或那个商店里。那是个糟糕的3月：泥泞、灰暗、僵硬。我们惶惶不安，处于目的地之间，却又觉得待在这里而且有人养自己再自然不过了。这是我们长久渴望到达的地方。我们向往着像成年人那样接管事务，但我们毕竟还只是孩子。风吹过，翻动我旧房间里的家庭信件和犹太教堂里的祈祷书页。

我们的弱小显而易见：我们除了移走所有瓦砾外无法开始新生活，我们的房间冰冷，厨房吵闹，而且镇里没有图书馆。从强制劳动营回来的男人们开了商店，货物寥寥，我在里面闲晃，像以前在父亲店里那样。他们中的两三个会搭档合作，一个买，其他人卖。强制劳

动营里的朋友。失去了家人，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一开始，钱能买到精制糖、法兰绒或锄头，但是很快唯一通行的货币就是鸡蛋或面粉了。但是门依旧敞开，顾客依旧会进来。年轻的鳏夫开始重新打量女人，从驱逐营溜回来的犹太女人和当地的女基督徒，从前的打字员、保姆和管家。如果妻子死了，她的妹妹可能还活着。一个女人会进入房屋和睡床，年底孩子们就出生了。失去原来的家庭不再是个噩梦，而只是个令人痛苦的事实。要是进展得顺利，你可以在新妻子和新孩子的陪伴下悼念死者，尽管更多的是默哀，不用语言表达。

但是在1950年，正当归来者们重新振作起来时——收集货物去卖、装修房屋、在房子里增添家人——人民政府接管了所有的生意、所有的工坊、所有的房屋，一切。你能看着它发生。这是第二波，最后一波针对拜赖焦新村的犹太人社区。第一波发生于1949年，当时很多人在门口挂上“马上回来”的牌子，走到镇子边缘，爬上了卡车，目的地以色列。鞋匠扬科·克尔特斯在三脚凳上继续用匈牙利语讲述他在纳哈里亚[注]的刺激故事：他最不缺说匈牙利语的顾客。扬科失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在1944年11月，在苏联军队经过拜赖焦新村，并把总部安置在地区政府大楼后，铁匠巴洛，镇子里最强壮的人，当选人民委员会主席。在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前几周里，他是指挥部主席。他是那种人们会在极端情况委以信任的人，尽管他身上没什么特别招人喜欢的地方：他是个可怕的牢骚鬼，总是心怀不满。脸上带着火星烫出的黑色麻疤，他绝对称不上英俊。松松垮垮的油布裤子，黑靴子，铲子状的爪子，爪尖长着黑色指甲，加上这些，就是他的整体形象。他会把东西分成杂乱的几堆，四处拖来拉去，通过把富农的小猪判给贫农来伸张正义，但是不会因此损害自己的利益。

不管怎样，有一天这个巴洛去了总部（之前的县政府大楼），带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上校控告一名苏维埃士兵，罪名是他带着一只鹅找

隔壁的女人煮，然后拿了她的鸭绒被去换劣质私酒。司令官让有罪方站在铁匠铺的储煤室门前。接着他做了个助跑，把士兵从背后一脚踢下楼梯。没人目击后面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听说三天里他们只给士兵水喝，别的什么都没有，当他好点了，饥肠辘辘时，上校召见了他。

“你反省自己的罪行了吗？”

以及如何反省的！

之后他就能得到吃的了。

上校和铁匠相处得还行，但当权者并非如此。回想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倒下后接管政权的宪兵把巴洛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可他还是镇里最强壮的人。1945年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顽强，但是因为和当局搞不好关系，他回到了自己的铁匠铺。也正是他在1956年领导了示威游行，扛着国旗，并成了当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当原先的共产党守卫重新掌权时，他们这群堕落好斗的醉鬼，把他拉到镇子的边缘，收拾了他一顿。他之后不久就死了。

我姐姐和我在拜赖焦新村又待了一个月。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得知我们要坐俄国卡车去纳吉瓦劳德的消息的，但是拉斯洛·库恩，一个住在布加勒斯特[注]的表哥（父亲最喜欢的姐姐，莎罗尔塔姑姑的儿子）过来接我们了。没人问我们想不想去，但是我父亲的朋友们认为这理所应当：我们需要去有人愿意长期收留我们的地方。我的表哥，一个纺织品制造商，提前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宿。灰绿色的卡车有着防水帆布做的顶篷和乘客座椅，车里装满了黑市货物箱，我们都没地方落脚。司机后面坐了一个中士，他学会了苏联人经过的每个国家的语言，并立刻投入了当地的经济活动。他卖给我一顶哥萨克帽，还用一把匕首跟我换了一个闹钟。（到今天我想起那个咧嘴笑的中士还觉得很温暖。后面会提到更多他的事。）那个秋天，纳吉瓦劳德和拜赖焦新村还属于同一个国家，甚至是同一个县；到4月初，它们就在不同国

家里了。但当时不是布加勒斯特或者布达佩斯发号施令；而是俄国人，以及总是突然冒出来的当地政权。

姐姐和我被带到了纳吉瓦劳德的一个地址，那里有几个丰满的女人在专心照顾一个婴儿。姐姐开心地加入了她们，而我则任自己沉浸到愉快的孤独中。我住在楼上的公寓里，家的主人是个从强制劳动营归来并失去了家人的人。他是个检察官，经常出差，不怎么在家过夜，所以这个宽敞的公寓事实上都是我的。我会坐在阳台上，品尝从橱柜里找到的烈酒。那是个完美的春日天气，我看着湍急的克勒什河把所有东西都像纸船一样卷走。手里拿着书躺在阳台上，我想让万物静止；我想要抓住当时那样的它们，并保护它们。

在童年时期，有这样的时刻，得到启迪的时刻，我们得知了之前所不知道的事，就算那件事没什么必要了解，因为光是活着，沿着河流或一排商店橱窗或一条列柱走廊漫步，就已足够快乐。

我循着气味走进祖父的房子里，寻找一个橱柜、一棵橡树、一个盖着蕾丝布的餐柜、装在一个很容易被刺刀刺穿的玻璃盒里的陶瓷塑像。花园内部的转弯让我想起了在凉亭下面的晚餐。想要活得好，你需要的不只是财富；你需要某种轻松感，但最重要的是，你得活着。你需要让牛肉汤和咖啡和雪茄各得其所。曾经有一种生活，里面的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地点，有着需要完成的任务，像衣柜里熨好的衬衫般整齐地叠起来；一个时间用来读书写信，一个时间用来读《新苏黎世报》和《劳埃德氏报》以及首都和省城的政府和反对派报纸，一个时间用来午睡，一个时间去咖啡馆，去散步，去剧院。曾经有一种生活，祖父们在换上烟草色的骆驼毛家居服之前，没有理由不把外套挂在同一个衣帽架上。

在30年代末的那段日子，在饭桌上有很多可谈论的事——当然，是指我长大到能权衡成人的话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反叛儿子去巴黎和

伦敦旅行，而不去维也纳或奥帕蒂亚[注]。他们不去莫斯科。他们离开柏林。他们会在晚餐时发表不耐烦的宣言，用银餐具吃着女佣（在一般家庭里是厨子）在厨房铃声响起时端来的随便什么东西，铃铛的按钮装在桌子上（在一般家庭里则是挂在桌子上方）用来传达她可以收拾餐盘并端来下一道菜的信息。

某种宁静的永恒似乎存在于每周菜单和用人们戴的浆洗过的帽子里。即使脸从尤利什卡换成比罗什卡，从埃尔琪换成伊尔玛，从雷吉娜换成薇尔玛，准备食物及上菜的过程也基本没变化。家庭里的年轻成员在解释更换用人造成的不可容忍的问题时一片迷茫，因为他们对所有人都很满意，从尤利什卡到薇尔玛。他们都和门当户对的人结了婚，随之而来的是可观的嫁妆。年轻一代也不能理解这奇怪的新关系不仅被强加在他们自己身上，还加在了身边所有人身上。不止一个衣食无忧的财产继承人选择了同居。

现在，那些时光也已不再。我穿着外套站在阳台上，看着泡沫冲击着岩石：克勒什河在低水位时也是一团汹涌巨大的水体。我去看了《战后六小时》，里面有战俘和那个令人难忘的左内锋足球明星的画面：每天都有一个穿着某种制服的武装警察带他们去清理废墟。一旦我在温暖的二楼，跟婴儿以及胖女人们待够了要求的时间，我就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阅读或者闭上双眼把精力集中在河水声里，抓着椅子的扶手，把头前后摇动，直到我头晕目眩，再也不能思考为止。

在那里的一个月过得很快，虽然我每天早上都去被驱逐者返乡办事处。在4月底和5月初，驱逐营开始解放。男人和女人会穿着带条纹的制服或者各种带条纹的以及平民服装的组合来到这里。他们身形消瘦，声音如同从井底传来。他们的眼睛时刻警惕，预测着下一记殴打。客户——被驱逐者——聚集在大厅里。在柜台窗口后面，职员会参考一张名单，上面可能说明了谁活着、谁死了。他们还分发平民服

装。很多人带着条纹服装离开；其他人把驱逐营制服留在了那里，把它忘了更好。

我问窗口后面那个不太友好的女人能否告诉我关于我父母的事情，她不能。给了她我们现在的地址后，我坐在大厅里的椅子上，等他们来，因为在这里他们不仅能得到平民服装，还能得到一点钱和关于我们在哪里的信息。他们如果不来这里，能去哪儿呢？我的母亲来自纳吉瓦劳德，她自然会来这里：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也正是从纳吉瓦劳德，她的姐姐及其孩子和孙辈启程去了毒气室。可能会有人回来，但不会是孩子们。他们几乎肯定不会回来了。

我试着想象我的父母走进大厅，来到窗口前，询问我们的消息，想象自己冲向他们并触摸他们。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变化很大，我们能不能轻易认出对方。返乡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坦率地看着镜头的人脸照片。这一年死亡和哀悼的知识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甚至最普通的人也不例外。一个人告诉我，如果我的父母碰巧去了奥地利而不是奥斯维辛，他们幸存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什么都不确定。所以我发现我在希望父母身处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领土——换句话说，身处持续的死亡危险中——因为想象他们在已解放的奥斯维辛里更糟。

我听说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纳吉瓦劳德和附近地区的犹太儿童无一幸存，我是办事处里唯一等待父母的孩子。坐在长椅上我旁边的女人告诉我，波兰犹太囚犯会把孩子从她们手中带走，交到祖母或者其他年老女性手里：她们想把年轻女性救出来，避免在门格勒医生下令后陪着孩子进毒气室。如果医生只是为了让她们牵着孩子的手就把年轻女性和其他还有工作能力的人都毒死，他肯定特别憎恨儿童：孩子们必须立刻无条件地死去。儿童和那些跟他们有肢体接触的人由医生指挥着向右走，动作就好像你在夏天的露台上用手拍死一只围着你转的蚊子。他把我的同龄人视为害虫，而非儿童。他看到孩子们的脸，却没有看见他们，他的眼睛被文字翳住，一名军官，聪明且专

横，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因为命令是根除他们的全部痕迹，所以没有考虑个体的余地：每个犹太儿童只是人群中的一个点。他们是什么样的孩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犹太人。人们说，医生只是一个长着英俊脸庞的虚荣年轻人，对双胞胎——也就是他的科学事业——比对他的小白鼠更感兴趣。如果医学能帮助日耳曼——或者最好只是德国——母亲生双胞胎并限制其他种族的繁衍，这会是个多好的献给元首[注]的礼物啊！很快欧洲就会充满生育力旺盛的德国人了。

不管怎样，我在办事处确实是个令人好奇的存在。有些父母不会看我；其他的则看着我，放声大哭。一个人想给我点东西，但是我没有接受；另一个人晃了晃我，接着跟其他人一样哭了起来。最后我受不了了。他们有我的地址，他们能找到我的。我不再去了。

最近有个拜赖焦新村的熟人来访，作家蒂博尔·塔多什，他现在七十八岁了。对我来说他永远是传奇，大男孩。他的父亲律师亨里克·塔多什是我父亲的朋友，在我现在这个岁数时死于糖尿病。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秃顶，仿佛昨天才看到过。他是个有眼力的人，把蒂博尔送去了巴黎，而蒂博尔在巴黎宁愿追逐女人和网球，也不愿学习：他想要成为作家。他厌烦政治，本来不会想到单独离开的，但是在1938年，他父亲意识到同盟国不会为了保护东欧而对抗希特勒——换句话说，我们的命运已成定局。他是个高大且和蔼的人。衣冠楚楚，头脑清明。他不是个听信花言巧语的人，且意识到了语言背后的利益。他送了一个金香烟盒给县里的健康官员，蒂博尔就解除了兵役，获准回到巴黎。在那里他写了几本超现实主义的书，他父亲会自豪地拿给我看，尽管他一个字都不懂。当他给他儿子发电报的时候，他会叫我母亲翻译，因为我母亲是他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多少懂点法语的人。战后，我站在他们的书柜前，蒂博尔的父亲把蒂博尔的书拿下来，仿佛那是历史遗物。它们也确实是历史遗物。

“那是个很好的小镇，”上年纪的蒂博尔对我说，“在那些德国疯病发作前，人们一直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生活自有其规律。在我们的朋友卡尔奇·马克的父亲开的影剧院里，左边的包厢是犹太人坐的，右边的包厢是基督徒坐的。他们会触帽檐相互示意，然后意义不明地点头。他们彼此分隔，但又在一起。年轻的农民坐在他们前面的便宜座位上，吉卜赛儿童在第一排。星期天下午，阿波罗剧院展现了村镇社会的横截面。

我们父亲那代人不需要激励来工作。勤奋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虽然有些人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打猎、打牌以及和乡绅喝酒。犹太人有自己的网球场，就在基督徒的网球场隔壁，犹太资产阶级会给孩子请德国家庭教师，如果负担得起，还会让孩子学法语或英语。友谊和职业利益不相关。亨里克·塔多什作为拜赖焦新村犹太人社区的律师，要求我父亲把新落成的多层楼往相反方向挪一米。社区认为房子侵占了我们家花园与其后的犹太教堂之间的三米宽便道，那条我每星期五晚上从阳台往下看的路。当戴着黑帽子的男人们三人并肩走路，手臂下卷着晨祷披肩，手里拿着祈祷书，起劲交谈时，一点也不拥挤。但是社区领导，我父亲的朋友和老同学，对此毫不动摇。他们可能因为主路上有一幢多层楼而气恼，当时除了社区中心只有这座是多层楼，而且在大平原上，镇子倾向于横向往远方扩张。想象力横向运动，我父亲的纵向想象需要修正。诉讼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尽管父亲赢了官司，他和塔多什的友谊依然完好无损。这个话题也没有在他们星期天下午有咖啡、蛋糕和烈酒的聚会上提起。

我吃惊地发现蒂博尔不知道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他知道他被驱逐出境，去了奥地利，但是不知道盖世太保把他和我父亲以及奇佩什兄弟中的一个一起逮捕了。奇佩什兄弟中的另一个被带到了奥斯维辛，但是活着回来了，手臂上多了一个号码。他们是健壮的男人，教育程度不是特别高，但是行动很快，值得尊敬，并且充满善意。一个是木材商人，另一个贩酒。他们保证孩子们上了大学，但是像蒂博尔的父

亲一样，他们从未离开拜赖焦新村。他们的妻子和其中一个女儿死于奥斯维辛。她们是美丽的受过教育的女孩，就像斯波纳特医生的女儿。斯波纳特医生的儿子是个魁梧的年轻人。他至今在世，感谢虚假文件，他伪装成德国国防军军官，挺过了战争。他的父母死于奥斯维辛。

拜赖焦新村的犹太人在政治上活跃，为了保全孩子而把他们送走，即使自己留在了那里，这是有充分原因的。他们对自己的环境很满意：他们建造了房子，过着日子，在众人的目光下赚得了名声。不管是荣誉还是耻辱，这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他们因为他们卖的柴火、葡萄酒、马车轮轴的质量而出名。我儿子米克洛什曾经嘲笑我，因为我问他买来的鞋子如何。“它们舒服吗？”他可能意识到我在引用我父亲说过的话，但是我真心诚意地同意我父亲的顾虑。

我的母亲和父亲在1945年5月底从奥地利的集中营回来。他们清理了房子，重新开张做生意。他们没有犹豫，因为我父亲不可能不想着去重拾他半途丢下的事业。一开始，只有四排架子的货物，接着有了六排，再接着有了十二排。货架填充得很快，因为有五个孩子要养。

作为幸存者，我最应该感激的是天意，但是我也不想把它看成巧合，我对任何上天的怜悯都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命运之神让我活了下来，为什么不让其他孩子也活下来呢？不管怎样，他们跟我一样无辜。我不能如此大方地交出薇拉、久里、卡蒂、尤特卡、芭芭、扬奇、嘉比或伊曹的生命，不能绝口不提莎罗尔塔姑姑、多尔非姑夫、吉莎阿姨、纳奇叔叔、伊隆卡阿姨、皮斯塔姨父、玛吉特阿姨、贝拉姑夫、久拉叔叔，也不能把其他人彻底遗忘。

代替童年的是一种缺失，一个从未被讲述并可能无法完全被讲述的故事。离事情发生已经隔了两代人，我觉得有必要保存拜赖焦新村犹太人的记忆。犹太教堂现在是一个铁器铺。有人说要把它变成一个音乐厅，但什么也没发生。回来探望的犹太人一般会去看阿努斯·李斯

特什，一个八十多岁的聪明女人，本地原来的居民之一，现住在从前的拉比的房子里。“常回来看看。这是你的家乡，不是吗？”上个夏天她这么对我说道。

1945年8月，我们接到一通来自边境比豪尔凯赖斯泰什的电话，通知我们，伊什特万和帕里这两个孤儿从他们在科洛斯堡（那里又一次变成了罗马尼亚领土）的姑姑家前往他们在拜赖焦新村的舅舅家，现在正等人去接。我父母碰巧去了豪伊杜索博斯洛(注)度夏，父亲把生意交给我管。我去了一个马车夫那里，他说他太累了，哪里都去不了，但是如果我驾车的话，他的马和车可以给我用。他提出这个提议时是有点犹豫的；这相当于把车子托付给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直到那时，我只有在马车夫坐在我旁边时才允许握缰绳。不管怎样，马车夫套好马，我爬上驾驶位，猛拉了一下缰绳。我本可以选择老路，但是选择了新路，这样我可以绕着镇子走一圈。

太阳已离开了布满庄稼茬的田野，让风景冷却。当我到达比豪尔凯赖斯泰什时，天已经黑了。我本想拥抱伊什特万，但是他只伸出了手。我嘟囔了些关于马的话。他从一个真正的城市过来，在那里，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知识精英是他姑夫别墅里的常客。我告诉他的事情只不过是乡村逸闻。

“稳定化进行得怎么样了？”伊什特万问道，以提高谈话层次。他指的是货币改革。我自豪地回答了他，但因为他对我的马车不感兴趣而失望，他说马车行驶得又慢又颠簸。事实无疑如此。当我在河湾饮马的时候，他几乎没有看一眼。当我提起这些马一开始被德国人，后来被匈牙利人再被苏联人养在新村的犹太教堂里时，他只说了一个“嗯”字。他再也不关心犹太人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历史扫地出门了。我提起了贝拉姑夫，但这也惹恼了他。我还有父母，而他成了孤儿，也没有理由去爱他父母是资产阶级的事实。他说他成了共产主义者，他的父亲要是还活着，也会是他的敌人。伊什特万读了好几遍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甚至试着读了一下《资本论》；我从不读这类东西。伊什特万贴出了共产主义海报，我从不贴这类东西。我参加了几次选举集会，存在好几个政党的事实把我吸引了过去：我之所以喜欢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之所以喜欢小农，是因为他们是小农。伊什特万在十三岁时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到十五岁，他成了一名正式的党积极分子，教大人们《资本论》来赚取工资。到二十岁，他因为他写的某篇文章被党和大学除名，到二十三岁，他在杰尔[注]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重要到当苏联坦克开进来时，他的上司和朋友，年老的阿提拉·西盖蒂，叫他离开匈牙利。西盖蒂自己冷静地等着被拘留，不久就从政治警察总部的四层楼窗户跌到了下面的水泥庭院里。我从来没有入党，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开匈牙利，就算在1956年[注]之后也没那么想过。

伊什特万比我精通理论，有着比我敏感激进的道德准则。他是个革命党，而我天生保守：我宁愿让事情保持原样。我的世界观是折中的，我也不遵循任何教条。我四处漂泊，克制自己不做轻率的承诺，因而总能在第二天纠正自己的放肆行为。伊什特万说的每件事都有一个聪明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如果我尝试了某物，而那是他喜欢的东西，他会用舌头发出赞同的声音。他陈述起每个问题来就像在跟自己说话一样。

“这次革命，”他在1956年10月底跟我说，当时我们拿着机枪站在学生国民警卫队卡车上，“不只是反对斯大林的，它对列宁也没有帮助。”我一点也不因为这个声明而震惊。到那时，根据他从国家计划办公室偷出来的数据的分析以及他在乡下的经验，伊什特万已经谈遍了每一个想得到的问题。

“移居外国的唯一好处是我得到了一本克尔凯郭尔[注]。”他从牛津城写信给我说道。革命失败后建立的不那么共产主义、更资产阶级化的共产主义制度，让伊什特万觉得不那么美妙。没人会为此思乡！他

要是没移居国外，很可能上吊自杀了。要是移民合我胃口，我也会那么做。

伊什特万基本上能把《资本论》全部三卷背下来，但是资本本身却没有打动他。1960年3月，作为一名三一学院的博士生，他被人发现死在自己的床上。煤气中毒，有自杀迹象，没有遗言。前一天晚上他参加完弟弟帕里的生日派对后，回到自己租来的公寓里。他搬出了学院宿舍，他将其视为橡胶墙疗养院，在那里他曾有一名用人。打扫房间的女工报了警。他被埋在牛津城。布达佩斯的《新闻晚报》在最后一页登了一个小小的讣告。不久前，有人说他有可靠消息证明伊什特万是“被自杀的”。他是1956年后匈牙利年轻移民里最优秀的人才，这也可能是这番言论出现的原因。帕里去调查这件事，但消息来源销声匿迹了。

20年代某段时间，我带着我的孩子和他们的美国表弟托尼到拜赖焦新村旅行，托尼是帕里的儿子。我们从一人高的野草中砍出一条路来，来到家族墓地，在那里托尼喊了出来：“老天啊！我站在我祖母上面了！”那是玛丽什卡姑姑的大理石墓。我的女儿多尔卡已经厌倦了坟墓，想去游泳，于是我们送她去巴尔克乌河。河水闻起来像猪粪。一家合作社马厩把废水倒进河里。

我们沿着镇子散步。主街上的单层中产阶级房屋，消失了的犹太人的家，颜色灰白且墙皮剥落地立在那里。我在铁路酒吧里喝帕林卡。一切都和四十年前一样，只是马车不见了，餐馆也变成了酒吧。在火车上，一个老吉卜赛人扇了他儿子一巴掌，因为儿子怀疑他偷了自己的钱。男孩没有还手，只是大声哭喊，发誓要杀了他。“我不能打我的父亲，但是我可以把刀插进他的喉咙。”一个带着德国牧羊犬和警棍的警察冒了出来。“老天爷啊！为什么你不尊重你的父亲？把刀放下，不许在我眼前在这火车上刺伤任何人。到布达佩斯我再把刀还给你。”

“太真实了！”托尼热切地说。

“父亲在这样的火车上最有家的感觉。”我的儿子米克洛什不无辛辣地回答。

直到1948年，我十五岁时，我还会定时拜访我父母在拜赖焦新村的房子。在父亲的五金生意和房子被政府收走之后，我的父母搬去了布达佩斯，跟我姐姐埃娃和我住在一起。从那时起只有信件过来。它们从当地的党秘书处来到我的大学，说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小资产阶级，意味着他是名阶级敌人，意味着我不配得到人民政权授予的学位。

后来，在70年代，我好几次回去我童年的小镇，拜访住在医院精神病房的朋友托尼·巴拉尼，那家医院由杰出的医生伊什特万·沙姆管理。我们中的很多人非常尊重托尼的敏锐头脑和对事物实质的讽刺感。他在医院里有自己的房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抽烟和阅读，有时候他会穿一件白大褂。他可以随意离开医院，但仍需要沙姆医生父亲般的支持和一对医生夫妇的友谊。他通过严密询问，帮助医院整理了患者病例，因此扮演了他在其他精神病院的角色，即智力和学识都远远高于病人和医生的囚徒王子。他的作家天赋首先显示在他的表达结构上：他总是一语中的。在布达佩斯第二十区的家里，他大部分时间只是坐在扶手椅里，凝视窗外街对面相似的工人阶级房屋，或者阅读房间里唯一的书。他一看完书就将其送人。他毫无占有欲，只对他的裤子挑剔。除此之外，他并不讲究时髦。他会在一个小时里好几次走到花园大门去看有没有人按门铃。他做好了应对任何侵入者的准备，必要的话会动武。

托尼·巴拉尼在见完拜赖焦新村的医生朋友后总会好受些，他会去沙滩，并在巴尔克乌河里游泳。我去看他的那次，我们在原先的李斯特什饭店里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谈话。我是楼上宾馆的唯一客人，我还发现晚上在饭店里弹钢琴的吉卜赛男孩在跟自己下国际象棋。托尼和

我坐在饭店大厅里的高背椅上，把刀叉戳进野猪香肠和蒜甘蓝里，喝着浓烈的红葡萄酒，并看着一排长相相同、营养良好且自信的农民投入地唱歌。这些敦实的男人穿着深色的夹克、顶端扣子敞开的白衬衫、防泥水的橡胶靴子，还用肤色暗沉、手指粗壮的手紧握眼镜。过去，角落里的桌子曾为镇里的显要人物预留；现在，70年代里，它成了侦探的大本营，而市县警察局搬到了隔壁。他们在讲笑话，如果席首的指挥官笑了，那它就是好笑话。

正对着我的是一个略带唇髭的年轻女人，她把一整勺的腰子和脑花送进唇间。等待主菜的卡车司机把脆皮猪肉面包塞进嘴里就啤酒。有人好奇地把它们撕开；其他人省去了这麻烦，一口咬掉半个。白菜卷上块状的酸奶油闪闪发亮，在刀子将白菜卷切碎时，可以看出里面放的米比肉多。看守当地水库的人上了一小缸豆子汤，里面漂浮着很多牛肉块。很快，他下垂的灰白唇髭上就有细小的油星闪烁了。

接着水果白兰地的方瓶子上来了，一两杯酒顺着喉咙滑下去，不留一丝痕迹。灯上挂着的捕蝇纸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粘满了苍蝇。一把低音提琴斜靠在墙上，其上还有一张常年在餐厅演奏的吉卜赛乐队队长的彩色照片，他正在大口吞咽羊排，喉咙如波浪般起伏。现在他咧嘴笑起来，大提琴手严肃地咬着自己的胡子，而匈牙利大扬琴手在吃光烤牛肉和炸洋葱的过程中，以科学家般的精准撒辣椒粉。

坐在邻桌的是一对身材瘦削的年轻夫妻，他们点了炖小牛胫，在盘子上把每一块骨髓都敲出来，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完全不管对方，最后把骨髓放到烤面包上，举到自己激动的嘴边。

长手长脚略带醉意的男服务员在女服务员的脖子上亲了一下。她往后退了几步。老式收银机后的女收银员一边研究着腿上曲张的静脉，一边有节奏地敲手指。一排装饰着鲜花的汽车停下来，半喜半醉的客人们一拥而入，在长桌子边坐下。男服务员开始端上白兰地，音乐声离这不远。穿着厚毛皮、皮夹克和靴子的男人们闻着热炖菜的香

气，并谨慎地小口咬起泡椒。客人们讨论起食物分量减少的趋势。“他们是在为我们的身材着想。”一个人说。一个穿着沾血围裙的年轻屠夫肩上扛着半头猪轻快地进入厨房，和厨娘打情骂俏，而她的学徒，戴着顶仔细熨好并折得有棱有角的帽子，从这喧闹中脱了身。

我们的左边是一个矮胖的男人，戒指深深地嵌进手指肉里，他正在对他的一个女同事献殷勤。他们离开了大本营去调查事实，而现在会议结束了，该稍微庆祝一下了。休病假的年轻工人在掰手腕。一颗面包屑在手臂粗壮的吉卜赛人的胡子上抖动，而他的大拳头纹丝不动。墙上装饰着遥远独立战争的木刻版画。服务员说最适合配野猪香肠喝的是正宗的“公牛血”红酒，并从一个特殊的瓶子里倒了一些出来。一个售货员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苏打粉，用小刀戳出小洞，然后把它混进苏打水里。

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吃完了肉排和黄油豌豆，他看起来快快不乐，尽管没什么可苦恼的。他在跟一个窄脸的金发教师说，了解不是爱的基础，因为你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这个人就变得越相对。

“你的意思是你对我了解得越多，你就越不喜欢我？”教师问。

这不是留胡子的年轻人的意思：他在思考形而上学问题。

“我知道了，”教师说，舒了一口气，“只是对形而上学而言。”（为什么这家伙不能放松下来，并停止跟她开玩笑呢？）

“通往熟悉的路也通往崇高境界，冰峰领域。只有卖菜的会认为我们能在伟大头脑之间找到温暖。寒冷的微风在我们之间吹拂，也可能是乐观的冷漠。”

“你的意思是从你的冰峰上来看，我显得很普通？”

这完全不是这个留胡子的年轻人的意思。“我们爱的不是值得我们爱的人，而是我们实际爱的人。”

现在教师要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年轻人提高了他的赌注：“上帝一定是个信徒，但是他信仰的上帝不能是他自己。如果上帝知道上帝，那他自己就不能是上帝，但是那就跟我一样分裂了。长话短说，上帝一定有另一个上帝。以此类推，永无止境。最好还是不要想这个问题。”

托尼吃了一片他声称从大脑皮层切下来的药。他用啤酒把药吞了下去。过了一小会儿，他感觉到一阵轰炸袭击正在临近，要求躲到防空洞里去。他注意到了一道墙上的紧急出口，但是它被一张坐着四个肥胖客人的桌子拦住了，于是他走到他们跟前说：“请跟我通过紧急出口，到防空洞去！”

这四个胖客人戏弄地问他。“它在哪儿？”托尼指着空白的墙。

“别打扰我们，好吗，同志？”

托尼放弃了他的疏散计划。他们想炸我们的话，炸去好了。几年之后，他用毒品和伏特加炸毁了他的心脏。

第二天我继续我的孤独散步。我的双腿自己知道该在哪里拐弯。一个小男孩在一扇窗户里等候。

“你在等谁？”

“我的父母。”

这是家里的用人会支着手肘等待房子的女主人打铃的地方，而相邻的窗户里，女儿则倚着枕头，以逃避她的法语课。小时候，我知道

谁住在所有这些房子里，但是到现在，名字都变得不熟悉了。我所能找到的熟悉名字都在墓地里。一排儿童帽和穿着靴子的女人腿经过，他们的脸盯着栅栏外，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事物。

2000年我接受市政厅（它现在是市，不是镇了）的邀请，来到拜赖焦新村。我要在曾经容纳霍尔蒂的青年军事组织的大楼里给本地居民朗读。朗读和其后的讨论有点严肃，而主办方更希望我能深情地表现出乡愁：养育温暖回忆，表达我对老拜赖焦新村的热爱。他们希望我每次看到它从地平线出现时就心跳得更快，这个被我三任妻子一致称为灰尘洞的镇子，但它让我心跳加速，我认为它很美，是所有城镇中空间安排最明智的城镇。接近从前的社区大楼和从前的第二十街上的国旗时，右边是加尔文教堂和学校，左边是我们的房子，它比其余的建筑都高一点，我有种到家的感觉。有多少次，我在晴朗的下午从河边骑着自行车回家时，曾经历过这个景象。看到自流井消失了，电影院破败了，我觉得很悲伤，但至少邮局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脑海里有一幅镶了框的画面，和我现在所看到的景象重合，但是就算用心良苦，我也无法描绘出我的听众所期待的美梦。

我不能用伤感来遮掩对犹太人的驱逐，或者是政府征收对幸存者造成的掠夺。镇子把它的犹太居民驱逐出境，并把他们的所有财产视为己有，让陌生人住进他们的房子。当时父亲称之为拦路抢劫，我表示同意。现在镇子开始认为我父亲和其他人的行为值得敬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成了模范市民。消失的犹太市民正在成为一个庄严传统。

我在废弃的犹太墓地里找到了我祖父母的墓碑。我祖父的墓碑上很可能刻了另一句碑文。医院主任，一个聪明人，告诉我这个墓地给比豪尔县超过一百个村子提供服务。有时候年老的游客从以色列过来，在这里漫步。流亡者的孩子们朴素、天真且热诚，和镇子一起，参与对纪念碑的保护。长着高颧骨的黑发女人们看着很眼熟。女副市长，一个非常善良的当地人，告诉我镇子有多期待我的到来，并提到

了她的父母认识我的父母和小时候的我。那一天我感觉到了我扎在比豪尔县的根。当我见到的事物符合想象时，我就会感到一个有所归属的人的快乐。是的，他们填了卡尔洛溪，我们曾在樱桃树间踢足球的花园也不见了，同样消失的还有我窗边的胡桃树；确实，窗户本身也不在了，封掉了。而犹太教堂仍是一间铁器铺。

---

1. 拜赖焦新村（Berettyóújfalu）：匈牙利城镇，位于该国东部，由豪伊杜-比豪尔州负责管辖，以巴尔克乌（Berettyó）河命名。—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门格勒医生（Dr. Mengele）：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1979），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
3. 瓦劳德（Várad）：匈牙利巴兰尼亚州所辖的一个村。
4. 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原为匈牙利领土，在“一战”后，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阿农条约，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5. 纳吉瓦劳德（Nagyvárad）：意为“大瓦劳德”，后划归罗马尼亚，改名奥拉迪亚。
6. 德布勒森（Debrecen）：匈牙利第二大城市，豪伊杜-比豪尔州首府。
7. 米什科尔茨（Miskolc）：匈牙利第三大城市，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首府。
8. 布拉索夫（Brassó）：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县首府，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南部。
9. 科洛斯堡（Kolozsvár）：特兰西瓦尼亚首府，后划归罗马尼亚，改名克卢日-纳波卡。
10. 毛特豪森（Mauthausen）：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位于上奥地利毛特豪森村与古森村的大型纳粹集中营群落。
11. 文理中学（gimnázium）：注重学术方面的教育，为进入大学做准备。
12. 《哈加达》（Haggadah）：一种用来传述逾越节规定的犹太文本。犹太人经常根据《哈加达》来吃逾越节宴席、传述希伯来人从奴役到自由的历程，以及学习逾越节宴席中的礼仪。
13. “寂静的夜，神圣的夜”（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原文为德语，是《平安夜》的原名和第一句歌词。
14. 约西（Józsi）：约瑟夫（József）的昵称。
15. 罗塞尼亚（Ruthenia）：东欧的一个历史地名，包括现在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北部、俄罗斯西部、小部分的斯洛伐克东北部和极少部分的波兰东部。
16. 乌日霍罗德（Ungvár）：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的首府。
17. 穆卡切沃（Munkács）：乌克兰城市，由外喀尔巴阡州负责管辖。

18. 比塞大（Bizerta）：突尼斯北部城市，为比塞大省首府。

19. 以上均为“二战”期间发生在苏联的重要战役。

20. 蒂萨河（Tisza）：多瑙河最大支流，流经匈牙利。

21. 帕林卡（pálinka）：一种主要生产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传统水果白兰地。

22. 科哈奈特族（Cohanite）和科恩族（Cohen）：这两个词在希伯来语中均为“祭司”之意，分别为书面语和口语。

23. 亚伦（Aaron）：《圣经》人物，摩西的哥哥，古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大祭司。

24. 《塔木德》（Talmud）：犹太法典，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

25. 沙罗什保陶克（Sárospatak）：匈牙利城镇，由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管辖。

26. 以上均为豪伊杜-比豪尔州的村镇。

27. 塔特拉山脉（Tatra Mountains）：喀尔巴阡山脉中的最高山脉，是斯洛伐克与波兰的边界山脉。

28. 凯日马罗克（Késmárk）：斯洛伐克城镇。

29. 多布希纳（Dobsina）：斯洛伐克城镇。

30. 久里（Gyuri）：作者名字哲尔吉（György）的昵称。

31. 帕里（Pali）：帕尔（Pál）的昵称。

32. 霍尔蒂海军上将（Admiral Horthy）：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1868—1957），匈牙利军人与政治人物，1920—1944年为摄政，掌握军政实权。1944年意图退出战争并与德国断交，被德军挟持至德国。

33. 帕戈（Pengő）：匈牙利当时流通的货币。

34. 德语，即没有犹太人之意。

35. 敲鞋跟：出自《绿野仙踪》，桃乐丝敲三下鞋跟就可以回到家里，指从梦中回到现实，在这里有确认自己不在做梦之意。

36. 吉苏（Gizu）：吉赛拉（Gizella）的昵称，下文的吉西也是同一个人的昵称。

37. 圣巴托罗缪之夜（St. Bartholomew’s night）：也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于1572年8月23日晚间（圣巴托罗缪纪念日前夜）的法国巴黎，是天主教徒针对新教徒的宗教屠杀。

38. 新利奥波德城（New Leopold Town）：布达佩斯的一片传统街区，属于中心地区。

39. 古布达（Old Buda）：布达佩斯的一个地区，历史悠久。

40. 贝拉·库恩（Béla Kun，1886—1939）：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家，犹太人，创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41. 若菲娅（Zsófia）：即若菲（Zsófi），若菲为其昵称。

42. 原文为德语。

43. 卡尔·鲁茨（Carl Lutz，1895—1975）：当时瑞士驻布达佩斯的副领事，拯救了六万多名犹太人，那是“二战”期间最大的犹太人救援行动。

44. 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1912—1947）：瑞典建筑师、商人、外交官和人道主义者，当时出任瑞典驻布达佩斯的特使，拯救了数万名犹太人。

45. 《木夯歌》（“Dubinushka”）：俄罗斯民歌。

46. 老鼠（Rata）：苏联伊-16战斗机的诨名。

47. 安乔尔福德(Angyalföld)：布达佩斯的一个城区。

48. 宁芙（nymph）：希腊神话中掌管山林、原野、泉水、大海等地的女神，也译作精灵和仙女。

49. 萨巴查克（Szabadság）：匈牙利语，意为“自由”。

50. 特勒克圣米克洛什（Törökszentmiklós）：匈牙利城镇，位于该国中部，由加兹-纳杰孔-索尔诺克州管辖。

51. 皮什珀克洛达尼（Püspökladány）：匈牙利城镇，位于该国东部，由豪伊杜-比豪尔州管辖。

52. 山尼（Sanyi）：山多尔（Sándor）的昵称。

53. 比豪尔凯赖斯泰什（Biharkeresztes）：匈牙利城镇，位于该国东部，由豪伊杜-比豪尔州负责管辖。

54. 普雷斯堡（Pressburg）：即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普雷斯堡是其德语名，该城市也曾经是匈牙利的首都。

55. 卡罗维发利（Karlsbad）：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一城市，以硫黄温泉著名。

56. 阜姆（Fiume）：前南斯拉夫城市，现为克罗地亚海港城市里耶卡。

57. 特里尔（Trier）：又译堤雅，德国西部城市，靠近卢森堡。

58. 马扎尔人（Magyar）：匈牙利的主要民族，指代匈牙利人。

59. 纳哈里亚（Naharia）：以色列北部城市。

60.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罗马尼亚首都。

61. 奥帕蒂亚（Abbazia）：克罗地亚城镇。

62. 元首（Führer）：希特勒的专属称呼。

63. 豪伊杜索博斯洛（Hajdúszoboszló）：匈牙利城镇，位于该国东部，由豪伊杜-比豪尔州负责管辖。

64. 杰尔（Győr）：匈牙利西北部城市，杰尔-莫松-肖普朗州首府。匈牙利第六大城市及五个地区中心之一。

65. 1956年10月爆发了匈牙利革命，一开始为学生运动，以苏联军队入驻匈牙利并配合匈牙利国家安全局进行镇压而结束。

66.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及作家，一般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

日食时分，独立山丘

UP ON THE HILL DURING A SOLAR ECLIPSE

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某个灿烂夏日里，我站在圣乔治山上一座衰败酿酒坊的门廊台阶前，有幸观察了世界变换颜色并沉入灰暗中。

中午的铃声响起。我在昨天抵达。乡村很美，而我的家人更美。我的旅途故事引得我最挑剔的听众发笑，而我收到了众多且种类丰富的礼物，因此很高兴：阿龙给我画了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上面有一头吃惊不已的鹿，跟他的父亲出奇相似；约西给我雕了一根拐杖，刻着“给爸爸”，很快这根结实的长拐杖就会陪我上山。

我在路上花了一整天——先是坐飞机，然后坐火车——但是晚上我就到达了这个休憩之地。现在，我把后背靠在不平的石墙上，坐在花园里位于丁香花和胡桃树之间的皂荚木长椅上，听着风声飒飒和燕子啁啾。我能感觉到波浪在额头和山丘之间敲击，那里在远古时期曾充满了火山岩浆，但是几千年来至今，它只充盈着果实、水和香气。

现在大部分房子里住的都是寡妇。和她们的男人比，她们跟生活相处得更融洽：男人们会坐立不安，主动出击，好奇该在世上做点什么，结果落得不同的来世；女人们则在我们现有的世界里慢条斯理地过日子。

当我开着窗户坐在书桌前时，我能看到海吉毛高什[注]的乡村世界：我的儿子们在一群朋友里旋转，邻居的年老妇女、拖拉机司机、推土机司机、油漆工、马夫、酿酒人、总是成群行动的吉卜赛家庭、

在马车车厢里上下摇晃着婴儿或者牵着孩子的手的年轻母亲、弯腰挎着小包出来散步健身的老妇人、扶着拐杖小心翼翼迈步的老大爷。

从我窗前鱼贯而过的当地人和我相互打招呼。村里最穷的老人有时候在从酒吧回家的路上跌入我家前面的花圃里，或者倚着拐杖，在菩提树下的长凳上打盹。如果他有更多钱，他只会喝更多酒。老人们现在都孤独。他们暂时不依靠那些自给自足的人也能继续生活，紧接着他们做不到如此的日子就到来了。

现在夏天已过半，日子渐短，虽然太阳还是高高地悬在空中。中午的铃声响起。一层雾气笼罩了长山的山脊。车轮印陪着我经过草地，我的双腿带我飞奔过有泉水的大地。不受豚草困扰，我用力闻了一下灌木丛(注)。我遇见了一个抱怨自己右腿的牧羊人，我的左腿有毛病。牧羊人左侧躺感觉好些，但是躺在心脏那侧对人不好，所以他整晚都在辗转反侧。干净的泉水从一只百年木雕狮子的嘴里涌出，流到一个长着青苔的池塘里，而池边的柽柳正在发芽。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事就是一直爬山。

苏西挨着我跪在长椅上。“我要画出很美的东西，美到你不能相信，而且我是为了你而画的。”她用红色铅笔画了一些网格。

很快就画完了，她要了另一支笔。“真美：树枝上滴下来的小水珠。”她低声说道。

她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八十岁了，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快乐总是短暂，像是假期。还没反应过来就结束了。

每天下午我们都去湖边，在那里尤特卡给约西租了皮艇，约西在七岁时就在划桨、翻墙、爬绳子、用各种可能的姿势在自行车上飞速骑动。尤特卡过生日时得到了一辆新自行车，她穿着白色的宽松裤子骑遍了邻近的村庄。她回来的时候双颊通红，充满热情。前一天她说

她觉得自己愚蠢，并因此沮丧。我努力说服她事实与之相反，但是徒劳无功。

“那就算你真的愚蠢又怎么样呢？你比我聪明多了。”

尤特卡笑了。

“活多久算是有意义呢，儿子？”我母亲曾经这么问我。

“直到我们死去，母亲，”我说，“肯定是到那时为止。”

早餐时的气氛很愉悦。连尤特卡的头都不疼了。是的，阿龙睡觉的时候被毒蛇袭击了，醒来时他注意到了腿上被咬的地方的红点，但是他没有抱怨疼。约西问到当天的计划。家长服务局有没有给人民也就是孩子们安排足够丰富的娱乐？够玩一整天的？

我保证说下午会去马戏团。我打电话去问有没有表演。是的，他们告诉我，会有大象。我在车里，坐在妻子旁边，递薄脆饼干给她嚼，递水给她喝。她一直没有把眼睛从路上挪开。

与此同时，哄孩子，让他们安静下来，管苏西以及想办法让他们闭上眼睛试着睡一会儿的活儿也一刻没停。我只是慵懒地盯着前方，给她递水。如果尤特卡不满意或者（说起来都可怕！）开始抱怨，我不会做任何反抗，因为这世界是尽善尽美的。就算是等待着我的大限，年老带来的一系列挫败，也比之后要发生的事更有趣。至于复活，我当然相信它了。它每天早上都在发生，除非表演因为技术原因取消了。

明天之后尤特卡就满四十五岁了，明天我就六十六岁了。我们两个都是白羊座。我们相互认识二十多年了。就算她什么都不说，我也能感觉出来她在想什么。她背负着三个孩子和一个丈夫，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实际问题。分配赞扬、在角落避难、编造难以置信的

故事、详细讲述刚过去的一天、主持夜晚的仪式；从英语课到刷牙到爬上床，完全控制所有这些事要付出的努力可不小。九点后（经常快十点了）她一从孩子的房间出来，也很快去睡了。她完成了她最主要的工作。

此刻一切都如此完美，我害怕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但是苦涩的眼泪、歇斯底里的哭喊、噩梦、自我流放和逃亡只会投下一点点阴影。每个家庭成员在回想起旧日时光时都只会记得快乐的时刻。

我觉得我是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世界落到我的腿上，或者我落到了它的腿上。而某一天我也会突然消失。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坐在凉爽的房间里，我开始写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它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在1945年4月中旬，我收到消息说我的表哥拉斯洛·库恩会在四点半到达。当时他三十七岁；我十二岁。我知道他的第一站是楼下的公寓，他会跟老老少少的女人们打招呼，包括我姐姐埃娃和那个小婴儿（我不记得是谁的孩子了）。接着他会上楼，到当时只属于我的那层楼来，阳台眺望着克勒什河，里面还有书房和酒柜。我做什么都不会受阻止。我可以花一整天阅读和漫步，没人要求我解释我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尽管我不介意有人问我，也不介意因为无知而挨骂）。拉奇[注]·库恩这个年长者令人宽慰，他代表了族谱里的下一代，有人决定了——可能是拉奇自己决定的——他会是我们的监护人，给我们面包的代班父亲，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的父母（他们在1944年5月被带走）从驱逐营里回来为止。如果他们回来。于是我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某种说明。

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我盯着属于哲尔吉·波加尼的纳吉瓦劳德公寓前门。作为当时的市检察官，他是律师出身，但很快就不得不为强制

劳动服务组的犹太人服务了。他的整个家庭都消失了。来自布加勒斯特的表哥拉斯洛·库恩进来时，就像是我父亲走进来了，但是他比我父亲高一头，肩膀更宽，全身上下都大一号，并且比我父亲小十岁。他是一个自信优雅的人，穿着无瑕的西装。你能看出来他把它穿得非常得体。

新来者比当地人文雅，他没有受到被送去集中营的羞辱。先前的战俘觉得活着就不错了，他们负担不起他的慷慨：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能装进背包里的东西。“瑞典大人”，我在姐姐面前这么叫拉奇，虽然我完全明白这称号并不存在。拉奇嘲笑其他人的吝啬小气，有时候会带着高傲去蔑视别人。他的父母曾经属于谦逊的人，而他毫无意愿效仿。当你身高六英尺三英寸(注)时很难当个小人物。

他问了几个问题，只想知道我对我当前的境况满不满意，他向我保证我们不会在那个公寓里待很久：他会在一个月内回来，把我们带到他家，去布加勒斯特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住。然后我们也会成为他的孩子，不管我们的父母回不回来。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如此私密的话题。当我问他在他来之前我该干什么时，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卷纸币，把它放在我面前，说它归我了，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花掉它。他给我姐姐埃娃布置了同样的任务。

之后我吃了很多填满奶油的甜点，去看了好几次苏联电影《战后六小时》。我既不懂俄语对白，也不懂罗马尼亚语字幕，但是看了几遍后我就跟得上情节了。某次有个年轻女人从一扇窗户前朝我善意地微笑。我回去了好几次，但是她不见了。我能应付失落。

我变得有点野了：我会解开衬衫的扣子，伸到胳膊下面挠痒痒。这没逃出若菲婶婶的法眼。

“哦，久里，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把自己弄了这副德行！我们只分开了六个星期，你就染上了这么粗野的习惯！”是的，她微笑着，

可能在开玩笑，但是她的话会被当真。

一对路过的兄弟坐在餐桌旁，不停地说他们从劳动营学来的黑色幽默，里面的暴力死亡就像西瓜里的籽一样平常。他们为了从若菲婶婶那里赢得一丝微笑而激烈竞争，那微笑里不变的内敛让我充满幸福。

若菲婶婶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而我则沿着克勒什河来回踱步，看着一个有武装但是衣着寒酸的警察押送着强制劳役者出发去清理废墟。他们要逃跑轻而易举，但是显然没人这么做。我找到了三年前我外祖父住过的房子，发现里面住着陌生人。他们对我的外祖父不感兴趣。他们说他们也被炮弹炸毁了家园。他们主动送我一些面包卷和果酱，但是我谢绝时他们也无所谓。有个小女孩在厨房的角落里画画。我待在那里的几分钟里，她最多只抬了两次头，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仔细打量了对方。在那之后，我好几次经过那栋房子，希望能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她，但是那些曲折的道路并未带来我希望的相遇，我甚至为此想象了不少对话。在我的脑海里，我们进行了非常严肃的谈话。

后来我不再去那条街了，甚至连那个方向都不去了，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吉苏姨妈。她吻了我一下，但是我挣脱了她的双臂，我不能原谅她在箭十字党政权初期毫无预兆地把我们抛弃在布达佩斯。我没有做出会去看她的承诺。她想办法到了纳吉瓦劳德，接手了亲戚的房子和财产。我带着抗议的微笑离开了她，没有告诉她我们的地址。

我对即将到来的布加勒斯特之旅充满了好奇，再加上对于旅行的渴望以及因为期望而产生的兴奋之情，这好奇大大加重了。我听说住在那里的匈牙利人比住在匈牙利本国的边远城市的还多。我们要在拉奇的黑色克莱斯勒帝国大轿车上赶好长一段路，车是他从罗马尼亚王后那里连司机一起买来的。现在获许重新工作了，他就在布加勒斯特

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到处做生意，包括科洛斯堡和布拉索夫，而我们沿路一直有亲戚家可以借住。

回顾过去，我发现那年我在文化阶梯上爬了好几阶，从乡村小资产阶级进入了城市知识分子圈，后者需要一种讽刺的风格，与我拜赖焦新村家庭背景的天真乡愁恰好相反。当我表达想要回到那里的渴望时，人们对着我微笑。我说我属于那个镇子，其他地方对我来说只是途经的小站。

我们的两个监护人——若菲婶婶，服装设计师和时装历史学家，和拉奇，纺织工程师和批发商，还是罗马尼亚的蛙泳冠军和著名业余乐团的助理首席小提琴手——都乐意模糊自己父母的出身。这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喜爱拉奇的母亲，高大强健的莎罗尔塔姑姑，她特别懂得如何让我开心。每次我们去纳吉瓦劳德看他们，她都会让我坐在能望克勒什河的露台上，如果有风从河面吹来，她会把我裹在丝毯里。接着她会放下一块带草莓果冻的巧克力糕点和小望远镜，让我看着河水从岩石上汩汩流过、鱼儿跃出水面。我可以在那里待上好几个小时。莎罗尔塔姑姑时不时地会从大人的餐桌上给我补给食物，并在我的要求下简要总结他们的谈话，主要讲的是家庭事务和拉奇与那位高个子、金发、优雅且高尚的伊波丽的婚姻，她无所不知，甚至可能超越了拉奇心目中的完美典范。

伊波丽来自科洛斯堡的一个富裕家庭，她上了大学，打网球，做体操，会说德语、法语和一点点英语，还带来了可观的嫁妆。她在礼仪上的理论和操作都无与伦比。她嘴角的一个牵动能表达出其他人教养上的毛病。她从不说一个字，也很宽容，但是她仍然注意到了。

她的公公，多尔非姑夫，跟我父亲一样，曾经做五金生意，但是他的店和身材都比我父亲的小。我不懂为什么拉奇不提他的父母死于奥斯维辛。可能是出于羞愧？他不想正面应对恐惧吗？或者可能他觉得一切都很好，提起这事不合时宜。所有对羞辱和谋杀的谈论都应该

是禁忌吗？我父亲对他的姐姐莎罗尔塔只有最崇高的爱和尊敬，从小她就无比温柔地照顾他：她总有东西能给他——一个苹果，一卷线——如果家里气氛紧张，如果我的祖母因为某事而气恼（考虑到五个孩子和住满人的房子，总有恼怒的理由），莎罗尔塔会采取行动，说一些非常好笑的话，让我的祖母笑得满脸通红，她的气恼也消失了——其无比坚实的基础也随之消失。除此之外，莎罗尔塔还有着完美的判断力和均衡感。看看她从所有求婚者中挑选出的身材矮小的多尔非姑夫吧：他是那群人中最有人性的。多尔非姑夫尊敬他高大的妻子，心中充满了惊异。他可能从没想过要背叛她，而莎罗尔塔姑姑正是知足的化身，她唯一担心的是孩子。

莎罗尔塔的女儿，拉奇的妹妹玛格达，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最漂亮的女孩。有一次她和我们一起在豪伊杜索博斯洛度夏，我特别喜欢做的事之一就是清早挨在她身边说悄悄话，闻她身上的香气。大多数时间里我是那个叫醒她的人，虽然她不总是兴致勃勃，有时候埋怨地叫我等着，别在毯子下扭来扭去。但是她一旦睁开双眼，就有奇怪的话要说。

举个例子，她会说，只有坏人能取悦她，她想要在某天遇见一个海盗，或者至少是个探险者。她想要看一看真正堕落的感情骗子，因为她在纳吉瓦劳德的剧院或面包店或女士俱乐部舞会或犹太大节日时的犹太教堂花园里唯一能遇到的都是好心的年轻男人。让玛格达觉得有意思的人都离开镇子去了大城市。她的亲生哥哥拉奇长大之后不再住在纳吉瓦劳德，只有在维也纳或者布达佩斯才觉得自在。他的女朋友如此之多，用上他所有的手指加脚趾也数不过来。

拉奇的来访对玛格达来说是欢乐的大日子。他们会一起走到克勒什河边的公告游泳区域，卖弄他们的仰泳、蛙泳和自由泳，把双臂深深地沉入水下，然后优雅地往前滑。在纳吉瓦劳德，拉奇基本上都和玛格达一起出现，要是玛格达的哪个朋友对她哥哥表现出明显的兴

趣，她可会做出不少尖刻的评价。尽管我到十二岁才亲眼见到他，但是我听说了很多关于玛格达的厉害哥哥的事，还看过他时髦的样子——穿着骑马装或者网球短裤——在照片上看到的。我还听说有一次因为某个年轻人对玛格达说了句不庄重的话，拉奇狠狠打了他一巴掌，打得那家伙往后跌，越过了公园广场里的长凳才倒下。

玛格达跟我分享了她的怀疑，即她哥哥并不是真正地爱着他妻子，但她至少会给孩子们一个出色的家教。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拉奇会用亲密的人称代词“你”（te）来称呼伊波丽，而她却用没有人情味的“您”（maga）来称呼他，但是在晚间活动时，他们又是不错的一对。1942年，玛格达认识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肩膀宽阔，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他有点秃顶，有长啤酒肚的迹象。这个人的堕落状态笼罩着一层神秘薄纱。坏人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她说，其实他们都是好人，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

他姓弗洛拉，还经营骗局，至少我的家庭教师利维娅是这么告诉我母亲的。这位弗洛拉先生从甘布里努斯饭店开着斯太尔-普赫轿跑车过来接玛格达，带她去很远的地方。这让我的母亲和家庭教师都很不安。午饭后，玛格达会消失，到晚饭后才回来。他喜欢不寻常的菜，比如说做成棍状的裹面包屑鸡肉，我不怎么被这样的创新吸引。有一次我留了一根这样的鸡肉棍给玛格达，但她看起来并不感兴趣。她说她在德布勒森的金牛饭店吃了骨髓蛋羹。那令我作呕。

一次，我和热恋中的玛格达坐在甘布里努斯饭店的露台上时，弗洛拉先生在我们身边坐了下来。

“你多大年纪，先生？”我问道。

我看得出来他不喜欢这个问题。玛格达试图用她的目光穿透我，但是放弃了。我们沉默地坐着，任由阿科什·霍勒兹的爵士乐队和他的

歌手斯蒂菲·阿科什打动我们，可能唱的是一首离别之歌。我蔑视这个有着女人名字——弗洛拉——的老傻瓜，试图让他出洋相。

他喜欢匈牙利大平原区吗？如果他没有为之着迷，那他就麻烦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提出了最无趣的批评：它平坦而空无一物，偏僻的小镇之间距离太远，连接它们的鹅卵石路会损害他的跑车。他说得越多，我就越高兴。如果这家伙这么蠢，那离玛格达把他赶走也就不远了。但这并没有发生。让我沉默且惊恐的是，玛格达高兴地赞成了，甚至提高了赌注：她完全理解他，这个弗洛拉，这个住在布达佩斯时髦的盖勒特山[注]上并且在蒂罗尔州[注]滑雪的猿人。她自己出身山区——不管怎样在精神上确实如此——挨着比豪尔大区居住。所以是他们两个反对我，匈牙利大平原的富家公子。（你真的能和他合伙串通吗——你和他成了“我们”，而我对你只是“你”而已了？）这个矮胖的弗洛拉会后悔他此时的恣意妄为的，你会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鼻涕虫！他会让你恶心作呕！就在那一年，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怀孕并被抛弃的玛格达，没能把她吞下去的安眠药咳出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躺在她身旁的床边桌上，系着丝带的，是她写给弗洛拉的信。他把它们退回了。

拉奇的到来是场真正的盛会。他会从后座上高高站起，和赶来见他的人打招呼，接着每个家庭成员和雇员都会跟他详细汇报近况，他表达赞扬，说些俏皮话来强调我们在知识上的薄弱。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会根据什么来反对他听到的话。我感觉到他身体内部运作着一件敏感的仪器，稍有刺激就不停颤动，把所有笨拙、过分或微不足道的东西都运送到黑色地带。我怀疑他用烟斗来防止自己回答得太快，尽管如果他立刻把话说出口，话语会显得更为辛辣，但沉思的停顿还是用烟圈镌刻出了真正的警句。没理由把他的话往心里去，但如果他把眼里所有力量都瞄准到你身上，你就完了。

拉奇极其有才华，尤其在创办大型企业上。1938年奥地利和希特勒结盟的时候，他不得不迅速从维也纳撤离，在那里他作为成功商人和马术精湛的骑师获得了进入上流圈子的入场券。他的玑珠妙语、他耀眼且富有智慧的微笑、他毫无瑕疵的礼仪，这些都足以让他留在那里，但是他同时也有某种尊严，某种让其他人追随他的力量：他是那种人们大献殷勤的对象，那种人们想要对他表现出自己最好一面的人。赢得老板的认可并不容易，但他们不断尝试。

在不到一个月后拉奇回到纳吉瓦劳德时，我们已经接受了他成为我们监护人的事。我信任他的原因可能是他太像我父亲了。他是个好人，虽然他的女友之一咪咪总是因为他不在而不快乐，这多过和他在一起时的快乐。

有一天，一位衣着入时的年轻女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轻快地问我的名字，根据拉奇的描述和我们的长相相似处，猜测我是谁。我点头。“是的，那人就是我。”这样一位穿着皮草并散发着甜美香气的美女会认出我，她竟然觉得值得这么做，这让我惊讶。她在雅伯特糕点店里摘下帽子，任自己的深金秀发散到背上，然后点了一杯茶。她把手肘支在大理石桌面上，把下巴放到拳头上，近距离地打量我。接着她微笑起来，像是在说，我们谈谈吧！

我去过那里好几次，一成不变地点奶油蛋糕（香草味，在拜赖焦新村的彼得里克糕点店里它也是我的最爱），但是这次，为了让我新朋友高兴，当她指着糕点柜说“这都是你的了！”时，我热情地做出了回应。这让我做出这个女士倾向于过量无节制的结论。咪咪打听了拉奇和家人的事，想知道所有事，因为对她来说，他太沉默寡言了，任何人的好奇心都会激怒他。“任何人跟我说的话我都会倾听，但是我不会问别人任何事情。”有一次在我用问题轰炸完他后，他这样告诉我。

咪咪头脑敏锐，口齿伶俐，自称在两天内读完了《蒂博一家》，一部厚厚的两卷本长篇小说。在布达佩斯围困期间，处于若菲婶婶的

威权下，我和这本书曾经有过相当不舒服的关系：她让我在手臂下各夹一卷，让我的手肘保持在身侧，并防止我“像头母牛一样”靠在桌子上。虽然在我母亲和家庭教师的努力下我得到了良好的训练，但我总是屡教不改，把手肘放在桌子上。“要知道，你可不是在酒吧里！”这是我经常听到的话。（“这真是太遗憾了。”我会这样自言自语。）

不管怎样，我和这部内容丰富、非常充实并且随时能够提供深入滋养的小说之间的关系，在布加勒斯特延续了下来，因为伊波丽也注意到了我爱把手肘支在桌上的不良习惯，更别说拨弄杯子的动作了，就像我每次在新村的酒吧门口瞥见里面的男人们做的那样。我一告诉她我和蒂博一家的古怪联系，她就到书架上抽出了同一版本的书。在布加勒斯特，它的分量一点也没减少。她试着进一步提高我的教养，让我用叉子的凸底而不是凹面把黄油蒸豌豆送进嘴里。（约十年后，我写了一篇关于罗杰·马丁·杜·加尔[注]的长论文，出于骑士精神，或者是对这位可靠大师的致敬，因为我在战时动荡之后体验了真正的资产阶级美德。）

我跟咪咪提到若菲婶婶的教学过程的那天，我挑衅地把我的手肘放在桌子上，她说，“你的家人是一群恶棍！”然后拨乱了我的头发。她的指甲很长，当然涂成了红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个月，我敢说，就算在雅伯特糕点店里这也是罕见的奇观。她问起了我们的家族。她自己的大部分家人都过世了，本来人数就不是很多。咪咪是一桩毫不正常的婚姻的产物，从小就决心要变得富有出名。后来她又加了一个愿望：活下来。她觉得她像玛格达，或者是玛格达像她。她们俩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经常被拿来比较。她们通过赞扬对方的美丽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变亲近。

跟她也一样，拉奇对自己的父母避而不谈，奥斯维辛的受害者，但是他也不提美丽的玛格达，她从来没到过那里。“感谢上帝。”咪咪会加上这句话。即使如此，她也过得不轻松：她逃到了属于罗马尼亚

的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在那里犹太人没有被驱逐到波兰，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成千上万地被枪杀。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咪咪被带到了一座无处可逃的岛上：所有尝试逃跑的人都被开枪打死了，到春天，剩下的只有他们的残骸。

你仍然可以利用假结婚、贿赂或当局的冷漠从缝隙中脱身：咪咪在俄国人来后不久到达纳吉瓦劳德，照管她母亲在那里的房子，在里面填满了她被驱逐出境的富有阿姨的家具，点亮银烛台上的蜡烛。她逐渐了解了拉奇的口味，做他最喜欢的菜，减弱一方面，提高其他方面，通过神秘的、半隐蔽的供应链得到调料。“你这个挑剔的表哥可是个美食家。他开始长胖了。你注意到了吗？”咪咪透露，她亲手改大了拉奇的裤子。作为一名接受过训练的裁缝，她希望在佩斯的中心开一家时尚沙龙，可能在赛尔维塔广场——是的，她在罗莎瓦尔吉音乐店的隔壁挑好了地方。要是他们俩都没被死，战后拉奇会在那里找到她。咪咪猜到了有可能布加勒斯特对拉奇来说不够大，他需要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他曾经在那里度过好时光。他甚至对咪咪透露了他未来的公司名字：泰尼康（Technicomp）。

“喜欢这个名字吗？”

“嗯。”

拉奇不想要合伙人，因为他想自己做所有的决定。可能他会让她在服装厂当设计师，咪咪说，但是现在销路好的是工作服。不过，它们也可以很吸引人。据称拉奇被她的生产力震惊了：每次她去纳吉瓦劳德都穿着不同的行头，全部由她用惊人速度设计和制作。

“你这个暴君表哥确实很爱新奇花样，”咪咪说，“但是别担心，他不会抛弃你的！他只是有点不好相处，不让自己被爱。他也没有把我宠坏，但你没事，”她加上了点嫉妒的语气，“因为你可以每天跟他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而他会是我永远的未婚夫。”她说话时带着一种梦幻

般的悲哀，因为把头发放下来了而略微焦躁，但她猜测拉奇喜欢跟我说话。

他也确实如此。拉奇和我甚至谈论过政治。他让我给他挑一份《火花报》，罗马尼亚共产党报。当我问他为什么想要这份报纸时，他说出了我在布达佩斯曾听我美丽的舞蹈家朋友玛格达说过的一样的话，那是她尝试从边境逃跑而背部中弹的几年前。她当时论断，共产主义者是纳粹、箭十字党和铁卫团[注]最坚定的敌人，所以他们是她最信任的人。我回答道，这不完全属实，因为我在新村听说过箭十字党人转变为共产党的故事——一日大嘴巴，终身大嘴巴。但是拉奇选择相信工业状况会好转，最终进入企业的时代。我跟他讲了俄国人的故事和他们醉酒后的疯狂开枪射击，以及我是怎么拉住一个正在伊姆雷叔叔的院子里排空膀胱的俄国人、没让他掉进井里的事。

哦，当然了，他说，他也有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应该记住他们是解放者，我这条命都是他们救的。我承认这点，但我才活到十二岁就在诸多方面上受人恩惠，以至于我在感恩上变得慵懒，并觉得拉奇对共产党的乐观慷慨过分轻率了。

正如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副经理庇庇说的，“理论很美，但说到现实，老天啊，悲哀的是，现实令人怀疑。[注]”他会一大早打电话过来，用他刺耳并略带不耐烦的声音宣布：“这是庇庇！”他对于我不能用法语帮他给拉奇传话很吃惊。当我提出用德语传话时，他谢绝了，说算了，德语是他目前敬而远之的语言。对于俄国人一天内在布加勒斯特征用了一万辆车的事，庇庇一点也不觉得了不起，他还在饭桌上公开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经常和拉奇及其家人在那张桌子上用餐，他们在谈话过程中抽着雪茄、喝着法国白兰地，就像真正的资本家一样。

回到沮丧的咪咪：我们在糕点店的对话中，事情变得清晰起来，她不仅在徒劳地等待她永远的未婚夫，而且还会继续等下去，就算她和其他人结婚也一样。“要是有一天你表哥离开了他的聪明妻子，然后说，‘跟我来吧，咪咪’，那么疯狂的小咪咪就会尽全力飞奔过去。她会抛弃她的丈夫和家庭，只为感受你珍贵的表哥用沉重的手抚摸她的头。”

几滴漂亮的泪滴顺着她的鼻子流下来，她用香喷喷的手帕擦掉了它们。尽管咪咪承诺说会去看我，但我再也没和她见过面。不过，我确实看到过她一次，但她没有注意到我，或者假装没注意到。她刚刚从一幢建筑里出来，正好一辆黑色大莫里斯轿车在路边停下来，开车的是一个理着平头、戴着墨镜和皮手套的男人。咪咪上车坐在他旁边，用手抚弄他的头发。鉴于我看到的情景，我认为拉奇对咪咪的热情是鲁莽的精力投入，纵然我做了道德反思，我还是得出结论，就我们而言，公认的不忠并没有让拉奇变得不可靠。

因此我姐姐和我决定让拉奇知道我们的秘密：埋着的金子。在一个不锈钢盒子里有两公斤金子，一半在手镯和其他首饰里，剩下的形状各不相同。我们到拜赖焦新村的第二天，我们在房子的地基上进行了干劲十足的检查，那里除了瓦砾外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查看了连着院子的五金店，认为一个角落的松脆地基暗示着某种挖掘，但是离门口一米远、踩得非常严实的地面下并没有挖掘的痕迹。

我们向对方点了点头：随便哪个傻瓜都能想到在角落挖坑，但是离门口和墙一米远的地方就不太像藏东西之处了。虽然一个盒子已经不见了，另一个可能还在原地，埋在土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挖出来，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安全。所以我们把秘密告诉了拉奇，让他解决东西该放哪里的问题。第三天晚上，拉奇说，我们次日早上九点开挖。

我们开了三辆车，由五六个短上衣下面别着手枪皮套的犹太男人护送，他们之前参与了强制劳动，失去了家人，认为自己在帮助县里唯一一对幸存的犹太儿童。他们带来了铲子，并在挖地的时候守着门。过了好长一会儿铲尖才戳到金属。他们把盒子抬起来，放进袋子里。我们立刻返回，去见那天早上在新边境用同情的眼神通过了我们的护照，准许我们进入匈牙利的边境守卫和俄罗斯士兵。他们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如果我们的父母回来了，他们就不能指责我们大意疏忽。我们从没想过让安多尔姨父知道这个秘密，尽管他对我们父母藏起来的贵重物品非常好奇。我们说我们对这样的事一无所知。我们十分擅长装聋作哑。

我们很快离开了纳吉瓦劳德。我仍记得与那些设法活下来的年老妇人的漫长告别。从很小时起，我就习惯了这样的台阶伤感。我回忆起我母亲的姐妹们（玛吉特和伊隆卡，命运把她们送去了毒气室和火葬场）大声的、几乎是突发的问候，而我则会往后缩，以此来逃避伴随着那些欢乐叫嚷而来的略带唇髭的吻。我母亲，现在九十五岁了，还会提起她早已死去的姐妹，说到最近探望了她们或者她们即将来看她。她问我最近有没有见到她们中的一个。我让她记起事实的尝试显得愚蠢而不必要，就算我把它说出来也如此：“她已经去世六十年了，母亲。你知道的。他们在奥斯维辛把她杀了。”

“是吗？”我母亲震惊地问，“他们杀了她？”她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她知道事实；她只是处于精神的沉睡中不愿接受它。她宁可回想她们小时候分享的游戏。她不再记得我父亲。最让她快乐的是她的孙辈和曾孙辈的来访，或者阳台上的某只灰色公猫跳到她腿上。祖莎，曾给我母亲当过护工、来自穆卡切沃的敏感经济学家，把那只猫叫作班迪。她喂它，幽默地描述它的性格。我母亲有时候会画点画，

读会儿书，或者扶着我的手臂在花园里散步。她吃别人送上来的东西，然后沉默，然后问问题，然后再次沉默，然后开始笑。

我来访时，她右手拿着拐杖，左手扶着我的手臂，我们会在花园里转好几圈。她的健忘会让她在单行道上转好几年：她在释放她的负担，记忆的挂毯一层层从她的意识中脱落，留下一个平坦光滑的乐观主义，有人爱抚拥抱就足够了。我抚摸她后脑勺上柔软的灰发，赞扬她，告诉她我觉得她最近画的一幅画很美，尽管两岁小孩也能画得更好，我也经常对自己感到同样的愚蠢乐观，某种宽容以及对世界的超脱，一张写着“不管怎样都很好”的面具。我感到母亲的脸紧挨着我的脸，父亲的微笑浮现在我嘴边。有时候我脱口而出他以前常说的蠢话，我能记起的那几句。当我这么做时，我的儿子们会模棱两可地微笑，不知道怎么评价我和我的语言怪癖。

但是让我回到原先的故事吧。在我们挖出来的盒子里，其中一个装着银器：盘子、刀叉、糖罐和烛台。我的父母打算在我们失去其他所有东西时卖掉它。事实上，其中一些最后到了亲戚那里，剩下的一点在几年前，在（充满光辉记忆的）20世纪末，还在我母亲的玻璃柜里。然后有一天，她碰巧一个人待在她位于一楼的公寓里，两个矮胖的老太婆按响了门铃。“你记得我们，对吗，亲爱的？我们在医院里住同一间病房。”她们告诉了她各种关于她和她们在医院的亲密友谊的故事，我母亲一样也没否认，但事实上她从来没住过院。如果她们这么好心来看望她，为什么要伤害她们的感情呢？当她们中的一个滔滔不绝地聊天时，另一个从抽屉里拿走了我母亲的存折，从柜子里拿走了她的银盘子。她们把东西捆起来，道了别，还表达了短期内不能再过来的悲伤。我母亲用她的客气道别回答了她们的客气话，然后目送她们离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月我们从纳吉瓦劳德到布加勒斯特进行了长达八百公里的旅途，在我表哥拉奇和他优雅、曾经属于皇室、

仍旧配着司机的车的庇护下。途中我们在我的远房表哥费伦茨·多博在科洛斯堡靠近希腊东正教堂的房子和花园前停下来拜访，也探望了我舅舅埃尔诺·克莱因，布拉索夫科罗纳酒店的经理。在这一切开始前，某种局势就已开始显现了。

在50年代，共产党接管后，拉奇成了罗马尼亚工业部（当时叫外贸部）的一个部门领导。虽然他在好几家工厂当过主工程师，是一名经历过国际谈判的受人尊敬的专家，还是因为他的资产阶级背景而受到怀疑：严格地说，他是名阶级敌人。为了确定他在精神上是否也是阶级敌人——或者用当时的说法，是否存在主观倾向，相关单位受到了动员。

一天晚上，躺在妻子身边，他被人造光的炫亮惊醒：四个穿着军用风衣的人影站在他面前，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盘问他一个失踪文件的下落。他们把他带到了部里，在那里他找到了文件，只是放错了文件夹。整件事到头来不过是个闹剧，然后他们放他走了，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睡过安稳觉。因此，下一次手电筒来访没有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事实上，他一直在等它。他离开了工业部，找了一个简单的工作：他想要的不过是把家庭维持在中等条件，并不受打扰。但这无法实现。拉奇没办法就地遁形，逃离他们的骚扰和讯问。伊波丽买了台编织机，开始给一家合作社做毛衣。

1956年，他们填了移民以色列的申请表：这是唯一的离开办法。整个家庭在1958年获准离开。我们在布达佩斯短暂地碰了面，他从那里去维也纳。有一个朋友问拉奇在1938年搬走时有没有正式通知市政府他永远离开了。拉奇不记得做了这样的事。他查了一下，发现确实如此。所以，在二十年后，他仍旧是维也纳的登记居民，可以申请奥地利公民身份。他成功地申请到了。之后，他在市中心开了一间优雅的办公室，名字叫泰尼康。他尤其享受以德国、荷兰、英国和瑞典公司的代表的身份去布达佩斯出差，为匈牙利企业采购化学用品、油和

食品工业设备。他把他的女儿卡蒂和儿子史特芬送去维也纳最好的学校，但是史特芬，他的生命之光，意外死于脑膜炎。

拉奇差不多从悲伤中解脱后，他和伊波丽每周去一次音乐厅。他阅读所有的主流德语报纸，在离泰尼康不远的卡多思餐厅吃午饭。每天早上他都经过城市公园去办公室，直到有一天他瘫坐在长椅上，失去了抵达巨大办公桌后面的皮扶手椅的全部欲望。莱斯纳女士，他年老的秘书，不理解是什么把库恩先生逼到了如此精神紧张的境地，虽然据库恩夫人说，这以前发生过一次：他曾被关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高级精神病院里，在那里他会盯着院子里的水坑，用最简短的答案回答她的问题。在维也纳，他从街对面看到的是一幢19世纪建造的古板公共建筑的砖墙，虽然他根本不想看窗外。

一段时间后，他振作起来，大干了一场。工作再次使他着迷。他开始和一个叫厄迪特的女人交往。她优雅、智慧、苗条，在早春的游泳池里晒得恰到好处，现在是南美洲的公民，原先是纳吉瓦劳德的犹太人，和他很配。他享受她诙谐恶毒的针刺之语，就像一次上好的按摩。他带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周游世界——美国、日本——给他的客户组合出复杂的方案。他经常去布达佩斯看他的表弟久里·格拉和我，友好地对我们的年轻妻子献殷勤，直到情报机构召他过去，试图让他告发他国内外的贸易伙伴和日益扩大的朋友圈子。如果他拒绝，他就没什么机会做生意了，因为他们可以取消他的多次入境签证。“这些人都在想什么？”他问我们，好像他在布加勒斯特的经历不能非常清楚地让他认识到这些人在想什么似的。他们在想，如果他做了他的性格所要求的事（我对此非常尊敬），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我们就不会在布达佩斯见到他了。

看到发生在表哥身上的事，我们很难过，虽然在那之后，要是他获许来访，事情会更令人不安。他不能来，我们的见面暂停了很长时间。拉奇对维也纳也失去了兴趣。料理完妻子的葬礼之后，他在美国

再婚，住的地方离他女儿卡蒂不远。之后他搬去了佛罗里达，最终在那里进入幽冥世界。

我介绍了这些后来的故事，让读者稍微了解一下坐在我正前方汽车前排上的男人的未来轨迹。后座上坐着我姐姐和两个我们认识的女人，拉奇顺便捎她们俩一程。她们的脑袋后方是那个装着沉甸甸的保险箱的袋子。进入普洛耶什帝[注]，司机突然转弯，偏离道路，撞上了里程碑。盒子飞到空中，撞上了那个说话最多也最大声的女人的头。克莱斯勒掉进了下面的沟里，车顶上压着里程碑。当时有一辆苏联军用卡车从相反车道朝我们开来——它的年轻司机可能睡着了——女王的司机熟练地把车轮猛地左转。作为结果，没有严重伤害发生——除了那个健谈的女士头上多了一个包。

我们在瓢泼大雨中被一辆卡车接走。拉奇坐在开放的后座上，裹着防水雨衣；我们和女客人们坐在干燥的驾驶室里。进入布加勒斯特的情形比离开纳吉瓦劳德时少了许多胜利感。

跨过雨中的林荫道，我们到达了一幢颓废的波雅尔[注]别墅。在花园深处立着一栋完全被忍冬覆盖的三层包豪斯建筑。花园里还有一个沙坑、一架秋千和一个小泳池。笔直地站在三楼门口，穿着柔软的骆驼毛长袍并散发着淡淡柠檬味的，是宽肩膀的伊波丽。我们发现她是个很好的代班母亲，注意自己的义务，从饮食到洗澡到干净睡衣。一切都差不多恢复到了1944年之前在家里那样：我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我们在午饭时间吃午饭，在晚饭时间吃晚饭，在餐桌上遵守礼节，每天把内衣扔进脏衣篮里，因为衣柜里有一套干净的内衣等着我们替换。在晨浴过后，我可以去花园，或者带着我两岁半的表侄女卡蒂去商店，她担任我的翻译：她把我说的匈牙利语用罗马尼亚语重复出来。受到我们的团队精神和默契配合的鼓舞，我们尽责地完成了指定的任务，从伊波丽和厨子维奥丽卡那里获得表扬。维奥丽卡是个大嗓门、逗乐而热情的女人，她对我不满意时叫我达契亚[注]野人。拉奇

的儿子，在小床上辗转反侧的婴孩史特芬，是公寓里除我以外唯一的男性，因为拉奇早出晚归，还经常长途出差不在家。

当王后的克莱斯勒在维修时，拉奇开着一辆红色的斯柯达双门轿跑车四处转，这辆车后来被那些总是成群站在路边的苏联士兵在图尔达[注]和科洛斯堡之间的某处从他名下征用了。拉奇表达了他的愤怒，坚持要跟指挥官说话，并要求将这件事正式记录下来。“规章”这个词惹怒了士兵。他们在拉奇德胸口猛推了一下，跳进了车里。总是按照书本做事的拉奇，认为这是个不正规的程序，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再次在瓢泼大雨中置身卡车后座时，他依然能够自嘲。

跟我一样，他是白羊座，将逆境视为冒险，不会长时间愤怒。他只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件待做事项上，赚钱买新车，然后从头接受这辆车也会像上一辆那样成为失去之物。在那段日子里，运气是个短暂的访客，有可能根本不来，在一个地方迅速闪烁，然后以同样快的速度消失。他在战后过了两年好日子，移民后则有四年，但是上一次我见到他时——我们沿着第五大道寻找一家烟草店，他曾从那家店的橱窗里见到一只很中意的樱桃木烟斗——我意识到他已经接受了退休老人的世界观：他对海边散步评价很高，并且停止制订计划了。

我父亲听不惯起诉书。相反，他会想，“这家伙到底想表达什么呀？”好像每个人心里都潜伏着几个不同的小人儿，就像衣柜里的西装。我想象他对我说：“还有你，我的孩子，你想要表达什么？”“没什么，父亲。我只是在等着前厅的铃声响起。可能我会跟卡蒂一起下楼到花园里去，但是如果你回家了，我总会待在看得见你的地方。”

有一天，拉奇从纳吉瓦劳德来电话说，我们的父母还活着。他们在拜赖焦新村的家里，我们很快就能见到他们。多快？很快。他拒绝告诉我们关键信息之外的事。我们的父母很可能和其他从集中营回来

的人一样消瘦且病态。我不喜欢想象强加于他们命运之上的集中营生活。

与此同时，我藏身于那个一点也不像家的公寓里。一切都散发出正常之感，然而事情本可能进行得不那么顺利。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两名英国飞行员躲在我住的房间里。他们的飞机被击落了，抵抗组织把他们带到了这里。在某天晚上的晚饭时间，门房按响了门铃，问除了直系亲属外，还有谁住在这里。“没别人。”拉奇回答。门房想要证据，但是拉奇不让他进去。当门房试图硬闯进来时，拉奇冲他脸上打了一拳，让他跌下了楼梯。“你不会后悔对此保密的。”拉奇说，并把他扶起来。

即使当我们从罗森塔尔瓷碗里舀汤时，我们的父母被人从纳吉瓦劳德和科洛斯堡送去毒气室的画面也飘浮在空中，悬挂在镀铬银器和盖着的汤碗上方。每当他们被提起，某种沉默就会降临房间，伊波丽和拉奇的脸就会绷紧，以抑制让他们喉咙发紧的痉挛。

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许可下，1940年匈牙利军队重新占领了属于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也就是纳吉瓦劳德和科洛斯堡所在之地。1944年，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的犹太人被送进了奥斯维辛，而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犹太人依旧处于罗马尼亚的统治下。因此，我住在布拉索夫的叔叔和住在布加勒斯特的表哥挺过了关键的那年，而我那些住在纳吉瓦劳德、科洛斯堡和拜赖焦新村的亲戚，除了那几个被征去随着部队强制劳动的人之外，都死了。有些强制劳动营里的人最后还是被枪杀，葬身万人坑，但其他人活了下来——决定在指挥官的一念之差中做出——并且回到了家。换句话说，被送去强制劳动的犹太人的命运取决于跟他们在一起的指挥官当时想杀他们还是想救他们。如果他是一个迷恋用枪的冷血法西斯分子，或者一个这样的指挥官代替了原来那个温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犹太青年就命不久矣了。虽然我尽量不去想象我的父母可能到了哪里，但是我在纳吉瓦劳德的

被驱逐者援助办公室听到了很多在比尔克瑙[注]发生的故事，那里的俘虏被根据有用程度分组，有人试着从火车跳到站台上，下场凄惨。要是去田野里干活，他们偶尔会找到些能吃的东西。

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拉奇会带着我们的父母回来。每天都有可能是那天。因为期待而引发的兴奋无比强烈。

突然之间，我不能再全心全意关注小卡蒂在花园里的漫步了。是的，就算是卡蒂也可以先等着，我还欠她一个新童话故事。一楼店铺里的裁缝也可以等——他应该给我量尺寸，做一套新衣服，虽然我对旧衣服非常满意。事实上，我确实很高兴不用听他问我我的“工具”放在左边还是右边。我需要时间来做最重要的事：待在花园的最高点，时刻能看到有谁来了。

终于传来了熟悉的汽车的轰隆声，关车门的砰砰声，和几个人的说话声，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奇。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母亲的。我飞奔出去，从母亲手里接过了她的包。埃娃也出现了，热切地拿过了父亲的帆布背包。为谁拿什么所做的争执抑制了将彼此拥入怀中的激动之情。这让亲吻有时间变干。走进花园里，我父亲在明亮的6月阳光下眯起眼，落在人群后面；我母亲伸出了双臂。我不得不忍住眼泪。是的，这是我的父母。

他们比我脑海中的形象更瘦小也更苍老了。两人的眼睛都包含着同样的询问：我日思夜想的人，你是谁？拉奇离开了，让我们单独相处。我们握着彼此的手，长时间没有说话。我看着他们，点点头，接着说出了两个词：母亲，父亲。接着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去了公园散步，我和姐姐已经对那里非常熟悉了；我们在意大利冰淇淋店里请父母吃了冰淇淋。看着一个长着黑色卷发的女孩在喷泉边用手掬水喝，接着把水洒在头发上，我感到一种苦乐参半的平静在我身上降临：周围的人没有监视我们、举报我们、把我们拖出去杀死的愿

望，一切多么美好啊。当身边没人想要你去死的时候，你才能放松下来。

午饭后，穿着睡衣，我们蹲在父母的床上，听着一个个冒险小说，我母亲讲了他们的故事，我父亲时不时扮个鬼脸作为评论。从维也纳到毛特豪森的强制行军途中，他们中的十几个人在我母亲的鼓动下在道路的弯曲处冲进了树林。他们跑得很快，守卫竟没发现。当时是早春，在林中生存并不容易。他们遇见了一个纳粹党卫军小队，把自己装成了匈牙利难民蒙混过关。士兵很高兴这群人会说德语，乐意把他们在树林里抓到的野兔和鹿烹熟，所以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下围坐在烤肉旁。逃跑者中的一个漂亮女孩吸引了年轻英俊的小队指挥官的注意，他扭捏地跟她调情，想要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个延续了两星期的森林田园诗救了他们的命，因为那些到了毛特豪森的人——那些当时不敢逃跑的人——一个都没活下来。我父亲在这场冒险中的任务是保持沉默，因为他的演技无法让他撑那么久：他不会作假也不会撒谎，总是勤勉地记账，按时交税，从来不赊账（虽然他也很享受用现金支付时得到的微小折扣）。他会令人作呕地重复德国谚语“人如其言”，但是头脑简单的虔诚是危险的。他要是没服从母亲，绝对无法在战争中幸存，母亲在面对权威和法律时更为意志坚定、更坚韧，也更有冲劲。因为那个年轻女人坚决地拒绝了他，指挥官非常受挫，他最终报告了树林中躲藏着一队逃跑的犹太人。

所以在1945年4月，他们被奥地利宪兵装进车里，花了好几天到达一个位于盛开的樱花树间的多用途营地，里面住着各个种族的人，包含很多战俘。但那不是个灭绝营，而正是在那里，在克雷姆斯，我的父母被解放了。

母亲安静但坚定的抵抗让他们的苦难提早结束了。举个例子，比如说烤香肠的事。拜赖焦新村的集市广场有一个露天食品摊，散发出

的猪肉肠的香气飘得很远，没怎么勾起母亲的胃口，倒是让儿子完全受到了诱惑。不管我从哪个角度闻，香肠的味道都占了上风。

它也不是毫无对手：我尤为偏爱向日葵卷的气味——把剩下的向日葵籽压成圆盘状，当作饲料——它透过长长的嗅觉队列钻入我的鼻孔。我还被桌子发出的柔和白光吸引，老婆婆们在那里贩卖酸奶油、黄油、农夫干酪和跟孩子的头一样大的羊奶酪。最终母亲迫于压力，买了一串香肠。我们在午饭前大胆地偷吃了几口，坐在厨房的松木椅上，用我的小刀切下来吃。我们吃得很快，像阴谋家那样，希望隐瞒我们对犹太饮食戒律[注]的违犯，不让父亲知道，他总是听话的好儿子，虽然听任母亲买牛肉时把臀部跟肩部一起买回来，但是他肯定会认为家里出现猪肉太过分了。不管怎样，我们试图隐藏的努力失败了：父亲正好上楼来找母亲，将大吃大嚼香肠的情景尽收眼底。然而他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母亲愿意说谎，有必要的话会违背法律。她曾经领着盖世太保军官和匈牙利宪兵搜查房子，否认了所有该否认的事。女人在这方面更为擅长。1944年5月，当我母亲随着我父亲被逮捕时，他们头两天被关在拜赖焦新村的消防局里。感谢命运，母亲有胆量让自己被关起来，把我们孩子扔下。一个宪兵接受了贿赂，让父亲进了母亲的牢房，她毫不含糊地叫他要求和当地的警察局长哲尔吉·费尼耶什见面，警察局长对他们一向很友好。她因此救了父亲和她自己，因为他们上的火车阴差阳错去了奥地利，而不是奥斯维辛。在奥地利，幸存的概率是百分之六十。她也救了我们，因为要是她在我们身边，毒气室就会是我们的下场——对我来说是肯定的，对埃娃来说也差不多如此。我从来不责怪她离开我们：女人应该待在丈夫身边。

第三天中午，我们给他们带了午饭。现在连食物也是政治宣言了，表达了团结和抗议。但是没人在那里接受食物了。一开始，我们很高兴看到通往监押区的门是开着的，但是发现里面是空的。一个宪

兵告诉我们，他们被带到德布勒森附近的一个地方了，第二天我们从警察局长那里得知他们待在一个改成了集中营的农场里。然而，他建议我们不要去那里，因为我们进不去。我们把烤肉带回家，小口地吃，然后把剩下的留做晚饭，打了一下午的乒乓球。在集中营里，宪兵拷问父亲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他说他没有什么财宝，他所有的资金都投进了生意里。我不知道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但是通过坚持口供，他让我们避免了再次白手起家，至少保住了一部分。那些他后来在和平时期用于交换钉子、铁丝和铁锅的金子，对他来说，就像最后一份手稿对小说家而言那样意义重大。然而，他们成功从贝拉姑父那里获得了消息，所以他们去了花园，从井里拉出了铁盒子。我记得他们用泵抽出的水汩汩流到街上的声音。

他们被按批装进运畜车厢里，一批八十个人。母亲给父亲拿了一些磺胺甲基噻唑(注)，父亲因为发烧而身体虚弱，每当火车停下来时，她就会扶他下车。他们在施韦夏特(注)的德莱赫酿酒家族的土地上干了要求他们干的活，守卫很严格，但并不特别残忍。他们睡在长仓库里。当地几乎所有的劳力都应征入伍了，所以他们在地里锄土豆、甜菜根、洋葱和豆子，偶尔在衣服下面或者口袋里偷偷塞几个。他们到冬天才停止干活，在寒冷中相拥，让彼此保持精神振作。

12月，他们被带去维也纳清理瓦砾。他们住在多瑙河左岸的弗洛里茨多夫(注)区的一栋学校建筑里，却在市中心干活，爬过一堆堆炸毁的房屋，把瓦砾清理成堆。大多数维也纳人假装没注意到他们，但有一个音乐出版人给了他们用纸包起来的涂了黄油的面包，邀请他们晚上到雕花桃花心木乐谱架中间喝热茶。

拉奇鼓励我父母在布加勒斯特待一段时间，休息一下。我父亲最终可以加入他的公司，拉奇说，但是他们得先身心振作起来。他大概还说了几句贬低拜赖焦新村的话：为什么遭遇了这么多事之后，我父亲还想回去？那里给他剩下了什么？既然他要从头来过，为什么不去

一个更严肃的行业呢？我父亲点了点头，尽管他一定在对自己说“接着说下去吧，傻瓜”。在他心目中，拉奇是个自大狂。

所以我父亲会回到他的五金生意，因为这是他的行业，整个比豪尔没有人比他更在行。他想要的不过是做他真正的自己，并和那个夏天第一个进入店铺的客人打招呼。事物要好好整理一番。他会先在右手边的角落里的一两排架子上填充货物。接着他会逐渐扩充，直到整个商店，包括地下室，都装满货物。当局不会管他的。他在镇里还有一些朋友。

至于母亲，她一心想去布达佩斯，孩子们设法活下来的地方。她反对这个想法，即拜赖焦新村是重新开始的地方。一切都被分裂成不同的国籍。曾经存在的不复存在，也没有可能重来。最好忘记无法修复的东西。

但是她的约西卡[注]太顽固，根本没人劝阻得了。他接着说起他的父亲和祖父，以及他能叫出镇里每个人的名字的事实。疯狂已经过去了，是时候去干活了。他取回了自己的房子，清理干净，在门上装了新锁。他想要的不过是舒服地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生活在他建立起名声的地方。他的一切都被夺走，他自己也被带走，这些事已经是过去的疯狂，不会再发生了。毫无疑问。他会供应最好的英国货。

母亲吻了他的额头：“哦，约西卡！”

我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他握紧它，说：“事情就该是这样，对吧，儿子？”

“当然了，父亲，我支持你的决定。”新村，再自然不过了，是的。

但事实证明，新村是个不怎么行得通的选择。首先，因为四年后父亲再次失去了一切，这次是以人民专政的名义进行的，其次，因为回到熟悉的小巢和对村镇平静生活的渴望——从没存在过或者只在父亲想象中存在的生活——不过是一个顽固且伤感的梦。但我不难理解父亲对这个小镇的依恋，他于此出生，这里还是他父母和祖父的家。

拉奇因为我们没接受他的帮助而有点生气。他已经开始喜欢我们，把我们视如己出；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成为他的孩子的那天，他知道把我们还给父母意味着失去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都待在同一个城市里呢？在那段时期，想象罗马尼亚变成一个好国家还是有可能的，它没变好并不是他的错。匈牙利也没有变好。

作为外贸部的部门领导，他跟来到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和英国客户谈判，但是因为他的同事听不懂对话，他们无法给上级写要求的报告。他们怀疑拉奇和他的访客在做秘密交易。一旦他得到访客的微小礼物或者注意力，他们就会把他拉到政治警察那里审问。他在街上被跟踪，他的房子被搜查。当他请病假时，他们把一个女人安插进公寓，作为合租人，这个女人明显假情假意的卖弄风骚让伊波丽不胜烦恼。后来，当拉奇逃离一切，进了疗养院后，他们把一个告密者安插在病房的隔壁床上。他装成病人的样子，拉奇一去厕所，他就会翻拉奇的口袋。有一次拉奇在一片纸上胡乱写了点什么，然后撕碎扔进了废纸篓里。他从走廊进入房间时发现他的室友俯身在垃圾桶前，把碎纸拣出来，拼成原样。他们想让他知道他被人包围着，当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作为政治局外人的忠诚专家。他们需要他的全部。

他成了一名卡车司机：他有力气背装满面包的大篮子。有一天，他在送货时，一个店主碰巧听见他在哼《扬基歌》[注]。在这件丑闻失控前，拉奇搬回了疗养院，蓄起了胡子，整天穿着睡衣或便服待在花园里，看着树叶落下，长久地保持沉默。感谢一名好心医生的介入，

他能听古典音乐唱片。一旦他们允许他和他的家人移民，他把一切都抛下了。为了让他的亲人离开那个疯狂的国家，他会做任何事。

每个人都能看出，带着谦卑微笑的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虽然是六个孩子中的老五，但他是唯一的儿子。他姐妹们的财政状况更加岌岌可危，小辈们则鄙夷他的资产阶级体面、分寸感和自知之明。我能感觉到表亲们的傲慢，知识分子面对中产阶级稳定性时感觉到的那种傲慢。

父亲根本不接受共产主义口号，总是怀念自由选举的原则，并反对在全世界各地发生的革命。“在选举里，你有很多选择，儿子。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他在战时和战后都听BBC。他会花好几小时听自由欧洲电台(注)，小心翼翼地调节旋钮来减少干扰音。

从布加勒斯特返回的旅程漫长，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卡车上度过。不管是谁，只要有辆车，就会在车上支起长椅，当起司机来。我们一行大约二十人坐在一个非常旧的古怪装置里。毫无速度可言，但是一群人共同颠簸前行让旅途变得好受了一点。我很想知道坐在我旁边和对面的人是谁。这些时不时和我一起下车来舒展身体的人是谁呢？我对面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罗马尼亚女孩，她从森林边的河岸跑过来，快乐地用罗马尼亚语喊了一声：哦，多美啊！虽然要担忧的事还有很多，该悼念的死者也不少。

在布拉索夫，我们再次拜访了埃尔诺舅舅，那个酒店经理，他矮壮、礼貌、悠闲，虽然有时候很沉默。战前，我曾和他一起在属于我外祖父家族的森林里度过漫长的夏天。他当时住在山顶覆盖着白雪的马拉马洛什山上的一个大木屋里，他被家族派去那里种树并生产木材。公司有一家锯木厂和火车，总是兴高采烈地在山坡咣当咣当上下行驶。我在五六岁时，乘着这辆小火车在山区宽铁轨上运送劈成长条

的树干，感觉棒极了。我外祖父坐在专属的加了软垫的乘客车厢里往返锯木厂。

我现在还能想起他们的样子——身材健壮，肩膀宽阔，没有啤酒肚，还蓄着八字胡：埃尔诺舅舅，我母亲的哥哥，和她的一个姐夫皮斯塔，他是个厌世者，一旦咒骂犹太人的激情攫住了他，就只能通过在背上放水蛭来获得平静。每当我去他们家做客，他都会在午饭后诘问我，嘲笑我上的是犹太宗教学校，教《塔木德》的学校，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是住在那附近——但老皮斯塔不是个善于仔细区分的人。他移居巴勒斯坦的尝试失败了，因此很生气，他厌倦了永远当一个犹太人。他热爱森林，热爱在结冰的溪涧里钓鲑鱼。他热爱喂那些在猪圈里不断长胖的猪，然后在它们的臀部友好地踢一脚，给鸡撒去壳燕麦，然后挥斧头一下斩去它们的头。有一次，他带我去山里他们把木头烧成炭的地方。他从吉卜赛人那里买了装在上釉罐子里的野草莓。那个轻浮的女孩也在，她会大笑并把眼球翻得只剩眼白来吓我。我想触摸她，但是缺乏勇气。在点篝火或烤肉上，没人能超过皮斯塔，也没人比皮斯塔更了解山间裂隙和瀑布。帮他把培根、鸡腿、洋葱和辣椒串到烤签上是件愉快的事。听见火车头的轰隆声，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所有培根，并开怀大笑，这么晚了，开的肯定只能是外祖父的私人列车。

这个老绅士喜欢坐在森林木屋的门廊上，那是他总是晚到的报纸送达的地方。只有在陪我们去喀尔巴阡山脉的一座小镇时——美丽的广场旁边树立着地方监狱——他才会离开门廊。在星期天下午，监狱里的犯人会通过栏杆贩卖他们的手工：木制的哨子和烟斗、咔嗒响的公鸡、鸟笼。他们的牢房就是他们的作坊。我们会沿着两边种着树的碎石路漫步，看着他们削木头。他们中的一个杀了人，有人告诉我们。他做拖鞋。

外祖父是特里尔和曼彻斯特拉比领袖的表亲，他阅读现代犹太学大师的作品。他一度是纳吉瓦劳德会众的主席。他不怎么关心木材业的细节。

当想象的蝙蝠在客厅里太过密集地围着皮斯塔姨父振翅时，他的头会变得非常红，我的大姨伊隆卡别无选择，只得拿出装着瘦弱、卷成球状、扭动的水蛭的泡菜罐子来。伊隆卡阿姨会把她丈夫反着绑在椅子上，脱掉他的衬衫。接着她会把水蛭放在皮斯塔姨父广阔的后背上——它差不多跟饭桌一样宽——逐个成排放上去。它们会开始工作——勤勉地吸血，变得肥厚——把皮斯塔姨父头上的红色吸走。在一刻钟内，皮斯塔姨父就会失去对犹太问题的所有兴趣：反正它也毫无意义。

如果我心情好，我们两个会通过一块狭窄的木板穿过溪涧，接着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前进，经过溪涧的支流，到达一片林间空地，在那里我们能看到鹿在小径上走过。当它们瞥见皮斯塔姨父时，它们会退缩并吓一跳，但是他会无辜地眨眨眼，然后它们就会继续吃草，或者从溪流那里喝水，成群地沿着小径移动。我非常享受皮斯塔姨父带我去这些地方远足。他甚至原谅了我在一次丰盛午餐后尿了床。因为我已经五岁了，我母亲会取消下午所有的娱乐活动来惩罚我的邋遢行为，但皮斯塔会偷偷带我离开房子，到冰冷的溪涧去，在那里，他会如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站着，然后伸手到水里，瞬间抓住一只银红点鲑。接着我们会坐在一块布满青苔的岩石上，皮斯塔会检查他的酒瓶，看看还有没有水果白兰地剩下——在黄昏时分，双脚冰冷，而酒瓶里还有一口酒，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1944年5月，皮斯塔在四轮马车上绑了三根树干，坐在车夫位上，他的妻子和儿子坐在后面，像当地其他爱国犹太人一样，往纳吉瓦劳德的犹太区驶去。一列货运火车把他们带去北方。皮斯塔姨父和伊隆卡阿姨，我母亲最喜欢的姐姐，很快化成了灰烬。他们的儿子久里·弗

兰克，我最善良的表哥，一年后在毛特豪森死于伤寒。他教会了我如何用一把锉刀和沥青把大衣纽扣做成足球世界冠军。

我的舅舅和姨父在纳吉瓦劳德的金鹰咖啡馆商谈时，并没有对未来形势做出正确分析。我母亲的长兄伊姆雷有好几个工作：他曾经是赌场庄家和酒店领班，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跟每个人友好地打招呼。他总是给他的现任女友预留座位，那女郎有一头偏红色的金发，跟所有的前任女友一样。伊姆雷有着宽阔的肩膀，皮肤晒成深棕色，并蓄着细长的八字胡，但是他秃顶且矮小。有时候他会登上管弦乐队的指挥台，从首席小提琴手的手中拿走小提琴。外祖父对此并不热情，他会在伊姆雷用这样的疯狂浪费时间的时候对咖啡馆敬而远之。

皮斯塔姨父与我的埃尔诺舅舅和埃尔诺姨父会去看伊姆雷舅舅，他们四个会把头凑在一起，商议如何从战争中活下来。最成功的方案是埃尔诺·施瓦茨姨父想出来的：冠心病。他不再跳进他行驶平滑的雪铁龙并让他的司机带他去一场有时候显得神秘的旅行了。每当他遇到那种对他提要求的女人——那种会对自己的女友八卦谁送了她新戒指或者皮草的女人——埃尔诺姨父别无选择，只得站在玛吉特阿姨的房间门口，把眉毛抵在门柱上，跟她抱怨人类堕落到了什么地步：“想象一下，亲爱的，她们又在说我了！这次是X和我！”

“可怜的宝贝。她们就没别的事可做了吗？可能因为你高大、英俊又魁梧，她们嫉妒我和孩子们。”

孩子们——埃尔诺姨父把他们照顾得很好。他把埃娃嫁给了一个名望很高的药剂师，安排班迪去英国留学，并成了一名建筑工程师。然而，他的儿子帕尔在埃克塞特[注]取得的胜利更多是在网球场上，而非医学实验室里，他把帕尔带回了家，安置在公司里：至少他不会像

另一个儿子班迪那样组织罢工来反对自己的父亲。班迪娶了一名在工党左翼非常活跃的健壮红发女子，她终生在议会里支持穷人。

伊姆雷舅舅在布达佩斯被一个箭十字党巡逻队的头头杀死，他拒绝承认伊姆雷的特殊地位。听出了军官声音里的不恰当语气，伊姆雷舅舅告知对方，他在跟一名预备役中尉说话，然后军官粗鲁地朝伊姆雷舅舅的头开了一枪。我的表哥，建筑师班迪·施瓦茨（后来改名安迪·硕特）作为英国步兵幸存了下来。他随和的弟弟帕尔的美丽妻子和女儿被一起送进了毒气室，因为母亲不肯松开女儿的手。帕里从强制劳动营逃了出来，在马拉马洛什山上组织了一支由不同国籍和宗教信仰组成的游击队。他们缺乏实施大型运动的武器，但是确实驱散了追捕他们的小分队。

埃娃，三个孩子里最小的，最后去了比尔克瑙，但是一名波兰囚犯把她女儿卡蒂的手从埃娃手中拽到了玛吉特阿姨，也就是女孩的祖母手中，因此，虽然她们中的两个进了毒气室，埃娃仍然活着。她在工厂干活，变得越来越虚弱，从一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直到她最终在医疗营得到消息，她丈夫帕尔·法尔卡什，药剂师和香水制作师，还活着。她的消息也传到了他那里，怀着再次见面的期望，他们恢复了健康，回到了家。

在我们的家族中，老一辈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如果必须选党派的话，他们会认同社会民主党。而年轻一辈则是激进分子，大部分人是共产主义者。可能这也是在我父亲从驱逐营回来后只想着在拜赖焦新村重新开张五金生意，并且过起从前的生活时，我会觉得不舒服的原因。他们也许知道没什么会跟从前一样了。但即使年轻人觉得激进的改变会影响生活中的一切，即使我很可能会站在我表弟伊什特万身旁，一起参与那嘲讽的共产主义合唱，我还是认同我的父母。我问伊什特万，在拜赖焦新村谁能比我们的父辈更好地经营他们的生意（费伦茨·多博的书店、贝拉·扎多尔的纺织厂、约瑟夫·康拉

德的五金店），毕竟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上工作了一辈子，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其中一个助手会接手的。”他说。

我父亲还相信可以回到他所认为的正常：他会在遭受洗劫的房子里，用仅剩的财产重新开张生意，顾客们会过来跟他打招呼，就现实和永恒的问题进行深刻讨论，坐在有软垫的扶手椅上，吃着他们用推车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大蒜香肠或胡椒培根或普通的腌培根，就着面包和红洋葱——并喝着他提供的新鲜自流井水。雇员、我父亲和他的常客，交情都很好，在冬天围着巨大的铁炉暖和身子时，或者在夏天享受凉爽宽敞的房间时，有如此多的话可说。

年轻的家族成员，他们有着职业或者人文学科学位，父母也被杀死了，想要彻底打破旧秩序。“为什么你们想要事情变得和从前一样？”他们问，看着我们带着所有的动产搬回家——或者至少我们想象是家的地方。我们应该为了活着而高兴，作为拜赖焦新村唯一幸存的犹太家庭，父母和孩子也团圆了。当我们的亲友提起他们被毒死的妻子和孩子时，我的父母会保持一种忧郁的沉默。

人们不停地告诉我，我除了为自己，还在为其他人而活。这让我害怕。如果这仅仅是句空洞的话，我不会介意其中暗示的责难意味，但我知道不止如此：现在我不得不按照他们如果活着会做的方式去一举一动，或者至少以一种能赢得我被谋杀的童年伙伴的赞许的方式来活。甚至和亲戚一起时，在他们对于我活下来、能够回到家并幸福生活下去的反应中，我也能感受到一种混合着敬意和憎恨的复杂感情。

另一个问题很快潜入我们的谈话中：我们是资产阶级还是共产主义者？“要是我父亲还活着，他很可能会成为我的敌人。”伊什特万曾经这么跟我说。我不是父亲的敌人，他也不对我们怀有恶意。对他来说，把他已故姐姐玛丽什卡和表哥贝拉的儿子伊什特万和帕尔·扎多尔接到家里住是再自然不过了。他也把我的表姐若菲·克莱因接到了家里。伊什特万和帕里在科洛斯堡的学校待了一年，冬天一路滑雪到主

广场，但是到1946年夏天，事情变得很明确，特兰西瓦尼亚会回归罗马尼亚，而他们则回到了拜赖焦新村的家。

对我来说，新时代从1945年夏天开始。家人团聚，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原来的生活勉强恢复了正轨，回到了拜赖焦新村的房子，一楼的五金生意重新开张。我姐姐很快去了德布勒森上文理中学，在一个退休军官家寄宿。至于我，这是自由的黎明：我现在接受私人家教——也就是说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去见老师——在父亲的店里上课，那里有三个架子装满了从布达佩斯、绍尔戈陶尔扬[注]和博尼哈德[注]运来的货物。（它们用斯图特贝克卡车运来，这些卡车现在属于俄国人了，作为民用商业车辆，偶尔由苏联军队护送通过还不彻底安全的路段。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代价。）

12月，我的一名远房表哥过来了。他的名字是埃尔诺·斯坦纳，是个好看且活跃的年轻人，拒绝承认将拜赖焦新村和纳吉瓦劳德分开的边界线。他和他的朋友们会用他们的破卡车运着货物从冰冻的土地上冲过边界。“我总是朝天开个两三枪，让边界守卫回头看。”埃尔诺是在5月被法国人解放的。他能和他们交谈，也养成了对卡巴度斯苹果酒和高卢香烟的喜爱。夏天回到家后，他得知他的父母和妹妹都没能幸存，尽管其他家庭住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埃尔诺还是重新占领了他的旧房间，叫新住户守规矩，并向他们展示他别在夹克下面的手枪。埃尔诺不想待很久，很快开始运人，而不只是货，往西去了。他家族里的很多年轻犹太人结束强制劳动后，发现自己失去了家人，就从马赛坐船去了海法[注]。

“我准备好了。”有一天埃尔诺说道。

我怀疑地看着他。

“准备好应对任何事了。”他冷淡地说。他的背包里装着他拥有的全部东西。

“为什么不接手你父亲的生意呢？”我问。

埃尔诺拍了一下我的手臂。“那一章结束了。”但是为了承认我说的也有道理，他补充道：“你父亲还活着。你在帮他。”

从卡车轮子上，他俯身跟我握了最后一次手。我站在我们的房子前朝他挥手，看着他离开，向圣地前进。神圣，他说，因为他们为之付出了鲜血。第二年在海法，他应该在活跃地破坏或者弄沉英国巡逻船，好让移民船上的乘客把划艇划到岸边。

我想要自己的空间，于是住回了旧房间以逃开其他人的喘气声和鼾声，并且能随心所欲地开灯。我需要一个客人能坐下来谈话的房间，但是没人能随便闯进来。我对隐私的渴望来自了解这一带的欲望：如果狗朝深夜行人狂吠，我想知道它们在哪个院子里叫。

虽然花园隔壁的院子曾经提供了很多玩伴，但是我目前只有我的表姐弟伊什特万、帕里和若菲·克莱因。若菲从贝尔根-贝尔森(注)回来，变得消瘦而坚韧，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现在房子里有五个孩子。没有安静的时候。我们在巨大的锅里做饭。绝对不会剩饭。

我父亲认为他养活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他享受重回正轨，看着货物逐渐从一面墙铺到另一面，重新雇用他的店铺助手。有些老顾客见到他重新站在门前，拥抱他并用力握他的手。“我的约西卡。”他们这么叫他，一个源自童年时期的称呼。他清楚地记得前一年没有过拥抱，但对此绝口不提。

1945—1946年冬天，在烧着山毛榉木的瓷砖烤炉旁，我听着来访者的对话。一个叫卡蒂的女孩和我会在苹果上切洞，去掉核，并填进肉桂和糖蜜，当时蔗糖还没回归市场。我对拉奇·纽尔的观点尤为感兴趣，他是卡蒂的宽肩膀且顽固的表哥。他结束强制劳动，成了一个难对付的顾客，后来又差点被苏联人监禁。他穿短皮夹克和系带高靴。

他的家族拥有当地的屠宰场，而他在当地的肉店帮忙，现在那里同时存在符合和不符合犹太教规的肉制品。他身上到肘部都浸着血，整天劈猪腿和排骨。在去我们家的路上，他会在下巴上擦古龙水。他梦想拥有养着成百上千头猪的猪圈，和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肉类加工厂，他会用无数匈牙利文学大师的观点来佐证这个梦想。他对米哈利·巴比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了解阿蒂拉·约瑟夫的诗，还提醒我注意一大批在世诗人：米兰·菲斯特、约拉斯·纳吉、拉约斯·卡萨克、蒂博尔·德里(注)。我姐姐会送他到门口；我则谦逊地退下了。他们的道别似乎超出了必需的时间。

在其他晚上，我会倾听铁匠儿子的忠告，他给我提供了性学建议——比如说，最好避开镇里哪几个臭名远扬的女人。他计划在布达佩斯成为机械工程师。拉奇·纽尔想要待在镇里，让我们发誓给小农党投票，因为如果共产党赢了，用他的话说，他就得跟他的肉类加工厂吻别了，而我父亲则要跟他的房子和生意吻别。到时候会是俄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来发号施令。在阴沉的冬天下午，他带来一本诗集。我们想办法把柴油灯换成了有泵的汽油灯，白色的灯罩变得紧绷，当火舌舔到它时会发出爆裂声。

我会切烟草，并把它塞进烟纸里（我不记得付钱的是谁了，恐怕是我父亲）；我用一只自行车轮做了个纺车，然后纺那些我母亲用来织毛衣的白色安哥拉兔毛；或者我会到其他地方读书。我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把许多夏天花在自行车上，跟我的表姐弟一起骑车到游泳区，或者到巴尔克乌河边，在那里，我们会爬到铁道桥的电缆塔上。

有一天，我发现我躺在电缆塔阳光照耀的水泥表面上，躺在玛丽卡身边。因为她比我大四岁，躺在她身边是种荣誉。很快这个活动在百叶窗低垂的凉爽房间的沙发上重演。她仰卧着，而我用肘部支撑着自己，试图探到她的短裙下，抚摸她的大腿。她的反抗很温和，当我

触摸她的皮肤时，我觉得她并不完全缺乏兴趣。我们都屏住了呼吸。玛丽卡的阿姨会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很长时间。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应当在我金发但无趣的家教面前流畅地背诵拉丁文变位和变格。当她给我父亲打电话时，他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是否去上了拉丁文课。“我当然去了，”我说，“大部分时间都去了。”父亲的凝视黯淡下来，然后他走开了。我不想伤害我的家教，但是我不能否认，我总是享受逃课。

通货膨胀带来了混乱。父亲不擅长驾驭这样的浪潮，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处理这样的事。十亿过后，又来了难以计数的万亿，接着是以物易物的时期，顾客带着小麦和培根来交换商品。父亲用不着小麦和培根，它们在地下室里发霉。人们逐渐认为商业完全没有意义，但我父亲坚持了下去，一旦可靠的钱在1946年被铸造出来，它就开始积累了。然而，他是否能保留他的生意还是个未知数。抚慰人心的声明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但是之后共产党对财产收归国有的热情从大公司转移到了小生意，结果是，在五年的第二春后，父亲的五金生意被国家收走了，这让他失去了房子和家，并且没有得到赔偿。法律就是如此规定的。小农的胜利毫无意义：共产党还是接管了一切。但他早就想到了会再次失去一切。至少现在他们不想杀了他。

拉奇·纽尔的梦想一如既往。他报名了布达佩斯的科技大学，然后在屠宰场干活，以此养活自己。有一天他在浴缸里睡着了，热水器里的煤气火苗泄漏了。煤气无声地覆盖了他，精疲力尽的拉奇·纽尔永远地睡了下去。

1947年8月，最后的议会投票过后，我会骑自行车到拜赖焦新村的市政厅，他们一接到电话通知就会把选举结果贴在一张大板子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参与了每个党派的竞选集会，发现每个党派都有种激励人心的东西。我当时十四岁，在德布勒森的加尔文教文理中学上了一年学，成绩优异。

前一年9月，我的父母用马车把我表弟帕尔和我送去了那所拥有四百年历史的学校，带着我们充当学费的一整盒食物——因为除了食宿费外，支付形式规定为日常用品：面粉、糖、培根、烟熏肉、豆子、鸡蛋和腌制品。

在我眼里，德布勒森是个大城市，陌生又神秘。沿着宽阔的集市街颠簸行进，马车到达了学生宿舍的入口，那里有青铜头像凝视着我们，令人肃然起敬。室内正面的题词告诫所有人，此处为祈祷及学习之地。

在三楼，一条阴森的、铺着石头的走廊通往堆着铁床的卧室。这个房间也作为学习区使用。日程规定，下午三点到五点必须保持静默，我们都要坐在公用桌子前学习。起床铃在早晨六点响起，我们会绕着院子跑圈。在肮脏的洗脸池前，我们只能洗到腰部以上。一只牛铃会召唤我们下到位于地下室的餐厅，每天早餐那里都会有配着莳萝的浓稠面糊汤等着我们。

我们沉默地站在椅子后面，其他人喃喃祈祷："亲爱的耶稣，今日为我们的座上宾，祝福你赐予我们的一切……我们日用的饮食，他赐给我们，愿他的名在天上被尊为圣。"我本可以念犹太祝福语"你是有福的，永恒的上帝，世界之王，你从土地里结出面包"，但那些日子里，我不是会祈祷的类型。

盛饭的勺子从舍长（我们必须遵从他）那里用起，按照年龄轮流使用。祈祷并没有抑制对等级的滥用。盛饭的顺序按照班级来，最大的班级最先去，最小的则排最后。如果陶瓷大盖碗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烩牛肉，很自然的，最高的班级会舀走大部分的肉自己吃，给"小乞丐们"，也就是我们这些十四岁以下的孩子，剩下的只有碗底的土豆了。作为四年级的一员，我属于低年级，因此也要听从这样的命令："乞丐，给我一杯水！"一种原始的乐趣感让其中的庸俗看起来很自然。无穷无尽的关于屁的笑话充斥着宿舍。

帕里在一年级，在等级的底部，而我，在四年级，属于低年级的最顶层，因此已经准备好了反抗。我竭尽全力地忍受欺侮。我甚至忍受了他们称为踢星星的恶作剧，它包含以下步骤：在晚上偷偷爬到一个新来的男生旁边，把拧起来的纸条贴在他的脚趾间，然后点火。当火苗触及他的皮肤时，受害者会用力往空中踢腿，惊慌地拴起门，并看着着火的纸在房间里飘荡。惹人窃笑的事。（就算是小乞丐们也有自己的既有秩序，因此，你可能最终落到嘲笑好兄弟或者自己的不幸的下场。）我忍受了家里寄给我的包裹在舍长的同意下被打开，并在没有问我的情况下被侵吞的事实。（我熟悉他这类人——“饶舌者”——我即将讲到，我最终下决心反对他们。）除此之外，我们相处得还可以。我成绩很好，并让他们玩我的四槽哥萨克匕首，他们会把它投掷到门柱上。我的同学都是乡村学校教师、牧师、唱诗班指挥、工匠和农民的儿子，他们在模仿正义、在新来者面前飞扬跋扈和服从大男孩的权威之间摇摆。熄灯后，要读一首赞美诗。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手淫的俏皮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一个同学和我分担了每天晚上袭来的想家之情，我们一起数日子。他告诉我，从车站到他的镇子，必须穿过一座森林。森林里有狼，他说，所以他时不时需要在头顶挥舞大棒。在前一年的圣诞节假期里，他打跑了一整群狼。我很想相信我的新朋友。

我们的房子离宿舍三十公里远，骑自行车回去是可行的，而一名友好的俄国中士，那个陪我们去纳吉瓦劳德的会说多种语言的人，会时不时过来问我想不想回家：我母亲愿意证明我得了几天不存在的病。他是拜赖焦新村指挥部的翻译，熟悉市场和整个交易世界。我用家里的厨房闹钟跟他换了一顶哥萨克帽子和那把四槽匕首。我们骑着他的吉普车，我坐在后面，双腿从边缘挂出去。他担心我会弹出去：他的司机开车时速一百公里。我因这速度无比激动。

但是跟我母亲一起爬上一辆牛拉的车也是很快乐的，车夫无精打采地坐在木板上，两头牛不紧不慢地走着，让我们仔细观察沿路的每幢房子和每棵树。德布勒森和新村之间熟悉的三十公里旅程会花费整整六小时。

以我的单纯，我对任何速度都满意：唯一重要的是我在回家的路上。而当我看着载着母亲的卡车——它充当了去新村的公交车——从德布勒森的金牛饭店开走时，我已经换上了铁石心肠。母亲在德布勒森待了三天，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团体购物之旅上，给我姐姐埃娃和表姐若菲买鞋。她们会一双接一双地试，一开始在看起来有希望的商店里，接着去了愈发令人失望的店铺。我母亲很耐心，对这些步骤保持尊重，但我觉得无聊，当女孩们最终选择了在第一家店试过的鞋子时，我没有错过表达鄙夷的机会。她们带着不屑的轻蔑接受了我的评语，给我贴上了野蛮的标签。我最初的意向，即走进第一家店并买下第一件我比较喜欢的东西，并未动摇。

随机选择的哲学在其他领域也指导着我："上帝是好的，那么他给予的也是好的。"我的生活被邂逅和电话塑造：最好的晚餐总是在最近的餐厅里；我的第一个女人——我当时十五岁——是成排站在老式妓院沙龙里的女人中离我最近的那个。这种方法可能跟饥饿有点关系：那一年我基本没长个。有什么就得接受什么。

举个例子，比如说德布勒森。它是离我父母的房子最近的（有好学校的）城市。宿舍可能摧毁了一些幻想，但我有优秀的老师。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图书馆。每当学校让我失望，我就会直接去那里。没人会问我是老师派来的还是在逃课。虽然上课不错，但我更喜欢阅读，所以我经常来到图书馆入口，一排宽阔倾斜的木楼梯，经过成千上万双脚的踩踏而磨损。我得伸手才够得着门把手，并且立刻就被地板蜡和旧书的气味迷住了。

有一天，我正在看一本轻松小说，我之前在母亲的床头桌上见过它的书脊，突然我感觉到一只手灵活地落到了肩膀上。我转身看到我们的班级辅导员，约瑟夫·萨兰奇博士，他教拉丁文和历史，令人敬畏。

“如果我的怀疑是对的，你，年轻人，现在应该在上课。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们面面相觑。我无法否认任何事。

“我希望你至少在读值得读的东西。”

他借着灯光在11月的暗淡天色中看了一眼那本书。

“这本书根本不值得逃课。”他轻蔑地说。

我觉得自己被贬低得一文不值，但无论如何必须回答。

“那什么算是值得逃课的呢，先生？”

这是个无耻的问题，但是他说了“这本书”，给了我接话的话头。他看着我，说：“等着！”他能进入图书室的内室，那是学生的禁地。当他在里面找书时，我很难继续读我的小说。他带着一叠书重新出现了，把它们放到图书管理员的桌子上，对他说：“如果这个男孩下次再来，给他这些书在图书馆里读。”他对着我眨眨眼，然后离开了。图书管理员用眼神把我叫过去，把最上面的那本书给了我。那是《罪与罚》。后来，在学校的走廊里，萨兰奇博士提醒我，就算我只看懂了书里的一小部分也没关系。我从中懂得的东西无论多少，其价值都高于从一本简单的坏书里懂得的全部。

最终我不得不离开宿舍。令我被驱逐的是允许我们午饭后去市里的规定（但我们必须在三点也就是静默时段开始前回去，三点后我们应该在做功课，而不是玩七巧板、陀螺或那个一拉绳子就能弹出小小的红花生的木头人）。在一个晴朗的11月下午，轮到我值日，这意味着我要在午饭后掌管公共休息室的钥匙，给那些宁愿待在宿舍里不去城里的人开门，可能他们觉得不安全，需要待在自己的窝里，或者他们想要学习，又或者只是因为懒。在一顿毫不丰盛的午饭后，我朝市中心进军。我可能从一个四周围着玻璃的小摊那儿买了一个果酱面包卷，或者在街角买了一串葡萄。不管怎样，我完全忘记了那把该死的钥匙。深陷观光和美味的愉悦中，我到达公共休息室的门口时，发现十双眼睛瞪着我。我怀着轻快的心情到达，跟男孩们亲切地打了招呼，并轻松地道了歉。没人说话，但是我被舍长狠狠扇了一巴掌。往后退了一步，我用头朝他的肚子冲去，把他顶得仰倒在地。当他们把我们拉开时，他说我会后悔我做的事。

规矩森严的生活不再适合我了。我问我的表姐若菲，帕里和我能不能搬进她租来的房间里，她说了可以。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就住到了若菲位于主教院的房间。从房间里能很好地看到大教堂、集市街和金牛饭店，在饭店的蓝色沙龙里，市交响乐队会在音乐学院院长贝拉·普坎斯基灵感迸发的指挥下演奏莫扎特和李斯特。

1947年秋天，我从沉闷的德布勒森加尔文教文理中学转学去了布达佩斯的活泼的马达可文理中学。我在一对老夫妇的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我是个乡下男孩，头脑简单，充满幻想，但布达佩斯很讨我喜欢。而且这次我可以自由地在城市里漫步，不用在外套上别黄色星星，也不用担心四处潜伏的危机。

学校和城市差不多有趣。它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有两份报纸，以及法官和陪审团、原告和辩护律师一应俱全的法庭，还有各种各样的案件，严肃的和不严肃的，等待着审判。在所有的评分会上都有一

名学生代表，如果他不同意教师给他的同学打出的分数，他有权否决。

政治无处不在，学生群体中有共产主义者，尽管男孩们大体上倾向扮演历史角色：丹东会坐在教室后排的一张桌子上评论道，罗伯斯庇尔有着一副怒目而视的神情。谢尼埃是个善良的、浅色头发的犹太男孩。我们曾一起在玛格丽特岛上散步，读巴比契[注]翻译的但丁。很快他就会从边境逃跑，在1949年这不再是件容易的事了，然后他移民到新成立的以色列国，成了一支坦克师的将军。在班里，我们做了不少角色扮演，也进行了数量巨大的辩论。我为马拉美辩护，反对浪漫主义大师维克多·雨果和之前提到的丹东，他后来成了歌剧指挥。（他对宏大效果的喜爱已初现端倪。）在那段时期，我们读了很多书：第二或第三次我向朋友承认我没读过这个或我从未听说过那个名字时，一个朋友把我叫作无知的乡巴佬。

是的，这是个政治的年代，就算在学校里也一样。什么时候允许杀人呢？这是个迫切的问题。或者，像我们这样十五六岁的男孩应该去妓院（如果可以，要去哪个？）还是和女孩出去约会？女子学校的女生吗？会聊些什么呢？作业？有个观点是不如和拉丁文老师聊天。我们的拉丁文老师是个睿智的人，虽然无政府主义支配着他的课堂。（柏拉图的译者不会陷入纪律的泥沼。）柯文迪老师会坐在最后一排，任何围在他身边的人都能倾听他说的话，而其他人则继续吵闹。

我寄宿的那对夫妇是阿诺德·孔塔——他曾是葡萄酒批发商，以及划船和竞走冠军，当时已经过了八十岁——和他的妻子。他们负担不起给他们的大公寓供暖的费用，里面塞满了雕花桃花心木家具、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德文版的歌德和席勒、法文版的福楼拜，黑色玻璃盒里装着牌匾，墙上挂满了阴郁的油画，青铜小雕像则占据着每个空着的角落。我觉得它非常压抑。十五岁时，我憎恶世纪末的颓废风格，

和它的折中主义，连青年派新艺术也一同厌恶（我们称之为分离派[注]）；我喜爱现代建筑的立体主义[注]。

孔塔先生是个矮个子，他的妻子艾尔莎则相当高。每个星期天早晨，这个整洁的老绅士会伸手挽住妻子的手臂（她的肩膀比他的头还高），然后他们会散步到英雄广场的美术博物馆。他常说，一幅好画可以看一百遍。每天晚上他都读一点《浮士德》。他会低声念一段希伯来文祷文再坐到书桌前。他的脸是粉色的，有双下巴，散发着剃须水的香气。他吃饭时穿着带烟味的常服并在腰间系着绳子。

我会沿着环路散步，路边有几幢宏伟旧建筑，每一幢都形成一个四分之一圆，除了胡子花白的佐尔坦·科达伊，谁还会从这些建筑里走出来呢。（每当他在音乐学院的楼厅里出现，全场都会起立鼓掌。）路过时我会低头致意，老人则会点头。施图克糕点店的花园和红色标志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忧郁。每当父亲结束了他的采购之旅，都会来看我，在我送他去西站之前，这就是我和父亲坐着聊天的地方。虽然我很喜欢和他相处，但他幼稚而发自好意的想法却不止一次引得我暗自发笑。

每天早上沿着离环路两街区之外的安德拉什大街散步时，我都感到必须走下人行道：60号的房子及其恢宏气势——和水泥柱上捆着的沉重锁链——命令我走到马路上。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它被称为忠诚宫，箭十字党的总部和刑讯室。被带进去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当时地下室里已经有混凝土浇筑的刑讯室，但结构不够现代：新政权往更深处挖了下去。建筑比政权长命，这个曾经是上层中产阶级公寓的房子成了新体制的政治警察总部。重建是加博尔·彼特的想法，他曾是一名裁缝，后来是一份时尚杂志的图书管理员，再之后是那个警察机关的头头——将军。他办公室带衬垫的门两旁各坐着一名少校，毫无疑问是货真价实的顾问。1956年之后，他们成了官方的幽默作家，撰写滑稽的圣诞广播和电视节目。

因为加博尔·彼特掌管着国家安全局，安德拉什大街的设施开始了一轮炫目的扩张，逐一吞噬周围高大而宏伟的房子。居民一被逐出家园，勤勉的石匠就开始了改造，使其适用于安全局的职能。每扇窗户外都有红色天竺葵在花坛里盛开，但配着机枪的守卫站在每道门前以及每个角落里，没人想和他们玩游戏。

浅棕色和灰色的苏联老爷车，以及车窗上挂着窗帘的黑色美国大轿车，从车道开过。下一个街区也是改造的一部分。街角的卢卡奇糕点店的橱窗——曾经是蛋糕、利口酒、玻璃吊灯、天鹅绒帷幕和大理石桌子的展示柜——被磨砂玻璃砖替代了：它成了国家安全局官员的俱乐部。

我后来得知，在供词上签了字的囚犯会在这里集合，在装饰艺术[注]风格的装潢中学习他们在作秀审判中的角色。因为面包师和他的看家本领还在，所以囚犯们把准备好的自我控诉背下来就能得到糕点。到那时，他们已经经历了最初的认罪和折磨的阶段。事实证明，大多数人能做到自我诽谤，甚至可以置自己于死地。一旦囚犯独自待在地下室里，像受伤的动物那样四脚爬进自己的牢房，所有的希望就都破灭了。你一签完文件，救赎了自己，就能洗个热水澡。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最有想象力的剧院。别人叫你打起精神从地下室出来，进入这个香草味的由金色的天使、吊灯、花环和生奶油组成的天堂，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沿着微微倾斜的大理石地板有尊严地走上一圈后，你能进入任何角色。内心深处，自我的可视和不可视部分之间的关系被割裂，可视的（和可击溃的）部分做着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可视的部分则吃惊地旁观。

1949年，我对地下室里发生的事知之甚少，但是我从BBC了解到，作秀审判中的被告会说各种能让自己定罪的话，他们是傀儡，意志已经被殴打和化学药品驯服。这看起来像是真的，因为他们说起话来就像机器人，背诵的成分多于忏悔，好像句意不再重要。

我认识的一个男孩的摄影师父亲告诉他儿子，审判过程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下来。此外，审判会多次上演，被告从来不知道哪次是“真的”。最终的视频由多次拍摄剪辑而成。整个过程会不会就是为了拍摄视频呢？据说在被告中有导演的朋友。

安德拉什大街（很快改名为斯大林大街）再过去一点，有一座1949年收归国有的私人借阅图书馆。借出斯坦贝克、海明威、马丁·杜·加尔和马尔罗[注]的小说令十五岁的我陶醉。同一个街区还有一家著名的私人妓院，由克拉丽斯夫人经营，位于一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寓二楼。到年底这一切都结束了：私人图书馆、私人幽会处以及其他任何私人之物，就连独立的个人也包括在内。我们在学校也不得安宁：我们不得不在每隔十分钟唱颂歌赞扬工人阶级。有时候我们偷偷在里面混进一两段下流话。

60年代早期，当国家安全局搬走，这地方作为特色糕点店重新开张时，我在花费了漫长下午调查公众福利局登记在册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后，会进来坐坐。我会和朋友们坐在天鹅绒座椅内，上方是吊灯的金色花饰和彩色装饰玻璃，四周围绕着蓝丝绸墙和金叶饰带，而有轨电车，苏联科技的骄傲，隆隆驶过。我和衣帽间的老太太们一直关系不错。我在那里约过很多次会，美丽的女人和奇怪的女人，聪明的女人和疯女人：我刚和第一任妻子离婚。那些女人现在应该去世了，或者上年纪了。

1983年11月下旬，当时我在纽约人文学院担任研究员，我妻子尤特卡和我在第四大街和A大道的角落租了一间公寓，跟圣马可广场隔着四个街区。一天早上，沿着圣马可广场散步时，我们遇见了一个路边集市。好几个乐队在表演，还有一个女人踩着高跷昂首阔步，吸引孩子们跳舞。我们花两美元买了一盏台灯，卖家想要证明它能用。我们走进了街区的警局内，寻找插座。“你的名誉危险了。”警察告诉他，微笑着看他们指向一个插座。台灯没有亮。他们大笑了一场，无

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男人还是女人——然后出于对售货员的同情，给他指了一个能用的插座。台灯没有问题。充满了尊严，售货员随后告诉我们，他的母亲是匈牙利人，他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见到我们，这个地方严格来说应该叫东村，而不是下东区。

我站在一家塔罗牌算命店的门前，被铁管、铁盘和铁栅栏包围。长着唇髭的算命者喜欢在靠窗的摇椅上打瞌睡。相邻的两家店是书店。我的小说《失败者》在两家店都可以买到。在匈牙利，它不得不在最隐秘的状态下出版，赋予了出版人加博尔·德姆斯基一种英勇犯罪的光环。在美国，我遇见了一个地下出版物式的白色封皮版本。排版得如此之密，以至于原本四百页的小说缩成了两百页。

伊万·塞勒尼[注]和我也用单倍行距打出了《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的打字稿。页数越少，越容易把它偷运出国。完成了那本书后，我就能回去写我的小说了。但是有一天比基（蒂博尔·哈亚斯——诗人、散文家、摄影师、身体艺术家、电影导演、守门人和仓库工人）告诉我们，塔马什（塔马什·圣约比，诗人、画家、电影演员和激浪派[注]艺术家）家里遭遇了搜查。他们原本找的是色情出版物，却发现了我们的手稿。他们突然就对色情出版物失去了兴趣。不，他们有了一本132页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打字稿，里面包含着各种煽动性想法。“看来127/b是你的分类了：反国家煽动罪。”负责拘留并审问我的好脾气且身材肥胖的中校说道。

近十年后的现在，当初的惊愕已消减为一连串滑稽的趣事，我们站在圣马可广场，看着人行道上的货品。人们把有一丁点儿可能卖出去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指望着市场之神为他们找到合适的买家。而市场之神也没让他们失望。因为在低俗小说和一两本好书中有两本眼熟的软封面书册——上红下黄——印着匈牙利语标题：《社会评论》，匈牙利共产党的理论期刊，1949年11月刊和12月刊。时值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因而封面上印着他的照片。

我拿起其中一本发黄的册子。现在这个出售它的年轻黑人能肯定地说，你能为日光之下的任何东西找到付钱的买家。躺在纽约的人行道上，大将军并不显眼，但是在1949年的秋天，整个世界都在送他礼物，包括感激的匈牙利人民送来的一列火车，装满了足以举办一场展览的材料：由迷你火车头、机械工具和儿童画组成的海洋。此外，每个橱窗都摆着他的雕像。比如说，在肉店，人类史上最睿智的领导人由冻猪油制成，艺术家的酬金以实物支付：背部肥肉。

突然之间，安德拉什大街建筑的一楼空出了一间公寓。之前的住户是共和国主席的女婿，一个自信的矮壮男人，有着一个同样自信且矮壮的妻子。在1949年的秋天，百叶窗关了起来。共和国主席的女婿被任命为驻开罗大使，携家人搬去了那里。接着他被命令回国，被告发为间谍，被判死刑并执行了。一切发生得很快。美国大轿车不再来接他的妻子了。搬家工人过来，把他们的财产拿去了只有天知道的地方。

1949年是大变革之年，伟大的新生力量之年，那时热爱和平且先进的人们在给人民灯塔准备七十岁生日。匈牙利国家安全局的铜管乐队，作为热爱和平且先进的人们的一部分，最近搬到了刚被处决的匈牙利驻开罗大使的宽敞公寓里，并在那里排练《斯大林大合唱》。我被迫听他们排练：我住在院子的对面。他们一小节一小节地排练，每一节演奏成百上千遍，把曲调深深嵌进我的脑海。“斯大林是我们的战役，斯大林是我们的和平，斯大——啊——啊——林的名字将把世界变得更美好。”（最后一句有轻微的韵律问题，但在意识形态上是纯洁的。）有时候会响起一阵轰隆隆的大合唱。一切都充满了节庆的欢乐。

1949年，斯大林认为会和西方开战，所以东欧需要根据苏联模式统一起来。苏联模式意味着审判。他们首先把大主教约瑟夫·明森蒂判处无期徒刑。接着是高大英俊并受人欢迎的外交部部长（之前是内务

部长）拉斯洛·拉依克，他被选为罪魁祸首，受到了充分的折磨，直到他做证说自己有罪为止。BBC称他为自己引进的方法的受害者。

人们和从前的自己不再相同了。他们的脸上似乎弥漫着一种僵硬的陶醉感。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围墙里发散出来的恐惧似乎随着窗边的天竺葵变红而变得愈发强烈。每天下午，上百万只麻雀栖在椴树和悬铃木上，把街道变成一条巨大而激荡的啁啾河流。在麻雀的无辜表面下，有没有可能深深隐藏着某种诡计呢？就像刚刚重制的木偶剧场等待着用机枪迎接穿长筒靴的幼儿园孩童？

德军失败后昙花一现的正常公民生活现在已经结束了，我意识到。烧毁课程记录，顶撞权威，高谈阔论雨果和阿波利奈尔[注]、厄岱[注]和巴比契的日子结束了。在文理中学的日子里我体验了整个城市，它的游泳池和图书馆，或者看望我姐姐，或者和一个萨克斯风吹得很好的男孩一起坐在咖啡馆里，或者仰慕坐在我后面的同学，他能嗝出整首《蓝色狂想曲》，或者雇他的邻居用屁把我周围的老师都赶跑，因而使我能不受打扰地阅读（虽然我不得不付钱并闻臭味）。

我的匈牙利文学老师鼓励我阅读，邀请我去他的公寓并借书给我。当他在我面前打开玻璃书柜时，那就好像美女脱掉了衣裳。那段时期，我在每行字里都发现了多重含义，并在陈词滥调里找到了深刻道理。

我当时十六岁，进入了文理中学的倒数第二年。开学第一天，我走进教室，发现两个学生站在窗边。其他人坐在桌前，看起来很严肃，正在以极大的激情唱着工人运动之歌。他们用不悦的期盼打量着新来者，想看看他会做什么。他会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吗？同一个班级，同一个集体，同一颗心，同一个灵魂。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可以过去和另外两个人一起站在窗边，假装不知道站在哪里让他十分可疑，竟然对这个以共同歌声收缩肌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集体麻木不

仁！他们站在那里——帕里·霍兰德和拉奇·恩德雷尼，班里最敏感的男孩。又高又瘦，博学，满腹讽刺，资深音乐会听众，阅读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赫胥黎的《滑稽的环舞》[注]，作为小塔西佗[注]，准备好了享受这个历史转变及其所有庸俗之处。

但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学生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吹嘘着他作为志愿者告发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同学的逃亡，然后坐在国家安全局的车里去了边境。他向来恶毒，但他的嘲讽现在植根于权力：他是学生联合会的高级官员。虽然他还得上课，但会在走廊里找其他学生官员小声地讨论运动的重要机密问题。外人不得靠近。他就是那个在1949年斯大林生日时发表演讲的人。他讲到了金鹰，讲到了冷酷无情地追求目标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上课第一天，他大声朗读了《沃洛科拉姆斯克大道》[注]的一段话，内容是癌症组织必须从身体切除，否则身体会腐烂。接着他就这个主题做了一小段漂亮的演讲，一边瞥我一边重复了好几遍“腐烂”这个词。

当政治局委员约瑟夫·雷瓦伊用一整页的分析谴责哲学家捷尔吉·卢卡奇[注]的有害幻想时，我是班里唯一支持卢卡奇的人。中学生竟敢不同意党领导的意见，简直大逆不道。我被传唤到一个跟我同岁的学生主持的纪律委员会那里。他的名字是费伦茨·费赫尔，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当时鄙视卢卡奇，但后来领悟了其精神。在一篇关于三年计划的文章中，我写道，对我来说，那意味着国家收走我父亲的生意和房子，对我过去常见到的疲惫工人来说，意味着长时间的低薪劳动。我的文学老师觉得自己无法给文章评分（“孩子，我无法为你做任何事，我无权管辖此类事务”），因此把它交给了校长。不久我就被学生联合会开除了。

我真正想要的是被学校开除。“你成长得太快，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了，”文学老师跟我说，“你在智力上超龄了。”这话有点过誉了，但我说不准他是不是只想摆脱因我而起的不愉快。

我的朋友帕里和我有一次邀请他和我们同去多瑙河划船。穿着泳衣坐在舵手座上，他露出相当大的肚子，但与之相衬，肩膀也很宽阔。当时只有我们三人，并且在水上，他透露道，他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和平相处，估计未来几年会很困难。“恐怖，”我模棱两可地说，“是历史的祭祀节日。”我的老师没有完全理解。也许我也一样。

那个夏天，1949年夏天，布达佩斯举办了世界青年大会，年轻的共产党员从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潮水般涌入。在那场将拉斯洛·拉依克及其副手定罪并处决的审判过后，城市里充斥着一种激荡的能量。有这么一种说法，仅剩的还没被逮捕的人是那些当局没时间安排审判的人。它们被安排在了第二年。

“这个冰淇淋代表了异化的头脑的忏悔。”某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还被未收归国有的意大利冰淇淋摊前如此说道。帕里大笑了一场。他的小提琴老师曾把康德称为唯一可尊敬的思想者，因此他能够欣赏我的黑格尔式讥讽。

很快，世界精神就被吸引到了妓院。把手肘靠在盖着一大块刺绣防尘布的钢琴上，我们从阳台凝视下方逐渐沉入阴影的环路。我们开始了狩猎之旅。我们跨过那幢新古典主义风格公寓楼的大门，经过它宽敞的院子、浅粉色的大理石台阶和略脏的红地毯。门铃在二楼沉重的棕色大门后发出克制的嗡嗡声。先是一个女佣，接着是夫人：“你还是要埃娃吗？”是的。埃娃身材苗条，乳房小而挺，散发着难以辨认的怡人香味。她的头发是红的——全身的毛发都如此——而且她的左臂文着奥斯维辛的编号。她十九岁，我十六岁。“跟我解释一下拉依克的事吧。”她命令道，因为我总能把事情说清楚。她的乳房起了鸡皮疙瘩。“我不想受酷刑折磨！”她有一件皮草，有时会有一辆轿车在外面等她。有时候她收我的钱，有时候她不收。当她收的时候，我用变卖藏书所得的钱支付。

虽然坐在妓院的厨房里很愉快，但看到那么多大腿容易驱散幻想。后来，他们关掉了酒吧，社会主义把女孩子们重新训练为出租车司机后，唯一剩下的那个把手肘倚在二楼窗口的人就是夫人了。她经历了第二春，因为那些醉酒并幻灭的男人习惯性地来到这里，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倒也乐意和她上床。她的脖子长了皱纹，但是脖子以下的皮肤依然光滑。她的阴唇大而肿胀。她保持着刮毛的习惯，叫起床来像唱高音。

不管是乘马车、骑自行车还是坐火车，只要能回去，放假我都会回拜赖焦新村，但是我一去布达佩斯上学，就变成了城里男孩。小镇童年的故事结束了——如果故事真的能结束的话。

这是我在拜赖焦新村的最后一个夏天。在炎热的工作日上午，镇里好人家的女儿们会躺在铁路桥边晒日光浴。我十五岁的时候曾经跟玛丽卡一起坐在一个电缆塔上，名副其实的包“箱”座位，能看到下面的沙滩上药剂师、主任医师、地区法官和加尔文教牧师的女儿们往大腿上抹油。每当火车隆隆驶过，我都会伸手搂住我的女友去保护她。

有一次，一队汗流浃背、风尘仆仆的哥萨克士兵从堤岸策马跳进水里。他们赤条条地洗马，一旦皮毛洗得锃亮，就跳进水里翻滚嬉戏，在水下相互推搡打闹，然后突然冒出来，白晃晃的身体坐在深棕色的湿马上。年轻女士们将目光移开。接着士兵们戴上他们的红毡帽，骑马绕着这些晒黑的年轻女士转圈，圈越转越小。她们的泳衣勉强盖到大腿，隐约露出一些毛发。太阳猛烈地照耀着。然后不知从何处响起了一记哨声，命令随之而来。士兵们抓起他们的制服和靴子，跟他们来时一样迅速地策马离开了。

1949年夏天，我经常躺在拜赖焦新村家里餐厅的沙发上，盖着一块深红色波斯毯，阅读《追忆似水年华》和《浮士德博士》[注]。我会把玛丽卡抱到自行车上，带她去巴尔克乌河游泳。那是初恋的日子。

玛丽卡比我大几岁，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衣服坐在我前面。我感觉荣幸。我从大坝骑到河岸，用一个急转弯停下来，我总是这么急转弯：猛地压下前后刹车。但是，有一次在我们两人的重量下，我们滚进了水里，人还坐在自行车上。这个小事故没给我们的爱情带来任何好处。在那之后不久，我们的客人，一个萨克斯风演奏手，问我对玛丽卡是不是认真的。当我指出我年纪尚小，还没有考虑结婚时，他告诉我，他有着非常认真的意图。为了玛丽卡的家庭幸福，我大方地放了手。萨克斯手骗了我，他的意图跟结婚完全无关。

在我十五岁，进入文理中学的第六年时，我跟我姐姐和表姐一起搬进了城市中部的一条窄街，瓦尔梅捷路。我住在六楼五号公寓的用人间里。进入房间必须通过门厅，房间小得只放得下一张桌子、一张床、一只衣柜、一把扶手椅和一个书架。我不受成年人监管，只在每月收到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对于生活费，我尽可能地省着花。偶尔我会和我的朋友帕里·霍兰德去华尔道夫酒店吃午饭。我们会仔细讨论菜单上的菜品，甚至在甜品后点了一杯拿破仑白兰地。服务员没有问年轻人的年龄。某些惯例依然存在。

然而，到月底，我会在拉约什·科苏特[注]街和博物馆环路交界处的华尔道夫站立餐厅吃饭。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会花3.5福林[注]买卷心菜千层饼，如果不够，就买1.1福林的有豆子的豆汤；如果连那个都太贵，就买70菲勒[注]的没豆子的豆汤，它虽然便宜，可也送面包。但是会有吓人的乞丐走过来站在我跟前，发出咕哝、咳嗽和抱怨的声音，露出他们掉光了牙的牙龈，先是盯着我的盘子，然后盯着我的人看。有时候我会和他们交易："我会给你们剩一半。但是请不要站在我面前。走到那边去！"但是他们绝不会走远；他们紧张地观察着，看我会不会留出说好的一半。

我对华尔道夫酒店从里到外都很熟悉，早年跟父亲来布达佩斯的一次旅行中，我甚至在这里住过。它有着那种我在匈牙利酒店就很喜

欢闻的特殊清洁剂的气味。我父亲的生命线已经被切断了，而我的才刚开始。一切仍在我眼前，从零开始似乎很自然。我住在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就算在下午都需要电灯来读书，我所拥有——及所需要——的全部财产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衣柜和一个书架，这些都没什么可丢脸的，这令人振奋。我喜欢有自己的房间，一个我能躲进去的钟罩，在那里，另一个世界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形成。我能轻易地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因为一本书正如我能从窗户看到的那一小片天空，同样是另一个世界。

在狭窄的瓦尔梅捷路的另一边，绵延耸立着黄色的县政府大厅，一个巨大的古建筑，它不规则的屋顶让我紧张，因为工人们嚼着作为零食的培根满不在乎地爬上爬下。“巴黎风格。”那些从没去过巴黎的人说。没人住在正对面，所以我可以盯着屋顶以外的天线、塔、圆顶、喇叭和云彩看。

住在我们楼下的是维利·科纳男爵的妻子，再楼下是蒂瓦达·纳托普男爵。我喜欢上了男爵夫人，她是个柔软、皮肤晒成棕色的女人，穿着运动装四处活动，我也喜欢男爵，他弯着腰，用拐杖检查前方的地。两人都被迫在1951年搬走，有同样遭遇的是一名嗓音深沉的美女，她抽烟，穿花格短裙，并让自己浓密的（我认为是天然的）红发凌乱地披散下来。她在土耳其大使馆工作，也在那里被捕。而另一个邻居，一名银行家，被重新安置在布达佩斯外。一名委员会主席，前文理中学教师，搬到了我们楼下。四楼军官的年轻儿子某天发现了父亲的手枪，并在玩枪时击中了七楼邮递员的女儿。

我还能想起那些来到我的公寓的朋友的样子，他们坐在床对面没有铺垫子的扶手椅上，或者伸展四肢躺在床上。伊什特万会说起他的运动同志，和那些无趣的官方房间，他们在里面讨论如何让每个人都变成他们那样，成为“新人”。事实上伊什特万在这个阶段对我来说也很“新”，跟从前的他不同（跟后来的他也不同，那时好奇心驱使他去

追逐一个刚刚成型的真理的难以捉摸的尾巴）。现在他的话语更具审判性，有时会以党的公正的名义与朋友针锋相对。党的逻辑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两年。

但他也能充满尊重地谈论女孩的头发或艺术天赋，或嘲笑他的同事们的人性弱点，用“多洗几次澡对他没害处”来评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说出了关于计划经济危机最高明的话，用大量数据佐证他的观点。作为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他获许在国家计划局工作，他会把数据抄在碎纸板上偷偷带出去，把它们握在手里，好像那是阿拉丁神灯或某种理论上的奇迹武器，用来谴责这个——用革命语言来说——倒退的制度。二十岁时，他意识到市场是存在的，只有以精神失常为代价市场才能被废除。当我思考到贝拉姑父的商业敏感如何在他儿子身上重现时，我眼前一亮，虽然伊什特万对于市场的兴趣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构想，并没有参与其中的意图。

我是一个在布达佩斯最好的学校之一马达可文理中学上学的外省男孩。我是一个谨慎的年轻人，但口音和着装泄露了我的乡村出身。托特先生，拜赖焦新村的裁缝，用高尔夫裤给我做西装，我的同学没一个人会这么穿。但是我最渴望的是一双他们称之为“滑雪靴”的鞋，有着双层皮革底，边上有皮带和皮带扣。我认为它会让我看起来更加冷峻、更有阳刚之气。滑雪靴是用来脱身、溜走、逃跑的，这种鞋在你被人追杀时不会磨坏你的双脚或在你脚上散架。

我喜爱有追逐情节的电影，从来不把自己代入追逐者的角色。我曾经借由想象给朋友们逃离边境的故事添加细节，让他们跨过溪流和矿沼。帕里和我曾计划着划船南下至边境，然后调查越境的可能性，但开着汽船的边境守卫绝不让我们靠近。我们仍然幻想着从水下游过去，用一根芦苇来呼吸，或者在肚子上捆一台马达驱动的螺旋桨，甚至讨论了螺旋桨会不会伤害我们的私处。

然而当移民成为一个现实话题时，当匈牙利犹太人也能搬到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甚至能用大箱子带走所有财产时，当我们的父母问我们是否愿意移民时，我姐姐和我说了不。所有我们爱的人，所有我们喜欢的东西都在这里。当时我已经在布达佩斯待了好几年，学会了接受人生中的好事和坏事。我坚持留在这些好事坏事都曾在我身上发生的地方。

“我们留下。”我说。

“为什么？”我父亲说，他有他的理由，因为他被剥夺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虽然他从来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但他承认其现实性，并设法在布达佩斯的一条小路上开了家五金店继续赚取微薄收入。尽管因为日复一日地告诉顾客他缺东少西而惭愧，他还是厌恶地排斥下属所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对国家主导的商业持悲观态度。“告诉我，儿子。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在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世界里极其不安全，如果第二天轮到他在半小时的例行晨会上讨论党报《自由人民》，我告诉他该说什么样的话根本没用。在会上，店铺的雇员会对前一天的新闻进行评论，谴责帝国主义者编织的旨在破坏工人阶级事业的谎言。我父亲或帝国主义者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我不会说话。”他会说，虽然实际上他有聊天的天赋。他退休后，常去大商场购物，并成上午地跟卖家和买家闲聊，接着听门房谈完天再回家。

我从来没跟家人说过我想当作家。别人看到的只是我读很多书，敲打字机，在读大学时发表了几篇书评。我的学位证书给了我担任匈牙利文学教师的资格。

要是我上了医学院，母亲会更高兴，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背景，我从未被录取。我的名字旁边有个“X”，意味着，用共产党的术语说，我不只是阶级局外人：我是名阶级敌人。

我申请了法语和匈牙利语专业，但是被拒绝了。我能进入俄语系算是走运了，它很快改名为列宁学院，旨在教育出具有坚实马列主义背景的可靠干部。但我们这些带“X”的人在哪里都待不长久，在大学第二年，斯大林死后两星期，哀悼期间我被阻拦在大学外。伊姆雷·纳吉[注]掌权后，教育部允许我在匈牙利文学系继续学习，但是在1955年3月纳吉下台后，我再次被开除。最后通过我的教授们的介入，我才获许重新入学并完成学业。

1956年夏天，获得了匈牙利文学学位后，我确实成了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家新成立（但还没开始发行）的杂志《生活图像》的编辑部成员。我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那些职位：我的同学们在挑起一场革命。我们得到了几把机枪，组成了一支大学国民武装兵团，试图对抗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并保卫大学。最后，我们投降了。

回顾那五年的学习生涯，我怀着复杂的感情。每当我去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大学做文学讲座，开社会学研讨会，或者只是跟教职工及其热情的学生谈话，我都会感到同样的模棱两可。了解一整个研究领域的概况，有整天学习的机会（一个在以后的人生中可能不会重来的机会），为准备考试而痛苦，认识到个人能力和局限，崇拜一些教授并鄙夷其他教授，思考将知识转化为实用的策略，体验初恋的兴奋，与朋友长谈至深夜，来时无知、走时受到了相对良好的教育——不，我们没有浪费时间。但即使是那些记忆也带着些许讽刺：我看到戴着不同面具的脸；我看到一支有着全新自我形象的军队沿着职业道路行进。从一个角度看，它是傲慢的新精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却是新孵出的蛋的巢。是的，它是个学位证书工厂，但也存在着大师-学生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戏剧化而哀伤的。

无疑，政治渗透了我的大学时代，渗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它成了教授和学生的固定背景。被锁在里面和被锁在外面，处理内部和外部的武器（里面的是机枪，外面的是坦克）只是常态。任何正常的学生角色都被抛弃了。但即使在革命的鼎盛时期，我也没有开枪射击任何人的欲望：面对着武装部队的压倒性优势，我认为语言作为反对力量终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结论是与那些没有涌出暂时对西方开放的边境的人共同思考后得出的。

我有一半同学都离开了，大部分成了教授，主要去了美国的大学。我们，最顽固者，转入地下，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占优势，我们就用伪装来提供自由精神，与此同时巩固和复兴自由文化。在我们被锁起来的时间里，我们还可以了解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强迫产生了强度。计划是从有经验的人那里学习，在白天，一部分时间待在图书馆里，一部分时间待在出租屋和后院里，努力拯救被忽略儿童的生命。

至于夜晚，我们待在图书馆的咖啡馆里。因此我们的后大学生活是大学生活的延续：同样的朋友和情人圈子、几个教授和文学圈。谁是谁的消息传开了。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这是个有着封闭亲密感的世界，像个行业协会。大学只是终生学习生涯中相对短暂的一个阶段，但它可以说是最激励人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第一次考试、第一次严肃写作、第一个公寓（或者至少是房间）、第一次与恋人同居、第一个公共角色。这些最终在记忆的竞赛中胜出，因为它们的气味和颜色比后来者更为浓郁，而这可能是之前的大饥荒造成的。谁能够消化所有那些食物、那些书、那些身体、那些经历呢。一旦学生时代过去，那种非凡的饥饿也随之消散了。我的大学事业，尽管被政治变迁折腾得残缺不全，但还是滋养了我对现实的渴求。我嫉妒今天学生的自由，因为政治并没有介入他们和知识中间，他们也免除了很多无意义阻碍之苦，那些曾经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阻碍。与此同时，考

虑到我们能从命运的挑衅和震惊中有所收获，不管它多么令人讨厌，我都不后悔这就是我的命运。

多年以前，我母亲想把我已故父亲的结婚戒指给我，但我戴不上。即使在我第一次婚姻期间，我在走出门的那刻也会把新戒指偷偷放进口袋。有一天我忘了摘，女子文理中学的整个班级发出了不小的嘘声。

从那天起，她们认为我和黛西结婚了。大学最后一年，黛西在我担任实习教师的同一所学校里，展现出了杰出的教学天赋。我曾坐在后排观察她，用嘲讽的眼神令她不安。她们可能看到过我们在1956年金色春天的地震洪水后或革命前，手挽着手沿着附近的街道散步。

后来，她们能看到我和我的妻子薇拉在一起，我们沿着订成厚册子的早期国会会议纪要，穿过国会图书馆（很多人在这里度过下午），然后拐进最后一个所谓的研究室，其四周是玻璃墙，衬着彩色镶嵌板。从那里，一扇沉重的门通往一间角房：至圣所，一个为我们预留的房间，我们，被允许拥有打字机的天之骄子，哲尔吉·塞克勒什和我。他当时四十岁，我二十三。透过我巨大的书桌后那扇厚重的窗户，我能看到绝美的景色：多瑙河，布达那边的步行道两旁排列的栗树，再后面是失修程度不一的六层楼宫殿。宫殿高耸着，带着宏伟的尊严，带着自知己美的美人的平静，即使街上的人大吵大闹，即使炸弹开始坠落，即使人们沿着堤岸排队，被子弹射进破碎的浮冰里，即使游艇在灰绿色的水面振荡。但是现在振荡的只有杜纳帕酒店的船上传来的钢琴声和鼓声，船上的夜店开到凌晨四点。一起来酒吧的夫妻和情侣可以租带家具的小船舱。

我通常坐二号有轨电车去国会图书馆，它高大且安装着黄铜把手的入口面对着多瑙河。你必须通过门卫才能进去。我会尊敬地朝他们点头。不管怎样，他们看守着通往我们国家顶峰的大门。学生们沿着台阶上上下下，相互描述在这里举办的座谈会中讨论的主题。人文院

系的女生会并排坐在青铜柄的灯下，未来的双领域学者（法语和匈牙利语、历史和英语、心理学和民俗学）凝视着现在的学者，后者属于最高阶层，被允许在四人的“研究室”开展工作。“研究室”用带着彩色玻璃的花纹木门跟大阅览室隔开，里面的大窗户可以俯视多瑙河及城堡。

人文院系的女生总是在谈恋爱，或想要谈恋爱，分手时非常戏剧化。她们会告诉女友，自己刚刚用悲伤毒死了自己，那个残忍的畜生说一切都结束了。在一个安静的布达小酒吧里，当时每个人都在跳舞，那个……那个无赖说最好现在结束，不要等到以后了。但真相是，什么时候结束都不好。所以现在，当她的头倒向桌子时，他会因为这一切耻辱而颤抖。但她忠诚的女友会抛弃自己的家教学生，像她母亲曾做的那样，把她拉到医院去，之后那个恶棍会坐在金发天使的医院床上，她会张开双眼凝视他，然后他们会因彼此而欣喜，因为感激而流泪，两人都忘了所有的蠢事：男孩曾说爱情结束了，女孩曾说那么生命也结束了。最终什么都没结束，图书馆第二天会再次从早九点开放到晚九点。

图书馆是避难所，是配备了价值永恒之物的庇护所。我在法国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发现了公开且开放地谈论国内禁忌事物的书。我能接触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期刊。那里还有艺术书籍和新作家写的小说。在国会图书馆，我得到了一张进入研究室的通行证，它是白色的而非粉色的，我甚至能接触到电报局的保密出版物。我跟别人共用空间，其中几个是做神秘研究的怪人，另外几个家伙极度无聊，用他们的白色通行证记马克思主义文学教科书的笔记，也就是说，从无意义中提取无意义。他们怀疑地看着我，因为我读的一切都让他们感觉疏远。但是我仍受到包容，在那里很自在；事实上，我们是一个大阶层，只得到最低限度的包容，但仍旧舒服。

我朝窗外的多瑙河瞥去：薇拉正赶来接我。我们会逛一会儿，在拱廊下把手臂绕在对方的腰上，天气好的话会坐在堤岸的台阶上。这是个适度谦虚的地点：和图书馆的内容相比，我的知识是零点零零零，并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如此。我渴望地看着多瑙河上的拖船。它们在船尾有个船舱，船长和他的家人住在那里，在早上他的妻子会把刚洗完的衬衫挂出来晾干。看着慵懒的拖船拉着这些白补丁和绑在船尾的六艘驳船，我会想象着自己学习了船长的技艺，在照料完日常任务后，坐在躺椅上阅读或沉浸在自由沉思中。

我在家和图书馆各有一台打字机，都是旧的黑色便携式机器。坐在隔壁桌的久里·塞克勒什和我会轮流打字。我用我的凯旋牌打字机无拘束地写作，它的把手掉了，但是我用旧皮带重新装了一个。我的机器响起来就像大炮，但我同事的更响。他从出狱起就一直坐在隔壁桌。在我面前，铺着深红毡布、四腿为狮子腿造型的桌子上摆着阿尔贝·加缪[注]、雷蒙·阿隆[注]、埃米尔·齐奥朗[注]、伊什特万·毕波[注]、拉斯洛·内梅特[注]和米克洛什·圣库提[注]的书。在作家协会和月刊《新声》的推荐下，我获得了白色的研究员卡片，它给了我借这些书做内部用途的权力。没有卡片，图书管理员会花很长时间争论要不要借给我某一本方向可疑的书；有了它，我要借的书大部分他们都会给我。罕见的拒绝，其解释是相关作品需要特殊许可才能借（为了获得特殊许可，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巧妙策略来），不是来自某个留着大八字胡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压抑且谢顶的员工，而是来自一位耀眼的（尽管穿着白色工作服）金发女郎，她的每个动作——如同她的声音和目光——都纤细流畅。她长着秃鹫般的大鼻子，嘴角很美，即使从来不笑也是扬起的。她看起来像被一只银钟罩包围着，虽然我经常这么想但没有做出努力去打破它：赢得了她，我会失去图书馆，因为最终我一定会离开她。这让图书管理员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塞克勒什曾告诉我们关于巴黎大学生活的故事，右翼和左翼激进派的故事都有。他告诉我们，在德国占领期间，他在一次突袭中被

抓，并被搜身。他碰巧身上带了把左轮手枪，包在报纸里，因此他把报纸举过头顶，而他们搜了他的衣袋，什么都没发现。听到这个绝妙的英雄举动，我们这些二十三岁的人能做的只是眨眼。他告诉我们，在狱中有一段时期，政治状况恐怖，但食物状况大幅提升，狱友都鼓起了信心，后来政治状况开始变好，但原来的残渣剩饭回来了，狱友又丧失了信心；听到这个故事我们大笑了一场。事情的真相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厨师在时局糟糕时被捕，在时局变好时被释放了。所以差食物并不意味着政权在制裁他们，只是意味着旧厨师回来了。他没仔细说审讯的事。他只说现实主义缺乏描述它们的方法。他让我们去读卡夫卡，因为只有卡夫卡包罗万象的比喻有能力接近我们的现实，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我们曾经争当第一个读到最新一期《新法国评论》的人。我知道法国秘密警察把久里通过格林尼克桥，即波茨坦[注]附近的忧郁之桥，交到了俄国秘密警察手上，因为他拒绝回家，也拒绝告诉法国情报局他在罗马当匈牙利特工时的任务，他们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居留许可。因此，他不得不从当叛徒和间谍以及被交给共产党中选择，后者命令他从驻罗马大使馆回国（他在一封信里抗议了拉依克审判），并最终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长相英俊，头发雪白，略微跛脚，声音深沉有力——一个真正的绅士，一个高尚的人[注]。他是法军少校，抵抗运动英雄，谈话大师，普鲁斯特译文的编辑，自己也是一名优秀的翻译。后来，他在著名的欧罗巴出版社担任校对，最终被提拔到文学部主编的位置。

有时候我的妻子薇拉·沃尔绍会加入，然后我们三个人会坐在科苏特肖像画下方的沉重扶手椅上聊天。我注意到了久里跟薇拉说话的方式温暖而有礼貌，沉思时看着她的脸，这对薇拉来说并非无足轻重。她也被他的阳刚的谦虚、他的自我隔绝和他的善良所吸引。她的嗓音深沉，会对我们的谈话做严肃思考，抬起她上翻的鼻子，皱起眉头，兴奋时摆弄她浓密而凌乱的褐色秀发，顺着思路张开嘴，偶尔做出评

论来表达愤怒或热情。在那里，在国会图书馆的打字机室里，就在首相办公室隔壁，我们这个小团队走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久里·塞克勒什，在命运（以及薇拉）难以捉摸的意志下，不久后就取代了我的角色。

从国会图书馆的窗户看出去，我能窥视到哲学家米克洛什·克劳绍，一如往常，头发仍是金色的，不像1985年他在伦敦公寓临死前那样灰白，在那里他被瓦斯爆炸严重烧伤。1956年春天，他的心中涌现出无数想法，轻快地踱步，挥舞着手臂，度过了一段美好旧时光。我们会花费数小时沉浸于对政治和哲学的探讨。我们会去乳品餐厅，每次他叫店里的女服务员停下来，从木托盘里拿糖包加在自己的大米布丁上时，她都会着迷地听他说话。他会深入谈论受费希特[注]激发的疯狂行为的丰富细节，用经典德国哲学把她钉在原地，导致房间的各个角度都响起了“面包！”“糖！”的嫉妒喊声。

有一天在科苏特桥上，克劳绍从我和薇拉身边飞快掠过，他为自己的匆忙而道歉，说他必须扔下黑格尔，回到康德，因为在康德的道德体系外什么都不存在，虽然这并不完全可能，因为你不能忽视历史，而没有黑格尔你就无法理解历史。研究了好几年斯宾诺莎[注]的《伦理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注]，他对两难困境再熟悉不过了。至于我自己，当时我正在长篇大论意识的分岔路和事件的同时性，作为对我的折中主义（我称之为多元主义）的道歉。为什么非要从黑格尔和康德中做出选择呢？两者可以在架子上共存。薇拉不赞同我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对她来说，这反映了我在选择爱情上的无能为力。这个人很美，你说，但那个人也美。她注意到了，在外面散步时，如果一个女人有一丁点魅力，我都会禁不住盯着她看。

在自由无法获得的情况下，如何赢得自由时间？有时候两者是一回事。一天，伊什特万给我带来消息说，德布勒森的火葬场在找专业的焚尸人。火葬场一星期只开两天，但它给出了一个极高的工资，作

为你必须克服恶心的代价。我们要成为专业的填炉人、烧尸者吗？在所有人中偏偏是我们？至少在这个情况下尸体是自愿进入焚尸炉的。我们说服了自己，想象着我们飞到德布勒森，住在金牛酒店，戴着白手套干活，把剩下的时间花在国会图书馆里，眺望多瑙河对面的城堡废墟。我们写了一封庄重的申请信，说我们对这份工作有着很深的兴趣。我们听说酬劳很高。是真的吗？负责人给了一个礼貌的回复。他们确实在招人，很高兴我们表达兴趣时的真诚。然而，他们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个误解，即工资是我们所说数字的十分之一。我当时二十岁的头脑闪过我们可以把尸体卖给解剖学会的想法。那里不需要。“你是个非常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基什教授说，他是解剖系主任，碰巧也是自由教会理事会主席。“用劳动赚取面包吧！”我本可以给货车卸货，却决定做校对和翻译。

那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注]的时期。在我第三次被大学开除后，在捷尔吉·卢卡奇的干预下，我重新入学。一群朋友会聚集在我们家思考历史征兆，确信我们站在历史的中心：奥地利前不久宣布中立，改变即将到来。伊什特万相信，引用他从计划局找到的保密信息，国家破产了。他说，要是机会来临，他有足够的材料罢免拉科西[注]。

在1956年10月23日的早晨，革命爆发的当天，我独自坐在安德拉什大街一个复折顶房屋的阳光照耀的角房里，这幢房子是新成立——且是激进反对派——的杂志《生活图像》的编辑办公室，我面前是一堆越来越高的半吊子投来的烂诗，作为文学教师新手和编辑学徒，我早就该给他们寄出礼貌的拒信了。相反，我把时间花在跟朋友和情人打电话上，时刻跟进政治局势。学生集会示威在一些时候被禁止，在另外的时候被允许。学生在游行，那当然很好，但是游行示威本身并不特别吸引我：我已经在“五一”节跟着同学们做够了强制游行。当我们集合时，我总是尽量避免担任举旗的角色，把事情安排好，以便于不知不觉地溜走，跟朋友们去多瑙河划船。把旗帜强塞给别人是个虽

然卑鄙但可宽恕的把戏。我承认，1956年的那一天事情有所不同，但即使在那时，我也没有去抓旗帜，而是抓住了我在大学认识的一个聪明女生扭动的双肩。我冷静地坐有轨电车去了游行地点，然后在游行队伍中注意到了她。我们一起跨过了玛格丽特桥。

只有官方节日才允许在街上扛旗帜，同时向党领导敬礼，但昨天被禁止的现在突然得到了允许——只因为我们正在这么做。我没有热切到要去剪掉国旗中间的人民共和国徽章，有相当多的志愿者去做这件事。什么样的人和事都相当多。在一次暴动中，他们骑着摩托车出现在游行路径的边缘，或者推搡着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或者从安着喇叭的汽车上冲人群喊一两句口号，然后热情地放声歌唱。我在文理中学认识几个这样的人，随时可以用强迫的热情煽动人群。

那天晚上，我带着我好奇的同伴经过了匈牙利电台总部，在那里我们听见了枪击声和喊叫声（“犹太杀手！”一个小心地躲进门口的人喊道），之后我回到了家，一边在阳台听着远处的子弹爆裂，一边告诉我妻子我不会参与枪击。但是当时政府还没有橡胶棍和高压水枪这样的折中办法，唯一的选择是实弹或忍耐，事态升级总是很快。所以最后，当一个年轻诗人跑过大学大厅喊着“嘿！谁想要把机枪？”我告诉他我想要，很快我就作为学生组织的国民武装队的一员，把手肘支在了敞篷卡车的舱顶。

和一群二十多岁的作家伙伴一起，我们本可以从三十多岁的老守卫那里夺取我们的文学政治月刊的编辑权。我的主编把职位换成了市长，实行了多党制。我们退出了华沙条约，苏联军队开始从布达佩斯撤离。

然后，突然间，他们重新入境，整整四千辆坦克，先是把炮弹对准他们曾发现机枪火力的地点，然后对着完全没人开枪的地方，只是为了安全起见，或是因为士兵想这么做。全体都罢工了，一个无休止的假期。城市是个大剧院，观众都参与了表演。当你发现自己拿着一

挺机枪或一台担架时，你不会想到未来。你活在一个浓缩版本的现在，考虑不到后果是赏是罚。战士中最勇敢的是刚从监狱里释放、有时仍穿着条纹制服的矿工，以及处于国家监护下的男孩女孩，他们从机构回到了城市。

1956年是我青年时代中记忆最丰富的一年，在那一年，从未见过的勇敢代替了恐惧。皮衣，或带俄国羔皮领的夹克，或有缎带的外套，或旧式轻骑兵制服——你能在市长的前厅看到各种各样的行头。当然，还有当时最流行的罗登呢外套。每个人都想见到我的主编，并得到签字盖章后的、允许他们成立新党派和征收国有资产作为总部的文件。现在武装起来的编辑同事把机枪收在椅子下面，耐心地等着见里面的官员，然后跟他讨论他的文学杂志。当人们带着他们的章离开时，这个学生注意到了跟每种服装风格搭配的言谈方式。但如果没有广场上那些年轻硬汉的勇气，门厅里的绅士们肯定不会有希望。出发去工厂的顾家男人经历了很多才加入街头战士的行列。那段时间，有很多半裸、严重瘀伤或被子弹打穿、被吐满口水的尸体，倒吊在党总部门前。这些私刑的受害者大多来自国家安全局。这就是他们为自己制造的恐怖所付出的代价。但当我看着死人的脸时，那样的原因似乎毫无意义。在回家的路上，我戴着国民武装队臂章，扛着机枪，不止一个女人问我能不能好心干掉某个邻居——你知道，四楼角落公寓里的那个。我没做任何事来满足盛行的谋杀要求。

要说我是个狂热的自由战士，那肯定是过分夸张。我拿着机枪在做什么呢？那是年少冲动，战争的残余。偶尔我会想象一支武装队伍咚咚咚上楼来消灭我们。（门厅前部哪个角落最适合作为我的射击地点呢？）我枪法不错：在短暂的士兵训练中，我赢得了神枪手的称号。我还是政治委员，因为当我们的指挥官问谁知道《资本论》什么时候出版时，我们团的学生士兵要么猜错了要么根本不猜，直到我插话：1867年。终于！他表扬了我，并任命我为其中一支连队的委员。

当时我们没有活弹药，我们扛的“一战”期间流行的带刺刀来福枪只有五发子弹。可能是为了防止我们在必要之外使用武器。这正是两年后发生的事，1956年10月下旬，我所属小队的学生们解除了包姚[注]驻防军官的武装，然后乘军用卡车挺进了布达佩斯。（我无法参与行动，因为我已经被强制开除出了培训军官团体。）这是为了跟上时代精神，那时“革命”一词让人感觉良好。每场革命都得到了最高评价：法国的、俄国的、匈牙利的。我们的1848年自由战争是所有美好的缩影：诗人为了祖国阵亡，只有无根的恶棍才在轮到他时缺乏牺牲的勇气。

一位年轻画家说，自己要是没去尤佩斯特的部队挨上几枪，她会终生蒙羞。我们必须走，来找我们的兴奋使者说，因为人民正在被射击。他们会回击吗？我问。不，他说。他们正在被迫击炮射击，是一路从盖勒特山发射过来的，不能回击。“那为什么要去呢？”“为了和大家在一起。”我能做的只是把年轻画家拉住，因此让她遭受了一生的羞愧。

我错过同学们的军事行动的原因是，在大学的理论训练中，当一名上尉设法描述敌人多恐怖时，我不合时宜地微笑了。

“那边那个！”他怒吼。“对，就是你，长头发的那个！站起来！你们看到了吗，同志们？这就是敌人的样子！看看他，正在嘲笑我们全世界的和平斗争。我命令你离开房间！”

我迅速站起来，离开了教室，唇边仍残留着一抹微笑。少数几个同学表达了他们的团结之情。他们倾向于“严肃”，因此也倾向于把我开除出共产党青年组织。大多数人举手赞成开除。一些人弃权。只有两个反对，但他们也是异见者。

最热切支持开除我的那个人——有才华的苏联奖学金获得者，学生青年联盟的委员，以及曾经的塑造风气权威的大师（他现在是社会

科学教授）——沉痛地证实，我从根本上是和人民敌对的。我后来得知，他的日记展示出了对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嗜血仇恨，尽管在时机到来时他从未参与战役，事实上他甚至从未离开米克洛什·克劳绍为了奖励他的好学头脑而提供给他的小房间。我熟悉他日记的内容是因为，房间的主要住户——米克洛什的祖母，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仍享受着好奇心赋予的长寿财富——稍微研究了一下摊在桌子上的笔记本。她很好奇那个怪男孩会写什么：他不仅没有在那些动荡时期踏出公寓一步，他还光身子穿夹克，因为他从来不洗衬衫。

米克洛什的祖母立刻注意到了“犹太人”一词的频繁出现。虽然生下来是个长老会教徒，但因为她的父母在19世纪皈依了犹太教，她可能对该字母组合尤为敏感，以便更好地在别的地主和医生之间自由搬家。看到她的租户在那个词上附加了诸多污秽之语后，她一得到机会就把他赶了出去。“滚吧，你这个可悲的伪君子！你怎么能如此鄙视我，又住在我的屋檐下呢！”

她仍然用贬义的匈牙利语名字“毛子”（muszkák）称呼俄国人，当她听说托洛茨基[注]的名字跟她的孙子联系起来时——米克洛什在伦敦做了一个关于他的成功演讲——她一直叫他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对她来说有意义，托洛茨基没有。

她的孙子米克洛什虽然上了年纪，但一直很活跃，我只能对他旋风般的能量感到惊奇，他靠着那能量获得了一辆卡车和文件来执行计划。他在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大闹了一场，然后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通过搜集信息、组合看起来可靠的报告以及权衡策略来温和地回应革命需求。内室有守卫，但是米克洛什闯了进去。真是白痴又无能，他喊道。知识分子应该在街上，进行武装起义！然后他详细解释了需要做什么。在忍受了他一会儿后，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问他得到什么才能还他们清静。一辆卡车和司机，米

克洛什回答道，还有一份声明他们支持他联合工人委员的行动建议的文件。

这就够了？他们很高兴用这么少的代价就摆脱了他。

于是米克洛什从一家工厂开到另一家工厂，聚集起工人委员会的使者，当天大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就于尤佩斯特形成了。在成立集会上，米克洛什不拘泥地提到了马克思、海涅、雪莱和厄岱，但在他说完之前，他们就感谢了他的努力，恳求他让他们追求自己的想法。米克洛什一点也不生气。

八年后在巴黎，当我问起那些事时，他带着友善的幽默回忆往昔。离开那些工人后，他试着把哲学家捷尔吉·卢卡奇和支持民主的共产党总理伊姆雷·纳吉撮合在一起，希望两人名字的象征性并列这件事本身能成为一种预言。我相信卢卡奇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然后我提醒了米克洛什，卢卡奇曾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担任文化部部长。1919年当卢卡奇担任此职务时，他命令关闭酒吧，这一举动对于提高政权的声望毫无帮助。该举动让我困惑的另一个原因是，哲学家本人爱喝好酒。

朗姆酒在我的酒精消费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我会在圣斯蒂芬环路的赌场咖啡馆就着双份浓缩咖啡喝它，在那里，一名乳房丰满的男爵夫人做咖啡，一位刚从集中营释放的前社会民主党议员会让你花一福林摸他超长的耳垂，角落的桌子偶尔还会传来一下后跟敲击声（这是君主主义信号，因为一名波兰流亡者提到了奥托·哈布斯堡博士，匈牙利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在一两天的时间里，我充当着心理学家费伦茨·梅瑞的保镖，然后在布达佩斯的公共广场巡逻，拿着机枪随时准备着，并拜访了几个编辑部。我会把我在寄售商店低价买来的又长又重的深蓝色外套挂起

来，然后在第二个钩子上挂枪，好像它是把雨伞。从这双重负担解脱后，我热情地提出了复兴杂志的计划。

我在一家咖啡馆逗留，喝了杯浓咖啡——钢琴前的女人有着绝对完美的、高耸的、染成银灰色的发型，好像这是太平盛世——我看着一群人匆忙经过，一个男人在前面跑，其他人在后面追。他们把男人击倒在某个地窖台阶上。

穿过大学大厅时，我碰到了米克洛什·贝拉迪，我敬爱的老师之一。我们面对面站了一会儿。

“拿着机枪的人道主义者？”他说。

“时局动荡，”我回答，“最好保证安全。”对我们两人来说，我想表达的意思都不清晰。我读过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人必须保护家人和自己。

我回家听收音机，读伊拉斯谟[注]和托尔斯泰。在地平线书店前，我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本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并把它从其他大多已烧成灰的书中移开。

很快街上就堆满了垃圾。街上还充斥着用最强烈的措辞要求苏联军队立刻撤走的海报。只让他们离开匈牙利还不够：他们要请求英雄的匈牙利人民的原谅，他们用近期的侵略和无理的延长逗留无情地侮辱了匈牙利人民，让我们回忆起了1849年俄国人带来的灾难[注]。

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一趟作家联合会，那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你能感受到管理者在准备公众声明时散发出来的重要感。它必须同时坚硬而柔软，洪亮又致命——换句话说，是一件杰作。

从乡下过来的卡车带了一些食物给知识分子的领导们，他们是国家的良心，戴着帽子，善于在听见开火时把身子贴到墙或栅栏上。不

管怎样，一个小包裹滑进了我的包里。餐厅里，作家们正在讨论应该退回多久前：1949，1948，1947，1945，还是更早？德军挺进的那天？存在一个可接受的起始点吗？或者革命爆发当天标志了新时代的黎明。那一天，带着轻率、招摇和对死者的展览。解放与谋杀携手同行。

一个矮胖的家伙欢欣鼓舞地走进来，脸上洋溢着光荣的红光：他成功击中了两名苏联士兵，并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他孩子气的骄傲说明他现在认为自己是男人了：他从学生变成了杀手。

一名记者听说苏联坦克正在撤离。而另一名听说的正相反：铁路工人传来消息说它们正滚动着轮子隆隆驶来。他说老家伙——指伊姆雷·纳吉——只对这消息摆了摆手。

我住的大楼的角落里有个咖啡馆，在那里我听见一个外套上带波斯领圈的人信誓旦旦地跟所有人说，康拉德·阿登纳[注]正在赶来，但是报喜者加了一句“骑着白马”，把好消息变成了弱智童话。附近街区的高级妓女，之前是语言教师并通晓数门语言，因为她每天去的游泳池关门了而愤怒不已。她也用洪亮的声调问咖啡馆里有没有人看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因为她还没想好自己是否喜欢它。

在我打开家门之前，另外两扇门突然打开了，当年的信息检索大师，即演奏会小提琴手和加油站服务员，用他们的问题把我淹没。他们的新友谊辉煌灿烂。上一刻他们会感觉到胜利的畅快感，下一刻就会预言一次挨家挨户的围捕，男人挨打，女人被强奸。现在他们要收集什么呢？跟战时那样收集手表？

11月4日深夜，艺术生——她的名字是埃娃·鲍尔瑙——和我拿着机枪在大学的人文系站岗。偶尔会有一辆坦克沿着瓦茨街隆隆开过。这部分庸常无趣。重要的部分是埃娃的美貌，她引人注目的深沉嗓音，以及最重要的，她所说的话。她读过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

原文，我没有。一种心胸狭窄的嫉妒之情让我对加缪做出讽刺。埃娃在当年12月移民，最终见到了加缪并和他通信。埃娃和加缪之间只隔着旅行费用，和我之间隔着铁幕。

薇拉打了几个电话。她所听说的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她不想看到倒下的、烧伤的或被吊死的人，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她只渴望离开并住在更可靠的人中间：她会去巴黎教英语和俄语，让我们能活下去；她会租一间公寓，把一切安顿好，而我会跟过去。她说我应该变得好相处一点。

11月11日，革命失败后，米克洛什·克劳绍和我表弟帕尔·扎多尔告诉我，他们会在第二天离开，叫我跟他们一起走。他们保证我能通行。他们给我看了，文件上有我的名字。他们的故事是，我们要去劝其他人回家。

我拒绝了。我说，事情不可能比之前更糟了。我会坚持的。我会活得比领导者久。我不想卷入这场大外流中，我想要了解这里、这些街道上发生着什么。这是个未完的故事，我拒绝从中脱身。

在诸多《圣经》英雄中，我觉得耶利米[注]尤为吸引人：他提前知晓即将发生之事——他预言了犹大国的陷落——而他对胜利者做出的全部请求只是允许他在废墟中哀悼他的城市和人民。

我不想找聪明办法逃出去。我想要一个正常的简单生活：同样的楼梯、同样的咖啡馆、跟从前相同的事物。就算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离开，仍有几百万人留了下来，就算离开的人当中有我的朋友和爱人，仍会有别的朋友和爱人出现。我的书在这里，天空、俯瞰多瑙河的阳台与河对岸的布达区山丘也在这里。

如果我走了，我会去哪里呢？人们朝着不同方向离散，但这仍是我能找到最多说匈牙利语的人的地方；我能最为轻松地生活，适应街

道、语言和习俗。

然而我支持他们的离去，因为我怀疑，跟我相比，他们留下来会遇到更大的危险。他们不太能继续在这里生活，因为他们比我更活跃、更坦率直言、更有活力、更有激情、更重要。我只不过是个乱出主意的人，一个武装的旁观者。此外，我的父母在这里，如果没有穿制服的人强迫我们分离，现在仅仅为了把我的生活变好，我就该让我们分离吗？我没察觉到这里潜伏着任何危险。他们把我关起来又能怎么样呢。我从进过监狱的人那里听说了很多监狱故事：在那里你也能生活。在狱中我还是我自己。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那把父母带上如何？然后靠慈善生活？靠奖学金重新开始我的学生生涯？我没必要在教室里日渐消瘦。每天早晨，我能坐在笔记本前，坐在随便哪张桌子上，因为我还有足够的钱在布达佩斯为数众多的咖啡屋里买一杯浓缩咖啡。我总能找到工作来支付绝对的必需品：我可以翻译，我可以编辑。我不想变得有钱。我曾经有钱过。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环顾四周，我只能看到战略家。他们如何处理问题和障碍？他们采取的范式是在强迫状态下产生的，虽然可笑，却让我着迷。毕竟，每种社会类型都是由一系列陈词滥调组成的。漫画需要反复发生的元素。这里的生活充满了直接源于概要思维的挑衅和苦难。心灵扭伤从未远离我们的大门。

我感兴趣的是，想法成为现实，并非来自习惯或严肃的实用性或传统，而是来自任性头脑的发挥，来自大胆的梦想，来自追求真相然后宣布它——高尚如何变为卑劣，理想如何成为地狱，以及最终，我们将如何从中幸存，因为我们这些有着劳动、怀疑和思考能力的寻常百姓比它更强大。

如果伊什特万留下来，他可能被判死刑。再说了，我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朋友呢？每个离开的人都是对的，每个留下来的人同样如此。每个人都试着注意命运的提示。我给自己的建议是：只要不处于致命威胁中，就挺直腰板。继续前行，但不要太匆忙。你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冲动决定。继续安静、踏实、不起眼、持续地工作。

他们搜查了米克洛什·克劳绍的公寓，抓了久里、塔马什·利普塔克和翁布鲁什·奥特凡尼。但没有抓我，因为我一如往常地迟到了。我们原定十点见面，我十二点才到。久里的母亲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找到油印机——我们早就把它藏好了。他们放了翁布鲁什和塔马什，但后来又把塔马什抓了回去。

我没被逮捕一事纯属运气，意味着他们没找到那张包含领取机枪者签名的名单。此外，我从来不算特别活跃，也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我观察时事，但不发表言论，不属于呼吁改革的青年组织精英（我早就被开除了），甚至不用他们的语言或风格。幸运的是，我毫不起眼。

所以我的门房终究没有举报我，虽然他曾看我拿着机枪来来去去，并且从未显露出同情的迹象。跟我的共谋者（准确地说是望风人）薇拉一起，我把枪埋在了当时仍空着的潘诺尼亚街地块的角落里。两三年后，一幢巨大的公寓楼从那里拔地而起，天知道我精心包裹并上油的武器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在跟一位古典语言学家在环路上散步时，我遇到了我的哲学教授。他参与了新的亲苏巡逻队，扛着机枪，穿着要求的灰色外套。他阅读极为广泛，能够调和他对克尔凯郭尔的学术兴趣以及他作为党的士兵的责任，后者也包含了重新教育我的努力。他要我把身上所有的资产阶级痕迹消除，把它们像旧衣服一样抛弃，离开我的老朋友，娶一个工人阶级血统的妻子，一名党员。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他严厉且体型结实的妻子在理论批评上毫不留情。当一切顺利时，他

妻子称他为同志，而一旦两人之间出现了任何意识形态问题，她就会叫他先生。（在公众领域也有类似的行为：在工作场所，我们可以是同志，但是在警察调查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先生。）我只点了点头，从他的制服观察他的知识之旅进行了多远，而他也仅仅沉默点头作为回应：他不愿交朋友或惹麻烦，我对此无所谓。武器就是雄辩的服装配饰。

苏联坦克第二次到来后——这次比起义前夕那次更多也更凶残——即11月4日后，一千万匈牙利人中的二十万离开了祖国，大多数是年轻人，包括我的一半同学、大部分朋友和爱人，以及我的表姐弟和姐姐。

“五六”年一代？在一阵短暂的勇敢过后，他们面临着选择：离开或留下。那些能离开的都离开了，逃离之前的事态或者未来的报复。他们在冰雪里艰难跋涉，穿过零星布置着守卫的边境。就在圣诞节前，薇拉也跟我姐姐一起出发了。她们走到了边境，穿过了一场半夜的雪暴，在黑暗中沿着有奥地利标志的路跋涉。接着她们再次看到了匈牙利标志：她们可能绕着同一座山丘走了两次。我姐姐第二天早上再试了一次，成功通过。

薇拉在圣诞节当晚回来，因为我没有买圣诞树而生气。我们出去设法找到了一棵小圣诞树和一些装饰品。有礼物、临时烹制的晚餐、烛光和家庭欢乐。

我没有在1956年离开。每次机会现身，我都坐在桌前写作。每当需要做出特别重要的决定时，我都会停顿下来，让事情按照原计划发生。更有活力的人离开了；剩下的人坚持到底，在磨炼中成形。当我从远处想起他们时，我喜欢他们；当我遇见他们时，我尽可能溜走。

尽管我留了下来，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那个现实和噩梦的黑暗钟罩，那个直面焦虑的空间，会很快再次扣到我身上。这时候应该学习

与忧虑同居，同时又确保它不喧宾夺主。1956年后，人们不再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想法。“五六”年精神转身面壁，并拉过毯子盖住耳朵。大多数记忆消亡了，保持它们鲜活毫无益处。

我姐姐房间里的家具曾经是我父母的卧室布置。一名木匠在世纪初复制了玛丽娅·特蕾西亚[注]的卧室，有天使的脸从床顶和衣柜上凝视我。两个裸体天使举着一面镜子，它曾经立在有着许多抽屉的梳妆台上，有的抽屉锁着，有的没锁，上锁与否根据里面装的东西而定。在我小时候，锁起来的是糖果、避孕套和一把手枪，而其他无聊的东西，比如照片、几缕头发和乳牙，则没锁。

这个卧室布置挺过了最极端的世事变迁。1944年，在德国和苏联的指挥所离开这幢房子后，镇里的穷人进来拿走了他们搬得动的一切。这个三门大衣柜是他们搬不走的东西之一；他们甚至没打碎镜子，尽管他们用尽全力破坏了其他各类物品。所以这个衣柜是唯一完整留下来的家具，它是这个充满垃圾的房屋里代表品质的纪念碑，一个可恢复的秩序的预兆。

到1960年，这个衣柜搬到了我们在瓦尔梅捷街六楼公寓的内室里，顶端放着我的自行车。梳妆台成了我的书桌，虽然举着镜子的天使被历史抛弃了，而此刻的历史更像是一场集体灾难。你收到当头一击后，会消沉一阵子，然后为了恢复原状而开始漫长的奋斗。我们应该是比赛选手，而不是受害者（至少，在常坐的咖啡桌前，我是这么跟朋友们说的）。

1960年某天清晨，一个醉汉在我的窗户下大声咳嗽。我很同情他：我们是仅有的起床者。某种沉默围绕着我们，它放大了呼噜声、愤怒的窃窃私语、远处火车的尖叫和从围栏里开出的有轨电车的呻吟。布达佩斯里刺激泛滥，但是我只能接受一小部分。黎明前的几小时，我们不需要与让人分心的声音、呼唤和义务的侵袭抗争，它们要

人时刻关注，把我们变得迟钝以至于冷漠。也许我终究不是个城里人。

当我作为儿童福利督导外出做实地评估时，我的工作要求我像进入自己家一样进入完全陌生的人的住处。几分钟后我发现，我确实在自己家。

“是委员会的人！”

一把厨房椅被推到我身后。

“先生，你看，事情是这样的……”

话语像水一样汩汩涌出。我希望自己不要睡着。

莱索·拉伊奈裹着外套睡在地窖里。他只睡到黎明，那时候他的酒醒了。寒冷把他唤醒。

一名警官想要作威作福。我说不定能杀杀他的威风。我带着秘密的热情做这种事。

一名耶和华见证人[注]一辈子都在猜忌他的妻子。她本可以让他永久收监，但总是冒险将他释放，保护他不受到压力。她把他带回家，他变本加厉地折磨她。

一名产科医生最好的朋友的妻子在生产，而这个朋友，一名瘸子，在走廊里等着好消息。医生的手伸进了婴儿的眼睛而非直肠，把孩子弄瞎了。一个外科失误。他回到家，然后服毒自杀。

我得了严重的风寒。我的骨头发疼。我在锦鸡饭店喝了鱼汤当午饭，这让我把“上议院”——一个破烂的流浪收容所，我在那处理的都

是难对付的家伙——抛出脑海。然而，每当我说出严厉之语，我还是能立刻从充满威胁的外表下清晰分辨出敏感的心跳声。

一个女人的丈夫死了：他站在人行道上，一辆公交车撞过来，当场要了他的命。女人得到了一笔丰厚的抚恤金来取代她富裕的丈夫。一年半后，已故丈夫最好的朋友离开他的妻子，搬进了寡妇的家。他们结婚了。作为结果，寡妇失去了她比工资还高的抚恤金。她有一个跟第一任丈夫生的幼儿园年纪的儿子，但很少有时间陪他。我问她为什么结婚。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不是吗？女人微笑，并脸红了。我也脸红了，然后道了别。

一名卖报纸的老妇人走进了主分销中心，来要她的配额。那段时间，人们都在读《人民意志报》，但他们把《人民自由报》塞给了她。她走出去，几乎卖光了全部。三个武装的年轻人，正悄悄地沿着拉科齐街走，突然瞥见她拿着一份《人民自由报》，就把报纸从她手中夺走，扑上去，对着倒在地上的她拳打脚踢。当老妇人爬走时，其中一个人说道："为什么不结果了她。"

"为什么？"另外一个人说道，"她不敢再叫卖那种垃圾了。"

老妇人的头骨破裂了。她瞎了一只眼，并从此得了神经炎。

接下来还有六个地址、六种新的绝望。但我先在拜特伦广场的长椅上坐下并祈祷。附近有一个犹太教堂。

现在启程去这个街区最黑暗的中心。阿尔巴多什夫人和她的女儿。她想要女孩尊重她。女孩不愿意。因此她残忍地对待她。

然后我宽恕了一名乱伦的鳏夫。她的女儿也原谅了他。如果我把他关起来，谁来养活他们呢？

我顺便看望了小拉约什卡·穆斯塔法。他已故的父亲是土耳其人。他母亲再嫁了。她的丈夫是一个叫博吉的锁匠。这个漂亮的小男孩为他的土耳其出身自豪，并且哀悼他的父亲。然而，当他们在学校里学到土耳其人时，拉约什卡听说了关于他们的坏话。他的同学开始盯着他看，所以他要求跟博吉姓。从此以后拉约什卡·穆斯塔法（或者说博吉）就停止哀悼他的父亲了。

一个年轻的打字员去老布达做划船练习。那是冬天。训练场空荡荡的，只有场地和花园。四个孩子袭击了她。尖叫。四个人都强奸了她。

“我知道你们长什么样！我会告发你们的！”

所以男孩们挖掉了她的双眼。

一位老人坐到长椅上，离我很近。他的脸柔软但充满胡茬，没几颗牙了，就算在太阳底下也穿着冬天的外套，身上很臭。一位长着尖鼻子的老妇人坐下来，加入了我们。她的言语和动作生动活泼，她长筒袜下的双腿裹着绷带。

女人：“中午吃什么？”

男人：“茶和猪油面包。”

女人：“你不做饭吗？”

男人：“不做。”

女人：“孩子呢？”

男人：“我曾有个儿子。他被处决了。”

女人：“所以你一个人生活了？”

男人：“跟我的臭虫一起。”

女人：“但是你肯定有笔不错的抚恤金吧。”

男人：“六百福林。我很快就拿它喝酒花完了。然后我就不吃饭，就吃点他们给我的剩饭。”

女人：“你住在哪里？”

男人：“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两个房间加厨房。”

女人：“为什么不租一间出去呢？”

男人：“我租了，但是我的房客发疯了。他停止交房租了。”

女人：“你应该结婚。”

男人：“是的，但我找不到一个我喜欢的女人。如果她年轻，她可能不会照顾我，如果她年老，我又得照顾她。我太挑了。”

我停下来喝了一杯牛奶。一个哮喘的老人少付了二十菲勒。他拄着两根拐杖走路。当柜台的女人在他身后追喊时，他假装没听见。每天他都少付二十菲勒。

一个女人被叫到警察局，接受关于一个他们逮捕的人的盘问。他不久前抛弃了她。她要么是害怕，要么是无法撒谎，因此做了对他不利的证明。她是主要的证罪目击证人。

一名电工最近失去了他的妻子。每天晚上他都为她摆出一套餐具，然后独自吃饭。他无法忍受电视。他走到衣柜前，一件件地拿出妻子的衣服。“她在这样的日子里穿这件，在另外的日子里穿那件。”这就是他度过夜晚的方法。

福利委员会官员因为工作而变得感觉迟钝。办公室的疯狂和他妻子的神经质逼得他无路可逃。无法入眠，过度工作，他学会了对事物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操场上的沉重铁椅子用螺丝固定在了地上。1945年1月，我透过破玻璃窗窥视角落的咖啡屋。那里塞满了在犹太区被打死的犹太人，尸体一直堆到天花板。就在那一天，我们去看望了犹太区医院里若菲婶婶的母亲，发现她还活着，但是脸上有一颗子弹。现在的新墙纸印着向日葵图案。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跟所有来者打招呼，带着歉意叹息菜单上缺东少西，好像在传达亲人的死讯。

旧公寓楼的庭院里开起了小商店，人们纷纷藏身于此。在伊丽莎白塔这里，一切都像洞穴。这个地方毫无虚伪矫饰，充满了生命，且人性化。我对这里毫不陌生，理解最遥远角落里低声说出的话语。我熟悉陶罐下包着干花的针织布、咯咯叫的女人们突然爆发的大笑、铁门的沉重当啷声。那个高个子且吸引人的女孩正在读杂志，她身上长及大腿中部的白毛衣很可能是自己织的。舒服的老人从深渊里冒出来，浓缩咖啡机咔嗒作响，勺子和碟子发出叮当声。做咖啡的人从来不休息。客人们认识他，并跟他寒暄。“把花吃了，该死！”“谁吃了花？”

在我的文理中学时代，布达佩斯的伊丽莎白塔代表了事物的中心，它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能在那里找到任何盼望的东西。那里的人口密度最高，因为他们曾习惯性地开着大门，我能捕捉到从敞开的厨房窗户飘到院子里的人味。我会沿着围绕庭院的走廊般的阳台散步，仿佛在找人。

我曾经跟哈尔斯法路上的盲人古籍收藏家店主按重量换书。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我带来的书比拿走的书重。

“你怎么没破产呢？”我问他。

“你还嫩着呢，年轻人。”他说，“你缺乏对于人性愚蠢和随机过程深刻的理解。你认为每个人都会带垃圾过来，并拿走好东西，但是相反的事情也以同样的频率发生。此外，什么算垃圾也是一个非常相对的问题。”

在往返学校的路上，我做了一些城市社会学的实地研究，如果我们接受我的朋友伊万·塞勒尼的定义的话。数年后，在一次去佩奇[注]做城市社会研究的旅行中，我们花了三天随意走动，我愧疚地提出我们在浪费时间，他回答说，不对，我们在做真正的实地调查。这平息了我的担忧。但是我唯一做严格意义的实地调查的时间是1959年到1965年，当时我作为公共监护人委员会的青年福利督查探访伊丽莎白塔的家庭，并撰写关于他们生存情况的报告。

我能做的只是写下我的印象，但那些印象的强烈一致性赋予了它们客观性，我做出的推荐会决定应采取的措施，进而影响孩子们的生活。我负责的是环路和哲尔吉·多饶路之间的区域，每天见六到八个家庭。几乎没有一栋楼是我没去过至少好几次的。大多数时间我待在面对内院而非街道的公寓里，因此它是这个我逐渐了解的区域里不幸的一面。有时候事情似乎没法变得更糟了。

过去四十年里发生了什么改变？贫穷仍在继续，只有脸在变。但是贫穷不只是一个状态，是一阵狂风，一个灾难，一个你掉进去的坑。你怎么能期待一个极度贫穷的人有着圣人般的耐心呢？当富人越轨，他们可能不会付出代价；穷人没有选择；他们踢打，他们抓挠，他们彼此折磨。

评论家认为我的第一部小说《社工》令人毛骨悚然。我认为这很正常：不完美使人平凡，从而真实。道德哲学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弱点，以及我们对它的接受之上。举止怪异的话会吓到别人。他们把你当作应该关在监狱或精神病院里的罪犯或疯子，好像人类是汽车，能

送到店里维修。疯狂的人存在，但是大部分在外面勉强过活，只有其中一些放弃了，把自己托付到精神病院里。脆弱和抛弃需要帮助。

一个国家越有钱、教育越发达，就越容易遭遇脆弱的问题，这种状态滋养了与身心、疾病、恐惧、悲伤以及死亡暗示间害怕、依赖且幼稚的关系。人们害怕死亡的预兆，没有受到任何处理问题和痛苦的训练。如果某物不完全处于应有的状态，那它就是错误的。可是，完美状态和糟糕状态之间的区域，正是生活的用武之地。

我的工作日里充满了决定，我遇见的每个人都是挑战。我的每个客户都要求某种行动。有些人需要的不只是一个热心的点头。但是当你要对一个完全无助的孩子负责时，你愿意做到什么程度?

在那些一室或者两室公寓的厨房里花时间是值得的：每个厨房都有独特的有趣之处。只有在你听到同一个故事的一百个版本后，你才开始理解并感受它。我每天都希望自己能克服巨大的肤浅感，就算我通过承认其存在来奉承它，我还是觉得徒劳无功。“他们全都跟我一样。”每天晚上下班后，我都在明亮的有轨电车里对自己这么说。

作为乡巴佬呆呆地看着城市生活，我从未厌倦。我研究大都会，想要写出一切，通过文字品尝一切。提出我的问题，让好奇心自由行动，我感到一种可传染的幸福。布达佩斯是一份永远劲爆的小报。就算花二十年，外省来的偷窥癖还是怎么也看不够。

当时我还在编辑托尔斯泰的日记。托尔斯泰用一个誓言开始每个早晨，然后用内疚的良心结束每个晚上；他打破了每个誓言：他喝酒、嫖妓、吵架、打牌和挑起争斗。我既不吵架也不打牌。

一天我早起，读了一些托尔斯泰的校样，然后去马扎尔·海利肯出版社，我在那里编辑俄国和法国经典作品的匈牙利语译文。文学主编叫我进去。他想显得精神昂扬，但是讲述的故事并不令人高兴。

F想要跟党指派给他的工人阶级女孩结婚，但是他的“资产阶级”女友告诉他自己怀孕了。那段时期流产是不可能的。社会学家的道德观支持那个女孩；他容易犯错的本性支持他的女友，一名阶级敌人。孩子会出生，但是他不能因为一名意识形态上和其他方面都有问题的女人而离开他的准新娘。跟诗人阿蒂拉·约瑟夫一样，F躺在了火车头前的铁轨上。火车轧掉了他的双腿。到场的警察证实，他的好裤子还有抢救价值。

他的未婚妻每天都来医院探望他，F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找到我的党员证了吗？”两星期后，他的资产阶级女友过来，坦白她没有怀孕；她只想他娶自己。1956年，矿工得到消息说，一名党里的权贵住在四楼。F不是党里的权贵，但他碰巧住在党地区办公室隔壁。矿工们闯进他的公寓想要把他带走，然后注意到了他的假肢。他们一起敲它，享受制造出来的噪声。

他是我在出版社的上司。我的同事，校对员塔马什·考托瑙和我会用交缠的手把他抱到电梯里。虽然有点心怀怨恨，遇到意识形态问题时，他总是非常警惕。然而，我利用他的多愁善感，设法骗了他：我出版了伊萨克·巴别尔[注]和布鲁诺·舒尔茨[注]。

我会带着猎人的警惕饥渴看女人。在那段日子里，我觉得没有比脱光了躺在同一张床上更简单的了解别人的方法了。交谈最好在事后，其中弥漫着相互感激和坦诚。卖面包的女孩和理发师，在大学念书的女生和在大学教书的女同事，住在对面的女高音，儿科护士——她们对我来说都极其有趣，且有趣之处各不相同，有着奇迹般的独特性。

我会去火车站，选一趟车，然后在一个小站下车，在宾馆里开一个房间，往主广场望去。狭窄范围内波动着的，缓慢经过的，都是众多的卖肉者，隐藏着，然后突然闯入公众视线。当一个有着漂亮身体

的女人经过时，我转过身，停顿了一会儿，抛弃了原来的目标，开始追逐她。我们彼此缠绕，然后松开。同婴儿咿呀说话的家庭主妇就是一眼泉水，跟阁楼里发现的旧日记或者离婚法庭上的深仇大恨一样珍贵。

我给一个把自己的号码通过共同朋友塞进我口袋的女人打了电话。我取消了所有计划，去了她给我的地址，在上楼梯的过程中试图猜测她会穿着什么：内衣还是武器，她怎么做到独处的，从近处闻她会是什么气味？我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听她说各种各样的事。我还没听到一个完全无聊的故事。什么样的情景能让我快速拥抱她且完全不会遭遇反抗呢？什么样的触摸能让她颤抖并像孩子般哭泣呢？之后会发生什么？她会给我回电话或者在不可能的时刻意外出现吗？

十六岁时，我们处境尴尬，因为身体已发育完全，但认识仍旧童稚。二十七岁时，我们局促不安，因为思想已经成熟，但血液仍旧童稚。

我有一份工作，但它很无聊。我应该在监护人委员会信奉儒家，在家信奉道家。我因为这个想法而发笑。谁能做到这点呢？我和出版社签了合同，要写一本关于司汤达的书，但没有动笔。我有一位恋人，但是神经质地反感再婚的想法。我有朋友，但是在他们开口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事实上，有时候我害怕知道自己后天会想什么。我已经到了这一地步：连续好几年的生日都只提醒了我，在革命之后愚蠢的五年里我有多少事未能完成。

在我们常坐的咖啡桌前，我做出了一些反决定论的言论，无法接受这个论点：我现在的样子是别人对我施加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我坚称身体里有人不停做出复杂的决定，但是我不十分了解那是谁。我的决定没有受到我父亲的财富或者童年性幻想的影响，我坚定地反对时髦的当代观点，以及我认为无趣且道德上存疑的颠倒的决定论。这是个责任感被抛弃的国度，人们为自己的所有行为辩护，不论好坏。

在图书馆的目录室里，一个教过我的教授提到，他从不同学生那里听到了一模一样的反政府理论，一问，发现他们都在最近跟我谈过话。我那位跟最高阶层直接接触的老师摇了摇头说，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应该仔细考虑自己说了什么，以及对谁说过。

革命失败后，在“统一的60年代”里，我所见之处皆遭遇了暴政的敏感。警察队长和门房是国家的守护神。他们实打实地被授予了以国家之名对公民施以高尚的愤怒和复仇的权力。不要以为那些看起来聪明、善良且有教养的人在获得机会以国家之名发怒时不会疯狂。他们最鄙夷就是那个揭露了他们每天的背叛行为的虚无的人，因为那个人否认了他们的存在理由。叛徒最大的天敌不是非叛徒的话，又能是谁呢?

我有一个同学，他妈妈碰巧看到他站在房间的椅子上发表演讲。他向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一个个地谴责他的朋友。他说啊说啊，声音越来越高，直到他晕倒，从椅子上摔下来才停止。

在冗长废话的汪洋里偶遇坚实岛屿，总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在审查盛行之年阅读有实质内容的作品是一种避难，是对那些挤进家中的谎言的暂停。包里有一本好书，是对我不得不忍受的陈词滥调的补偿。我们可以用文学苛责人们，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学会了阅读，就能用它来原谅他们，并为他们的美丽而着迷。自从文理中学时期起，我就相信，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文本的持续讨论维系着人类的进步。

从春天到秋天，我一直在寻找花园里的座位。那种桌子上装饰着红格子布的户外餐厅还存在，而我认为能在菲扎克俱乐部的花园里跟比我年长的作家共进午餐是优秀的标志，奖励是同他们较量头脑的机会，并因此确认我有权坐在桌前。同伴中总有一个人刚从国外回来——自然是巴黎——并且跟外省人谈起它，对他们来说巴黎就跟月亮

一样远。但是就像我们不想登月一样，我们也不需要巴黎。我们改善了断定自己不需要哪些人和物的艺术。

你仍能用足球在街上踢足网球。小女孩们仍会用粉笔画出跳房子的格子。你仍能找到长满青苔的废墟和角落与恋人幽会。仍存在隐匿处，在那里诗人和他的情人能藏身依诗行而建的房间。

这座城市的潜在优雅超越了所有障碍。你仍能找到19世纪作坊里的白发表匠和国有布店里衣着优雅的犹太售货员。在仍有战前钢琴家演奏的餐厅里，仍是带着战前礼仪的服务员为你服务。

在我附近的街区里，唯一负担得起汽车——一辆斯柯达——的是那个俏丽的服装设计师，也许还有一两位作家或电影导演。这座城市仍属于步行者，我充分利用了这个事实。至今我还没学会开车。

我们了解彼此的爱情习惯：我们的生活不过是摊开的书本。我们被关在同一个舞台，而爱情就是我们的民族志。我们追求它，然后尽全力逃避其后果，好让我们能再次展开追求。没有穿白靴子的女孩倚在她们的车上。工作乐趣和私人乐趣还不是界限分明的领域。如果某人正在为，比如说，配偶的不忠（或者就不忠的情况来说，则是对方的忠诚）而苦恼，他们内心痛苦的编年史就会遇到同情而非轻蔑。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信赖的朋友以倾诉心事，所有的秘密都有着成为公共知识的趋势。

在市中心和山坡避暑别墅的女人，每个街区里的、面对院子的一楼小房间里的女人，在夜里遇到的、在咖啡馆遇到的盯着你反复打量的女人，从楼上的楼梯拐弯处低头看你的、进入商店并惊喜地注意到这位尚未知名的骑士的忠诚的女人。跳上有轨电车的女孩，我们跟随其后跳上车的女孩，以及最终饱含意外热情的拥抱，好像我们在彼此体内引发了爆炸。

她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可能比我好也可能比我坏。她们很好奇，我也如此。勇敢的人坐电梯上楼；胆小的蹑手蹑脚走到六楼，在按响门铃前犹豫不决。大腿交缠卷曲，指甲紧抓床，乳房左右摇晃，阴唇开了又合，湿了又干。要是你没把她赶出门外，要是你愿意在附近逛逛、出去喝一杯、看看飘落的雪、研究掌纹、听一个家庭传奇，那么你是个好人。她们是心理学家和发型师、教师和挂毯制造商、律师和医疗助理、歌剧演员和簿记员、陶瓷艺术家和银行柜员。关于众多女人，我喜欢的是她们的两面性：没有隐藏日程的女人就像没有香味的铃兰。那名女同志清楚地表明，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你意见相左，但是在性事上与你意见一致。靠在栏杆上、门框上、带镜子的衣柜上，在地上、在浴缸里、在餐具室，在最不寻常的地点。跨过障碍，报复禁令，最终带着少年般的喜悦来到新床上躺在新的身体边。

床是暖的，暖气是冷的。我能用左手摸到白色洛可可天使的鼻子。我拍了它一下。一切都好。我发展出了一种不太适合已婚男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一个正在离婚的男人来说是容许的。我晚上很早睡觉，在凌晨三点起床。然后我爬进浴缸，盘着腿躺下，让冷水冲刷胸膛。鹅毛被子召唤我回到它在没有暖气的房间的怀抱中。我考虑着是否要喝一杯芳香葡萄酒来开启神圣的一天。（我姐姐埃娃从美国给我寄了一箱芳香葡萄酒。）我的生日快到了，一个非整数但重要的数字：二十七。这是公元1960年。

我起得比学校的学生还早，比工厂的工人还早。我走到仍暗着的城市，向着皮帕奇酒吧走去。他们让我进去，他们营业到五点。客人都在往家赶了，仅有的女孩是出租车带回来的那些。我坐在自动唱机边，全神贯注地看萨缪尔·贝克特[注]的作品，被沾满灰尘的帘子、擦得锃亮的皮鞋、咖啡、香烟、啤酒、发胶以及城市的体臭——每两个公寓才有一间厕所——的混合气味所包围。

“在寻找堕落感吗？”钢琴师说到，他的双手在键盘上跳跃。我在寻找堕落感吗？不如说是一种沉沦状态，皱纹上的妆花掉的时刻，领带后面的领圈崩开的时刻，腰带松开一两个孔的时刻。芬兰大使的儿子开始摔玻璃杯，但是吉西过来扫干净了碎片。“你继续吧。”她说。她每次清扫都能得到不错的小费。

走向多瑙河岸，走向佩斯区被炸毁的伊丽莎白桥墩！小摩托船还没开始运转，但是我需要每天早晨在沿着河岸分布的台阶上观察河水。并不算长，因为我们从这里出发，到塔什锁[注]的平静死水为止，那里的河水表面闪着黑光，在绝对寂静中柔和晃动。一名工厂被国家征收的工厂主通过每天早上在那里钓鲟鱼并把捕获物卖给好餐厅而挺过了困难的拉科西时期。

初夏的一个早晨，我离开皮帕奇酒吧前，对裴多菲[注]雕像说了几句话：“欧洲安静了下来，裴多菲先生，再次安静了下来。我们紧紧闭着嘴巴，就像1848年之后、你的革命之后那样，至少没人被开枪射进多瑙河。但是你知道，裴多菲先生，两年前他们绞死了我们的首相，伊姆雷·纳吉。消息宣布的时候，我们痛苦极了，说不出话来。”

翁布鲁什·奥特凡尼，那天晚上的主人，用一连串的镰刀收割动作——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给我们做了好茶。触及天花板的书架里堆着比我们都高的19世纪思想文化史。我们被从窗户看出去的美景征服了，但是翁布鲁什浇灭了我们的热情。“是的，它确实很美，但美也是时间的窃贼。”

翁布鲁什的父亲，伊姆雷，是一名了不起的艺术收藏家和资助人、前银行家、退休的财政部部长、公民社会的虔诚信徒和作曲家传记的翻译。共产主义最糟糕的年代里，他整天穿着丝质睡袍躺在床上，被茶壶和烟灰缸包围，角落的窗户用深红天鹅绒窗帘遮了起来。

当他的儿子推测目前的政权可能变得自由一点时，伊姆雷会安静地听他说话，好像他是个疯子。

1961年，我开始在海利肯担任半职，准备一个十卷本、透明薄纸印刷、皮革和帆布装订版的列夫·托尔斯泰作品集。我的日子在托尔斯泰的笼罩下过去。我坐在多瑙河畔读《忏悔录》，挨着伊丽莎白桥的废墟。

这部作品在清晰远见上无可比拟（尤其是前半部分），但是在面对宇宙时缺乏个人的谦逊。它是对所有消极的、存在主义的、否定生命的哲学的一个诚实热情的摘要。一旦思想从机械的生存意志、日常任务和责任感的肤浅中解脱出来，并用其在时间中的存在拒绝其身份，换句话说，一旦它开始质问生命本身，并仔细端详了死亡（之前它对死亡缺乏想象和了解的自由），它就突然感到，可悲的是，必死的存在毫无意义、令人厌恶和感觉羞辱，以及追求能让个体存在融入并获得安宁的目标或使命或任何高尚之物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只有在处理自然时才有效，而自然没有思想；它一应对人类元素就失去了其有效性。我们没有追求自我毁灭之外的目标和未来。思想与生命无法共处。一致且符合逻辑的想法通往自杀。

唯一阻止自杀的办法，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是发展出回避这个问题的行为模式。普通人被平凡的斗争束缚着，过于迟钝，无法将生命致力于看清事物的本质。被死亡背后偷袭的人可以排除在方程外。一种纯粹的类型是享乐主义者，他们纵情于强烈的享乐中，除了吃、喝、做爱以外什么都不做；另一种是伤疤收集者，他们贬低生命而非对抗死亡，带着无止境的抱怨半疯狂地期待死亡。

那么是什么在维系生命？托尔斯泰问。是什么让人度过绝望？是什么让受苦有价值？是什么安慰了人们的灵魂？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的什么超越了个体？

信仰，托尔斯泰回答。他起初选定了宗教信仰，然后寻找个性。信仰和智慧并不相关。人不能用两者之一去证实或支持另一个。在智慧完成其使命后，信仰在我们无助的边界行使权利。（信仰，而非上帝，后者是信仰的结果，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功能之一。）无限的概念并不起源于有限的圆圈。信仰带我们超越了有限的限制，在面对无限时达到谦卑的状态，这种谦卑通过消解我们的自我，从而让我们解脱。

在这里，他的思想让位给了一种使徒式的讲话，我没有跟上它僵硬的说教倾向、对农民和穷人的理想化、对地主罪恶的描述以及对文明的浪漫排斥。

我自己跟穷人——体力劳动者，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无法证实托尔斯泰的言论。据我所知，我们都必须经过思考者的发展阶段。我能做证，布达佩斯的芝加哥，伊丽莎白塔，发展出了一种粗糙的酒吧间存在主义变种，其中的居民和我们这些相对来说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一样，生活都受到相同的无解问题及相同的孤独和恐慌的影响。

我倾向于认为自己绝不会咒骂生活，就算得了严重疾病也不会。这是我四十年前在基什波什塔咖啡馆写下的。我珍视生活中所有幸运和不幸的本质。我不想与世界决裂或联合。目前，我希望世界和我继续相互凝视。

关于未来我所能设想的只有这点：地球上的人类生命最终会消失。这种可能性没有给我提供任何道德选择。我总是惊讶于宗教的来世概念和共产主义启发的（更准确地说是发明的）乌托邦能有多愚蠢。

尘世的和天国的乌托邦都以摒弃此时此地的世界为前提。对于未来的任何欣喜之情都使得对当下的中伤成为必要。不管我当下的生存

状况如何，我不想要一种激进且从根本上不同的生活，因为我不相信这样的事物有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我认为对理论上美好的替代国家的承诺就跟常见的谎言一样令人厌恶。

我们能够做到生活在有限的当下，在做得到时欢喜雀跃，在痛苦时承受折磨，将死亡的前景置于眼前，又抵制下一次、另一边的恐惧吗？

人类是旅客，在去往某地的路上。一旦到达，他们就不再是旅客了。身处途中诸多痛苦，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到达目的地会有多美好，就像一个精疲力尽的人想要睡着以忘记一切。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感觉也不错。

人活着要面对三个问题：日常生活的烦恼、对世界的不确定了解以及对死亡的确定了解。信徒说，上帝，唯一的真理，会补偿这一切。就算是非信徒也会希望有一个友好的讣告，或者在罕见的情况下，在他住过的房子里立一个排位。但有些人不要求补偿：他们接受这些问题，对于他们了解宇宙的最终不确定性泰然自若。一个人都无法说出关于自己最亲近的人的确定言论，又怎么能对宇宙有着确定的了解呢？

在世界的这个地方，人们大吃大喝，买货架上的丑陋服装，并不停地看电视。他们不处决反对派，因为不再有反对派了。没有快乐和不快乐的人；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都没有。我们的社会有时候单调，有时候狂乱。有过一致性，它也就能接受任何混乱。它是黏糊糊的一堆，不能认真对待事情，也不知道在哪里划定界限。

如果你在这里寻找一个精致崇高的灵魂，那么你注定要失望。但是如果你觉得绝对必须拥有一件真正的当地物品，那么试试这个：在开始前就被抛弃的无形战斗。你在这里能找到的只有乱七八糟的生存副产品。每个人都是一只蜗牛，一条毛毛虫，一条蠕虫。我们肉体上

强壮，精神上虚弱。人们死于心脏的脂肪变性。没有屠宰场，全都是你自作自受。早衰使你丧命。

我尽量把自怜从我的散文中去除。

我第一次遇见的尤利娅·朗（我1960年秋天到1976年秋天的妻子）时，她拖着金色的头发和沙沙作响的黑雨衣、身穿翻领白衬衫飘进了基什波什塔咖啡馆。她刚刚从大学过来———她能入学要感谢她完美的文理中学成绩和迷人的表达能力——然后进入了咖啡馆，她是一名法语和匈牙利语专业的一年级生，压抑着她的胆怯，感叹道："我的上帝，现在发生了什么呀？那个二十七岁的老男人是谁？"她还不满十八岁。

我会在早上六点带着笔记本、钢笔和墨水出现，好像在按时打卡。这允许我观察那些在上班前发生的约会，一般来说都很匆忙。

外套扣子敞开，尤利注迎着风昂首进入。最好不要挡她的道，因为她能把你撞倒。（这暗示了未来发生的事情：当你吃惊地瞪着她时，她已经把早餐放到桌上，让米克洛什把之前开始讲的故事说完，并叫多尔卡不要再用手捂米克洛什的嘴了。但那都要在几年后才发生。首先她得上完大学。）她的入场不会不引人注意。女服务员对她舞文弄墨的常客投去赞许的一瞥："其他人是挺漂亮，没错，但是这个有与之匹配的精力。"尤利甚至带着一份手稿。老绅士发出了一个满意的"嗯"。（她那时就写得很好，就像她四十年后那样，抱着我们最小的孙子走向汽车，我们的儿媳妇坐在驾驶座上，我们的儿子米克洛什正坐着让他的儿子扬科，那个三岁大的雄鹰安静下来，扬科正展开一只翅膀给他三个月大的弟弟遮阳，他跟所有人说，弟弟"在变秃"。）

从那天早上起，在十六年里，尤利和我几乎每天都见面。我总被保证有故事可听：她是那种身上总会发生复杂事情的人，或者说是那种能让它们发生的人。对她来说，她似乎不觉得上年纪的福利官员和

兼职校对员的故事单调，也不会在故事转变为分析时因为挫了系领带骑士的傲气而不安。显然，她身上完全不存在无耻的意图。

很多天后我们才第一次接吻，当时她把头稍微往后倾斜。接着嘴唇相贴，身体交合，直至精疲力尽，对方身上就算是指甲盖那么小的地方也都经过了耕耘——这个相互的耕耘持续着，直到我带着两个美妙的襁褓小人儿出院，穿过马路并把他们放进出租车里。

你是谁？当我们彼此对望时，我试着从她的眼睛驶向神秘的港湾。在板条床上进行神秘对话的那两个人又是谁，姐姐给弟弟讲幻想故事，而他带着问题向她，最近的权威，求助。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切——只可惜我不是真的在场。当时的婚姻分类广告通常以这句话结尾：探险家请勿应征！这让我不寒而栗。

在我们恋爱期间，在接近她家时，尤利会巧妙地提醒我把手臂从她肩膀上移开，因为窗户里的眼睛从小就熟悉她，期待她的举止符合年轻淑女的身份。尤利的祖母征得了尤利的许可，在她小孙女的追求者来访时把家族的贵族头衔挂在墙上，但是她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尽管就外表来看是个高雅绅士，他仍是个（不拐弯抹角）犹太人。犹太人也可以很正派，不对吗？

随之而来的是大约十六年的同居，以及对共同审判——孩子们的凝视——的服从，我们对安娜·多劳（1965）和米克洛什·伊什特万（1967）严格但公平的裁决非常有信心，也对他们的仁慈充满希望。

《社工》在1969年出版，那些年里出版的最黑暗的书。我不敢相信它竟被允许出版，因为它对政权的官方自画像表示了强烈的质疑。不管从哪个角度读我的文字，我都找不到任何精神昂扬的迹象，主人公和小说的叙述者只是尽全力处理他的案例，艰难跋涉，不断沉沦。

1956年之后，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处于那种状态。只有政权改变，我们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但是那看起来不可能。最好的情况是，改变会慢慢来临。与此同时，我们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

早上我会去新工作那里报到，但是很快就离开，前往位于转角的创造咖啡馆。即便如此，我还是设法完成了比那些气喘吁吁地从电车站跑到办公室的老古董所完成的更多的工作。工作的迹象在我的桌面上欣欣向荣——表格、文本、计算尺（这是个带着自由主义伪饰的规划办公室）——但是早上仍然属于我自己，就跟我早年作为福利官员时一样。我开始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现在到处都有人认出我的样貌和名字。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伊万·塞勒尼和我在佩奇与塞格德[注]做了我们的首次大规模城市社会学研究。我们用的是当时的通用研究方法。走进第一间电脑室时，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间庙宇：村落系统与总体的社会结构有什么关联？人们如何在社会空间中移动？他们如何到达他们所在之处？我运用灵活的光学系统周游全国：有时候用显微镜，有时候用望远镜。我在一句话里结合近景和远景。我把政治放在次要地位，我当前关心的是在这段缓慢流逝的时间里我们如何忍受彼此。

我四处漫步，寻找有用的谈话对象，沿着街道走路，好像它们是图书馆书架，装满我从未听说过的书。我在门口和院子附近打探，临摹楼梯和厕所的涂鸦（提议和请求皆有），游游荡荡，像是依偎在一个躯体无边无际的女人身上。

大的希望已化为乌有，而小的希望还残留着。此刻任何对生活的庆祝都看起来像一种自我妥协的媚俗，但爱仍起着抵抗生活之束缚的作用。身处众多的禁令中，偷尝禁果、打破规则的感觉特别好。一夜情自有其荣誉。

还有文学。文学依然是场冒险。谁知道什么事件会进入我们的叙事呢？可讲述的故事数量远多于能写到纸上的，而我们选择什么完全是随意的。你从光谱中取了点东西，你就丢弃了其余的部分。这是说“不”的空手道。

故事的目的是要难以忘记。我们作家接手了从未进入的自我。我们窥视他人的头脑和床笫。你能成为自己以外的人吗？一旦不需要故事的孩子降临到世上，我们就都要开始担心了。

小时候，当夜幕从窗户那边以诡谲的波浪降临时，我会在黑暗中趴着，把拳头压在眼睑上，召唤出不曾预料的图像，我对它们毫无控制力，收起意志力，任其随意流动。一旦它们开始流动，我就告诉自己，让它们发生吧，让它们遵循自己的秘密逻辑。

后来，我避免做决定，任自己被扫进婚姻（和工作）中，把生活的进程托付给偶然。我觉得通过做某事，我能比不做时对它了解得更多。我始终能感到一种逃离时光流逝的邪恶诱惑。

1973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二本小说《城市建设者》。虽然玛格维多出版社的主编喜欢它，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得不因其黑暗的世界观而拒绝它。（它最终在1977年于匈牙利出版，删去了几段话，之后出了德语和法语版，没有经过正式批准，属于违法出版。）也是在1973年——在针对我的朋友米克洛什·豪劳斯蒂的煽动审判期间，控告集中在他杰出的散文《计件工作》上——政治警察宣布我是嫌疑人，对我的公寓进行了好几次搜查，没收了我的日记，解雇了我，并剥夺了我在三年内出国旅游的权利。

1974年春天，伊万·塞勒尼和我在乔班考[注]，离布达佩斯不远的一个山村里租了一间农舍。这个“教堂司事屋”是教区牧师住所的一部分，并且让我们与西格蒙神父，一名本笃会僧侣，建立了友谊。正是

在这个房子里，伊万和我秘密写出了《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我们计划将它在国外出版。

1974年除夕，一大群人聚集在画家伊洛娜·克舍鲁一间半的工作室兼公寓里。我们被她描绘着女性身体、鸟儿和墓碑的彩色拱顶以及她的版画设备和其他工具所包围。空气中洋溢着兴奋的情绪。这让人想起1968年。我们的文化区正在为新事物做准备。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亚文化已经形成。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朋友联盟：每个人都认识其他人，我们定期见面。也有竞争派别，部落酋长们在青年艺术家俱乐部对彼此投出嫉妒的目光。秘密警察也投出他们的目光，好给这个时代的各个层面做出精确的描述。反改革正全面展开。

因为前一年失去了我的城市社会学家职位，我当时在乡下的一家作业治疗精神病院当助理护士。我指导故事朗读和远足，跟病人们聊天。在精神病院的经历对我刚开始动笔的小说《失败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从职工和病人双方都学到了很多。理性是我们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或者说至少已经被吸收进去了，而批评态度——也可以说是异见态度——取决于超理性决定。它们可能是信仰问题，可能是飞来横祸的结果，但它们不可避免。你沿着对你开放的路径行走，不管是否有风险。但是为了什么呢？是知识上的满足吗？是享乐主义头脑发出的命令吗？思考这些可能性本身就是纯粹的享受。

如果我在街上遇见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有卓越的头脑和人格，他们会用手指戳自己的额头，问我是否失去了理智。“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吗？”他们会这样问伊万和我。关于我们做出的（对他们来说）无法理解的行为，最简单的解释是我们理解了某事，并把它写下来，仅仅因为我们喜欢。

三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清晨，门铃响起，五个人挥舞着一张搜索令闯进我的公寓。少校检查了我的文件，坐在我的书桌上说：“我会把你像一片叶子那样碾碎。”他是个紧张而迂腐的人，自夸能理清我扔在档

案橱柜里的杂乱物品。他告诉我，如果我像他那样把钥匙放在单独的皮口袋里，他们就不用把我的夹克口袋拽变形了。他命令我的孩子不要把毯子上的流苏缠在一起。（在他家，他们有一把特殊的梳子用来保持它们垂直。）接着他通知他的妻子，他会很快处理完嫌疑人，然后回家，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过电影了。我就是这样发现我是嫌疑人的。

我问他，我怎么能用锁在档案橱柜里的日记来煽动任何人去憎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呢。没什么能更简单了，他说。如果我有个访客，然后我走进厨房煮咖啡，他就能跳到档案橱柜前，拿出日记，并读它。所需要的就是这么多，这就有了犯罪行为，我是罪犯，我的煽动性日记就是犯罪事实，而受害者——我好奇但意识形态上无辜的客人，趁我给他煮咖啡的当口，做出了他的行为。在我煮咖啡时我总是邀请我的客人去厨房，我告诉他。“厨房？”他问，显得很在意，好像这会冒犯我的客人。是的，我温和地告诉他。这就是咖啡煮出来的地方。我也告诉他，我的朋友们不会做出像偷看我的手稿的事。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会做这样的反常举动的是你们这帮人：专业人士，换句话说，不会受到煽动影响而去憎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的人。

“你女儿八岁大了。她能看她父亲的笔记。她的双眼看到它们的那一刻，就满足了127/b法规的条件。事实上，我不需要确认她看过它们的事实，只需要她能看到的可能性。如果钥匙在锁里，罪行就能发生——注意了，是犯罪行为。因为你在想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但敌方思想一旦获得了客观的书写状态，就不再是一件私人事务了。”

我想象他最近才学会“获得客观状态”这个短语的。少校喜欢听起来有学究气。“此外，开档案橱柜的钥匙不在你的钥匙环上。”证据确凿——他对此相当自豪。

第二天他派了一辆警车来接我们的儿子米克洛什的保姆。埃尔琪出于本能地断言，工程师的档案橱柜一直是锁着的，她从来没见过钥匙。少校朝她咆哮，让她停止说谎。埃尔琪脸红了，然后站了起来。作为一个退休的纺织工人，她是个模范无产阶级，也是工人护卫队的成员。年轻人无权称她为撒谎者。她一辈子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可以问她的同事或邻居，她是不是个撒谎者。（当她最近重述这个故事时，她露出笑容说道，“事实上我扯了个小谎。”）

无论如何，少校没有被打动。当内务部取消了我在三年内出国旅游的权利时，少校亲自确保了我被解职（如果我坚持写一些对我不好的东西，我一定会受到适应不良紊乱症的折磨），我的一些朋友支持他们的逻辑。我的朋友都是聪明正直的人，他们祝我好运，但是理所应当地认为挑战权威会引发严厉的反应。有些人认为我疯了，其他人则认为我如魔鬼般聪明——但是我实际上相当坦率。无论如何，我在政府任职了十一年后，现在成了自由职业者。

也不是说我希望得到一个公共职务，或者希望脚下踩着讲台。少校将我从公共事业中解救了出来。如果说我有目标的话，那也是内部移民：一个除了去满足我认为有必要服从的义务之外不会离开的花园。我失去了赢或者输的欲望，只是在坚持着。上帝禁止我成为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者。我躲避能引发嫉妒的有利地位。即使在政府任职期间，我也尽量避免拥有下属。我只有身处这样的群体时才感觉自在：全体人员都平等，人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并且随意嘲笑彼此。每当有人要求我在舞台上讲话或者读书时，我都会尽可能快地溜走。

1973年后，伊万和我能肯定，每份文件最终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阅读了我们做出的每份社会学访谈。我们写，他们读。研究变成了证据：每个事实都成了对我们不利的证据的一部分，每个窃听到的词

语都让它更有力。词语能把你除灭、逼你成为别人、设下圈套让你掉进去、背叛你，它们会让你做出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我第一次遇见伊万·塞勒尼是在某个会议上，我觉得他有点冷漠，但是当时我大部分朋友都有点冷漠。他从烟斗后面问我："这么说你们也在做调查咯？"我的答案乱糟糟的，像个半吊子，更显出对方疲倦而宽宏大量的优越感。我判断他比我小五岁（我当时三十三岁，他大约二十八岁）。他的夹克和领带完美无瑕。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一名有教养的年轻学者，我们当中的罕见人物。

我也被你们惊呆了。这么说我的办公室和我是个我们？他在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但是很快我们就认识到我们的机构可以聚集力量，在匈牙利城市社会学中创造新浪潮。我们刚建立的友谊提供了额外的刺激，但是我们都没有明确地提起它：我们太害羞了。

突然间，我成了部里的规划和研究学院中的一名年轻土耳其改革者。伊万和我——来自布达佩斯且发表过文章的专业人士，主持那些当地精英最多只能做出一两句评论的会议——嘲笑或蔑视他们仍然认为有趣和值得尊重的东西。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伊万教会了我散步是社会学家的基本工作方法：如果你想要知道一座城市是什么样的，就去它的街道上散步吧。观察狭窄倾斜的污水沟边上的摇椅，在佩奇极度贫穷的西迪纳区，污水沟被称作水路。看祖母给孙儿讲故事。注意立在窗边的镜子让老妇人了解谁在沿着街道散步，确保她能不断从外面的世界得到新鲜信息。

伊万对这些细节有独到的眼光，也有跟我们的当地同事吃美味晚餐的习惯，那些同事成了我们的八卦和当地民俗的来源。第二天早上，他们会带我们去吉卜赛居住区，或者去那排他们称为"干部岭"的

优雅新楼房。我们也拜访了许多当地人：委员会主席、党派书记、老男爵、牧师、教师、铁匠、园丁、商人、矿工。

早上八点，我迈出在布达佩斯的家门，到十点，螺旋桨飞机就把我送到了佩奇的塞切尼广场，我从纳多尔咖啡馆的大理石桌子上开始一天的工作，观察当地人以南方风格来来去去，如潮水般接踵而至。然后伊万和我会出发，跟我们见到的人打招呼——支着铲子站在花园里的男人、带着购物网袋的女人、我们向其问路的穿着短裙留着马尾辫的女孩。

我们笑容甜得发腻，是见过世面的傲慢老油条。我在西方总共大概待了两个月；我曾在巴黎城岛的一家咖啡厅写作，观察附近村庄里穿蓝色围裙的农民，躺在诺曼底的海滩上，岸边靠着横渡大西洋的大客轮，法兰西号。伊万是个无可救药的世界主义者，靠一份福特基金会助学金在美国待了一年。当我叫他描述纽约时，他说："你在纽约，因为没有狮子而失眠，辗转反侧。所以你拿起钱包，走出去，突然间就得到了一头拴着皮带的狮子。"

"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这个人不去搞文学呢？"

十年后的某个晚上，我在纽约难以入睡，于是走进我见到的第一家杂货店，问别人我能在哪里找到一头狮子。"你不如买一个好吃的舌头三明治？"店主反问，他身形魁梧，面带微笑。

这都说明了研究和幽默感并不相互排斥，你也可以在旧体系下做出好成绩。作为我们欢乐流行社会学座驾的橙色大众轿车，由我们较年轻的同事罗伯特·曼钦担任司机，把我们依次送到随机挑选的一百多个村庄里。在一个牧师住宅里，我们虔诚地触摸了那张有四百年历史的桌子，加尔文牧师加什帕尔·卡罗伊曾坐在上面将整本《圣经》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过来。我们会带着大包的儿童服装去吉卜赛居住

区，那里的孩子会赤裸地从棚屋跑出来，经过雪地，朝我们狂轰滥炸：“钱，先生！给点钱吧！”

有时候我们想，我们会单纯地观察他们，描述他们的社会结构；有时候我们想象，如果我们成功定义了状况，改革就会发生。但是体制，我们观察的最终对象，有一天搜查了我们的公寓，开始了后来一连串的不愉快事件，他们可能认为，如果他们严格监视我们并隔离我们，就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我们就会要么醒悟要么离开匈牙利，像我们的俄罗斯、捷克和东欧异见者同人做的那样。我们也许幼稚，但当局同样如此。我们坚持了下来。

我们坚持使用伊万的漫游法，提着磁带录音机翻山越谷，坐在乔班考的塞尔维亚墓碑上或欧佐立悬崖底部的长椅上讨论话题。然后，老布朗橡和窃听装置之下的严密系统出现了。我们习惯了说话颠三倒四，相互打暗号，改写句子，有些句子虽然开头没问题，但是加上意料外的曲解或转意后，就会增添额外的光彩。

我们的基本主题是，政权是如何因利益对立的党派冲突而受损耗的。内容表跟圣诞树一样干净，只缺装饰。但伊万主要关心的是树干和树枝之间的关系，而我对内容和即兴创作更感兴趣。每次我们用详尽的对话将一个点解释清楚，就去欧佐立悬崖做一次徒步旅行。我们充实了我的老观点：历史是知识分子的轨迹，是总体性的骑士，是思想的诗人，是解释、原则和噩梦场景，是向上的力量和愤怒的力量。留心语言，因为宇宙源于词语。留心情绪的塑造者、感觉的制造人。留心他们各自的修辞杂烩。很快我就渐渐明白，我们的意见交流开始比社会主义的苦难甚至社会主义的前景更吸引我。

一天，我们听说阿格奈什·黑勒-费伦茨·费赫尔家遭遇了搜查。他们也是异见者，日程与我们相同，因此我们变得更为谨慎。好几次，我们把打印稿包在塑料袋里，把它放在盒子里，然后埋起来，虽然在不甚仔细的时刻，我们仅仅把它藏在煤箱里，塞在煤块下。钟楼的每

个房间都在茶碟大小的瓷座里装了窃听器，录下我们的每个鼾声或敲键盘声或喘息——我们对此毫不知情。我们不认为自己足够重要。确实，我们听说了索尔仁尼琴[注]被放逐到西方，听说了国内外的流亡者；我们听说了安德罗波夫[注]，前驻布达佩斯大使，现在担任苏联秘密警察头子，正进行大搜查，清洗顽抗的反主流文化，但是我们从没想到，匈牙利相关部门也会采取类似的粗糙手段。不久后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他们在如此行动的事实：我告诉妻子，我母亲的玻璃柜中的银质糖块罐里有一把钥匙，下次他们突袭房子时，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那里。

从那时起，每当我们需要讨论任何关于写作和手稿或政治上敏感的遭遇时，我们会把它写在纸条上，然后冲下马桶。寻找容纳得下打印稿的角落和缝隙也成了第二天性。我们最想隐藏的是我们进行到了哪一步。我害怕手稿一完成就被夺走，所以我总是否认任何进展。当别人打电话问我“你在工作吗？”时，我会回答，我只是在闲逛。

“你是个文化抵抗者。”一个审问我的人说道。在那之前，我都不认为自己是文化抵抗者，但是我喜欢警察的措辞。我对警察词汇变得更敏感了。我注意到，在我们楼一家从没开过门的商店里，有一只眼睛通过刮开窗漆形成的小洞观察我。我感觉到，马路对面的楼房的两扇窗户里，有两张脸在跟着我。我开始认出缓慢经过身边的汽车里的人、在院子里支着手肘的老人和我身后那些脚步从来不停止的人，以及停在前门的那辆车。我清楚地感觉到，来钟楼检查文件、问我在镇里做什么的警察是整个负责维持弥天大谎的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既不注意共产党意识形态，也不注意反共意识形态，我们同时诋毁了非官方和官方知识界的自我形象。作为知识界的一员，感觉受到了侮辱，即使是我们的反对派朋友也对《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表示了不满。发生的一切，我们在书里进行了总结，即

知识界通过克制对权力结构的质疑来维持系统的有效运转，同时将自己视为遭遇不公的受害者，并因此解除了自己的责任感。

在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我的朋友，电影批评家伊薇特·比罗，把一名悲哀且多疑的捷克电影导演带到乔班考的花园里。伊万和我马上感到他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然后把我们最宝贵的想法讲给他听，但他只是摇了摇头。“你们还没说完就会进监狱。还是这么聪明的人！”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的朋友加布里埃拉·豪约什（扎博）和哲尔吉·约凡诺维奇跟我一起去了乔班考。当扎博站着往下看时，雕刻家拍了前后照片：先是那些丑陋的老式窃听器置于松黏土里的样子，然后是松黏土去掉窃听器的样子。我把他们像拔胡萝卜那样拔掉。因为不知道拿它们做什么，我把它们和其他垃圾一起扔进了厨房柜子里。那天晚上，同往常一样，我坐公交车和通勤列车回布达佩斯。第二天，当我重新进入乔班考的房子时，我注意到我的宝藏已不在厨房柜子里了。我没有瓦茨拉夫·哈维尔[注]那样的自由精神，他曾在跳蚤市场叫卖他的窃听器。

我们不打算在匈牙利出版我们的书，想让它在正常国家出版，也就是说西方。我认为确保这本书出版是我作为公民的责任，之后发生的事就没什么关系了。我妻子帮我打字，然后我们叫一个朋友，塔马什·圣约比，把它一页一页地拍出来，因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台复印机还处于政治警察的监视下。

走在布达弗克[注]区的彼特帕尔街上，一排曾属于酿酒商的房子沿着山坡排列，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我们受十岁前居住地的影响之深，如宿命般，以至于只有在相似的环境中才感觉身心合一。我不停回到小说的第二章，关于童年和家庭的那章。生活对我来说是美好的，对于“你好吗？”这个问题，我一般回答——局外人看来会觉得奇怪

——“好极了。”这种感觉可追溯到我的文理中学时期，早上离开家后，只要知道当天不用值日可以自行离开，我就很快乐。

有一天，突然之间，另一个朋友蒂博尔·哈亚斯过来说，塔马什被逮捕了：在他的公寓搜查色情文学时，当局偶然发现了我们的手稿。原来，总在我家门口搂颈接吻的情侣是警察。救护车和出租车会跟踪我们，就像形形色色外表异常普通的男人女人们做的那样——或者是外表奇怪的男人女人们，如果他们想被发现的话。因为这样的事只能在党总部的允许或命令下发生，我们只能推断，离我们被逮捕也不远了。

我们告诉彼此，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做的事都是值得的，并且对要讲的故事达成了共识：我们不知道手稿是谁的，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否认自己的作品是过往时期的残余，当时你要是在传单上联合署名，就会坐上好几年牢。

伊万的妻子卡蒂和我把他送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他去南斯拉夫的出境签证还有效。当然，他被带下了火车，被送了回来。我们在抵抗的游戏中缺乏经验。

有一天，两个男人带着拘捕令，跟伊万进了切拉格吉浴池的桑拿中。他们在他两侧大汗淋漓地忍耐了三刻钟，直到他们三个一起走出浴池的大门后，才抓住他的手臂。

我有个毋庸置疑是幼稚的欲望，就是偷偷溜走，摆脱他们的盘算，破坏他们的游戏。至少我能赢得时间。一旦消息传出来，决策制定者可能面临来自作家甚至他们的孩子的压力。我叫我的第一任妻子薇拉留我暂住。

我恐怕没在薇拉位于七楼的公寓里待超过两天——当国家安全局的官员来敲门时，我正在读书、观察排水槽里的鸟儿和马路对面建筑

上缓慢行走的屋顶工人（他们也在观察我，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屋顶工人）。那天是1974年10月23日。他们一开始去薇拉的学校找她，把她带回来作为证人，但是他们想抓的只有我。他们甚至没有费心洗劫整个地方。我谢了薇拉，塞了一把牙刷进口袋，之后随着便衣警察走出了房子。

久拉·费赫尔中校是我的审问者，他礼貌地请求我原谅他占据了如此多的后座空间。他告诉我，他在阅读我们的作品时费了很大的劲，因为他不习惯这样的词汇量和思考方式。尽管喝了大量的浓咖啡，他还是在读它时睡过去好几次。

“所以这个研究没怎么惹怒你。”我说。

“一点也没有。”他承认。

“那为什么我在这里呢？”

中校摊了摊手。

手写样本证实了打字稿确实出于我手。

“这是你的作品吗？”我说，是的，因此破坏了我跟伊万的约定，他一直坚称我们跟手稿毫无关系。我觉得他们不能对我们提出正式的指控，因为除了作者，没人看过此文本，换句话说，他们动手太早了。我认为，他们想通过没收每一份副本来消灭这本书。

我发现监禁尚可忍受：早起，打扫牢房地面，就着豆汤和土豆吃面条。监狱图书馆提供了可读的书，当局还允许我签授权书，允许我妻子接收我在美国出版《社工》的版税。中校每隔一段时间就背诵哈谢克的《好兵帅克》㊟里他最喜欢的场景。我们不谈论这本书，只谈论另一份副本。专家基于被没收的副本确定了它的存在，因为封面上有复写纸的痕迹。

一天早上我醒来，感觉把这件事想通了。我建议他们把它作为内部出版物，跟托尔斯泰和吉拉斯(注)一起出版。他们可能认为我是个白痴，但是问问也没什么坏处。关键在于把它扼杀在萌芽中，或至少在把别人卷进来前把它扼杀掉。朋友们的公寓肯定会遭到搜查，他们还会被召去，作为证人被问话。我们需要赢取时间。一旦事情平静下来，我们就会把书出版。（伊万把“真正”的第二份副本和进行中的手稿藏了起来。）我会继续写下一本小说《失败者》，并为它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与此同时，我们会让当局觉得他们的工作并非徒劳。我会让他们拿到第三份副本，其封面上不可能存在复写纸的痕迹。他们还会得到一份具有警务价值的手稿，至少暂且可以指望别处不会再有这本书了。我决定，满足两个条件的话，就让他们得到它：他们立刻把我们俩释放，以及持有手稿者不会遭受任何不良后果。

这就是我在第二天告诉他们的话。几小时后，中校按照上级指示，接受了我的条件。我跟他一起坐在警车里，朝我的妻妹祖莎·朗和她丈夫埃尔诺·山多尔的公寓驶去，埃尔诺·山多尔用上了高难度驾驶技术，试图甩掉跟踪他们的车，把手稿拿到家里，然后把它藏在他们的瓷砖烤箱里。两人都在家。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他们同意了我叫他们上交手稿的要求。

当天下午，我们三个——塞勒尼、圣约比和我——就被假释了。一道正式法令禁止我们出版那份有敌意的文件（那本书），连口头交流其内容都不行。任何违反行为都会导致刑事诉讼。如果我们觉得做不到遵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当局会允许我们移民。我们甚至能带上家属。伊万说他会考虑一下，但是我告诉他们：“不，我是一名匈牙利作家。”

当时我们的情况得到了一点西方媒体的注意——据说基辛格(注)问起了我们——然后我们两个都决定带着家人移民，在西方的某所大学继续我们的研究。我们需要工作邀请、签证和出境护照，这些我们都是通过官方渠道申请的。

尽管去国外过学术生活看起来可行，我还是很难想象自己会成为一名充满感激的流亡者和（一切顺利的话）大学教授：我会厌烦它的，它会像是在浪费时间。在有某事阻止我写作的日子里，我会紧张生气，有冲动逃到没人能打扰我的地方，从那里走进花园，呼吸新鲜空气。

我是个热心家，但很幼稚。我到一个新城市的第一天——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大还是小——我都能想象自己在此度过余生。这个可以是我的窗户，等等。然而第二天在城里穿梭时，我就有冲动去其他地方，一般是回家。可能对乔班考来说，令人惊讶的是，搜查房屋的人中竟没有一个掀起我钟楼房间内的桌面，我小说的笔记就在那里，原封不动。

我回到了我的日常工作状态，坐在布达佩斯的咖啡馆，在划线小笔记本上写作。一个长着纽扣眼的观察者经常看我辛勤工作。有危险时，在人群惊慌逃窜时，静止不动。我会放弃移民计划，我给负责文化事务的党官员哲尔吉·奥采尔写信说，条件是他们出版我的小说《城市建设者》，取消警察骚扰，并让塞勒尼离开。我的措辞方式是，我决心留在匈牙利是种牺牲，是件礼物，然而它实际上是种渴望，渴望能够继续过着我一直拥有的生活，对我来说，这种生活既非毫无成果，也非令人不快。奥采尔回复道，没人可以跟他提条件，不过他倒不觉得我的要求古怪。

当我告诉伊万，我们不能在西方合作写书时，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很痛苦。你也能留下来，我们会设法活下来的，我想。而他是这么

想的：你原本答应要来的，现在你食言了。你真的以为你能写你的书，在西方发表它们，然后继续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散步吗？是的，这正是我所想的。事实也是如此。我就这样开始了作为被禁的地下作家的十五年生涯。

孩子们很聪明。当我被逮捕时，尤利发现自己很忙，因此她把七岁大的米克洛什送到费里·费赫尔[注]和阿格奈什·黑勒家过夜，他们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儿子。米克洛什整个下午都和他一起玩，但是当夜晚降临时，他把费里叫到一边，带着一丝挑剔的语调问他："你是好人吗？"

费里听懂了他的意思，答道："是的，米克洛什，我相信我是个好人。"

"好，"米克洛什说，"那我就在你家过夜了。"

我当时开始在精神病院工作，受到我从自己和里面的人身上观察到的脾性的影响，我试图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行为策略，一种个体的世界概念。病人可能行为古怪，但是他认为自己是改革者。这就像在描述我这类异见者，我想。我的小说的主人公被送进了疯人院。印出来的小说被没收，法院命令称其为"敌对材料"，勒令将其销毁。不是我，只是我几年的工作成果。

从根本上说，精神病院是对国家权力的反映。里面的疾病来自这个世界，世界提供了疾病的根源和象征。理性是我们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自称如此），而批评态度——也可以叫异见态度——取决于超理性判断。你沿着你相信的路径行走，不管有无风险。但是为什么呢？知识的满足？思想的享乐主义？思考众多可能性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我在四十三岁时被所有地方开除，也就不再需要忍受那些伤脑筋的家伙（虽然我总是将他们处理得很好），所以我把自己放逐到花园里，在那里我很放松，有充足的时间把事情理顺。我写的文章赚到了足够我们再用几个月的钱。但是我们的生活并非毫无风险——之前提到的房屋搜查、窃听、监视和三年的旅行限制——我的妻子尤利被禁止上电台，她曾经每天早上八点前在那里做深刻且新颖的书评。

只有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写作才算行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匈牙利写作都有机会成为行动。它要做的只是超越常规而已。几乎每个声明都是一个掀起反政府风潮的机会。

我刚失去工作时，一个浓眉同事把头探进我的办公室低声说："你封锁了自己的命运。"但是我鄙视通过祈求回到羊群中的想法。官方认可的正常状态包含了神经衰弱的所有症状。只有自由人是健康的，而健康人是自己的主人。病人受人管理：他们依赖于别人，不能够照顾自己，无法独自行动，不会做决定，也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只看到他们想看的——或者他们害怕的。

被逐出稳定工作后，我认识到，我的情况和集权政党国家的逻辑一致。因此，我没想过要去各个编辑部来回奔波。我知道他们除了拒绝我的作品外别无选择。我偶尔还投一篇稿来做做试验。意志薄弱者甚至不予回复，而意志坚强者会写几句话，大意是他们不敢发表我的作品。最终我放弃了：我为把他们置于如此境地而羞愧。

我现在确信，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我都不适合稳定工作。尽管我尊重所有做体力劳动、教书或者检查病人的人，但我还是因从中解脱而兴奋万分，然后把生活视为无止境的假期。只有打字机的响声给我的行为带来了一丝体面——毕竟，打字员被视为工人——而事实上，由于体制的宽容大度，我是个叼着烟斗坐在摇椅上的探险家。

因为太懒惰，也不擅长经营从事反对活动的组织，我基本上不怎么参与其中，尤其因为政治活动清早就开始——那是我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我绝不会考虑放弃它。我只负责写作和分发反政治册子。

对于旧体制的局内人来说，很难想象有人会离开政府权力机构的官职，去追求平民生活。但是我根本不需要代表权、尊重和薪酬。有人抽时间做他们喜欢的事，其他人不这么做。下雨时，乔班考郊区的吉卜赛制钉匠有时间去森林里采蘑菇。如果一个CEO在工作日早晨去森林，人们会认为他疯了。我仰慕那些在家和花园里养活家人的工匠，遗忘那些需要他们每天定时向老板汇报的职业。

就算我坐在乔班考的吉卜赛小酒吧里，深深注视着我金黄色的果渣白兰地时，我还是得承认，走在异国城市的阳光下，比待在家里在同样的五个台阶上来回踱步要好得多。那我为什么坚持留在祖国呢?

乔班考教堂司事住所的白墙和深色木横梁天花板在一百多年里都没有变化。草地以外厨房门口，刺人的荨麻长在果树间。门的左边放着一张大理石桌子，它曾经是座墓碑。那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花园生产出大量水果：酸樱桃、核桃、杏子、梨子和无穷无尽的李子。在好年份里，几根疲惫的枝条会在果实的重压下折断。

一条小巷呈拱形经过房子前方。它被称为红军大道，铺着白色砾石，间或有草丛。星期天早晨，镇里上了年纪、身着黑衣、围着头巾并且戴着软帽的女人们会拿着祈祷书，安静地走进巷子。工作日里很少有人用这条巷子，所以我肯定能不受打扰地独处。只有教区牧师会在某个下午来访，但是他很快就会离开。“我们对创造热情的卑微尊重！”他会这么说，留下许多微笑的回忆。

如果我出门时动静比较大，花园尽头的鹿就会竖起耳朵，跑到我背后，用它长着茸毛的鹿角轻轻抵着我。狗会狂吠，接着让自己卧倒，而鹿会抚摩它的肚子。但是鹿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好斗的日本公

鸡，它跟鹿一起睡觉，在鹿的肚子下面做窝来保持温暖。公鸡跟鹿的联盟加重了其骄傲自大，它会像无赖一样咆哮，对可怕的乌鸦发出跟它的身体一样单薄的声音。

我在草地上放了几个树桩当座椅，但是它们被蚁群占领了。如果我踢一脚树桩，那就会像地震一样晃动它们的世界，使它们疯狂地涌到地表，抢救蚁卵和面包屑，在曲折的慌乱道路中彼此相撞。在绝望中，成千上万的蚂蚁从深处涌上来，黑压压地布满树桩，从上方看，它们的疯狂社会和我们的一样，行为一点也不理智。一旦危险（中途它们偶尔会在恐慌中咬掉彼此的脑袋）过去，它们会夸耀它们的英雄主义和它们经历的磨炼。我再踢了一下树干，蚂蚁更猛烈地往外逃窜。愿它们享受历史的震动。混乱之后，和平降临，它们将不得不重新组织，罢免不称职的领导者。在鹿、狗和公鸡的陪伴下，我观察到蚂蚁幡然醒悟，然后爬回它们受了震荡的宇宙的缝隙中。变幻无常的上帝的愤怒已经退去。

隐藏在我疲倦而神秘的残酷下，我，即上帝，返回了房子。为什么尽管我是个无可救药的恶棍，却克制自己在拥有权力时滥用它呢？

我度过时间的方式是对我的奖励，也是对我的惩罚。我编造了诡计来欺骗我天生的愚蠢。如果我不愉快，我就不得不忍受一个不愉快的人格。他人即地狱吗？[注]如果那是我自己呢？锁在暗室中，唯一的光源来自屏幕：无限循环的我。

我喜欢从乔班考走回布达区多瑙河畔的野生栗树林。我几乎在每个咖啡馆和酒吧里都发现了合我胃口的东西，也不介意生活的缓慢。自然而然发生的就够了。

从四十岁到五十五岁，我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都违反了法规。我对禁止工作和出版的回应？一种不受拘束的、内在的、著作者的自由。我用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散布作

品，一般通过加博尔·德姆斯基的地下出版社出版。我不仅收不到任何钱，还要定期付出印刷费，因为我把在匈牙利散播我的作品当作一项公共服务。

我可以白天待在书桌前，晚上跟我想见的人待在一起。也有我不愿见到的人，他们站在角落，或者坐在门口的车里。他们到处跟着我，但保持一段适中的距离，没有打扰到我的孤独。被列入黑名单和内部移民并不是命运给予的打击，而是我自己的决定造成的结果，因此，处理随之而来的苦恼也是我的责任。

在这个国家内保持正常是不可能的，假装若无其事更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行。批判性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独的阵营：后面有警察穷追不舍的我们，对抗作为主流心态的承载者、因而不受警察影响的他们。人们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对我的攻击，但我既不回应，也不写任何攻击文章。我从来不能理解他们的敌意从何而来。人需要最大限度的自律和幽默感才能不发疯。

在十一岁时，我被迫接受这个事实：时代精神在竭尽所能地杀死我，然后把我扔进多瑙河。不愉快的经历让我比大多数人都早地产生了怀疑心态。大话？大话会把人们变成谋杀儿童的凶手。

作为一个被禁作家，我有着免于他人期待之苦的奢侈：我不需要迎合当地读者的偏见；我不需要表现得自信或愤怒或绝望；我不需要担忧当局因为我写的文章而不快。我不要求任何与我生活的现在所不同的未来，只因我不相信有可能存在一个不同的未来。

我在电视上观看莫斯科“五一”庆祝活动：一名高大的士兵伸展着双臂走过一栋建筑的整个正面，紧凑的方阵排列在红场上。每个队列边缘的扛旗体操运动员身穿白色。只有最受人尊崇者——工人比赛的获胜者——可以出现在方阵里。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照片下方，是目前党领导的照片，再下面是他们本人。

大会的每名成员都在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从上方拍摄，伸展于人柱廊间的道路网看起来几何对称。在公民组成的地毯（可以说是一等队伍）和站台集合体（中间是列宁墓）之间有一道由立正的白手套警察组成的墙壁；他们——也就是元帅，他们收集的奖牌在胸前叮当作响，跟陵墓的扶手一起闪闪发光——之上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身着这个国家版本的男性时尚：深灰色的外套和拉到眉毛位置的深灰色帽子。阴沉的老人们在那里朝人群挥手，使其欢呼。

喇叭响起。勃列日涅夫脱下帽子，走到麦克风前。他跟一篇别人起草的充满长词的稿子奋力斗争。脸上布满了傲慢的皱纹和眼袋。在他身后，暴躁但不动的其他领导人，现在将双手放在背后，疲倦的脸向内凹陷，很明显没在听他讲话。“致以温暖的问候，为工人的幸福而斗争。”领导人们坚定地转动头部，先左后右。当老大说完，他身边的两名领导人开始鼓掌。人群随即跟上。栏杆边的人偶尔把双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好像是出于义务，然后击几下掌。他们有一副心不在焉的面孔，毫无好奇心。大站台上的运动员就带着这样的面孔经过栏杆。

这就是70年代。我走到公路上，上面有一个标志说禁止拍照。拍什么？导弹发射井？雷达站？能从一条高质量水泥路接近的地下兵工厂的森林入口？向其倾斜的小山可容纳一座坟墓。在那里制造的微型窃听器足够整个东欧使用。

周围的土地没有耕作；禁止放牧。透过沿着道路分布的森林带，我能瞥见灰色水泥建筑、守卫塔、靶子、掩体，它们都被一道覆盖着铁丝网卷的混凝土栅栏包围。军官的住所隐藏在村庄边缘一道着色砖墙后。孩子们在铁丝网后踢球，丈夫跟他们的妻子一起在装配式公寓楼里走动，光头士兵沿着一根离地三米的大梁跑来跑去，身上穿着全套行军装备，还扛着机枪，含糊的象征主义小旗在尘土飞扬的山丘顶部飘动，一台运着两桶牛奶的吉普车凭空冒了出来。

苏联军队——现已在匈牙利当了三十年的不速之客，他们是健壮并长着粉刺的孩子，身上有汗味和地毯味，连续数月被困在军营里，只能透过军营栅栏向外凝视——脸上有着被迫与母亲分离的儿子的悲伤表情，又混杂着一丝傲慢。守卫着他们的武装车辆和火箭筒，他们会嫉妒地打哈欠，嫉妒那些穿着彩色服装步行和开车经过的当地人。他们唯一会被视为个体的时刻，就是他们在一年或两年的任期结束后前往车站乘坐莫斯科特快之时。真是奇怪的占领者。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残破不堪的。就连车辆也像是偷工减料的产物。

一列灰暗的卡车形成一道无穷无尽的钢铁河流，每辆卡车后拖着一辆损坏的，后面的车都已无法使用。两小时后车流才告一段落，我们才能过去买牛奶和面包。

我向来是天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被迫的异见者。我们居住在一个疯狂的世界，文字在其中似乎有着高深莫测的分量，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这个已故的政治体制里，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其想法、文本和课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每天早上坐下来制造一些会被视为反国家煽动言论的句子，而很多理应过得更好的人四处侦查，以保证某些炒冷饭的陈词滥调无法面世。我的包里既没装炸弹，又没装左轮手枪，只装了一个笔记本。正当我以为自己开始习惯这个状态时，我遇见了一个年轻人，他因为复印了我的研究而被三辆汽车跟踪。这个事关非正式出版上百份异见文本的牛仔与印第安人游戏让双方都很忙。没有一栋拥有打印机油墨和稀释剂的乡村住宅逃过了警方监视。

在匈牙利，我过着一种闷声的生活。生活在东欧意味着要时刻面对失败和倒退，但也质疑了生而为人的本质。没有真正的独裁者，只有一长排被践踏的个体，每个人都想象前面的人是告密者，而后面的人是鲁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旦告密成了通用货币——而告密者是模范公民——还剩什么可供告发呢？我们能借以辨认说谎者的真相在哪里？

“服务员！请结账！你能不能好心告诉我，在哪里找得到上帝？”

“我推荐香草酱金面，先生。”

“这样的话，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事情会改善吗？”

“永远不会。”

1976年，我得到了DAAD，即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可以去西柏林待一年。我的三年旅行禁令已经期满，我给首相亚诺什·卡达尔写了一封信，要求获得在国外待一年的许可。这在当时很不寻常，不仅我自己，连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得到了护照和必备的章。

考虑到尤利是法语教师，不会说德语，她决定带孩子去巴黎。她也没有回国的意向：她不想继续生活在警察国家里。我觉得，既然我起初是匈牙利作家，不妨也作为匈牙利作家死去。这导致了离婚，我妻子留在巴黎，带着我们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而我在延长了两年西方生活后，于1979年回国。

在布达佩斯漫步了五天后，我不再因为人们在说匈牙利语而惊喜。未经提炼的汽油的恶臭不再刺激我的鼻子。深灰色的建筑、灰扑扑的橱窗、楼梯附近伸出的电线、院子里修到一半的东西、战争期间和1956年留下的子弹坑——一切都再次显得熟悉起来。我取下了我母亲贴在墙上的东西，只留了一张孩子们的照片。我买来一些看起来有意思的书，轮换着坐在几张扶手椅上，花时间待在公寓里——我不因为那些公寓熟悉的衰败而吃惊。我享受着蔓延的厌倦感。

我努力了解在我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受允许的东西多了一点点。留着长发、自封的先锋艺术家剪了头发；年轻女人学会了做饭，并有了孩子。渴望出国的人开始接受在国内尽量过得幸福的想法。年轻的历史学家骄傲地质疑党关于1956年的路线，并吃惊于它没有在世

界上造成巨大震动。政治异见者成了总建筑师、戏剧导演和主编，他们买了更好的车、出国旅行。有一些笑话他们不能再笑了。

我跟所有一切，跟时间与事物昏昏欲睡的流逝草草讲和。我耸耸肩。“我一切都好。你们这样也很好。”公寓充满了寂静，以及不总是轻松的夜晚。

如果我打开灯，四处张望，我会因为看到自己在哪里而惊讶。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一套与之搭配的（如果是临时拼凑的）经历过风光日子的家具，一张带茶碟印的镶铜帝国餐桌和杂乱无章的书房，里面的书架都碰到天花板了。在那些曾经雪白、现在灰黑的墙上，裂缝组成了一张骆驼的脸，我曾经通过看它来确定我身处何处。我从没叫人重新粉刷房间。我的愿望是留下尽可能少的痕迹，并尽可能少地干涉我身边的生命。不管怎样，这是唯一一个我说话不会犯语法错误的地方，唯一一个我张嘴不需要感到尴尬的地方。我遇见了我的前老板。在当局命令他解雇我之前，他一直对我很好，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聊天，可是一旦政治警察发布命令，他就当场开除了我。他把狗绳换到左手后，困难地伸出右手。他也中了风。

他只记得我们曾是多么亲密的好朋友。站在林荫道上环顾，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每个我看见的人——不仅是党员或者狂热爱国者，而是每个人。连那些憎恨体系的人也是，因为他们不能停止思考它。不只马车夫是，马也是。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包括我自己。

从童年时期到1989年，我都带着这样的观念生活：任何自行其道的人都必须估计死于岗哨间的可能性。通过塑造自己的生活，革新者使得其他人——而不是他的自我忽视——杀死他的可能更大。渴望生活尽可能长地持续，这无异于自杀。

坐在乔班考的大理石墓碑桌边，我甚至记起了没有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但是无论你记得什么，它都的的确确在你身上发生了。凡人寿命不过白驹过隙，因而我迷恋所有附着时间的事物。

从乔班考的隐士巢穴回到布达区的公寓后，我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我听到消息了吗？我们在安洁莉卡糕点店见面，能看到折中风格的新哥特式国会，代表们在里面赞成提交上去的每一个动议。（我们认出了打电话要求与我们见面谈话后过来的那名女士和那两名男士。）我有没有听说，他问，加博尔·德姆斯基已经连续数天被公开跟踪，当他们因为他没开转向信号灯而让他停车时，他们发现了我的小说《失败者》的手稿。他们把他拉到地区警察局，没收了文件，做了笔录。九本微型装订本在出版社被没收了。又是这种事?

在田园牧歌式的乔班考，人容易忘记自己生活在哪里。

1982年，我把在那里写的一篇散文起名为《反政治》，因为一切都关于政治。几年后，气喘吁吁的德姆斯基肩扛重袋冲到我家——里面装着刚印出来的《反政治》。这篇秘密写作并出版的文章指出，是时候和平结束铁幕和导弹对话了。这个问题应该移交到欧洲人手里。在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华沙争取自由的尝试被镇压和报复后，接下来是莫斯科和柏林。把俄国军队送回家！让俄国游客过来！

柏林要因为这些事对欧洲，尤其是中欧负责。想想死去的数百万生命，想想因为柏林的傲慢而浪费的几十年。假如柏林没有挑起战争，就不会有苏联军队在布达佩斯建立起一个体制，使得出版一本未经审查的书成为午夜的秘密，成为阴谋，成为一项能让你入狱八年的罪行（“准备和发行含有煽动反国家行为的材料”）。

在扶手椅上，我能看到悬崖顶部，站起来时我能瞥到尤特卡的深色头发和长腿。她在逐个检查果树，同时研究着一本叫“小花园大快

乐”的小书。她计划种植小茴香、芦笋、白菜和茄子。里面会有几个花圃、一片草坪，也许还会有一个孩子。

我们两个都是白羊座。有一次我语气随意，然后她粗暴地回应。我怒气冲冲地离开，她从阳台朝我猛掷马克杯和勺子以及不得体的脏话。她让我等等，然后跑下来把我的衬衫撕了个粉碎。我衣衫褴褛地回到家。电话响起。那是一个吓坏了的女孩的声音，她叫我回去。我换了衬衫，然后回去了。

我看到你二十年前的样子，穿着没有特色的羊毛毛衣，棉质长筒袜在脚踝处磨得很薄，还有深蓝色的宽松夏布裤子，那在当时的亚文化中很流行。你躺在草地上读歌德的回忆录，读着读着头就低下了。几分钟后，你猛然抬头。脸上留下了草的印子。你说你睡了一个好觉，因为这本书如此美妙，又如此无聊。

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融，我们的记忆也如是。我们沉默地观察影子移动。我们的大多数选择实际上是发现。有人按响门铃，溜进我们的生活，把在跳蚤市场买来的丝质睡衣挂在我们的挂钩上。如果我想要独立，为什么选择娶妻生子呢？这就是我在第三次结婚前问自己的问题。以下是我反对此做法的论点，我对结婚的信念越来越弱：有家室的男人是个囚徒——他再也不能断言自己一无所有了。已婚男人被判处家庭生活，成为愚者的家长。妻子就像国家：她对你所做的一切都好奇，并在暗中观察你。有国家在监听不就够了吗？（当然，我一般不亲吻窃听器。）

跟我在一起最久的女人是我最害怕惹恼的女人。越不害怕，我就越快放弃，就越快寻找下一个不敲门就踏入房间的人。突发奇想驱使我追求某些女人，但是我被尤特卡的声音、触感、气味、动作、语言和思考方式所吸引一事并非突发奇想。从第一个晚上起就是这样，或者说那种感觉在我身上停留了二十多年。

纤弱、节制、谨慎、笑声轻柔、哼唱并提供深思熟虑的判断，尤特卡在1982年跟我一起去了西柏林，开始我的第二段暂居，那时她已在布达佩斯与我相伴三年。她骄傲地宣布她能听懂德语广播了，听法语也毫不费力；英语的结论早就得出了。她热爱金色的落叶、夹了戈尔根朱勒干酪的黑面包和马孔勃艮第酒。

我们回去后，一切依旧。有一次，在1987年，在电脑屏幕前检查文件的边境警卫消失了，稍后带来另一名警卫，他发现并没收了我的计划演讲的手稿。教育部如果认为内容合适，就会把它们还给我。

“但是我没有它们怎么讲课？”

“那是你的问题。”

“好吧，那我就不演讲了。”

他得意扬扬。

但这一切都是个试验，是种策略：文本早就被偷运出境，德语翻译已经在西方等着我。

在柏林从车窗向外望，我看到的是一个和平、整洁且有序的城市。一切正常。不是几乎一切，是一切。人们身上穿的就是橱窗里展示的衣物，这意味着人们频繁更换财产，因此不必对它们过分依恋。如果我住在这里，我的愿望是可以拥有清白的良心。我会担心精神上的索然无味，用繁文缛节把自己包围，并仔细地计划时间。

在国内，街上有一股紫色烟雾：东方集团[注]的车辆排出的废气。那个夏天尤特卡完成了一本关于20世纪初布达佩斯的死亡和葬礼的书。然而，她的情绪却一点也不悲哀：她更担心尿布。

我拒绝紧抓现状，也拒绝逃离现状。我生活中的每个转折都得感谢纯粹的巧合，包括我的三任妻子。一天，我碰巧在教室瞥到薇拉的头发，尽管我已经见过她一百遍了。尤利在一次快乐的聚会中扑通坐到我的椅子扶手上，然后待了十六年，留下了两个孩子。尤特卡某天在巴黎按响了我的门铃——我们是同胞，并且住在同一层楼——然后问我想不想来点咖啡。咖啡从没煮出来，但是有了一段婚姻和三个孩子。我用最传统的方式，在我的孩子们和孙子们身上发现了生活最简单的目的，为了他们，我打算尽可能活得久一些。

给自己的话：呼唤他人注意我想要什么或我不知道什么毫无意义。我已经足够无耻了。不再有人想看我裸露的胸膛，因此我在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

我出版的一切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它可能曾经有用，但那些日子早就消逝了。我在回房间前无法把眼镜放到床头柜上或跟妻子道晚安的日子迫近了。不久后我的双眼就会像两颗光滑的栗子了。

每种生活都好过没有生活；每种生活，包括伴随它的痛苦，都是好的。确实，每天的生活就像在海草中跋涉，但是我能熬过各种事情，因此活到了现在。鉴于我还活着的事实，“为什么”的问题就跟葡萄上的苍蝇屎一样愚蠢。

十二岁时，我从国家社会主义[注]中幸存；十五岁时，我见证了共产主义的接管。共产主义和我一起变老。在活跃且守纪律的默然忍受中，几十年过去了。因为在政权解体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所以我一生最好的年代都笼罩在其阴影下。尽管如此，我从未远远地观察祖国。我在其中摸索着生活。

生活缓慢，但我并不因此后悔，因为它如此丰富。不完美造就凡人，因而使人真实；脆弱和必死性在道德意义上是近义词。道德哲学只能建立在脆弱性和我们对它的接受上。

如果对于人类现状的每个书面描述都能组成文学，那么也许人本身也组成了文学。小说的主人公可能是一名福利律师或城市建设者或者退休革命者，但那只是幼稚的面具，因为没有福利律师、城市建设者或者退休革命者躺在床上或坐在精神病院的长椅上时会如此深刻地思考人生。内心独白不会整句出现。

我一生中较为重要的选择全都源于我十几岁时想成为作家的决定：1956年我克制自己不去穿越暂时开放的边境，选择了需要观察的工作，因为我对社会阶层底端的人群感兴趣（不是说我自己的地位有多高，我只有低廉的工资、窄小的公寓以及两三套换洗衣物），陪着我的老同学塔马什·奇洛格前往老布达砖厂的住宅区，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于伊丽莎白塔担任儿童福利督导。然后我开始对整个匈牙利以及边远城市和村庄感到好奇，于是在一家城市研究机构任职。

现在是夏天。布达佩斯城里的人们尽可能少地遮蔽身体，无论美丑！我将其归功于这座城市的纵欲，以及一种幸存下来的前基督时代异教生命渴望。布达佩斯做事总是很彻底：斯大林主义、革命、卡达尔政权的妥协，凡是你能想到的均如此。它试验生存策略，碾碎体系以将其软化，复兴古老传统——任何能减少损失之物。要知道，布达佩斯是东欧第一个宣告自由的城市。这座城市比政府更长命，它从未让异教生命渴望被禁欲狂热所接管。这里有许多正直的犬儒主义者，他们不认为苦难比勇气更为高尚。

连我的内部迁移也基本上是偶然事件：一天凌晨，我的门铃响了，他们走进来，撕碎我的档案橱柜，将我从所有机构中开除。接着1989年的变故到来，很快我接到一通电话，我受邀担任国际笔会[注]的会长。这是个严肃的邀约，我接受了它并做得很好。

有些作家喜欢强硬作风，直到跟生命危险擦肩而过，并能够向读者讲述它时，他们才满足。我不是那种人。我生性温和。但是偶尔我

会迎头撞上命运摊开的手掌。

好事总是独自发生，它们是命运的礼物（也可以说天意），但坏事也随机发生，出人意料：事情发生了，就是这样。我们感觉不到逼近的命运的蹂躏，也无法阻止它。我们沿着礼物和意外的楼梯前行，它们构成了章节。

我不喜欢被某时某地的处境吞没，我宁愿从旁边或上方观察它：我享受后退和离开。这种冲动、这股把我冲走的潮流、这阵呼啸的风、这个轻柔的呼吸是什么？摆脱陷阱的愿望？防止自己被包围？

我出生于1933年。六岁时“二战”爆发，十一岁时生存意味着命运和警惕的合作，对匈牙利省城的犹太儿童来说尤为如此。1944年5月，我的父母被带走时，姐姐和我受邀搬去布达佩斯。待在拜赖焦新村，等事情过去，这本应是正常举动。假如我们那么做了，就活不到今天。我欠布达佩斯一条命。它为我的姐姐和表弟们还有我提供了避难所，它让我们远离奥斯维辛。当时对我来说，布达佩斯唯一重要之处是它的大小：它让我们成为大海中的针。到1944年5月，事情很明显：省城里的人不会阻止驱逐行动，他们在遵循政府的命令，而政府想要所有的城镇judenfrei。除了几个特殊的年头，我身边的官方文化一直不诚实，并对我充满敌意。尽管我没有犯下任何反对它的罪行，但我最终意识到刑期已经开始了。

每个词都将作家置于新境况中。他被即兴演说那令人喉咙发紧的陶醉感带着走。如果一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有任何价值，那么这一天，从日出到日落，就是他永久的朝圣。日常行为和神圣行为之间并无界限。

老练的朝圣者承认，很可能与圣人的对话永远是单向的。他可能一生都在跟某个不存在的人讲话。然而，即便他得不到任何回答，即便圣人从不现身，与其谈话还是毫无问题的，永恒的此时此地。

在这样的私密朝圣路上，我们追溯一条以往走过的道路，重新经历往事，走出奴役国度，在苦难道路上向着十字架跋涉。我们的人带来了羔羊，最为贵重的祭品：儿子。他高兴地将脖子献给沉重的刀刃。他出现在隐藏的上帝面前，为其奉献自己的生命。书籍也是如此：命运把我们送到天使面前，让我们与其不断搏斗；永恒的辛勤劳作，固定下痕迹，使位置可见。作为朝圣的作家道路？也许是对不可企及之物的追求校准了这条平行线：写一本在它之后其他书都无须再写的书，其后只剩钟声、闪现和无意识。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投入那本终极之书，在每个醒着的时刻思考它，与它同居，一个充满希望但终究难以捉摸的情人。

我想要写那种随时可能被叫停的书，那种永远不会完成，只能中止的书。再喝一杯酒，再抽一斗烟，我就没什么可羞耻的了。

谁在观察我？谁是我命运的全知守护者？为什么不说出个谁来呢。如果上帝创造了我，那么他一定可以观察我。我们的梦想是一个宇宙，它为我们而创造，并照顾我们。如果我们把上帝编织进故事里，他会像一个任由我们支配的人，虽然偶尔会隐藏起来。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很像。如果他同时是生命之神和死亡之神，那么他既好又坏，我们也是如此，而他仅仅是在模仿世间上演的游戏，联合了理智和盲目的偶然事件。

我曾认为罪恶是愚蠢肤浅的：罪人缺乏耐心、急躁、惊慌失措并且歇斯底里。要是他们能想象出假如自己从未犯下罪恶会怎样就好了。近来我倾向于认为，厌恶和残忍是独立的激情，可以填满生命，不管它是愚蠢还是智慧。就算是最坚定的相对主义者也能分清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恶棍，尤其在他被其中一方的行为影响时。我们辨别一个人是好是坏，这件事出于本能，就像异物入眼后会眨眼一样自然。

我经常微笑。我父亲也有微笑的天分。它源于我们单纯的天性。你越聪明，就越生气。当有人问我是否快乐时，我回答：总是很快

乐。当有人问我有没有不快乐过时，我的回答是：很少。这表明我很单纯。

1977年当我在柏林靠德国奖学金学习时，我母亲是我跟布达佩斯的主要纽带。她是我在匈牙利唯一的血亲。我是个糟糕的通信者，每周给她打电话。我努力用礼物让她开心，缓和她的财政状况，在春天，我邀请她来柏林待一个月：一双温暖的靴子无法代替微笑和充满“埃德桑尼姆”——字面意思是“我亲爱的母亲”——的漫长从容谈话，这句稍显过时的匈牙利语听起来再自然不过了，却无法自然地翻译成其他语言。

我们道别时，我吻了她的手。她的手指关节变粗了一点，她带着幽默的遗憾说，她皮肤上已经出现了棕色小点。“老年是丑陋的，我的儿子。变老没什么好的。”为了安慰她，我说，如果包含好灵魂，苍老的脸也会是美丽的。我忍住没有问自己母亲是否美丽。她从来不美。但是她的双眼有一种东方式的神秘，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明亮且愈加富于冥想。

我母亲很高兴我是作家。她会借助词典阅读我的作品的德语、法语和英语书评，查询每个她不认识的词。她会说一些赞扬的话，接着开始担心相应的作品能否在布达佩斯出版，然后让我惹上麻烦。不要把一切都写得很绝对，她说。“你可以写一些好作品，而不激怒他们，我的儿子。”

这件事会让她无比高兴：在布达佩斯的电视上看到我，然后第二天接到朋友们的来电，受到众人的祝贺，比如她以前的理发师，或者楼里的年轻女门房，甚或是那个面善的邻居——她丈夫是一名狱卒，以其克制的行为而闻名。

我与政府间的问题几乎没让母亲吃惊，因为她本人跟当局也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她觉得自己微薄的津贴不够用，但如果能多一半，

她就会非常满意了。正午她喝一小碗带土豆的汤，以及一两个鸡蛋。听老人卡达尔说话会让她睡着。“你说得够多了。”她会对他这么说，然后关掉电视。

早上六点，她会在厨房喝一杯咖啡，然后回到床上阅读或者听收音机到八点，接着花一个小时锻炼和洗澡。她从不看私人医生，因为不想花钱，免费的诊所医生对她来说就很好。每年能得到一张为期两周、工会赞助的药用温泉门票，她就欣喜若狂了。在那种场合，她和她的老朋友玛丽卡共用一个房间。玛丽卡从未结婚，还有点古怪，但是母亲已经习惯了她的怪异之处。她们会在咖啡馆喝浓缩咖啡，在公共休息室看电视。她们还会在某个下午享受一小杯白兰地（然而，一瓶干邑白兰地在我母亲的橱柜里放上半年才喝得完，而且她还在用它招待客人）。

1978年，我没有留在旧金山，虽然我可以选择为许多政治运动效力：美国印第安人或北爱尔兰天主教徒或卡斯特罗区的同性恋或抗议核能的日光室爱好者或澳大利亚原住民。我可能选择韩国CEO、来自比利牛斯山的公社成员、生物能分析的导师、苏菲派[注]大师、悬空漂浮的冥想者、信仰治疗师或者犹太人归耶稣运动[注]。我可能参加非洲的抵抗运动，主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或者我只是留下来，玩电影、全息摄影、视频、电脑，参观监狱里的犯人，变成同性恋或者搬进珍妮丝·贾普林[注]自杀的粉色房子里。但是我没有。我本可以在某个省城里谋得一份教职，在那里，我此刻会走进中心广场，经过河岸进入咖啡馆，点一份装在纸杯里的苹果汁，然后看年轻的男人女人因为试图往前走而任性发怒。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做。

我书架上的书是有生命的，祈求我看看它们，把它们从黑暗中拿出来，跟随它们。盒子在我身后填满堆起，我废弃的作品追着我。我迟迟不打开它们，不追忆逝去的时光。那么多的褪色照片，到现在只

觉得隐约熟悉的名字。但是当天堂大发慈悲时，天空会打开一条裂缝，然后无中就会生出有来。

跟布达佩斯或柏林相比，即跟我住得最久的地方相比，我的工作在乡下做得更好。然而，因为我同时生活在这两种地方，极端赞成或反城市的文化哲学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事实上，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我的领域：我享受在稠密和稀疏之间、自然和人工之间来回切换，我不想在任何一边定居。

我冲出房子，来到草坪上。你从村里看不到这个地方。我停下来，转身。广阔的空地令人精神振奋——环绕的小山、三百年前就遭受洗劫的城堡废墟，以及孤独。明亮月光下空无一人。我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努力。

时间来了又走，我还在柏林的艺术学院，用我的匈牙利方式重读德语词的首音节。我给德国人提供我拥有的建议，做第无数个介绍演讲。我再次当选主席。没有别的候选人。

我尽自己所能地供养家人，并尽全力不去干涉他们的生活。我承认（并接受）我妻子是一家之主的事实，并竭尽全力遵从她。我努力为家庭提供温暖和鼓励，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麻烦够多了——焦虑、失败、孤独、悲伤、失去——家长永远不知道它们的范围有多广。能在脚步声围绕中开始每一天，我就很满意了。

我也可能是一只有良心的农场动物，定期挤奶，靠微薄的饲料生存。对家庭来说，我不是总统先生，我只是厨房桌边诸事中一个简单的微笑。谁能分辨我的描写有多真实呢？即使是我母亲，在我写她时，她也是我想象的产物，就像在写自己时我也是如此。任何文字作品都是故事，而非现实。

今晚，在柏林艺术学院和科学院的联合座谈会上，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科学和艺术是否仅仅是奢侈品。它们当然是。几乎所有人性都是奢侈品：道德、宗教、谈话、娱乐、爱、哀悼——全是奢侈品。一个人不偷、不骗、不杀害弱者、不用真实或捏造的指控谴责竞争对手也是奢侈品。只有在军营、监狱和集中营里，才没有奢侈品。

别人告诉我，我无法逃脱最终的痛苦，我不会复活，在那边什么都没有。为了回答这些话，我需要一匹白马，深呼吸，以及一株白寡妇大麻，在漆黑的夜里，当家人沉睡时，愤世嫉俗地寻欢作乐。我不承认自己有罪，也不对他人怀有任何期待。

叙述者做着准备：他吃药、举重、维持生命。如果他乖乖跟随纸上的笔迹，他就能发明并借助想象力间接体验各种情景。今天就是小说，永恒的今天。最好的时刻是那些没有他就不会发生任何事的时刻。叙述者的自由意味着终身监禁。他甚至在没人鼓励他写作的时候坚持写作。他在追求什么？多活几天，多写几句，以及让家人过得幸福。

他无知、无助并且不知所措，除了面对衰老外别无选择。与此同时，他的过去，也就是他的财富，增值了。老照片让我们相信，作为孩子我们是一样的人。给我讲一个无聊的好故事吧，我的朋友。我们会补上细节，不停旋转，重复说过的话。

在我所有的身份中，我一直是个写作间谍：福利官员、城市研究员、异见者。（我们给自己惹了多少事情！）因为1989年的政治剧变，我当了一阵子圣人，一个需要思考的身份。这是否意味着我误入罪恶之途，把自己卖给了世俗虚荣的恶魔?

我起床。腿抽筋了。我跌跌撞撞，从桌边跳到扶手椅上，又跳回去。我躺下来呻吟：站着更好。一个无眠之夜，一个太过漫长的夜晚的形象。唯一的药方是坐在桌前，做我平常所做的事。

每句话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一个无附属物的单元，一个闭环，好像内聚力在把许多镁铅弹聚拢起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一堆鱼卵，或者受到摇晃后树枝上聚集的蜂群。不止一次，我觉得自己像一滴从水管跌落的水珠，在无声无息地消失。

木桥下小溪潺潺流过。邻居的母鸡疯了。漫长的干旱后，近来下了不少雨。葡萄开始枯萎：茎把它们吸干了。我们坐在露台上。云层在流泪，空气中飘浮着水分。鸟儿慵懒地吱喳叫，接骨木逐渐变黑。一棵杨树开始在血红色的大太阳下闪闪发光，好像洒满了玻璃。

在码头尽处，我突然怀疑，我抵达了尽头的尽头，从这里再也无处可去。少年时期，我曾想象，一个人在码头尽处坐上几小时，才能等来深刻的思想。考虑到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出现，我跋涉到圣乔治山上，来到衰败的酿酒坊阳光普照的花园楼梯上。天上有风筝在飞，朝我的方向加速的空中画像带来一阵突然的阴影和风。

隔壁的女人在购物回家的路上跌倒了。我们把她扶回家，然后探望了她几次，但是躺了一会儿后，她就起来了：给椒盐脆饼干做造型，在上面涂一层蛋清，撒上碎奶酪。我期待能咀嚼饼干，喝她的葡萄酒陈酿。我闻到了她身后烤架上的鸭子的气味：她的孙辈们明天过来。

下午我会出去，到有人有生气的地方。我惊奇地凝视集市小摊上的货物，举着一个高脚酒杯，给我女儿苏西买了一个哨子和一串珠子，给我儿子约西买了一把带雕花手柄的折叠刀，给蔑视财产的少年诗人阿龙买了几份羊肉串。尤特卡给她的植物园买了一些红罗勒。

我们参观了附近村庄考波尔奇[注]的艺术节。我们看见一只木猪，眼睛闪闪发光，嘴里有一个小屏幕，用丰富的细节展示了屠宰过程——但它是倒序播放，从香肠变回活畜。我们听到它的惨叫，观察放大的开膛破肚细节，眼睛被剜下切碎，鲜血迸射。我们觉得我们在彼

此吞食，把彼此的血液排空到碗里，做成香肠，或者把它蒸熟，热气腾腾地浇在炒洋葱上。

接着有一个潘趣(注)跑出来狠击幽灵，而一旦他狠狠打了它们，它们又反击了他后，一旦所有的烤薄饼卷都被人好好享用后，起初的毛毛细雨就变成了瓢泼大雨，表演中断了。鼓和钹充斥街道。公交车动不了了。一个苗条的女孩不停鞠躬，肩上有衣领状的木道具，她古怪的头颅就在里面上下摆动。一名穿靴的男演员噼啪敲击了穿靴的双手，然后分裂成一个四腿生物，更准确地说，是两个相互吵架的人，从背上抖落血迹斑斑或面粉斑斑的头盖骨。其中一个有只眼睛外凸，仿佛番茄。

我加入了队列，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绿白相间的荷兰伞，站在儿子们身边，他们狼吞虎咽下一个又一个烤薄饼。附近的教堂、小屋和酒吧里充满了可看的东西。

唯一的悲伤音符是夏季的圣诞老人，他拉着雪橇，棉花胡子下垂，正从他的脸上融化。他迷路了，沦落到夏季，无比悲伤地在砾石地上拉着雪橇，寻找更好的世界。去年他是村里的坏男孩，拍打漂亮女人的臀部，当发现别人给他矿泉水解渴时，把瓶子扔得老远，还打了几个夸张的喷嚏，让阿龙和约西着迷。但他今年很规矩：说了几句话后就离开了，垂头丧气，然而绝不放弃希望，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充满白雪的美好世界。

在一家酒吧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生动的场景，还有匈牙利大扬琴音乐，外面有几辆卡车，车上有演员在蹦跳在冷笑在尖叫在使劲踩踏，有小孩子在找妈妈，有球在滚动，有司机在打呵欠，还有啤酒、红酒和帕林卡在流动。一个健壮的家伙拦下汽车，叫人们品尝他用消防车运来的啤酒。

我的儿子们最喜欢夏季圣诞老人，然后是四腿两头的奇人。苏西两个都最喜欢。

很快就到2000年了。要把那些头大身长的“9”都换成大腹便便的“0”，我对此觉得遗憾。“9”有着巨大且做回顾状的头，看起来非常明智，而三个“0”则意味着对于成就沾沾自喜。

千禧年结束了。该结账了。服务员走了过来。

“我度过了一个20世纪。”我告诉他。他犹豫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已经明确表示了我要付钱。

“那第二个千年怎么办呢？”他问。

“我必须连它也一起付吗？”

“此外又有谁呢？”

“好吧。把它加到账单里。”

但是服务员悲哀地摇了摇头。“第一个千年怎么办？”

我惊恐万状。“你打算追溯多久远？你不能让我对一切负责，不是吗？”

“此外又有谁呢？”他说，再次悲哀地摇了摇头。

这次我生气了。“我要见老板，上帝本人！”

而上帝做什么工作呢？他出现在阳台上。是他本人。他用一根手指指着我。我从桌边站起来，看着他的眼睛，然后把我的手指指着他。我们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主与客，父与子。

“我要叫你母亲过来。”他终于开口说道。

“而我要叫你女儿过来。”我终于开口说道。

女人们来了。孩子们还没吃饭。她们叫我们去洗手，坐到座位上，并停止斗嘴。“顽固的老家伙。还在相互指着手指。”我们坐下来，老人和我都很为难，等着上菜。

晚饭后，老人还不放弃。“你的账单还没付。”我们差不多商定了一个价格。我伸出手。老人的手慢慢上升。我等着它碰到我的手。它会停在哪里？我不知道。

何处是家？太阳系中立足之地。紧握钢笔端坐之处。我在家里的床上醒来，在家里起床去卫生间，从家里迈出大门，问候每个遇见的人。

家就是我走过的那几平方公里。家就是拜赖焦新村的犹太墓地，废弃了五十年，竖立着我祖父母的高耸黑色花岗岩墓碑。（我曾祖父的白色大理石墓碑，高度不及他们的一半。）家就是我盯着马路对面的面包店标志时迫切想要逃走的教室。（我的同学都被杀死，学校也已拆毁。）

何处是家？他们不会杀死我的地方，我知道孩子们安全的地方，个体和文字受到高度推崇的地方，做我自己和想我所想能得到尊重的地方，有一个能在饭后喝酒聊天的安静厨房角落的地方，孩子们玩捉迷藏和建造沙堡的地方，尤特卡抬着脚坐在扶手椅上读书的地方，我能在上山的路上四处停下来喝杯酒，并在友好邀请后，再次昂首阔步下山的地方。

家就是伊丽莎白桥中央，我旅行归来时低语“多美啊”的地方。它是一幢长满了爬山虎的房子，我寻找钥匙，气喘吁吁地爬到三楼，两

边肩膀各背着一个包，并且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生机勃勃的声音。我到家了。

---

1. 海吉毛高什（Hegymagas）：匈牙利维斯普雷姆州所辖的一个村。
2. 豚草花粉易引起过敏和鼻炎。
3. 拉奇（Laci）：拉斯洛（László）的昵称。
4. 六英尺三英寸约为一百九十二厘米。
5. 盖勒特山（Gellért Hill）：位于布达佩斯的一座山峰，高二百三十五米，在山上可俯瞰布达佩斯的景色。
6. 蒂罗尔州（Tyrol）：位于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多山，拥有许多著名滑雪胜地。
7. 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88—958）：又译杜伽尔，法国小说家，《蒂博一家》的作者。
8. 铁卫团（Iron Guard）："二战"期间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党。
9. 原文为法语。
10. 普洛耶什帝（Ploieşti）：罗马尼亚南部城市，普拉霍瓦县首府，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以北五十六公里。
11. 波雅尔（boyar）：罗马尼亚贵族头衔，仅次于大公。
12. 达契亚（Dacia）：罗马尼亚古地名，现罗马尼亚中部偏北和西部，在这里即指代罗马尼亚。
13. 图尔达（Torda）：罗马尼亚西北部城市，位于克卢日县（罗马尼亚的县相当于国内的省）南部，全县第二大城市。
14. 比尔克瑙（Birkenau）：距离奥斯维辛三公里的一个集中营，被称为"集中营二号"。
15. 犹太律法禁食猪肉。
16. 磺胺甲基噻唑（Ultraseptil）：匈牙利当时流行的抗菌消炎药，现已被淘汰。
17. 施韦夏特（Schwechat）：奥地利城市，位于维也纳东南，以啤酒而闻名。
18. 弗洛里茨多夫（Floridsdorf）：维也纳行政区，位于该市东北部。
19. 约西卡（Józsika）：约瑟夫（József）的昵称。
20. 《扬基歌》（"Yankee Doodle"）：美国独立战争时流行的一首歌曲，通常被视为美国的爱国歌曲。

21. 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由美国国会出资建立的广播和通讯电台组织，对苏联及东欧等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

22. 埃克塞特（Exeter）：英国城市，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当地建有埃克塞特大学。

23. 绍尔戈陶尔扬（Salgótarján）：匈牙利北部城市。

24. 博尼哈德（Bonyhád）：匈牙利西南部城镇。

25. 海法（Haifa）：以色列港口城市。

26. 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德国两个相邻村庄，纳粹曾在此设集中营。

27. 以上提到的名字均为匈牙利诗人。

28. 巴比契（Babits，883—94）：匈牙利诗人、散文作家、翻译家，翻译了但丁的《神曲》。

29. 青年派新艺术（Jugendstil）和分离派（Secession）都属于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前者为德国的分支，后者为奥地利的分支。新艺术运动主张运用高度程序化的自然元素，属于折中的历史复兴风格和现代风格的过渡。

30. 立体主义（Cubism）：0世纪初的先锋艺术运动，特点是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

31. 装饰艺术（Art Deco）：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流行的艺术运动，特点是对几何形状和清晰线条的运用，颜色鲜艳、装饰繁复，往往代表了奢华。

32.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90—976）：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其小说《人的命运》曾获龚古尔文学奖。

33. 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938—）：匈牙利社会学家，《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是他和本书作者合著的社会学作品。

34. 激浪派（Fluxus）：0世纪60年代前期从欧美发展起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艺术思潮，主张个人从生理的、精神的、政治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反对权威，反对把艺术家区别于一般人，反对把艺术分成绘画、雕塑等不同领域，甚至认为艺术与生活应该没有区别。

35.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880—98)：法国诗人，剧作家，艺术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先驱。

36. 翁德雷·厄岱（Endre Ady，1877—1919）：匈牙利诗人，作品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影响。

37. 《滑稽的环舞》（Antic Hay）：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出版于923年的小说。以上两本书都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迷惘的生活。

38. 塔西佗（Tacitus，58—117）：古罗马历史学家。

39. 《沃洛科拉姆斯克大道》（The Road to Volokolamsk）：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贝克1944年出版的关于莫斯科战役的小说，又译为《恐惧与无畏 》。

40. 捷尔吉·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41. 《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出版于947年的小说。

42. 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802—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民族英雄；匈牙利848年革命领导人，担任革命中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元首。

43. 福林（forint）：匈牙利货币。

44. 菲勒（fillér）：匈牙利货币，现已废止。一福林等于一百菲勒。

45. 伊姆雷·纳吉（Imre Nagy，896—958）：匈牙利政治家，953年到955年出任政府总理。

46.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93—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

47.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

48. 埃米尔·齐奥朗（Emil Cioran，1911—1995）：罗马尼亚哲学家，也译作“萧沆”。

49. 伊什特万·毕波（István Bibó，1911—1979）：匈牙利律师、政治理论家。

50. 拉斯洛·内梅特（László Németh，1901—197）：匈牙利作家、戏剧作家、散文家。

51. 米克洛什·圣库提（Miklós Szentkuthy，1908—1988）：20世纪最多产的匈牙利作家。

52. 波茨坦（Potsdam）：德国城市，勃兰登堡州州府，位于柏林西南，当时属于东德。

53. 原文为法语。

54. 费希特（Fichte，762—84）：德国古典哲学家，主张“绝对自我”，有排犹思想，并激发了德国国家主义。

55. 斯宾诺莎（Spinoza，632—677）：犹太裔荷兰哲学家，《伦理学》（Ethics）是其最重要的作品。

56. 《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黑格尔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对西方哲学影响深远。

57. 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58. 拉科西（Rákosi，189—1971）：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1945到1956年期间的党和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59. 包姚（Baja）：匈牙利南部城市，属巴奇-基什孔州管辖。

60. 托洛茨基（Trotsky，879—940）：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十月革命直接领导人，后于党内斗争中失败，被开除出党并流亡海外。其观点一般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

61. 伊拉斯谟（Erasmus，466—536）：尼德兰（今荷兰）哲学家，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

62. 1849年，俄国沙皇和奥地利皇帝联合镇压了匈牙利人民起义。

63.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876—967）：当时的西德总理。

64. 耶利米（Jeremiah）：《圣经》中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时的一位先知。

65. 玛丽娅·特蕾西亚（Maria Terézia，77—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哈布斯堡王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

66. 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基督教非传统教派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的信徒。

67. 佩奇（Pécs）：匈牙利第五大城市，巴兰尼亚州首府，靠近克罗地亚。

68. 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894—940）：苏联犹太小说家、戏剧家。

69. 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189—194）：波兰犹太裔作家、美术家、文学评论家、美术教师，被认为是0世纪最出色的波兰语文体家之一。

70.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906—989）：20世纪爱尔兰、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

71. 此处有爱情锁，即恋人们将挂锁锁在桥上，象征爱情永恒。

72. 裴多菲（Petőfi，183—1849）：匈牙利爱国诗人和英雄，自由主义革命者，他被认为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

73. 尤利（Juli）：尤利娅（Júlia）的昵称。

74. 塞格德（Szeged）：匈牙利第四大城市，琼格拉德州首府。

75. 乔班考（Csobánka）：匈牙利佩斯州所辖的一个村。

76. 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苏联作家，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代表作为《古拉格群岛 》。

77. 安德罗波夫（Andropov）：苏联政治家，长期担任苏联党政领导职务，曾任苏联克格勃首脑，后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78.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936—20）：捷克作家及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于993年到2003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79. 布达弗克（Budafok）：布达佩斯第二十二区。

80. 《好兵帅克》（Good Soldier Švejk）：又译《好兵帅克历险记》，是捷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81. 吉拉斯（Djilas，1911—1995）：生于黑山，曾担任过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

82. 基辛格（Kissinger，923—）：美国前国务卿。

83. 即之前提到的费伦茨·费赫尔，费里（Feri）是费伦茨（Ferenc）的昵称。

84. 原文为法语。

85. 东方集团（east-bloc）："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对中欧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其范围大致为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

86. 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纳粹主义。

87. 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世界性的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组织，旨在促进世界各国作家间的友谊与智力合作，并积极保护作家免受政治的压迫。

88. 苏菲派（Sufi）：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

89. 犹太人归耶稣运动（Jews for Jesus）：基督教宣教团体专对犹太青年传教的运动。

90. 珍妮丝·贾普林（Janis Joplin，194—1970）：美国歌手、音乐家、画家和舞者。

91. 考波尔奇（Kapolcs）：匈牙利维斯普雷姆州所辖的一个村。

92. 潘趣（Punch）：木偶剧潘趣和朱迪（Punch and Judy）中的主人公。